

三
耳
关

生活

2017.8.28
2017年第35期
www.lifeweek.com.cn

周刊



倾听情绪

正视抑郁症

951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BENTLEY



卓绝魄力，纵贯壮阔人生

Bentayga. 宾利添越超豪华SUV

永不言最，旨在非凡。客观而言这是宾利座驾综合性能之翘楚，迄今为止。

敬请登陆百度，搜索“宾利”，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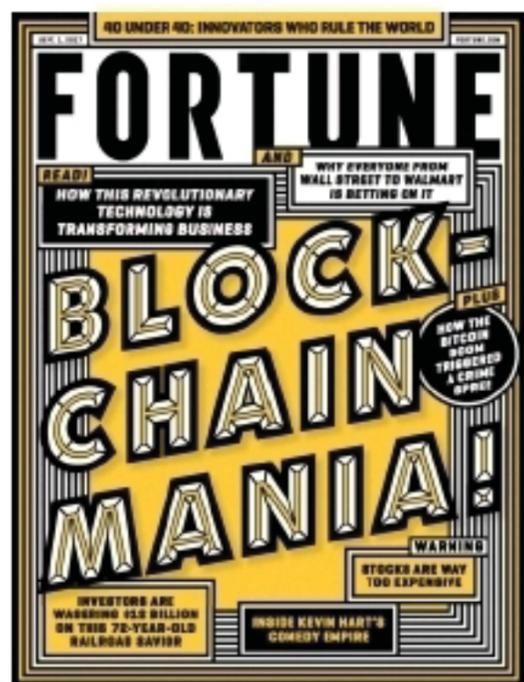


广告

宾利官方网站: www.china.bentleymotors.com 宾利客户服务中心: 400 119 8880



微信扫描二维码
关注宾利汽车中国



《财富》(美国) 2017.9

区块链热潮

不久前，发行达世币的 Dash 公司宣布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工程学院合作，建立区块链 (Blockchain) 实验室以深入研究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是互联网金融领域中特别火的黑科技，通过去中心化和去信任的方式维护一个可靠的数据库，目前正受到其他行业的青睐。许多高校都已开始了区块链研究，Dash 公司则表示新实验室将成为第一个致力于积极研究技术应用的官方研究机构。



《明镜》(德国) 2017.8.19

1 / 特朗普无法原谅的耻辱

8月12日“弗吉尼亚种族骚乱”发生之后，特朗普虽发表声明，但态度暧昧，引来民众不满，这场灾难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政治丑闻。在特朗普之前，从未有过美国总统对新纳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暴力如此轻描淡写过。对许多共和党人来说，现在的特朗普已经走得太远了。无论是在全球范围，还是在自己的党内，这位民粹主义领导人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

《旁观者》(英国) 2017.8

3 / 性工作者：当代社会的奴隶

舆论曾经一度制造过“快乐妓女”的神话，记者通过在 40 多个国家 250 余次的采访试图还原全球大多数性工作者的真实生活，引发出关于人权、人性和法律制度在这个问题上的多维思考。那些呼吁让卖淫合法化和正常化的声音最大的是从中获利的人：皮条客、赌客和妓院老板。他们以“自由主义”为幌子，实际是在以一种商业交易的行为将这些性工作者奴隶化。实际上，大多数性工作者都处于难以想象的家庭困境和生存压力中。

《新科学家》(英国) 2017.8.19

2 / 是什么让一个普通人成为极端分子？

恐怖主义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意识形态冲突或宗教动机，也不能简化为个人障碍。那些恐怖分子通常被嵌入到一个家庭和友谊的网络中，效忠于一个封闭的群体，即部落、文化、民族、宗教或政治。在“伊斯兰国”(ISIS) 控制的地区，许多平民自愿或不自愿地与他们合作，形成了一种军事化的公共关系。许多圣战组织是由上层中产阶级领导的，吸引到社会精英的孩子们转向恐怖主义。

《国家地理》(美国) 2017.9

4 / 大脑成瘾的治疗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临床神经科学家安娜·柴尔德里斯 (Anna Rose Childress) 通过分析可卡因上瘾患者的脑部扫描图，发现成瘾类药物能促脑部多巴胺的生成，后者作用于大脑的各区域，激活奖励系统。但过量的多巴胺并不能带给人快乐，反而让人容易上瘾。柴尔德里斯发现病人左脑区域经可卡因刺激 33 毫秒后，奖励通路即被激活。她试图找寻一种抑制奖励通路激活的药物，帮助人们治疗大脑成瘾。





生生不息，因你行动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一。WWF在全世界拥有500万名志愿者以及一个在100多个国家活跃着的网络。WWF的使命是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创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为此我们致力于：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确保可再生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降低污染和减少浪费性消费的行动。

在中国，WWF的工作始于1980年的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是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保护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37年间我们在中国的项目领域由最初的大熊猫保护扩大到物种保护、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可持续发展教育、气候变化与能源、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等领域。



实际上没有你，就没有我们，现在加入WWF



P30 封面故事
正视抑郁症
倾听情绪

- 32 从神经衰弱症到抑郁症
- 40 抑郁症：吃药还是不吃？
- 48 停下来，倾听你的情绪
- 58 爱的拯救：一个家庭的历程
- 62 关欣：告别昨天
- 66 长风：“互助的本质是自助”
- 70 从不知抑郁是何物，到与之相处
- 76 李子玉：与抑郁症的对抗和共存

P88

夏洛茨维尔事件：种族主义的幽灵在美国游荡



P118

罗伯特·卡帕，定义战地纪实摄影

**社会**

- 时事：夏洛茨维尔事件：种族主义的幽灵在美国游荡 88
- 热点：4岁女童被埋事件：家门口的伤害 92
- 热点：乐视坍塌：“蒙眼狂奔”之后的乱局 96
- 调查：天津“瓷房子”：一个收藏家的借贷罗生门 104

经济

- 市场分析：联通混改的新高度 86
- 商业：叮叮超级车：出行领域的“消费升级”新尝试 114
- 商业：宝马提速本土化 116

文化

- 艺术：罗伯特·卡帕，定义战地纪实摄影 118
- 文化：“互联网正在成为社群与文化的破壁者” 130
- 文化：如果一个人完全抛弃人文学科会怎么样？ 132
- 设计：意大利广场的神秘与忧郁 136
- 时尚：为什么时尚大片里有那么多动物？ 142

- 书评：哈佛的中国哲学课 150
- 书与人：复数的平野启一郎 152

专栏

- 邢海洋：中国人会成为世界首富吗？ 16
- 张斌：绝境重生，每个人都可以的 148
- 宋晓军：两场不同的涉核“口水战” 149
- 朱伟：余华：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8） 156
-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58

(封面供图：视觉中国)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0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60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7年第35期，总第951期，2017年8月28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o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孙璐璐 Sun Lulu 王海燕 Wang Haiyan 王梓辉 Wang Zihui

刘周岩 Liu Zhouyan 刘畅 Liu Chang 王珊 Wang Shan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张富伟 ZhangFuWei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乔龙宁 Qiao Longning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宇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 lianhuawei@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2100585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883566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鑫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1 · 宾利

3 · WWF

17 · 三联全媒体

65 · 生活周刊

75 · 松果生活

79 · 《模范监狱》海报

135 · 三联中读

159 · 三联书店

封三 · 熊猫茶园

封底 · 哈苏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
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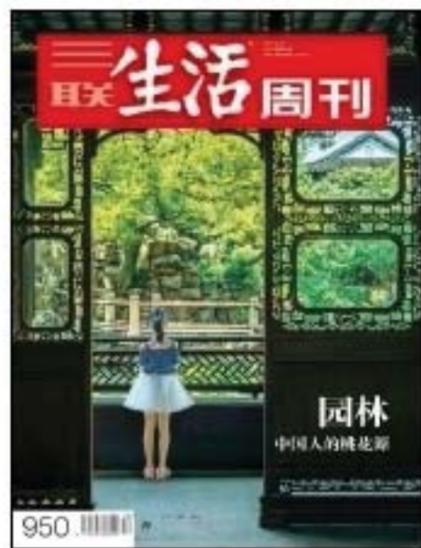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电邮：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园林

这期周刊看似讲园林，但跳脱出了通常以建筑、布景、设计等“技”为主的讲述方式，实则是在梳理从古至今人们对文房清供、茶酒花香这种真情趣的“境”的推崇。在封面文章的采访中，王澍说，在现在这个发展狂热的社会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平静的世界，它从来没有消失，只是暂时隐匿”，恰好与封面标题把园林定义为“中国人的桃花源”相互呼应。这大概是古代士人阶层最美好的向往，这种向往恰好折射在古人对建筑、花木、叠山和流觞、雅集中，成为中国人精致隐逸的园林生活。

(@常悟)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在美国取药

华裔移民邹先生最近验了一次血，医生发现他有一项指标不正常，便给他开了一个疗程90天的药方。当他去美国知名连锁药房CVS拿药时，却被告知他的保险公司蓝十字已经在电脑系统里对这种药附加了限制，拿药需上报蓝十字批准，费时一周。

邹先生问药房的工作人员：“难道医生的药方不是批准吗？”一位美女药剂师很有礼貌地告诉他，由于这种药物是管制品，本着对病人的关心和谨慎，保险公司要为他的健康双重把关负责。邹先生听了心里美滋滋的，对保险公司感激涕零。

两周过去，渺无音讯。邹先生几次致电药房询问，终于在第三周得到了“请来拿药”的喜讯。他匆匆赶到药房，才在拿药时发现只有30天的剂量。邹先生无奈赶回家，拿起电话拨通蓝十字保险公司。几经周折后，保险公司终于批准了原药方90天的药量，邹先生便匆匆二赴药房。

到了药房，工作人员查遍电脑却怎么也找不到邹的药方。反复核查后，才弄清楚蓝十字的业务代表或许忙中出错，把批示发到了三年前邹先生旧址所在地的那家CVS药房。好在都是连锁店，老药房同意把药方转给新药房，但需要等一个小时。无奈之下，邹先生只得忍住疲劳，漫无目的地在附近的商场闲逛。

好不容易等到一小时，兴冲冲三顾药房。正在当班的一位帅哥药剂师一本正经地向邹先生宣布，药方虽已转来，可是由于他要配的是管制药品，拿药仍需上报保险公司批准，过程需要一星期，所以今天不能拿药。听着这些熟悉的说辞，邹感到哭笑不得。

邹先生再也忍不住了，只感到血冲脑门。他夺过电话，也顾不得君子形象，便对着保险公司的业务代表打起了抱怨的连珠炮。在邹先生一再催问缘由下，业务代表的上司主管才告诉邹，这涉及保险公司和药房内部复杂的成本控制和操作程序，他不便透

露，只是向邹解释问题已得到解决。

他的解释让邹先生更加生气，邹先生激动地告诉他，我还算年轻，有精力花上三周时间往返奔波与你们周旋。可天下有千千万万的耆老，或许已无力自理，或许已无力说话，或许虚卧病榻，等药救命。邹先生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大声，周围一片静寂。药剂师垂首肃立，保安在远处探了两下头，看来也不想干预。排队取药的顾客们洗耳恭听，从他们的眼神里，邹先生看到的不是漠然，而是一种共鸣、期许和鼓励。

当邹先生拿着90天的药包回到家里，已经精疲力竭，一下瘫软在沙发里。他回想着保险公司主管说过的话，顺便去网上查了一下。当他看到这种药的零售价为1750美元后，才恍然大悟。看着这些平凡得有点不可思议的药，真的会有那么金贵吗？继续查询，才发现同样的药品在美国境外如墨西哥的药房售价竟然100美元还不到。那为什么这些药品在美国就会卖这么贵呢？美国的医药体系或许真的也需要一款灵丹妙药了。

重庆 陶诗秀

划片招生，各显神通

每年的8月中旬，是我国不少地方小学新生入学的集中报名时间。为了均衡教育资源，避免有的小学招不满学生而有的小学“生满为患”的扎堆就学现象，很多城市的教育管理机构都本着就近上学的原则，对所有小学制定了相应的“划片招生”的规定。我所在的县城也不例外，今年7周岁的小外甥女豆豆也到了入学的年龄。按照县城教委的划片规定，豆豆应该在距离她家户籍所在地不远的县城第三小学报名上学。然而，妹妹和妹夫都在县城第一小学附近做生意，而且，相对来说，社会上普遍认为第一小学的教学水平比第三小学要高一截，所以，为了更有益孩子发展和做生意接送孩子两不误，他们打算把孩子安

排在他们做生意所在地附近的第一小学上学。

然而，他们到了第一小学，向负责招生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工作人员便以不符合相关规定为由，客气地拒绝了妹妹和妹夫的要求。工作人员的拒绝是实际情况，妹妹和妹夫没有办法，只好另做打算，去规定的小学报名。然而，就在他们去划片所在学校报名的途中，妹夫却意外得知，划片招生并不是什么死规定，只要有关系或者脑袋瓜儿足够灵活，去自己划片区之外的学校就读并不是什么难事儿。

妹妹知道我的一个要好朋友的爱人就在第一小学工作，她便第一时间找到了我，想让我帮她了解一下，是否还有希望让豆豆去离他们做生意更近的第一小学就读。

为此，特意先向要好的朋友打探情况。据朋友说，每年的8月份是全县小学领导们的“丰收月”，这已经是教育系统乃至整个圈子里的公开秘密。

所谓“丰收月”，朋友给我做了详细的说明。事实上，像我妹妹这种情况，无论出于实际方便需求也好，还是为了选择更好的教育资源也好，不打算在教委划定的学校就读的学生非常普遍。而这时，不少掌握接收学生大权的小学校的领导们，便充分利用县教委制定的所谓的划片招生这个门槛儿，堂而皇之地将自己片区范围以外报名的小学新生拒之门外。然而，一来教委这样的招生规定只是指导意见，二来涉及的实际情况十分复杂，比如新生的户口迁

移问题、学生家长工作或住房的买卖问题等实际现象存在诸多变数，加之教委对新生入读学校的监管成本过于庞大等因素，所以，在实际招生工作中，学校自己有足够大的操作余地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招不招收划片范围以外的新生的“决定权”，实际就掌握在小学校长们或部分具体负责招生的工作人员手中。

在这之前，我总认为基层小学教育机构是清水衙门，是一方净土，但通过朋友偷偷向我透露出来的一点“真相”，我才意识到，有些事情还真不像我想得那么简单。依我的那位朋友看来，豆豆去第一小学上学并非不可能，只是变成了一件考验家长的事情。

山东临清 卢长平

房子是用来干吗的？

刘叔的儿子今年参加高考，成绩不错，上周亲朋好友一群人来到刘叔家里祝贺，刘叔虽然满脸堆笑，但笑容背后却有一丝愁容，原来，刘叔在为儿子未来的学费发愁。

刘叔虽然家在农村，但夫妻俩就一个儿子，这几年刘叔刘婶两人在外打工，一年下来也有好几万元的收入，前年刘叔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了两层小楼，房屋墙面贴上了洁白的瓷砖，屋内装饰也是简洁大方，一点也不比城市普通人家差，听说去年刘叔还在县城买了一套商品房，看家里这条件，不应该为几千元的学费发愁呀。

谁知刘叔长叹一口气

说，这两年房子是置办下来了，可除了这房子之外，家里哪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呢？打工挣的那点钱不仅都用在房子上了，外面还欠了一屁股债，不过现在村里家家户户有了钱都是用来买房子、盖房子，为了房子不惜欠下巨额债务，倒不是只有刘叔自己家这样。刘叔接着说，上个月刘婶身体不舒服要住院，刘叔手头紧，便去村里其他邻居家借钱，走了好几家，虽然家家都是新盖的楼房，装修也不错，但就是没有一家有钱能够借给刘叔，刚开始，刘叔心里还挺想不通的：大家都是街坊邻居，现在生活条件也比过去好多了，怎么千八块钱也不愿意借呢？后来，刘叔听了村里老王的指点才明白过来：倒不是大家小气，无奈是真没有闲钱，现在村里盖楼房的家庭没几个手里有余钱的，要借钱的话，就要看谁家住的是旧房。果然，听了老王的话后，刘叔又跑到村里老李家，老李是村里为数不多的仍住旧房的人家，老李没说什么，很爽快地借给了刘叔，不过刘叔走时，老李也没忘了交代刘叔过俩月别忘了还钱，因为再过俩月，老李家也准备去县城买新房了。

记得小时候，判断村里谁家的经济条件好，看看住房就行了，现在这一规则也渐渐不灵了，村里住房条

件好的，反而家里没什么钱。以至于有在法院从事执行工作的朋友在介绍工作经验时说，到现场后如果发现被执行人家里是新房，那基本上意味着申请执行人的债多半是难以收回了，如果发现被执行人家里住的还是旧房，那这债多半还是有希望执行到位的。这一现象不禁让人啼笑皆非。改善住房本身无可厚非，但为此不惜欠下巨额债务，甚至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质量，岂不是有些得不偿失。

刘叔听了我的话，不服气地说，现在不要说农村，城市里大家不也是在忙着盖房子、买房子吗？现在不是流行“买到就是赚到”这句话嘛，大家在外打工，回到村里交流起来，也是谁谁几年前在省城、市里买了套房，这几年什么也不用干，光凭房价上涨就赚了几十万元，这样的财富故事对村里的父老乡亲也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在这类故事的刺激下，大家对房子上心有错吗？

刘叔的话让我无言以对，是呀，虽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投资的，可这些话与房价上涨所带来的财富传说相比，刘叔选择相信后者，似乎无可厚非，可对房子这种畸形的追捧，真的会提高刘叔的幸福指数吗？

河南 关晓海

更正：本刊第33期《我们如何与电子游戏相处》中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张晰应为张昕。特此更正。

本期截稿时间：8月21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希腊 | 山火

8月15日，消防员、士兵和志愿者在努力灭火。13日始于雅典北郊的山火仍未被完全控制住，爆发山火的区域在雅典以北约40公里处。约180名消防员在志愿者的支援下努力扑火，防止山火向附近的村庄蔓延。政府出动了72辆消防车和多架消防飞机控制火势。由于高温、干燥和大风，扑火工作面临较大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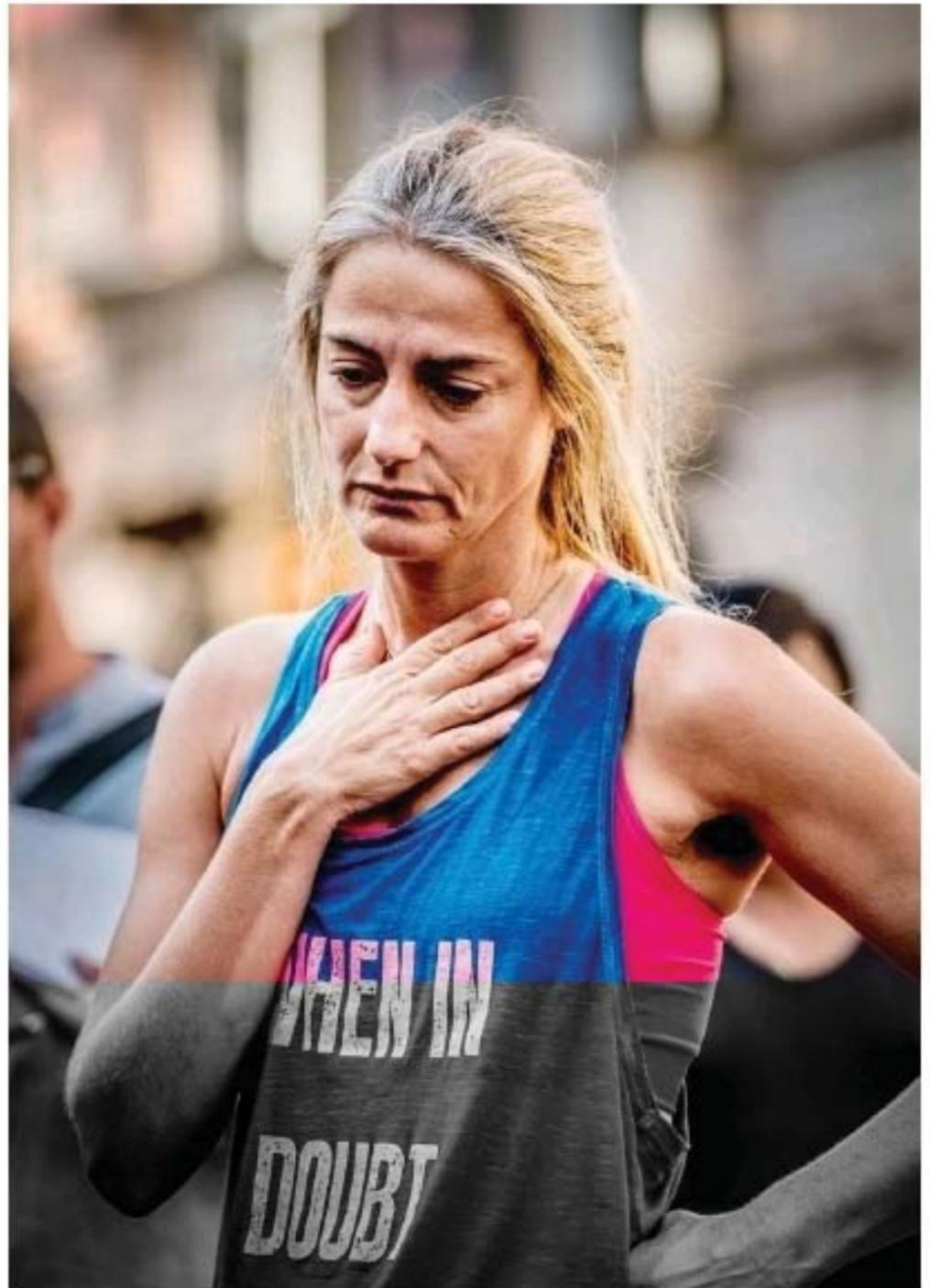






西班牙 | 恐袭

(右图) 8月18日, 西班牙巴塞罗那恐袭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 人们在兰布拉斯步行街放置鲜花燃烛, 以表哀悼。17日下午, 巴塞罗那市中心著名景区兰布拉斯步行街上一辆白色厢式货车突然高速冲向行人, 撞倒、撞飞多人。事件已造成13人死亡, 100余人受伤。恐袭发生5小时后,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通过其“阿马克新闻社”发布声明, 宣布对巴塞罗那恐袭事件负责。



英国 | 绵羊集市

(左页上图) 8月15日, 英国苏格兰莱尔格镇举行一年一度的绵羊集市, 该集市是欧洲最大的单日家畜集市之一, 约2万只羊在此交易。

阿富汗 | 童趣

(左页下图) 8月17日, 阿富汗贾拉拉巴德的一座砖厂内, 儿童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追逐玩耍。

安哥拉 | 大选

(右图) 8月19日, 安哥拉官员在罗安达出席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总统候选人若昂·洛伦索 (Joao Lourenco) 最后一次竞选集会。安哥拉计划于8月23日举行议会与总统选举投票。2017年大选是安哥拉自2002年结束27年内战以来的第三次大选, 赢得议会选举的政党领袖自动当选总统。

日本 | 萌物来袭

(下图) 8月14日, 日本横滨举行“皮卡丘节”, 大约1500只神态各异的皮卡丘在横滨市各地走街串巷, 摇摇摆摆、热舞卖萌。这是精灵宝可梦公司和日本港口城市横滨合作举办的皮卡丘大游行, 目的是吸引游客来这座城市。





中国人会成为世界首富吗？

文 / 邢海洋

阿里与腾讯，中国两个互联网产业的集大成者交出了闪亮的第二季度业绩，在“哑火”的美股和港股中鹤立鸡群。人们在猜测，阿里即将在市值上追上亚马逊。而腾讯的一款游戏竟能助其业绩暴涨 59%，令人感叹中国市场的深度。凭着 14 亿人口的大市场，中国人将世界首富的名头收入囊中似乎近在咫尺。

只是在今年年初，阿里巴巴和腾讯控股的市值分别为 2600 亿美元和 2500 亿美元，7 个月后两家中国互联网巨头市值均超过了 4000 亿美元，涨幅均超过一半，而美国的 FANG (Facebook、Apple、Netflix、Google) 虽然也涨势强劲，却无一有中国两大互联网霸主的速度。今年二季度，Facebook 因在移动应用上吸引到更多广告客户，营收为 9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4.8%，净利润为 38.94 亿美元，同比增长 71%；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第二季度营收为 260.10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1%，净利润为 35.24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的 48.77 亿美元下降 28%，即使剔除欧盟的 27.36 亿美元罚款，净利润同比也仅增长 28%。相对的，阿里净利润 140.31 亿元，同比增长 96%；腾讯净利润 182.54 亿元，同比增长 68%。中国两巨头虽然在总量上有所不及，可增速惊人，摆明了赶超的姿势。

若论未来的增长潜力，两巨头也似乎有着广阔的市场等待开掘。阿里云付费用户数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几乎翻番，付费用户数首次突破百万。其线下无人超市与生鲜超市正与线上完美互动，大有将未被电商

蚕食的超市零售业一网打尽的态势。而作为阿里最强劲的对手，腾讯则在网络游戏上大显身手，二季度智能手机游戏收入首次超过 PC 端游戏收入。尽管如此，对比其 2015 年、2016 年的全年数据，腾讯网络游戏收入虽然连年攀升，但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已从 55% 跌至 47%，多元化发展使腾讯拓宽了收入来源，获得了持续稳定增长的保障。作为其超级王牌产品的微信，尽管用户数量增长有所放缓，但 6 月活跃用户数量已达到 9.6 亿人。过去一季度，来自微信及其他移动端应用的广告收入迅猛增长至 61% 人民币 60.71 亿元。可实际上作为微信的用户，我们不难发现腾讯在微信上掘金相当克制，并未像美国线上媒体同行那样吃相难看，招致传统媒体的反弹。

再有一个涨停，阿里市值就要超过亚马逊了，当然这个“涨停板”是 A 股特有的。连海外机构也开始为阿里站台，德银就分析，阿里巴巴的新零售战略已经走在亚马逊之前。ZDNet 上有评论称，在为零售业寻找升级道路方面，阿里巴巴与亚马逊如今在一条赛道上，阿里从概念到实际操作都更有成效。故而未来阿里巴巴对亚马逊的超越将是长期的，绝不会像贝索斯问鼎全球首富那次“半日游”。如今阿里凭借 4000 亿美元市值已经坐上亚洲第一市值公司，未来引人遐想。正如每次盘点着国产手机市场占有率的时候都会群情兴奋，我们实际渴望着中国出现全球首富或中国科技巨头登顶全球市值巅峰的一刻。

微软独霸电脑操作系统，比尔·盖茨独步首富近 20 年，苹果则靠智能手机的开创性设计登上全球市值高峰。盘点首富可望而不可即的机遇，总不免将“天时地利”作为首富出现的大背景，思考中国互联网巨头成功的原因，却不免要给首富渴望泼点冷水。

即使《王者荣耀》这样没有文化、语言阻隔的游戏，中国市场也贡献了绝大多数收入。现实是，国内几乎所有成功的大型互联网公司都缺乏海外竞争的经验，技术上都是追赶者，而非首创者。在技术上，巨头们能给谷歌、亚马逊和 Facebook 构成实质性挑战恐怕还要等上 10 年。在此之前，阿里和腾讯能挖掘的恐怕主要是 14 亿人口的市场，而 FANG 的战场显然要大得多。■

腾讯控股一年来的股价

(单位：港元)



生活在碎片时代



生活在碎片时代，
不能像碎片一样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



松果

节气

中读
ZHONGDU

新知
WISSEN

爱乐 PHILHARMONIC



栏目插图 | 范薇

奢侈品回潮

上半年，古驰营收由去年同期的 19.475 亿欧元增至 28.325 亿欧元，增幅超过 40%；拥有圣罗兰的开云集团保持强势，上半年综合收入达到 73 亿欧元，同比增长 27%。贝恩咨询与意大利奢侈品行业协会联合发布的报告称，包括手表、珠宝、服饰、鞋履和皮革制品在内的奢侈品行业，在 2017 年总营收将升至 2540 亿~2590 亿欧元。年轻人正在成为奢侈品品牌的购买者，尤其中国新生代。

次新股破发风险

尽管“压价”上市，“炒新”退潮后仍有次新股跌到发行价边缘。赛托生物以 40.29 元发行，一度冲上 93.43 元的高位，可 7 月后就跌到 50 元以下，三角轮胎、天能重工等次新股破发风险更大。这些次新股均在 7 月中旬的创业板、中小板大跌中遭受重创，此后一蹶不振。市场风格转变、新股加速上市等多因素叠加，次新股的投资逻辑出现了从质变到量变的变化，新股从上市到开板时间也越来越短。

“301 调查”

8 月 14 日，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对中国进行贸易调查。有抱怨称，在合资企业，美企被迫转让技术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莱特希泽可能将按照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对中国发起“301 调查”。可是，这一诞生于 20 世纪“冷战”时期的单边主义法律工具在 1995 年 WTO 成立后几乎销声匿迹。“301 调查”具有极强的单边主义色彩，曾引发国际社会强烈不满。



供给侧的隐忧

在对“取暖季错峰生产”等的偏执理解和不当预期下，螺纹钢价格一度突破了4100元/吨的高位。显然，宏观经济基本面预期并不支持商品市场的过分上涨：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增速都在下滑而且后劲不足。而从改革主导者的角度，放任偏离了成本中枢的钢铁和煤炭价格暴涨，未来大宗工业品一定会重复两年前股灾的路子，“高大上”的供给侧改革最终会在“鸡飞狗跳”后，一地鸡毛。



腹背受敌

印度7月开始征收商品服务税，莫迪总理的改革实质上拉开帷幕。与此同时一场百万人的大抗议席卷孟买，年轻人呼吁更多的工作机会。印度改革来得太晚，制造业的就业很可能被周边国家夺去。印度今年5月的工业产出仅增长1.7%，越南1月的增幅是7.1%，孟加拉国去年12月的增幅是7.4%。即便是在颇让印度人自豪的IT行业也出现了“摆脱印度”的征兆，班加罗尔的IT企业纷纷迁址海外，近10万人将失去工作。



地产巨变

1~7月房地产销售面积、金额增幅分别为14%和18.9%，降至近一年新低和次低；7月，两者环比降幅均超过40%。7月还是开发投资和新开工最低迷的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续3个月下滑，单月新开工面积增速也首次转负为-4.91%。从宏观的角度，目前房地产行业几个主要指标都开始掉头向下，行业的拐点确定无疑。

小型股哑火

美国大企业第二季度业绩增长近12%，可小企业却背道而驰，小型股票指标标普600指数成分股盈利预计将同比下滑2.5%，另一个小型股票指标罗素2000指数今年迄今为止只上涨了4%。美元疲软，大型跨国企业在美国之外的市场获益良多，那些拥有较大海外市场的企业，70%的销售额超过了预期，而小企业主要是专注于美国本土市场，只有59%做到了这一点。小企业的停滞反映出美国消费市场的疲弱。



向海洋进军

气候变化带来的农业减产令许多悲观主义者担忧，未来的地球可能将无法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对肉食的需求。但以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为首的研究小组在《自然·生态与进化》上发表论文指出，海洋养殖业仍大有潜力可挖——少了牛羊猪鸡鸭，还有鱼蟹海参虾呀！研究者分析了120种鱼类和60种双壳类生物——生蚝、贻贝、扇贝等——的人工养殖生产潜力后预测，全球养殖渔业年产能可高达165亿吨，平均到每个地球人头上，就是1800多公斤。几乎每个有海岸线的国家，都能靠海洋养殖业实现对海鲜类食物的自给自足。

好消息



理性和语言

如果牺牲一个无辜者就能拯救五条生命，你会怎么做？芝加哥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小组日前发现，当使用母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来交流沟通时，人们会较少受自身情绪的影响，做出更功利、更理性的选择。这或许是因为使用外语会减缓人的思维速度，令人更专注也更少冲动。



人的教育

想要更有效地通过讲故事教给小孩子做人的道理？三毛、哪吒、阿凡提要比熊大、熊二、喜羊羊更靠谱。多伦多大学的教育学研究小组在《发展科学》上发表论文指出，以人为主角的故事要比以拟人化的动物为主角的故事更容易令学龄前儿童将自身代入，并激发模仿和尝试的兴趣。

坏消息



倒打一耙的抗生素

为什么要尽量减少抗生素的滥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小组日前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病原体》上警告说，由于抗生素会干扰肠道菌群平衡，削弱肠道的免疫屏障和抗感染能力，如果不谨慎善用，不但不能杀敌一千，还会自损八百，增加患上严重肠道感染疾病的风险。



早餐不可少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小组在2008到2012年间追踪调查了1600余名英国中小學生后发现，那些经常不吃早餐的孩子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存在关键营养物质摄入不足的问题。对神经系统发育和身体成长至关重要的叶酸、钙、铁和碘的摄入量与是否吃早餐的相关度最高。

真实的历史根本不可能击败这条顿式的梦幻。在纳粹思想的所有自相矛盾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厚古薄今，而他们所追思之古代，最起码也被当代重新粉饰过。

——彼得·盖伊，《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

我不相信诗人比小说家对于真实有更大的权力，正如我也不相信小说相比新闻写作有任何的优越性。对我而言，它们都不过意味着把词语安放在确切的位置。

——爱尔兰作家科伦·麦凯恩

他们是天才，为了他们的天才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天才就是一个另辟蹊径来抵达真实的人。

——罗贝托·波拉尼奥，《未知大学》

偏见没有两面，仇恨没有两面……唯一能击败响亮、愤怒的仇恨之声的，是更响亮、更理性的声音。我知道，你们生来并没有这些仇恨观点，没有人是这样的。但事实是，你们还来得及去学习、去改变、去理解，所有人都同样有价值。

——8月17日阿诺·施瓦辛格发布短片，对特朗普总统和新纳粹等人喊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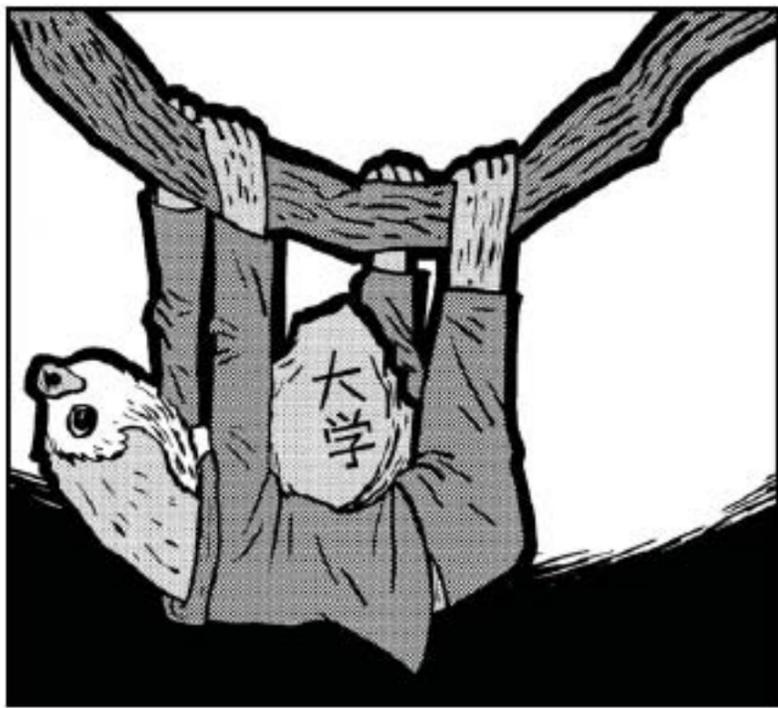


插图 山羊哥



我称这部电影为近距离史诗片，可以说它是我拍摄所要追求的目标。使观众视觉上沉浸于一种激烈的人性化叙事中，而且通过对比多种不同的叙述角度，每一种角度都有条理地进行，以此尝试着去建立关于在敦刻尔克发生的那些非凡事件的一个更大的画面。

——克里斯托弗·诺兰谈他执导的《敦刻尔克》

+/-

数字

494

米

近日，瑞士开放了世界上最长的步行吊桥，其长度为494米，宽度仅为63厘米，距离谷底最大垂直距离为85米，大概30层楼高。

30

只

8月16日，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货运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这是“龙”飞船第12次为空间站送货，共携带约2.9吨物资，包括特别为宇航员带去的30只小杯型巧克力、香草和生日蛋糕口味的冰淇淋甜品。

6000

兆瓦

美国8月21日迎来99年第一个横扫全美的日全食。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在日全食发生的3分钟内，有17座太阳能电厂会陷入完全的黑暗，全美太阳能发电场最少会损失6000兆瓦的发电能力。

自助餐三十六计

文 / 二公子
图 / 谢馥飞



被关闭在一个风轻云淡的海岛酒店参加单位培训考试一周，本以为是件惬意的事情，怎料在连续吃了几天自助餐，加上一天两顿用自助餐余料呈现的茶歇后，我身体零件开始不听使唤了。

其实倒不是什么大碍，仍然能蹦能跳能睡觉，出问题的单单是眼睛。具体“症状”就是一周过半，进了酒店餐厅，就开始目空一切。无论是冷切、热烤、西式、中式、鸡飞蛋走、椒红韭绿，什么食物对眼球都无法引起刺激，更别说勾起食欲。

其实我已经很小心了。因为经常出差，深知自助餐的危害，自己早就琢磨出长期吃自助餐的策略。具体总结就是：如果长期住在同一酒店，比如三天以上，第一餐切不可一鼓作气大开杀戒，否则就会经历再而衰三而竭，接着不战而降溃不成军。所以这次参加培训，我坚持每餐只吃一道主菜、一种蔬菜、一样主食，不管其余菜色如何，我自按兵不动。拿自助餐不当自助餐吃，这一招在《三十六计》里，叫反客为主！

我曾把这个经验跟另一位年轻同事分享过，差不多是带着一半警告说给他听的。可第一天，这老兄就没有管住自己，把自己盘子堆成花果山，汤盆搞成水帘洞。结果就是，吃到第三天就来找我了：“你说得对，这里的菜也不换换样子！”

尽管我在吃自助餐上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经常放下筷子隔岸观火，光聊天不动嘴，而且饭前保持运动，饭后散步，吃饭当中远眺餐厅外景

观，采取适当的欲擒故纵，可是到了第五天，我还是厌食了。到了饭点儿，看着余下的自助餐券，血糖就会升高，有饱腹感，脚步相应踉跄，只盼着培训结束。

“矫情！”这是老爸在电话那头听我诉苦后的不屑一顾，“自助餐最好了，天天吃还不乐意，看把你狂浪的！”“不好好吃可不行啊，胃要养的！”老妈千叮咛万嘱咐。

你们说你们的吧，我已经忍无可忍，当即决定少吃一顿午饭，三十六计走为上，别人吃饭我散步去！在烈日当空的酒店外走了十分钟，我已经大汗淋漓，回房间准备冲澡。掏门卡的时候却闻到了对门一阵异香。那是同来参训的老邱房间，他在搞什么花样？

任我急切地敲他房门，老邱却不急不慢，磨磨蹭蹭半天开了一个门缝，掩着门笑眯眯地看着我，“什么事嘛！”我和盘托出，说酒店的饭吃了这么多日，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不知道如何是好。而且这里山高海远，外卖快递鞭长莫及，只觉得度日如年，盼考试后早日脱离苦海。老邱嘿嘿一笑：“其实我也受不了了，所以刚用酒店水壶煮了自带的腊肠，泡了碗方便面！剩得不多了，要不你拿一根过去？”姜还是老的辣！这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光想着怎么用谋略对付自助餐了，怎么没想到夹带点私货到海岛来呢？

捧哏这种情绪劳动

文 / 闫晗
图 / 谢馥飞



亲戚家新踏入职场的小朋友表示很迷茫，开会听老油条们吹捧老总极尽夸张，明明自己不信，可偏表演得那么真诚。小朋友得使劲儿掐自己的大腿，才能不笑出声来，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到了北宋时期的星宿派。

《天龙八部》中星宿派掌门每次出场都自带背景音乐。“星宿老仙，德配天地，威震寰宇，古今无比”，“师父功力，震烁古今”，一千多人敲锣打鼓、吹箫奏笛唱歌，用多种形式传达同一种口径。鼓掌喝彩不及时让队伍不整齐的，还会受到众同门责备的白眼。包不同为星宿派总结了三门神功——“马屁、法螺、厚颜”，让星宿门人引为知己。他们慷慨地告诉包不同，自家神功功夫虽然变化万状，但也有诀窍——只要牢记“抹杀良心”四字。

在星宿派学会的技能有没有用处？当然有。星宿派掌门人失势之后，高度敏感的门徒立即转型，在上级公司灵鹫宫找到新工作，并量体裁衣，为新主公换了一种清新脱俗的吹拍法。灵鹫宫缺乏这种类型的人才，虚竹听得也很受用。不过等到《射雕英雄传》的南宋时期，逍遥派系杳无踪迹，倒是灵鹫宫下属的七十二岛之一的桃花岛崛起。为什么呢？也许人才培养上后继乏力，也许掌门被星宿门人包围自我膨胀不思进取了。谁知道呢。

小朋友说上班明明没做什么事，却感觉好累。为什么累？即使工作不忙，也需要付出情绪劳动。服务行业自然不必说，作为客服、护士或者机场地

勤，遇到“奇葩”的概率极大，和“极品”打交道完全是工作的一部分。而普通行业，有时也逃避不了成为演员的命运。当上司逗起哏来，必须有捧哏的，就看谁反应快、演技好了，这也是情绪劳动。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看起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快意恩仇的样子，可但凡组织，就免不了有表演的时刻。比如，当宋江非要和他费尽心机挖来的高级人才卢俊义推辞第一把交椅的时候，众人的表现很耐人寻味。心腹李逵自然永远第一个跳出来捧哏：我舍命跟来，就服你一个，再推让我就要杀人了。卢俊义这个男配角听了这话恐怕心惊胆战：跟老大搭戏太危险了……

然而，光心腹表态，捧哏的力度显然不够。于是军师吴用一边说着“老大你再推让，兄弟们会心冷的”，一边朝其他业务骨干使眼色——你们有点眼力见儿啊。于是兄弟们不得不跟进，武松代表其他人说：军官们都是奔你来的，只服你一人。晁盖旧部刘唐表忠心：当年哥哥刚上山时，我就站你这边。鲁智深不耐烦：再推让咱就散伙了。各派系代表从东西南北中各角度表达了支持，宋江此刻心满意足，对自己胸怀博大、众望所归的人设很欣赏。

前些年，朋友去南方一个民营企业谈业务，眼前的一切让他瞠目结舌。老板每说一句话，员工都要回一句：“是，老爷。”于是暗想：这企业工资得比同行业高出不少吧，起码得加上群众演员的工钱。■

声音的奥秘

文 / 贝小戎

图 / 谢驭飞



前阵子我在网上选购空调，一个厂家介绍说，他们使用的超静音技术能使空调静音运行。花开的声音有 10 分贝，翻书的声音是 40 分贝，正常聊天 50 分贝，他们的空调运行时只有 21 分贝，而一般空调运行的声音有六七十分贝。

有些汽车厂家宣称该品牌车内有禅院级的宁静。美国学者大卫·布拉特纳在《宇宙的尺度》一书中介绍说，一般车内的声音有 60 到 70 分贝，跟空调、背景音乐、正常交谈和真空吸尘器一个级别。安静房间里正常的呼吸声有 10 到 20 分贝，图书馆或安静的房间声音的强度为 30 到 40 分贝。嘈杂的餐馆跟除草机一个级别，80 到 90 分贝；大声交谈跟卡车同级，90 到 100 分贝；摇滚音乐会跟链锯、喷气式飞机滑行同级别，有 110 到 120 分贝。2009 年吻乐队在一场音乐会上演奏的声音达到了 136 分贝，其响度相当于心跳的 1.7 万倍，有可能造成永久性听力损伤。火箭发射的声音是 180 到 190 分贝。在美国，如果员工需要长期暴露在 85 分贝以上的噪声环境中，雇主必须为他们提供保护耳朵的设备——请想象一下餐馆服务员戴着耳罩工作的情形。好在距离每增大一倍，音量就会降低大约 6 分贝——走到餐厅外面他们就可以摘下耳罩了。

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是大约每秒 340 米，而声音在固体中的传播速度更快，在钢铁中，声速可达每秒 5960 米。所以人们确实可以把耳朵贴

到铁轨上，听听是否有火车正在驶来。这是因为固体内部的分子关系更加紧密，而且它们几乎不可能单独运动而不影响临近的分子，所以能量会传得更快。声音在两种介质之间的传播并不理想。空气中的声音很难传到水里，反之亦然。所以你在垂钓者旁边说话，并不会把水下的鱼吓跑。

声音的波长大约是 1.3 米，如果遇到尺寸大的物体，声音会被反射，如果遇到尺寸小于波长的物体，会发生衍射，它能从物体旁边绕过去。低频音波长更长，所以传得更远。因此，重低音喇叭放在房间里的哪个位置都可以，因为低音波长较长，易衍射，人们听不出来声源在前方还是后方。

我们都知道，超声波可以用来洗牙、粉碎肾结石、探测人体内部，工程师还可以用它检查塑料、木材或金属的内部结构。频率超过 20 千赫的声音被称为超声波，频率低于每秒 20 次以下的，就是次声波。现在有的科学家认为，很多房子闹鬼的传说实际上源自神出鬼没的次声波。比如频率大约 18 赫兹的声波会让人的眼皮跳个不停，而且还会让人的边缘视野中出现灰色幽灵似的阴影。2003 年，伦敦有个研究小组在一个音乐厅后面架了一台次声波大炮，演奏的时候他们间歇性地掺杂了只有 7 分贝左右频率为 17 赫兹的声音，结果有 22% 的听众说，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不适、恐惧或与之相反的超凡脱俗、神圣感。■

30岁养猫

文 / 罗彪
图 / 谢馥飞



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往复如此。而立之年的我，感觉生活缺少了一点乐趣。习惯性地打开长期关注的猫咪微博，觉得乐趣无穷，下定决心养只猫。念头不止一次闪过，这次像雷电一样强烈。

寻猫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购买，一种是领养。领养的都是流浪猫，由一些组织统一管理。领养要求严格，光是在省会城市有房这一条，就能筛掉一大波意向者，爱心和房价在强烈地争夺着每一只流浪猫的命运。我在网上尝试着申请领养，对方不热情，不冷淡，不干脆，倒不如买之解思愁。

小猫是普通的中华田园猫，健康活泼，具有猫科动物的典型特征。进了家，猫好奇，人欢喜。未经猫咪同意，女友为其赐名糖糖。

糖糖本是家养猫，吃食习惯了猫粮，人吃的蔬果一律不碰，小鱼干蒸煮油炸也难讨欢心。人吃饭，它就一定蹲坐在桌子上，眼珠在碗筷的一次次碰撞中来来回回，你好心送上一筷子，它可能连嗅也不嗅。最有趣的是，幼猫有很强的好奇心，是出色的监工，人类的一切行为，它都想尽收眼底，寻找一切途径，爬上高处，俯视你，最差也要平视你。家里有一个大碗口径大小的洗漱台，一人使用都显得拥挤，猫还要一跃而上，颤巍巍地立在台面边缘观察你。既然它给你腾出了地儿，你就照常洗漱了。对于夜晚猫咪不睡觉的习性，当真是一件修心的事，无论锁阳台、关客厅，凡是

有门阻隔，小猫就急，抓门哼叫是必杀技，消磨你的耐心。倒不如心一软，开门了事。长夜漫漫，猫的睡眠短暂而迅速，两小时一醒，醒后可能是去刨猫沙，可能钻被窝，可能在你枕头边观察你的死活，常常是把人闹醒，它又很快睡了。

前几天，将养猫一事告诉了父母，否定的态度依然不变，只是没有儿时那么强硬，在他们的守旧意识里，猫就是上蹿下跳，猫就是爱抓咬人，猫就是易掉毛，猫就是总发情，猫屎就是史上最臭……

养猫的生活数月有余，每天定时喂猫、铲屎，按时打扫房间，家里没有很浓郁的猫味，反倒比养猫前更干净利落。偶尔查看资料，想要把它调教得乖巧懂事，奈何大多网友都以猫奴自称，任由猫性，倒落得个轻松愉快。

30岁的人生，不生不熟，不能像小奶猫一样人人宠爱，也不能像江湖老猫一样处事不惊，整天厌倦地游荡吃喝。同龄人大多有生不逢时的感觉，我想为何不像小猫一样充满勇气和好奇心，继续探索世界呢？

村上春树说过，你与幸福的距离只差一只猫，有猫我很幸福。30岁，我初次养猫，我想说：“猫咪，请多指教。”

本栏目投稿邮箱更改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陀飞轮卡罗素腕表

宝珀在SKP“黑色风暴”展览中展出的L-Evolution系列卡罗素陀飞轮腕表，表盘经过磨砂抛光处理并覆以NAC黑色电镀涂层，不规则孔洞的镂空设计可窥见机芯构造。逆时针方向转30度的机芯让卡罗素与陀飞轮构成11点与5点位置的斜线排列，整体造型呼应了这两套抵消地心引力装置的旋转状态。

植物滤水系统

Drop By Drop是一套依靠植物过滤的滤水系统。像一套迷你生物圈体系，Drop By Drop利用植物蒸腾的作用来起到净化水的作用，将有效蒸腾（即热、风、光和湿度）所需的四个关键因素保持在最佳水平。含有水分的空气系统通过冷凝作用在玻璃面罩上形成纯净的蒸馏水，最后凝集在玻璃器皿中。



磁吸式转换插头

Anchor数据线集三种样式的转换头于一身，独特的磁吸式设计可以精准地盲吸数据线接口；不锈钢线缆包裹数据线，可以增长数据线的使用寿命。在实验室数据面前，它经过60万次的翻折弯曲依然可以保证数据线头部分的完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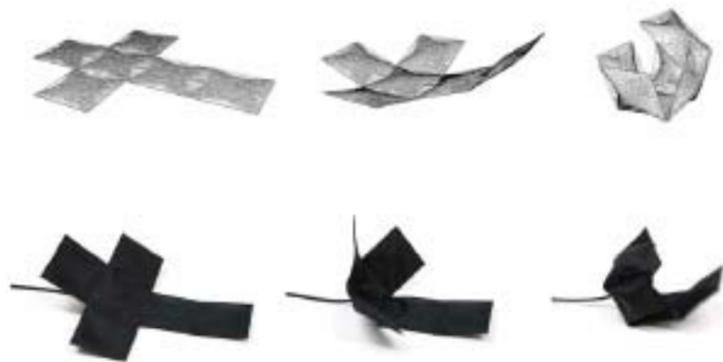


多功能茶几

这台 Sobro 是专为现代人打造的集多功能于一体的茶几，含一个可容纳约 32 瓶酒水饮料的迷你冰箱，还有保冷效果的冰桶。桌面右下方有触控面板，可直接调整冰箱温度、LED 照明，也可操作桌面左右两侧的蓝牙喇叭。它还配有 USB 插座和电源插座。

智能卫生巾

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以特殊材料为纸张，利用特效打印机在层叠的纸张上打印出了一款“智能卫生巾”。它采用了新型材料 aeroMorph，在未充气前薄如纸片，充气后就会变化成想要的形状，配合液体传感器和微型充气系统，即可变身一款可以智能高效地防止侧漏的卫生巾，亦可用于未来的可穿戴设备。



“云效果”灯

这款名为“Floating Cloud”的台灯将天空中的“云”以“悬浮”的技术来达成美妙的效果。纽约市的艺术家和设计师理查德·克拉克森 (Richard Clarkson) 在灯内部安装了内置音箱，并在云朵里安插了麦克风，用以读取环境声音，来显示相应的灯光效果。



隐形磁体技术

Hifiman 专为 Susvara 设计了隐形磁体结构 (Stealth Magnet)，该技术优化并改善了磁铁缝隙间的空气湍流与反射，让磁铁在声波面前得以隐形，有效降低了失真。此外，Susvara 的振膜上还具有超薄的镀金导电层，令单体反应更为灵敏。





动感吊坠

H. Stern 品牌的 Zephyr 吊坠项链用钻石镶嵌出线条曲折的吊坠，色彩偏棕黄色的底座和项链采用了 Noble Gold，一种介于黄金和白金之间的合金。

装饰艺术

Ralph Lauren RL888 系列 32 毫米女表具有纽约爵士时代的装饰艺术风格，表盘上是宝玑式指针以及阿拉伯数字和罗马数字组合在一起的时数，可选表带的色彩超过 40 种。



爱的主题

Kartell 品牌的 Parati 注塑塑料手提包采用镂空编织图案，正面立体地塑造出牡丹、兰花、海葵和大丽花等各种花朵，白色的心形手势提醒着人们爱的主题。





嵌套圆桌

Pols Potten 品牌的托盘桌由三个不同尺寸的金屬鍍銅圓盤組成，使用時可以一個個向上堆疊，相互嵌套的結構又方便了收納。



彩條吊燈

Colonel 品牌的 Suzie 吊燈形似紙燈籠，實際上是將各種色彩的塑料條手工縫製在金屬結構上，每盞燈都有它的色彩和諧感。

卷筆刀與鎮紙

Beyond Object 的 Funno 卷筆刀由一整塊黃銅製作，表面用手工打磨鏡面拋光，簡約的設計消除了它作為實用工具的痕跡，同時也可以充當書桌上的美麗鎮紙。



萬花筒托盤

Hay 品牌的 Kaleido 系列是由一系列色彩絢麗的多邊形組成，帶彩色粉末塗層的鋼質托盤相互嵌套，可以配合在一起或者單獨使用。



倾听情绪

正视抑郁症

主笔 / 陈赛 插图 / 范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卫生部一共进行过三次大样本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最近的一次调查结果刚刚在今年4月发布。之前两次调查得出的心境障碍患病率的数据都不过万分之几，但这一次的调查结果却是4.06%。

按照中国13.8亿人口换算，这个数字相当于5600万人。而且，4.06%是12月患病率（过去12个月有没有得过抑郁症），如果按终身患病率（有生以来有没有得过抑郁症），则数字会变成7.37%，相当于1亿人。

心境障碍也称情感障碍，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情感或心境改变为主要特征的一组疾病，包括抑郁症、心境恶劣、抑郁障碍未特定、双相I型障碍、双相II型障碍、其他双相障碍、物质所致心境障碍、躯体疾病所致心境障碍8个二级分类。抑郁症是心境障碍中最常见的类型，现患率为2.10%，约有3/4的患者有终身复发的风险。

黄悦勤，中国残联副主席，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是这次全国大型流行病学调查的总负责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黄教授告诉我，从2003年开始，她就想组织一次全国性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之前两次都不是全国性的），但直到2012年，这个项目才在国家卫生部和科技部的支持下正式启动。之后的调查耗时3年，经过严格抽样，入户3万人，由经验丰富的精神科医生做平均2小时/人的详尽询问与访谈，最终得出的是一个“真实、可靠、全国性的成人精神障碍数据”。

对于4.06%这个数字，黄教授的评价是“不吃惊”。“跟国际上比，我们的抑郁症患病水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低于美国，高于日本。整个亚洲的抑郁症水平是偏低的。日本也很发达，但他们的抑郁症水平跟我们相差没那么大。”

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这仍然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一个人群中，有4%~7%的人有抑郁症，意味着100个人里面有五六个人有抑郁障碍。而且，这次调查并没有包括儿童和青少年。虽然没有数据统计，但我们采访的多位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都表示，过去五六年来，儿童与青少年抑郁症的上升趋势是惊人的。比如，祝卓宏教授（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国家公务员心理健康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告诉我，这五六年来青少年抑郁症的增长，是他从医2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现象。在2009年之前，他只遇到过一个9岁的男孩患有抑郁症。根据祝教授的分析，这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教育体制的恶果。

黄教授分析中国抑郁症患病率升高的原因之一是：“当今社会人们生活方式改变，违反人类固有的生物节律

饮食和睡眠，导致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功能紊乱，最终造成情绪障碍的恶果。”

这次调查的发现也再一次验证了中国抑郁症“低就诊率”的现实。“除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患者以外，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均普遍存在低咨询率和低治疗率的现象。心境障碍（包括抑郁症）患者中因为自己的症状而寻求咨询的比例不足1/5，而实际接受治疗的比例仅1/10左右。他们的求医行为均存在很大误区，在非精神科和心理科的机构接受治疗的比例高于3/4，说明多数精神障碍患者未选择正确的医疗机构就诊。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中国的抑郁症患病率跟经济水平没有直接关系，跟年龄、职业也没有明确的关系，唯一有关系的是性别和婚姻状况。其中，婚姻状况的因果关系并不清楚：是抑郁症导致家庭关系不好，还是离婚受刺激之后患上抑郁症，两者之间互有关系，但谁因谁果，每个家庭情况都不一样。

“心境障碍女性现患率高于男性患病率，与以往多数调查结论一致，一般认为与女性的各生理阶段的心理变化相关；分析婚姻症状差异，分居/离婚和丧偶现患率高于其他婚姻状况现患率，且已婚人群现患率最低，说明患者的情绪问题影响人际关系、婚姻和谐、家庭稳定。”

这也许可以验证祝卓宏教授的一个理论：中国人的抑郁症发病率相对低，跟中国人情社会、人际网络密切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这个文化正在遭到破坏。人际关系的变革、变动、动荡、不稳定则是当下中国抑郁症发病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际因素对抑郁的影响是有大量的研究支持的。比如，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群体中的焦虑抑郁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孩子。

在分析中国抑郁症发病机制中的文化因素时，祝卓宏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人口流动是一个重大因素。人口的流动意味着关系的断裂。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和原有的乡土文化的分离。住房问题导致人在大城市不断搬家，大城市里漂泊的状态，我们与邻居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中国人看似人际关系复杂，但生活得越来越像西方人，原子式的个人—同事之间也很难建立亲密的关系，社区之间也没有建立起很好的支持系统。以前相对稳定的状态下，邻里之间彼此很熟悉，可以互相支持。工作调整，不断换地方。改革本身，带来的生活的不稳定，人际关系的断裂，稳定社会关系的缺失，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网络的削弱。”

从神经衰弱症到抑郁症

——中国人如何安放精神的痛苦？

主笔 / 陈赛

对每一个病人而言，“抑郁症”的标签背后都是一种具体的痛苦，如果不能真正深刻理解其中的痛苦和可能的原因，就无法真正更有效的帮助他们。

那天，单位派豆子去博洛尼亚，一座美丽的意大利小城，参加一场美丽的童书展。

这本来是每一个童书编辑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据她事后分析，一种有负众望的恐惧变成了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

她是一个天真的姑娘。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来到北京，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这是她很喜欢的工作，也是她能够胜任的工作。她喜欢孩子，喜欢故事，大学时毕业论文写的是《长袜子皮皮》。但她有完美主义的倾向，什么都想做到最好，工作的压力渐渐变得难以承受。

渐渐的，晚上不睡觉，吃不下饭，上班上一天，什么都写不出来，基本上处于怠工状态。每天给不同的朋友打电话，处于一种极度的倾诉状态。有一天，她给弟弟打了36个电话。

她本来是一个很开朗、很负责任的女孩子，这种转变自然遭到了很多怀疑的目光。公司以为她是想跳槽，同事开始指责她的不负责任。她的自我怀疑也越来越深：“一开始，别人指责你的时候，你觉得很气愤。很多人指责你的时候，你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这样。我是不是真的挺自私的？”

一个礼拜里，她瘦了10斤。

她最后还是去了博洛尼亚，并在那里第一次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但是，至此，“抑郁症”这个词还从未出现在她的脑海里。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除了真正的抑郁患者外，没有人可以了解抑郁带来的痛苦和绝望。”

张进，财新传媒副主编，在他自己的抑郁症笔记《渡过》一书中引用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的一段描述：“人类文字中对于崩溃阶段的忧郁症描述并不多，处于那个阶段的病人几乎全无理智，但他

们却又需要尊严，一般人往往缺乏对他人痛苦的尊重。无论怎样，那都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当你陷入忧郁（melancholia）的时候。”

张进回忆道：“我还记得，那时我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哭泣，因为太害怕而无法起来洗澡，但同时，心里又知道洗澡其实没什么可害怕的。我在心里复述着一连串动作：起身，然后把脚放到地上，站起来，走到浴室，打开浴室门，走到浴缸旁边，打开水龙头，站到水下，用肥皂抹身体，冲洗干净，站出来，擦干，走向床边。12个步骤，对我来说就像经历耶稣的艰险历程一样困难。我用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转身，把脚放到地上，但是之后觉得万念俱灰，害怕得又转过身躺回床上，但脚却还在地上。然后我又开始哭泣，不仅因为我没办法完成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而且还因为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愚蠢无比。”

这种时候，劝是没有用的。劝一个抑郁症患者“别多想”，就好像告诉一个皮肤烫伤患者，你别觉得疼一样徒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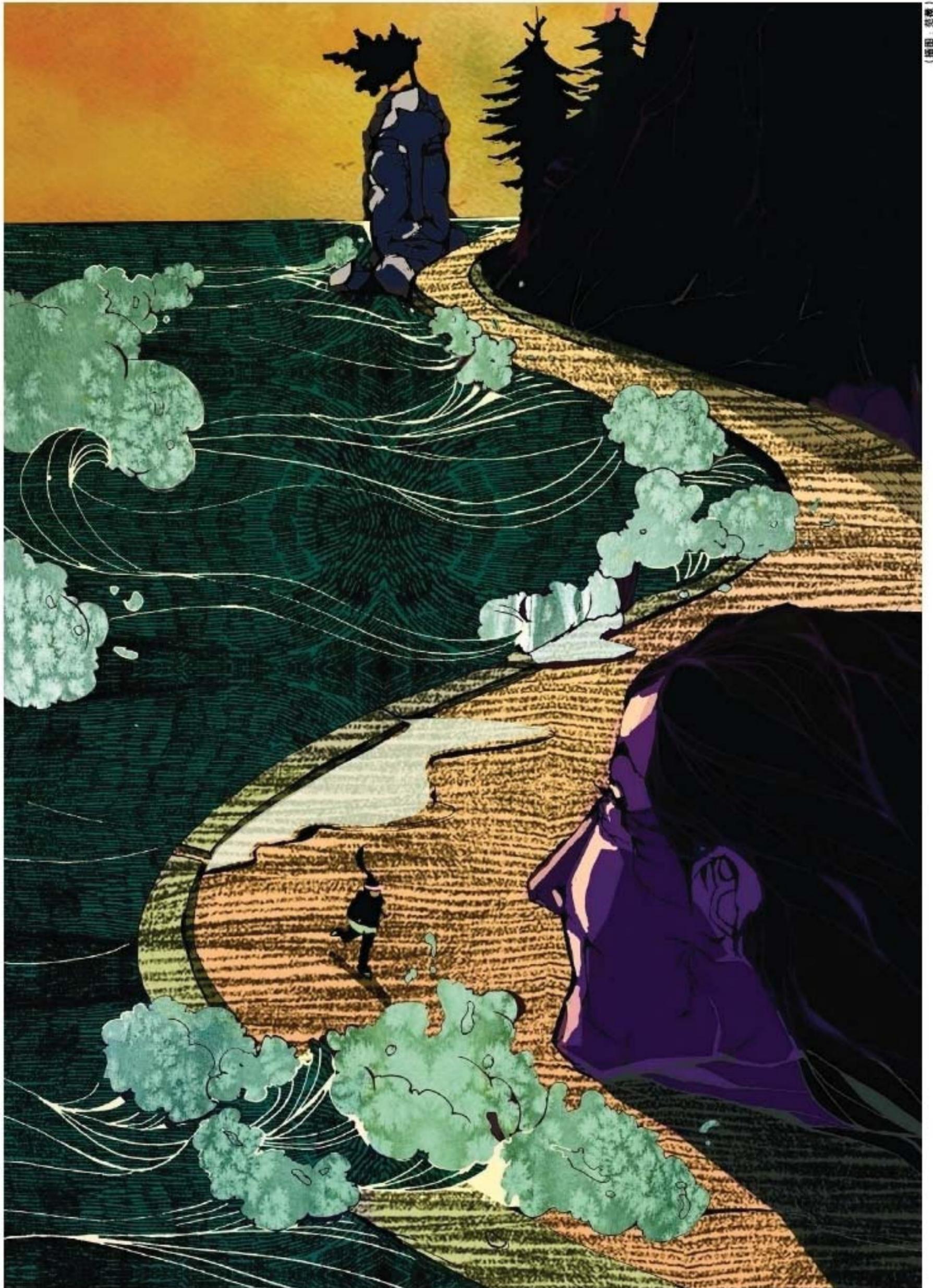
当豆子的家人终于决定将她送去精神专科医院的时候，她已经处于呆滞状态，两眼无神，每天只做一个事情，拿着手机看电视。网络一断，立马要跳楼。“我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所有的亲戚都来跟我聊天。但任何事情都激不起我的兴趣。”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活着有没有意义，而不是我这样想，是病态的，还是正常的？直到我真的好了，对生活有希望了，吃饭也香了，也想念周围的人的时候，我才会这样想，原来那段时间我是生病了。”

当豆子从疾病中走出来，她仍然困惑的是：“为什么我会生病？正常的悲伤与病态的抑郁之间，界限到底在哪里？”

悲伤与疾病的边界？

和很多中国人一样，我对抑郁症最初的了解来自张国荣。那是很多人都记忆犹新的事情。2003年4月1日，这位受尽万千宠爱的明星从一座大饭店的高楼上高坠死亡。早在1987年，张国荣就在自传中写道：“记得早几年的我，每遇上一班朋友聊天



(插图: 吴薇)



左图：2015年7月2日，美国加州的一名医生用经颅磁刺激技术为病人治疗抑郁症

右图：参加互助会的抑郁症患者

叙旧，他们都会问我为什么不开心。脸上总见不到欢颜。我想自己可能患上忧郁症，至于病源则是对自己不满、对别人不满，对世界更加不满。”

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抑郁症是一种疾病，一种严重到会让人自杀的病。

但是，与癌症不同，抑郁症并没有明确、可量化的病理诊断，连最先进的核磁共振都不能作为诊断或者排除的依据。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祝卓宏告诉本刊：“事实上，目前没有任何一种‘精神疾病’，真正符合‘疾病’的标准。因为一种‘疾病’必须要有明确的定位、定性、病理特征，但‘精神疾病’无法满足其中任何一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 we 不说‘精神疾病’，而说‘精神障碍’）。比如，除了大脑里的神经系统之外，肠道里的细菌、微生物、菌群的变化也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那么，‘精神疾病’到底应该定位在哪里？连精神分裂症也不能定位在

大脑。《英格兰医学杂志》最近报道的一个个案，就是讲一个人有被害妄想，在医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结果是肠道对乳糖敏感。不吃乳糖，幻觉就消失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抑郁症更像是“发烧待查”，一个人发烧了，但未经检验，并不知道发烧的原因是什么。即使最有经验的精神科医生，也只能依靠问诊，根据症状的表象，得到主观性的判断。比如，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市最大的公立三级甲等精神卫生专科医院）的杨甫德院长非常详细地向我解释抑郁症的三个核心症状：

第一是情绪低落，完全处在悲伤中，任何事情都带不来快乐。其次是兴趣减退，尤其是过去很感兴趣的事情现在一点兴趣也没有。再次是身体疲乏，哪怕一天无所事事，依然感到四肢疲软无力。

第二是严重程度。正常的心情低落和抑郁症最大的区别就是看工作能力和社会功能有没有受到损



害。一般来说抑郁症中度以上，病人的学习工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生活自理能力都会严重下降。但一个人心情不好，在能力损害上并不大。

第三是持续时间。持续两周的心情低落就是抑郁症症状。

但是，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症状，每个人的情况可能都是不一样的。有人有家族遗传史，有生物学基础，从小个性孤僻；还有一部分则是后天遭受了大的打击，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一部分，家庭因素有一些，没那么重，没有遗传史，个性有一点缺陷，又遭受了大的打击，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影响的结果。

虽然都同意“精神障碍是生物心理社会互动的结果”，但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精神科医生与心理医生对于抑郁症发病机制的解释却有着很大的分歧。

杨甫德院长认为：“抑郁症发病的根本因素还

是生物学因素，比如，可能有遗传因素、脑部结构的损坏，或者早年的病毒感染等等。至于发病能不能痊愈、什么时候痊愈，就是这些外界因素影响的，这些外界因素叫社会事件因素，当然也可能有个人性格因素。”

但祝卓宏教授认为：“遗传因素在抑郁症发病机制中占的比重并不大。先天有先天的因素，但后天的塑造十分重要，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更大。即使是大脑本身，也在人际互动的过程中一直在改变。现在(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一部分有易感基因(抑郁症基因)，但更多的患者不因为生物学因素，而是后天经历了一些打击。”

“‘痛苦’这两个字的中文构成很有意思。”他说，“‘痛’是病字框的，是身体有病，而‘苦’是草字头，是一堆草的意象。苦像乱草一样，一茬一茬，不断滋长。也就是说，痛是身体有病感受到的，是有机体的反应，任何人都避免不了。苦是我们对事物的

评价带来的，是你的态度带来的，是可以改变的。”他专攻心理治疗中一个叫“接纳承诺疗法”的流派，其核心概念“正念”，就是主张观察而不评价、不思考，只是用眼耳鼻舌身去感知世界、觉知世界，也不用语言、思维去思考世界、评价世界。他认为，从认知层面来说，“思维反刍”被认为是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抑郁症患者倾向于不断反思负性的东西，自动化的负性思维。

抑郁症：一种陌生的疾病体验

在一本题为《像我们一样疯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的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谈到美国药厂葛兰素史克是如何在一个漫长痛苦的经济衰退时期，通过各种市场营销手段把抑郁症“推销”到日

本的，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除了利益的推动之外，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代表着更高水平的科技。

作者伊森·沃特斯指出，人类的绝大多数文化中确实有一种普遍的心境状态和一系列的行为，与失落或者失去他人有关，或是丧失了社会身份或个人动力。但同时不同文化对上述的存在状态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形容和理解。比如西方概念中的抑郁——特别是美国人的这种，在文化上就是很特殊的。他们愿意对陌生人公开表达情绪和悲伤的感受，又非常倾向于将心理痛苦视为一种医疗健康方面的问题。

即使在美国，关于悲伤与疾病之间的界限，也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问题。按照 DSM-IV（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的诊断标准，若丧失亲人后抑郁症状持续不足两个月，则不诊断抑郁。但到了 2015 年，DSM-5 中这一排除标准被移除了。亲人去世后如果抑郁程度也达到了抑郁症的标准，即两周以上也算。这一改动在美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回归抑郁症的根本——我们的情绪系统应对重大的“失去”，无论是失去工作、失去尊严、失去感情、失去亲人，都是一样的。反对者则认为，这是抑郁症的过度诊断，是将正常的悲伤疾病化，是药厂在制造病人。

正如作者所说：“当一种民族文化在经历社会上广泛的焦虑和冲突时，就特别容易被新的有关心理或疯狂的信念乘虚而入。”在中国，是否也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呢？毕竟，无论从个人，还是从整个社会而言，中国人对于精神痛苦作为一种重大疾病的体验依然是陌生的。

“在中国，滥用药物或滥治疗的情况有没有？”北京安定医院（精神专科三级甲等医院）院长、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王刚告诉我们，“但中国抑郁症的主要问题是诊断和治疗不充分，而不是过度诊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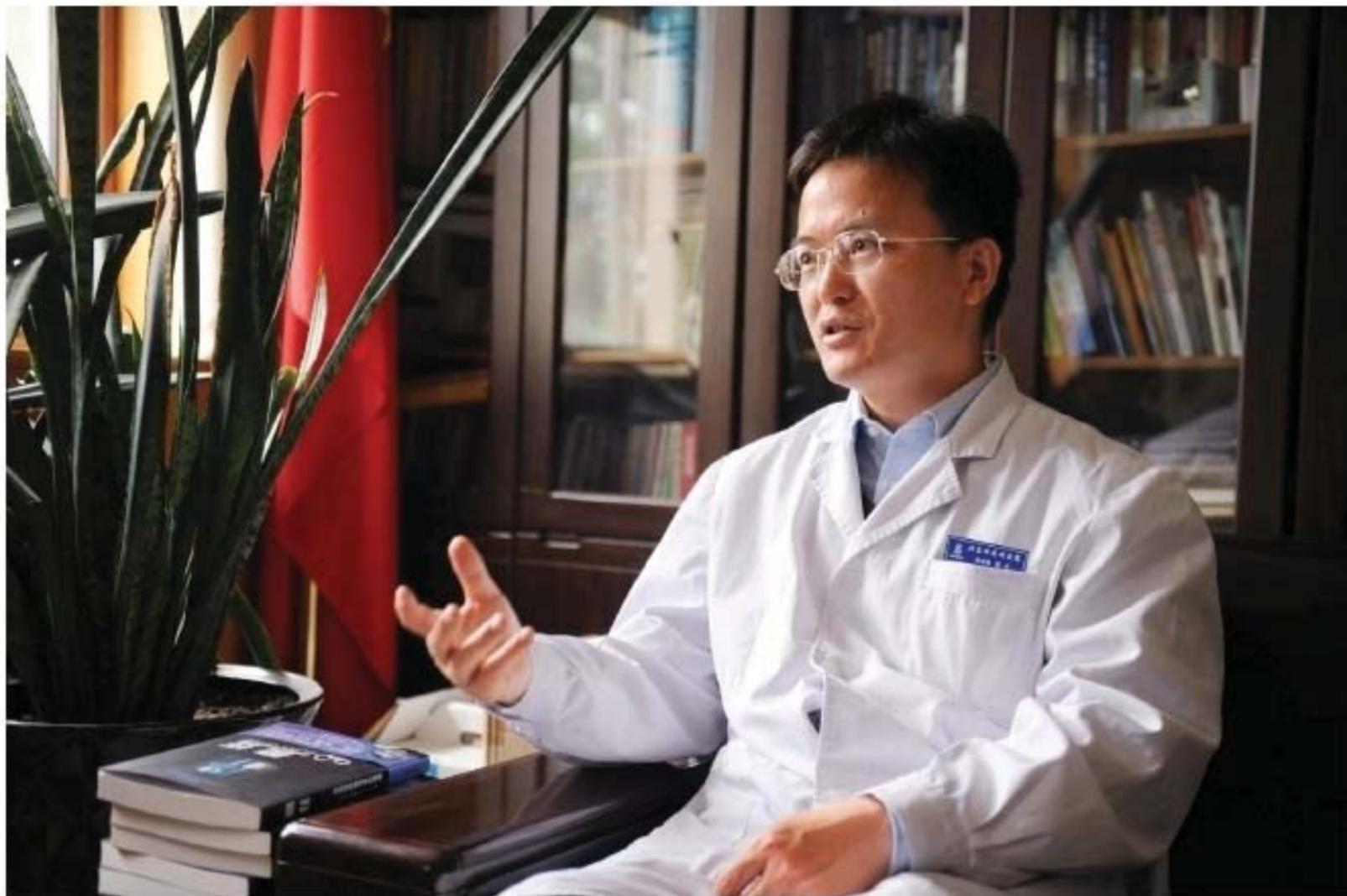
北京安定医院的抑郁症治疗中心从 2006 年成立，是中国第一家抑郁症治疗中心，从原来的 100 张床位扩张到 250 张床位。“刚成立的时候，安定医院门诊和住院的患者 70%~80% 都是精神分裂症，但这个中心成立 3 年后，数字就有了明显变化，门诊和住院患者 50%，甚至 50% 以上都是心境障碍。”

“为抑郁症设置单独的科室，是近 10 年来中国精神医学的一大进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抑郁症治疗的社会需求是很大的。社会关注度提升，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抑郁症不是一个小众的疾病，而是一个患病率较高的疾病。”

但是，2013 年，安定医院曾经做过一次北京地



（张作霖）



左图：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祝卓宏

右图：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

区的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调查显示，就诊率不到10%。这不到10%的就诊率人群里又有90%的人选择的不是专科医院，而是综合医院或者心理咨询诊所。“你能想象癌症不去肿瘤医院看，而来安定医院看的情况吗？”王刚不止在一个场合用这句话来表达这件事情的荒唐性。

但是，这个问题有一部分恐怕是抑郁症本身的特点带来的——抑郁症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体验，从外在很难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抑郁症。

王刚告诉我们：“中国精神分裂症的就诊率很高，是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行为和思维上的异于常人的表现特别明显。相较之下，抑郁症患者在行为、神态上难以看出和常人的区别。抑郁症患者也很少存在思维逻辑障碍，更多地表现为思维上联想的速度问题，会迟钝。但性格较为好强的患者在职场、公众面前不愿意把自己内心的真实体验暴露出来，所以也无法从表情判断。什么叫强颜欢笑啊？即使专业人士也很难从行为、表情挖掘病人的内心状况。”

抑郁症在发病早期还经常表现出“自限性”的特点，会自行缓解，这是影响患者不去看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为忍忍就过去了。但事实上，如果不

及时就诊，后期发病会越来越频繁，程度越来越严重，每次持续时间越来越长。国外研究还表明，随时间推移，后期外部原因对发病的影响会越来越弱。但如果一早发现就就医，经过系统的持续的治疗，后期大多不会再有反复发作的情况。

抑郁症还有另外一个很可怕的特征，让人消极、悲观，看不到希望。一些重度抑郁症患者大都是被家人强迫送来的，因为他们本身已经丧失了求生的欲望。

经济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虽然目前抑郁症的药物大部分都在医保范围之内，但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当然，还有医疗资源的不可及——我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有2.7733万人，心理治疗师5000余人，总计只有3万多人。

但是，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愿意跟精神疾病扯上关系。中国人对精神障碍有一种强烈的病耻感，可能与我们的文化对“疯狂”的恐惧和歧视有关系。根据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精神障碍一共有157种，焦虑、抑郁、睡眠障碍都是，精神分裂症只在其中占0.5%~1%，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发病率都是差不多的，但我们却会不自觉地精神障碍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画上等号。

即使在大城市，当我们谈论抑郁症的时候，人们仍然习惯于轻声低语。一位曾经的抑郁症患者告诉我，她跟新认识的男朋友一提起自己得过抑郁症，立刻就被拉黑了。而越到中小城市、偏远地区，对精神障碍的认识误区就越严重。“心理疾病患者受到歧视，不仅个人得不到规范治疗，而且他们的家人也不理解，更不知道如何照顾、帮助他们。最后，患者丧失社会劳动能力、失去工作，家人互相指责、矛盾不断；一人生病，拖累一家子，严重影响家庭生活和经济状况，甚至沦为社会困难家庭。”

“抑郁症是一种家丑。人们会想：如果是内因，说明我们的基因有问题，个性有问题；如果是外因，是人际因素导致的，那说明我们的家庭关系不好。”祝卓宏分析说，“我们很害怕人际评价。人际关系越密切的社会，越在意别人的评价。但所谓无能、基因不好、自杀、伤害别人……这些耻辱标签都不是病人给自己贴的，而是社会给贴的。”

身体与心理？

1980年夏天，美国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曾经在湖南进行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当时在中国人中流行的“神经衰弱症”，87%是重度抑郁症。在这项研究中，绝大多数患者主诉躯体化症状，90%的患者抱怨头痛，78%的患者失眠，73%头晕，49%的病人包括各种痛苦，而将情绪低落作为主诉症状的患者只占9%。克莱曼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社会传统上并不认为情绪问题是“疾病”，只有“身体”作为一个具体的、可供展示的客体，才是疾病发生的场所。

在中国，躯体症状确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根据这次最新的全国性流行病学调查，心境障碍的城乡分布是城市1.94%，乡村2.27%，乡村明显高于城市。但在农村，谁会说自己得抑郁症呢？但一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农村的躯体问题就太多了，尤其是女性，身上疼，但说不出哪里疼，其实是在家里长期受到歧视……”

在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我们的记者随行出诊，也发现很多病人都有躯体不适的现象，比如失眠、头痛、心悸以及消化系统疾病。不少人在综合医院看了很多年，才意识到是精神上的问题，才找到精神科。

王刚认为，这种现象更多的是出于对疾病的认知不足。“中国人在心理健康方面的认知上和其他国家差异较大，本身关注度也不够。国人往往忽略抑

郁症的核心症状，而是关注一些伴发症状。”

“从就诊状况来看，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多数在综合医院就诊，而不是在专科医院就诊。但综合医院大部分以躯体症状为源头来进行就诊。这也是一个原因。一个现象由多重因素导致。事实上，在综合医院，有专业精神科资质的医生数量不足，而医生往往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去分析问题，可能在关注上也会更偏向于躯体症状。”

在祝卓宏看来，当中国人感到不适时，更容易从身体感受到情绪的痛苦，也更容易从身体上去找问题，这种现象部分还可以归结为东方文化的含蓄性。比如中国人对于挫折、障碍的应对策略，向来崇尚一个“忍”字，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的人际交流也很少会说“我心情不好”，而是说“我身体不舒服”，否则别人就会觉得你很奇怪。

其实，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张疾病标签合法地承载了许多中国人的精神痛苦。如果是在二三十年前，我们在安定医院门诊见到的那些病人，同样的症状大都会被贴上一张“神经衰弱症”的标签。

神经衰弱症在中国的患病率曾经是很惊人的。1982～1985年全国12个地区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神经衰弱”的患病率为13.03%，城市患病率为14.02%，农村为12.05%。

“神经衰弱”是19世纪中期美国医生乔治·彼尔德（George Beard）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彼尔德总结了当时在美国广泛流传的一类原因不明的躯体综合征，将其命名为“神经衰弱症”，即“由过度疲劳引起的神经机能衰竭”，其症状包括多系统多项躯体痛苦，比如全身不适、功能衰弱、食欲不振、长期神经疼痛、失眠、疑病以及其他类似症状。

彼尔德认为，这些神经系统上的虚弱或疲惫以及各种精神和身体的低效症状是由于神经功能的一些可逆的失调所造成的。神经衰弱的概念几乎包括了所有非器质性生理功能紊乱和多种由于心理社会原因引起的心理生理障碍。

与抑郁症相比，神经衰弱显然是一个更中性的疾病标签——不过是神经系统的问题，是过度劳累等原因导致的。当人们可以把精神上的痛苦与不适归因于社会，而不是个人的基因、生活习惯或自我约束时，这种病听起来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当它从20世纪上半期由日本传入中国之后，就迅速被中国的普通民众所接受。连传统中医也对它做出看起来病因一致的解释：由内部或外部的原因导致的“正气”的衰减，使气的不足和身体抵抗力降低。

但是，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精神病学家开始争论“神经衰弱”究竟是不是一个独立的病种。之后神经衰弱逐渐被界定为是由许多不存在内部联系的症状堆砌起来的一个病种。因此，神经衰弱在DSM 3中被删除，以抑郁症、焦虑症等病名代替。

今天，“神经衰弱症”也从中国人的精神障碍清单中消失了。但是，从神经衰弱症到抑郁症，仅仅是我们与西方医学接轨的一种方式吗？用一种科学的标签代替一种不怎么科学的标签？中国式的“神经衰弱”与“抑郁症”的标签背后所承载的，真的是同一种疾病吗？我们对悲伤、抑郁和痛苦的理解，真的没有受到美式精神疾病的影响甚至“推销”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的答案却不尽相同。

王刚说：“神经衰弱这个疾病的诊断名称已经没有了。因为根据长期的跟踪随访，发现神经衰弱的病人诊断显示他们患抑郁症的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神经衰弱可能是抑郁症的早期表现，或者说是抑郁症的一个具体化的表现。”

黄悦勤则认为：“神经衰弱症与抑郁症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上世纪的神经衰弱症现在归类于焦虑障碍。”

很多时候，抑郁症患者会对“抑郁症”这三个字感到不满——没说几句话，5分钟的时间，医生就用这三个字概括了他所有的痛苦。

徐凯文（精神科医生，北大临床心理学博士，副教授）认为，仅仅从现象层面进行描述而发明的医学标签本身就是粗暴的。“人类对自己的精神世界，心理世界的认识还是很不足的。无论精神科医生，还是心理学家，都不应该停留在只是简单地贴上抑郁症的标签。”

“世界上有几百种精神疾病，有一些是有明确原因的，比如梅毒、吸毒导致的精神症状，治好了梅毒，相应的症状就会消失；还有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一个人经历地震、战争，经历了生死，受到了惊吓，经历了丧失的痛苦与创伤，这些都是明确病因的。但抑郁症的诊断，只在症状层面有相似性，它是一种现象的描述，不同的抑郁症患者在实际发病机理有很大的不同，跟生物、社会、经济、文化都可能有关系。”

对每一个病人而言，这些标签背后都是一种具体的痛苦，如果不能真正深刻理解它的痛苦和可能的原因，就无法真正更有效地帮助他们。就像这几年他一直在研究的“空心病”的现象。临床上，这些年轻人大都被诊断为“抑郁症”，但他们的病因既

不仅是生物化学的，也可能不是原生家庭的问题，没有心理创伤，也不是因为克服不了的负性认知。他们只是丧失了存在感和意义感，内心是空的，不能认同自己，因此一点点小挫折就能让他们整个地放弃人生。他们内心的荒芜，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他们觉得生活是美好的。“如果没有对这些问题反省，找到真正的病因，而只是处理现象和症状，那就像一个人发热，医生不管病因，只是不断地用退烧药来解决一样是不行的。”

“人的精神世界是非常复杂和美妙的，西方的精神医学想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找到一种简单的物质基础的归因，以此理解人的爱情、人的悲伤、人的痛苦，这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矮化。”

在病情最严重的时候，豆子曾经无数次站在30楼的公寓屋顶，想要纵身跳下去。最终没有跳下去，是因为她怕死，也是因为终究舍不得家人。她想到小舅妈的房子还在装修，她还想看。

在精神专科医院的病房里，最终将她从一团无知无觉的麻木状态中拽出来的，是听到一直陪在身边的母亲被同病房一个大小姐脾气的病友责骂。一种难以忍受的愤怒和心痛，突然刺破那个情绪堆积的暗无天日的浓雾。

她从小跟着外婆长大，与母亲的关系并不亲近。但那个时候，“我妈就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的希望。我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里，寸步不离，有点像回到了婴儿状态。后来出院，彼此都还有一点伤感”。

40天后，她出院了。无意间听到父亲为她辩护，“我的女儿我自己知道，她有一颗赤子之心，她不会变坏”。

她开始重新想起两年前去世的小姨。她们从小一起长大。她那么活泼，那么爱美，那么充满生命的活力，总是给全家人带来欢乐，却在30多岁就生病去世了。她想，也许，她的忧郁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以前，周围的人总是对她说，要优秀，要优秀，但现在，她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优秀？为什么不能承认：“我并没有那么优秀，我可以不必那么优秀？”

“接受自己可能不那么优秀，是我在生病之后得出的结论。”她说，“但与此同时，也不再委屈自己，想哭就哭，想笑就笑。”

偶尔，她还会有一点抑郁症的残留症状，心有一点点下坠的疼，但除此之外，她觉得自己一切都好。

“什么事情，发生都有发生的道理，有时候我会很感激这场病。”她说。■



(新京报尹亚飞摄/视觉中国供图)

2013年6月25日，北京安定医院的一名护士正在核对病人的治疗单

抑郁症：吃药还是不吃？

主笔 / 曹玲

对很多抑郁症患者来说，药，吃还是不吃，是一个非常纠结的问题。

药的忧虑

8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北京安定医院二楼打量那些候诊的人们，他们很多人是来看抑郁门诊的。

这里和普通医院的候诊区没什么两样，有人在看手机，有人和家属交谈，有人盯着屏幕看有没有到自己的号，有人两眼放空，露出疲倦和略显呆滞的神情——这也正常，北京的三甲医院人满为患，

看个病往往要在喧闹的环境中等上半天，病人常常感到焦躁和不耐烦。

只有两个人让我觉得略有异样。一个姑娘在一个小伙子怀里把头蹭来蹭去，好像是在抽泣。但是在医院里哭的人太多了，肿瘤医院里时常能看到蹲在墙角下泣不成声的患者和家属。此外还有一个姑娘，穿着破洞过大的牛仔裤，整个膝盖和半条大腿都露在外面。姑娘用手机看演唱会，一个外国饶舌歌手又蹦又跳，声音很大，她一边看一边不停地抖腿，抖了至少有20分钟，周围的人并没有对她提出任何异议。

“大多数抑郁症患者表面上看起来和常人没有

区别，你无法一眼看透他的内心。但是走进诊室，有些人哪怕四五十岁了，也会哭得一塌糊涂。”安定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李晓虹说，她擅长治疗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等精神疾病。这种现象在心理治疗师那里更常见，有人调侃道，看心理医生贵，一张嘴就哭上半个小时，几百块钱没了。

在李晓虹的诊室，有人说着说着眼圈泛红，不光病人，家属也是如此，各个满腹心酸。病人从事各种职业，有IT工程师、律师、管理人员、学生、退休老人、失业人士……大家遇到的事情五花八门，有的和医生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有的只阐述了症状。其中一部分人还在艰难地坚持工作，一部分人已经休假或辞职。抑郁症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很多患者都说：“医生，道理我都懂，就是做不到，怎么办？”

“抑郁时，患者的整个评价体系都是负性的，没有办法靠个人力量变成正性的。”李晓虹说。来安定医院就诊的患者中，中重度较多，一些轻度的患者很可能选择去有精神科的综合性医院解决问题。毕竟大家对于精神专科医院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比如上海人经常调侃：“你刚从宛平南路600号出来啊？”宛平南路600号就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而北京的安定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回龙观医院更是全国有名的精神专科医院，对于普通人而言，总有一种无法直视的距离感，轻易不会迈入医院的大门。

李晓虹的诊断工具不多。目前临床上无法通过化验或者仪器检测来诊断患者是否有抑郁症，一些检查为了排除其他疾病，比如甲状腺功能减退、脑部肿瘤引发激素异常也会让人表现出抑郁的症状。此外，还有些检查是为了保证服药的安全性而进行的。

目前出现了越来越复杂的脑成像技术，比如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和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让人有机会更仔细地观察大脑工作。例如，fMRI可以通过测量神经递质受体在某些区域的分布和密度，来追踪脑区活动变化。使用这项技术可以更好地理解大脑中哪些区域可以调节情绪，或者其他功能是如何被抑郁症影响的。但是这些技术只用于研究领域，离真正的临床诊断还有一段距离。

她常用的工具包括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精神症状自评（SCL-90）等。这

些量表仅仅进行症状和严重程度筛查，临床上，疾病诊断仍需要依靠医生详细的精神检查。医生通过询问患者的症状、既往的生活心理事件、性格特点、家族史、躯体疾病病史等进行初步的判断。通常，她会给中重度患者开药，以药物治疗为主，心理治疗和其他疗法为辅。

常常会有人问：“我严重到必须要吃药吗？不吃药行不行？会不会有各种副作用？会不会成瘾？会不会吃一辈子？”

“为什么要建议中重度病人吃药呢？因为抑郁症是一种很容易复发的疾病，一些研究表明，第一次发作之后有一半的患者会痊愈，另一半会复发。如果你是第一次得抑郁症，你不知道日后会不会复发。现有的研究表明，全程治疗可以有效降低抑郁症复发。所以，首次发作我们就建议全疗程治疗，在发病的急性期控制住症状，症状好转后一般两三个月能恢复。恢复之后还要继续吃药，预防疾病的死灰复燃，绝不可以擅自停药。”

抑郁症发作一次的自然周期是4~6个月，如果不对病情进行人为干预，初期，它也会可能自然趋于缓和。在人为干预的两三个月之内，药物能够控制症状，但是药物和疾病的发展处于相持阶段，此时如果停药，症状依然会出现。“所以，我们建议第一次抑郁症发作，症状消失后继续服用6~9个月的药之后再考虑停药。过快撤药会有撤药反应，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渐停药。”

并非每个患者都必须吃药。对于一些轻度或者中度偏轻的患者，李晓虹认为可以采取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当今的循证医学表明，非药物疗法包括一些心理治疗，如认知行为治疗、人际心理治疗等，疗效和药物相当。”

但是患者如果已到中重度或者具有强烈的自杀倾向，她就强烈建议必须吃药了。“很多中重度的患者已经无力通过一些非药物的方法提高自己体内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的水平，这时就必须用药物让它们很短的时间内恢复，然后他才能够积极应对疾病和生活，否则就会进入死循环。”

多巴胺、五羟色胺以及去甲肾上腺素都是大脑内负责传递信号的化合物，也叫神经递质。多巴胺被称为幸福荷尔蒙，负责传递兴奋愉悦的信息；五羟色胺能让人产生快乐的情绪，浓度低下会让人失去动力，注意力涣散；去甲肾上腺素和人的活跃程

度有关，我们的食欲、性欲都受它的影响。传统的理论认为，抑郁症是因为大脑的某些神经递质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抗抑郁药能提升这几种神经递质的含量，让大脑的神经递质重新恢复平衡，从而恢复正常的情绪。

但是抑郁症是如此复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况，如何用药不能一概而论。门诊有一位三十几岁的女性，婚后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怀上孩子，然而胎儿在大月份时出了问题，直接导致她患上抑郁症，初诊的焦虑和抑郁测试显示是重度抑郁。然而她急于再次怀孕，不想服药，并且通过休假、心理咨询等方法在积极恢复，复诊时抑郁和焦虑测试的分值都明显降低了。休息期间，她的家人意外受伤，对她而言这又是一个新的生活事件，让她感到紧张。李晓虹建议她继续休息，继续进行心理咨询。“如果她来复诊时焦虑和抑郁测试的分值依然很高，我就会强烈建议她吃药了。”

虽然是精神科医生，但是李晓虹也同时接受了系统心理治疗的训练。“每个医生观点不同，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我更理解她希望成为母亲的心情，况且她的目前的焦虑、抑郁水平并不高，所以可以尝试非药物干预，而且她的心理咨询师同时也在监控她的情绪状况。如果忽视患者的心理因素和应激源，一味要求她服药，她也不会配合，觉得医生不理解她，下一次可能不来看病了，这样就把治疗的道路封闭了，反而对患者更加不利。”

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并不冲突。合格的心理咨询师也会给病人做筛查和评估，建议重度抑郁的患者到精神科就诊。门诊时，有位年轻漂亮的苗条姑娘，先是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症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也无法很好地执行心理咨询师的建议，并且回避、排斥早年发生的事情，于是心理咨询师建议她去精神科进行治疗。

“病人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建议继续进行心理咨询的。做心理咨询和治疗需要调动自己的资源，一个人的资源有限，严重的病人没有足够的资源，这个时候如果非让她去调动，她会很排斥甚至加重抑郁。我们建议停止心理治疗，通过药物改善情绪，等情绪稳定后再联合心理治疗。”李晓虹说。

总体来说，世界各国关于抑郁症的诊疗指南中，都把中重度抑郁症的药物治疗作为基础性治疗手段。但是对于轻度以及中度偏轻的抑郁症，不同医生有不同的看法。安定医院院长王刚说：“按照指南的说

法，轻度抑郁症未必需要吃药，可以通过心理疏导、压力管理、运动调节等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这些方法的总体有效性，特别是在长期治疗中的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短期的疗效、长期的有效性如何？采用了这些方式之后，是否能够有效地避免复发？或者能避免患者从轻度发展为中度、重度？我觉得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支持它。”

按照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患者需要至少已持续两周出现抑郁症状才可以确诊。而王刚认为，无论是家人去世，还是失恋这样常见的打击，只要情绪低落持续一周就可以来就诊，尽早进行干预。至于这样一来会不会导致治疗过度、药物滥用等问题？王刚认为，药物滥用的问题是肯定存在的，但是目前我国最大的问题是诊断和治疗不充分，而不是过度。

浙江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包爱民长期研究抑郁症，她有一位精神科的医生朋友，朋友也曾告诉她，自己心情不好没有调整过来就吃药了。“事实上他并没有达到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但是他觉得自己不好，就借助一些药物尽早对自己进行干预，防止变成真正的抑郁症，我认为这也是可行的。”包爱民说。

抗抑郁药通常在服用几周后才会起效，但副作用却很快出现，这个阶段患者会感到非常难熬，甚至抑郁情绪进一步加重。对此李晓虹说，副作用因人而异，有些人初期服药会头晕、心慌；有些人睡眠不好、多梦；有些人恶心、消化不良；还有一些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导致出汗、面色潮红等等，这些都是常见的副作用，一般会在服药两周之后逐渐淡化，大多数人能够适应，适应不了的医生会考虑换药。

还有一些人担心吃药以后会变呆变傻，脑子坏掉。“这是不可能的，药物的化学成分是一个激动剂，是让人快乐、改善情绪的化合物。有些人觉得变呆变傻可能是因为长期在吃一些抗焦虑的药物，比如安定类药物，时间长了会影响认知，面部表情松弛，反应迟钝，注意力下降，让人产生‘呆傻’的感觉。”

各种研究表明，如果不进行治疗，持续不断的抑郁症同样会伤害你的身体，比药物治疗的副作用更严重。抑郁症不仅会伤害大脑，还会摧毁你的信心和自尊，让你的生活停滞甚至一团糟。“在抑郁症刚发生时进行充分的、及时的治疗能够减少抑郁症



(视觉中国供图)

2015年10月11日，北京安定医院开展大型咨询活动，咨询内容涉及老年精神科、儿童精神科、情感障碍等方面

复发的概率，患者一定要及时进行干预。”王刚说。

什么导致了抑郁症？

有人把抑郁症比作心脏病。心脏病是由一系列复杂因素导致的，包括遗传易感性、情绪因素、饮食、运动习惯等等。心脏病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萌生的，就如同血小板在动脉聚集一样，一旦你跨过了血压和胆固醇水平的隐形阈值，就会患上心脏病，它将伴随你的余生。

抑郁症也可能属于类似的阈限疾病，遗传和生物学因素决定了我们每个人可以承受不同的压力水平，压力一旦达到某个程度，就会把我们推向抑郁症的边缘。大脑不正常的情绪调节、遗传易感性、应激性生活事件、药物和医疗问题，这些事情中的几种相互作用导致了抑郁症。

“某些压力将人推入第一次真正的抑郁，一旦跨过那条线，就再也回不去了，就‘有’了抑郁症。我们可以从一次次发作中恢复过来，我们可以改变

生活方式来预防或者调节以后的发作，但是我们依然‘有’着抑郁症。除了少部分非常幸运的、在最初就得到了有效治疗的人，对大部分人来说，轻度的心境恶劣还是会一直存在，除非接受严格的康复训练。”美国心理治疗师理查德·奥康纳（Richard O'Connor）在《走出抑郁》一书中写道，他也曾是一名抑郁症患者。

抑郁症在家庭中传播。王刚分析认为，从抑郁症发病机制来看，遗传因素排在首位，遗传在其中的贡献度大概是百分之四五十。“所以我们关注的第一个人群，就是有抑郁症家族史的人群，追踪自己的父系、母系这两系，三代之内如果有抑郁症的患者，你就应该关注是不是有抑郁症的风险。”

此外，非遗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与抑郁症患者一起成长的人可能更容易患这种疾病。看着沮丧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长大的孩子，可能会在一定条件下模仿那个人的行为。如果他从小习惯了父母连续很多天在床上躺着，可能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

抑郁症的发病和年龄、性别也有关系，儿童期男女发病率没有差别，但是进入育龄期后，女性是男性发病率的两倍，这样的差异在进入老年期后消失。“这和女性身体的激素波动有关，除了每个月的月经周期，怀孕生产和绝经期也是两次重要的激素波动期。”包爱民说。

虽然传统观念认为，抑郁症是大脑中某些化学物质失衡所致，但是新的研究表明，抑郁症并非简单的一种化合物过高，另一种化合物过低导致的问题。许多化合物在神经元内部和外部发挥着作用，大脑中数以百万甚至十亿的化学反应构成的动态系统，支撑着你的情绪、感知，以及对生活的体验。

“正是因为情况如此复杂，即便你看到两个人可能有着类似的抑郁症状，但是患病的内在原因可能完全不同，有效的治疗方案也有所不同。”李晓虹说。

研究人员认为，相比于特定的大脑化合物，神经细胞连接、神经细胞生长，以及神经回路的功能更为重要。然而，他们对情绪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理解远远不够，许多问题并没有答案。

目前，科学家认为在抑郁症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区域是杏仁核、丘脑和海马。一些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的海马较小。例如，在《神经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fMRI研究中，对24名有抑郁症病史的妇女进行了研究。平均而言，抑郁症患者的海马体比正常人小9%~13%。女性患抑郁症的次数越多，海马体越小。压力因素可能在海马缩小中起着重要作用，研究人员认为压力可以抑制海马中新的神经元产生。

那么，海马中新的神经元与情绪低落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吗？抗抑郁药物进入人体内会很快改变大脑中神经递质的浓度，但是病人感到好转却是几周以后的事情。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在想，如果抑郁症是神经递质水平低下引起的，为什么神经递质水平迅速增加之后并没有很快显示疗效？

答案可能在于，情绪好转只会随着神经生长，形成新的连接而改善，这个过程需要几周时间。动物研究表明，抗抑郁药能促进海马内神经细胞分支生长和增强。有一种理论认为，这些药物的真正价值可能是产生新的神经元，加强神经细胞之间的连接，改善神经网络之间的信息交换。如果是这样的话，研发促进神经生长的药物或许会看到更快的治疗效果。

虽然如今常用的第三代抗抑郁药已经副作用更少、起效更快，但是并非所有的药物都对患者有效。有的药物对这个患者有效，有的药物对那个患者有效，还有一些患者对任何药物都没有反应。对此，医生只能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试错治疗：如果效果不好，再调整药物。

包爱民说，人的大脑里有1000亿个神经元，这些神经元被神经纤维连接起来，神经纤维在头脑中缠绕了10万公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网络，比中国高铁网复杂无数倍。“高铁网络上有的是小站，有的是枢纽站，比如上海站。假设上海站出了问题，它会使得和它发生关系的站点都出现问题，这个时候你去调节完善北京站肯定无效。如果抗抑郁药是针对北京站的，对上海站就不会有效果。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实际情况更加复杂，这样可以简单解释为什么有些药物并不起效。”

一种预防自杀的新药

目前，临床使用的抗抑郁药中，起效最快的需要一周时间。这对那些生不如死、度日如年的重度抑郁症患者来说还是太慢了。王刚说，曾有被家人拖来看急诊的抑郁症患者，一路上两度试图钻到车轮底下自杀。对于患者的家人和临床医生来说，如果有一种能立刻打消自杀念头的药该有多好。

王刚正在研究一种名为艾氯胺酮(Esketamine)的药物，这是氯胺酮(Ketamine)的异构体，而氯胺酮是一种常见麻醉药，同时也是臭名昭著的毒品，俗称“K粉”。

2000年，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利用氯胺酮作为抑郁症的治疗方法。他们发现，它比传统的抗抑郁药物更快地改善情绪，当传统药物失效时它也能起作用。与一般抗抑郁药不同，氯胺酮几个小时内就开始有效。对于有自杀意向的人，这种快速的效果可以挽救生命。

耶鲁大学精神病学教授杰拉德·萨纳科拉(Gerard Sanacora)曾给上百位重度抑郁症患者使用过低剂量的氯胺酮。他在接受采访时称，经常有许多医生问他怎么能给病人提供如此有潜在危险的药物，他都同样的话回复他们：“如果你有病人已经接受了正规的治疗，却在短时间内仍极有可能严重自虐甚至自杀，那为什么不试试这类新的治疗方法？”

目前，对伴有自杀风险的重度抑郁症患者，通常采用电休克治疗。但电休克治疗有一定副作用，使用也受到一定局限。而氯胺酮见效快，疗效显著、创伤小，显示出临床优越性。或许正是考虑到氯胺酮应用的某些效果与电休克相近，国外一些学者也把它形象地称为“静脉电休克”。

与抗抑郁药不同，抗抑郁药通过转移大脑化学物质的平衡如五羟色胺和多巴胺来工作，而氯胺酮则被认为改变了脑细胞相互通信的方式。它阻断了一种称为NMDA的受体，这种受体在大脑信号传输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被认为会加重抑郁症。

目前，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把强生公司的艾氯胺酮和艾尔建公司的Rapastinel列入“突破性疗法”，这两种都是氯胺酮类药物。获得“突破性药物”认证的药物开发能得到包括FDA高层官员在内的更加密切的指导，保障在最短时间内为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试想一下，如果有患者想自杀，给他喷点药，他就开开心心地走了，那该多好。”王刚说。他目前正在进行鼻内吸入式氯胺酮药物的临床后期研究，这种给药方式比静脉注射更加方便。

但氯胺酮也不是特效药，现在并没有证据表明病人一经用氯胺酮，抑郁就能得到根治。药物的初始效果在1~3天内就会消失，长期效果如何依然不得而知。王刚的一项研究是把氯胺酮联合原有的抗抑郁药使用，看看能否促进原有抗抑郁药快速起效。

一般来说，抗抑郁药的起效时间是服药两周后，他们希望通过氯胺酮和药物联合，让两种药物的相互作用，将抗抑郁药无法起效的时间覆盖掉，使整个治疗作用连起来。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氯胺酮单次给药联合抗抑郁药艾司西酞普兰，可快启动和增加艾司西酞普兰的抗抑郁疗效。

科学家们想得更远，他们试图了解氯胺酮能否作为一种预防抑郁症出现的药物使用。有研究表明，氯胺酮能够预防情绪紊乱的出现。在伊拉克受伤的美国士兵使用了各种麻醉药包括氯胺酮，由于氯胺酮能引起幻觉，外科医生原本担心它会引发与战争有关的幻觉，使得士兵患有精神病的风险提高。

结果却发现了相反的情况。2002~2007年在伊拉克受伤的2.5万名服役人员中，接受氯胺酮治疗的退伍军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病率较低。在因

烧伤而住院治疗的平民和士兵中，多达45%的人最终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而战场上使用氯胺酮治疗的士兵，尽管有更严重的烧伤，需要更多的手术以及更长的住院时间，但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却减少了一半。

科学家正在研究，是否可以使用氯胺酮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给军人、被强奸者、车祸以及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幸存者使用。不过，并非每个人都相信氯胺酮是一个安全的赌注，它的长期安全性也是一个未知数。“研究还在继续，患者需要更好的药物。”王刚说。■

受抑郁症影响的脑区



杏仁核：杏仁核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是大脑深处的一组结构，与情绪有关，比如愤怒、愉悦、悲伤、恐惧和性唤醒。当一个人回忆带有强烈感情因素的记忆时，比如害怕，杏仁核就被激活。当一个人悲伤或者临床诊断为抑郁症时，杏仁核的活跃程度更高。即便在人们从抑郁症中恢复，这种活跃程度的增加依然存在。

丘脑：丘脑接收到部分感觉信息，并将其传递到大脑皮层的对应区域，从而指导语言、行为反应、运动、思维和学习等高级功能。一些研究表明，双相情感障碍可能是丘脑的问题引起的。

海马体：海马体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在处理长期记忆和回忆方面起着核心的作用。海马和杏仁核之间的相互作用验证了一句谚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正是这部分脑区使你产生了恐惧感，当你面对有攻击性的吠犬时，关于这一经历的记忆会让你在日后的生活中提防狗。一些抑郁症患者海马体较小，研究表明，持续暴露在压力激素下，会损害大脑部分神经细胞的生长。

抑郁自评量表 (SDS)

请仔细阅读每一题，把题目的意思看明白，然后按照自己最近一周以来的实际情况，对下面的20个条目按1-4级评分：①很少；②有时；③经常；④持续。

- | | |
|-----------------------|-----------------|
| 1. 我感到情绪沮丧，郁闷。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2. 我感到早晨心情最好。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3. 我要哭或想哭。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4. 我夜间睡眠不好。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5. 我吃饭像平时一样多。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6. 我的性功能正常。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7. 我感到体重减轻。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8. 我为便秘烦恼。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9. 我的心跳比平时快。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0. 我无故感到疲劳。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1. 我的头脑像往常一样清楚。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2. 我做事情像平时一样不感到困难。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3. 我坐卧不安，难以保持平静。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4. 我对未来感到有希望。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5. 我比平时更容易激怒。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6. 我觉得决定什么事很容易。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7. 我感到自己是有用的和不可缺少的人。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8. 我的生活很有意义。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9. 假若我死了别人会过得更好。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20. 我仍旧喜爱自己平时喜爱的东西。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计分方式：1. ①、②、③、④依次计1、2、3、4分；2. 第2、5、6、11、12、14、16~18、20题反向计分，即①、②、③、④依次计4、3、2、1分。

统计结果：总分（20个项目所得分之和）：_____；标准分 T （标准分 = 原始总分 \times 1.25 并四舍五入取整数）：_____

抑郁评定的领临界值为 $T=53$ ，分值越高，抑郁倾向越明显。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72分以上为重度抑郁。

注：量表总分值仅作为参考而非绝对标准，应根据临床症状来划分；对严重阻滞症状的抑郁病人，评定有困难。

焦虑自评量表 (SAS)

请仔细阅读每一条,把题目的意思弄明白,然后按照自己最近一周以来的实际情况,对下面的20个条目按1-4级评分:①很少;②有时;③经常;④持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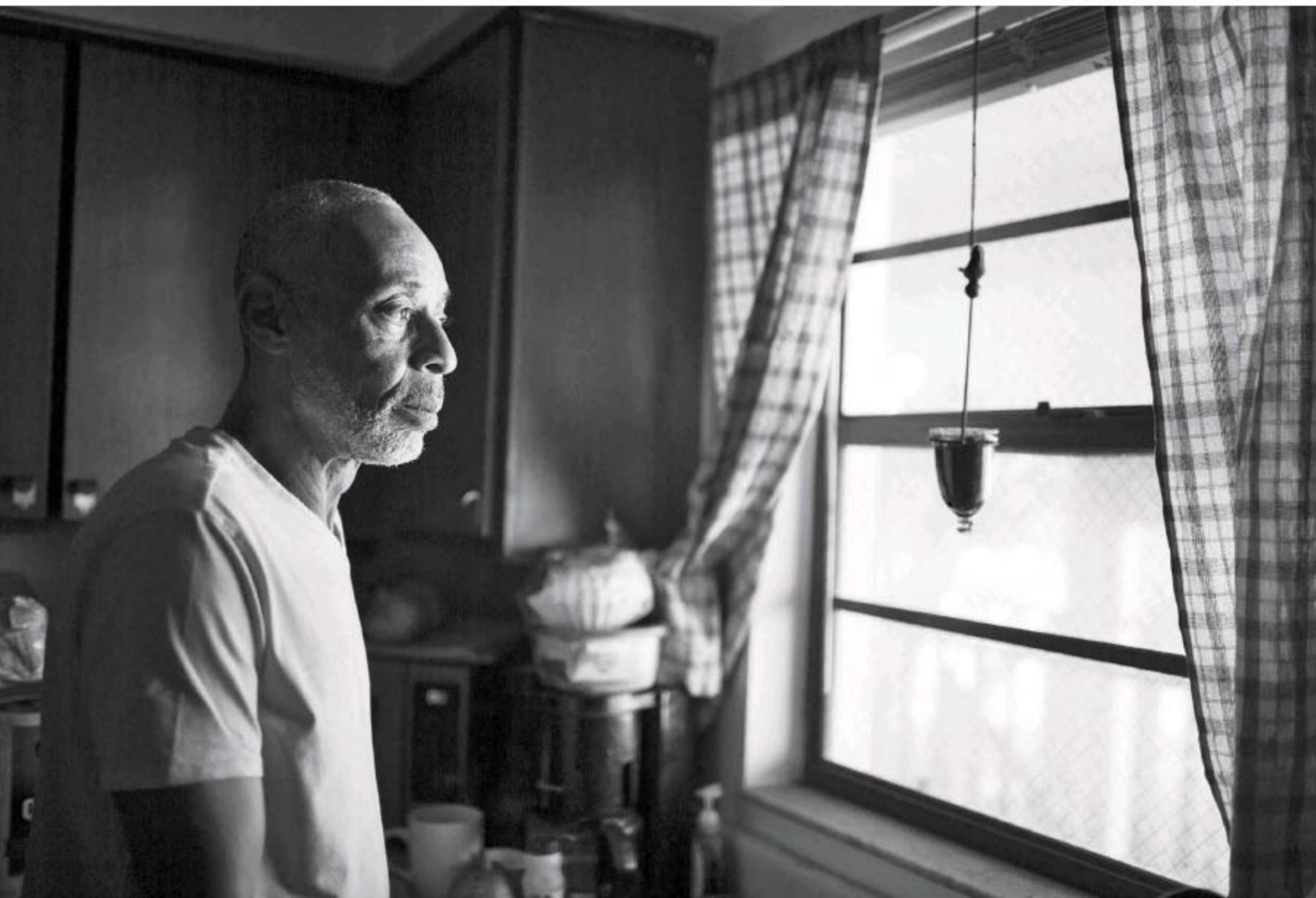
- | | |
|----------------------|-----------------|
| 1. 我觉得比平常容易紧张或着急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2. 我无缘无故地感到害怕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3. 我容易心里烦乱或感到惊慌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4. 我觉得我可能将要发疯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5. 我觉得一切都好,也不会发生什么不幸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6. 我手脚发抖打战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7. 我因为头痛、颈痛和背痛而苦恼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8. 我感觉容易衰弱和疲乏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9. 我得心平气和,并且容易安静坐着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0. 我觉得心跳的很快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1. 我因为一阵阵头晕而苦恼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2. 我有晕倒发作,或觉得要晕倒似的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3. 我吸气呼气都感到很容易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4. 我的手脚麻木和刺痛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5. 我因为胃痛和消化不良而苦恼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6. 我常常要小便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7. 我的手脚常常是干燥温暖的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8. 我脸红发热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19. 我容易入睡而且一夜睡得很好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 20. 我做恶梦 | ①很少 ②有时 ③经常 ④持续 |

计分方式: 1. ①、②、③、④ 依次计 1、2、3、4 分; 2. 第 5、9、13、17、19 题反向计分, 即 ①、②、③、④ 依次计 4、3、2、1 分。

统计结果: 总分 (20 个项目所得分之和): _____; 标准分 T (标准分 = 原始总分 \times 1.25 并四舍五入取整数): _____

T 值越高, 焦虑倾向越明显。低于 50 分为正常, 50 ~ 60 分为轻度焦虑, 61 ~ 70 分为中度焦虑, 70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注: 量表总分值仅作为参考而非绝对标准, 应根据临床症状来划分。



参加过“越战”的美国老兵托马斯在纽约家中，饱受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困扰

停下来，倾听你的情绪

——关于抑郁症的进化起源

主笔 / 陈赛

低落情绪是进化选择的结果，消除它不仅不可能，而且很危险。这样一个进化的视角，要求我们耐心、明智地管理我们的情绪，学会容忍一定程度的抑郁，学会倾听抑郁告诉我们的事情，按照符合进化本意的方式生活。

一个关于抑郁症的积极模型

对于这个时代的抑郁症，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曾经下过这样一个诊断——“自我的失常”。

在一个个人主义猖獗的社会，人们越来越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在这个信念系统的支配下，人们所面临的失败常常让人变得极其沮丧。与自我失常相随而来的，是公共意识的消失。以前，当我

们遇到失败时，可以停下来，在意义和希望的精神堡垒中休养一下，重新思考我是谁。比如宗教提供了一种更宽广的时空感，人在更大的视野中是如此渺小，个人的失败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上帝、社区、国家以及家庭的信任已经遭到严重侵蚀。现在，当我们需要一个避风港时，却发现原来那些舒适的沙发、躺椅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摇摇欲坠的小板凳——自我，而且是一个超大号的自我。除了将失败归罪于自我，我们别无选择。

听起来很有道理，但这个理论并不足以解释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因为在个人失败之外，抑郁症还涉及生物、心理以及社会的多重现实。无论科学家，还是心理学家，都没能破解抑郁症的复杂成因和治疗方法。

在《深度：抑郁症的进化起源》(The Depth: the Evolutionary Origin of Depression)一书中，乔纳森·罗滕伯格(Jonathan Rottenberg)从进化论的源头来审视抑郁症，提出一个很有趣的假设——抑郁症是一个人类动机的黑洞。

这种假设听起来既陌生又矛盾，却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可以用来解释抑郁症流行的起源，以及为什么抑郁症一旦生根就这么难缠(有四分之三的患者有终生复发的风险)。

罗滕伯格年轻时也曾患重度抑郁症。“这种疾病夺走了我的心智，我的自尊，我的几乎一切东西，由此，我对抑郁症和它的顽强产生了新的尊重，以及想要理解它的强烈欲望。”他甚至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从一名历史学家变成了心理学家。

罗滕伯格认为，之前关于抑郁症的各种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都是疾病模型——“因为抑郁症如此令人不快，伤害性如此之大，很难想象还有别的考虑这件事情的方式。这些坏的东西一定是疾病。治疗的逻辑也很简单，消除潜在的缺陷(无论是低血清素，或者悲观的思维)，将抑郁从人的情感中剔除出去。”

这种疾病模型也制造了很多问题。一些患者不愿意求助，因为他们被贴上了“缺陷”的标签。即使那些得到了帮助的人，也会一次次地被精神医学体系重复告知：你是一个有缺陷的人。但对于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些缺陷，却永远没有答案。

所以，他认为，还有另外一种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抑郁症是一种情绪病，最核心的症状就是情

绪低落。那就应该从情绪本身来看待这个问题。人为什么会有低落情绪？

从进化的视角来看，我们的身体是一系列的适应、进化的遗产，帮助我们在面对不确定和风险的状况时生存和繁殖，但这并不意味着进化是完美的，事实上，再了不起的适应也有代价——更大的大脑给了人类更高的认知能力，但也增加孕妇生产的风险；直立行走解放了手，有助于打猎与制造工具，但也给脊柱增加了压力，使背部更容易受伤。大部分哺乳类动物进化成了温血动物，能在寒冷的天气里捕猎，但它们也比爬行类动物需要更多的食物，有更多的挨饿和营养不良的风险。

情绪系统也一样，是进化选择的结果，有它的好处和代价。

情绪系统的进化优势与劣势

关于低落情绪的进化优势，有三种理论：

第一种，低落情绪有助于冲突中的焦虑，从而降级冲突——失败者认输而不至于战死；

第二种，低落情绪是一种“停止机制”，阻止一个人追求一个不可实现的或者危险的目标；

第三种，低落情绪是决策工具，将我们置入“反思的心智”，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环境，尤其是当他们面临非常棘手的环境时。

在这三种理论中，任何一种都不足以解释抑郁症的成因，但三者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理解，为什么低落情绪会如此难缠——因为它在很多时候是非常有用的。

在心理学里，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罗滕伯格将“情绪”定义为“驱动行为向正确方向展开的内部信号”。听起来很复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日常的体会——当一个人情绪好的时候，就会愿意做点什么事情，比如跟朋友出去玩；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不想动弹，想缩回去。可以说，情绪是行动的组织者和调节者。

高昂情绪鼓励有机体展开行动，追逐奖励；低落情绪则将焦点放在威胁和障碍上，并约束行为。当情况不大妙，目标不大可行时，低落情绪会暂停行动，确保有机体不做无谓的努力。在一个时间、资源和行动力都有限的世界里，进化出这样一个机制对生存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只熊如果在一个干涸无鱼的水塘里浪费太多时间是会饿死的。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

当然，与动物相比，人类与情绪系统的关系更复杂。因为我们可以选择根据情绪行动，或者无视情绪。我们可以告诉自己继续追求一个正在失败的目标，其结果就是人定胜天的意志与古老的情绪系统之间对峙。为了解决争端，情绪系统该怎么做呢？它可以关闭动机，不仅一个动机，而且一系列动机。最终，当情绪系统胜利的时候，会导致动机的全面崩溃，包括疲倦、迟钝，到最后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干。在一个房间里，床是行为冻结最自然的场所，而躺在床上的人，不是因为缺乏动机和目标，而是动机过于强烈，以至于情绪系统就像一个黑洞，最终吞没了所有的动机，使一个四肢健全的人完全爬不起床来。

这就引发出一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锲而不舍的努力一定是好事吗？西西弗斯一次次推石上山，

是人类高贵精神的象征。但是，当低落情绪一次次警告你放手时，你应该听从本能，还是听从意志？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有高远的志向，但太高的志向，也可能导致抑郁症。

动物也会情绪低落，任何养过宠物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除了“负罪感”和“自杀念头”之外，下面这只宠物狗具备了人类抑郁症的几乎所有症状。

人类症状 宠物症状

低落情绪 垂头丧气的姿势

失去兴趣/愉悦 玩耍减少，对食物和性的兴趣减退

睡眠障碍 更少睡眠，夜里不安

负罪感 ——

活力低下 散步时有气无力，不玩 fetch

精神运动性症状/行动迟缓

无法集中精力 缺乏注意力，不能表演 old tricks

体重与胃口变化 食量减退，消瘦

自杀念头，自我伤害 ——

从抑郁情绪到抑郁症的转换，很少是无缘无故的，比如“失去”就是最常见的心理触发因素，失去食物、失去伴侣、失去工作、失去爱人……比如这只叫奥利的宠物狗之所以表现出这些类似抑郁症的症状，据作者分析，是因为它刚刚失去了同伴。

大猩猩不会说“我很悲伤”，但当一只母猩猩面对自己的孩子死亡时，她的身体与行为的变化与刚刚丧子的人类母亲的反应是十分相似的，包括荷尔蒙变化（如类固醇分泌过高）、免疫系统受抑，以及生物钟紊乱。

美国的研究数据显示，人类四分之一的抑郁症与丧亲有关。痛失所爱，大概是最为普世性的悲痛。一个母亲，怀胎十月，孩子却夭折了。这时候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下一步要做什么。低落情绪会逼迫她停下来，思考这个孩子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现在孩子不在了，她应该如何继续生活。这种悲痛，超越历史，超越文化，尽管人类各种文化的仪式不同，但总是有这样的停顿，给你有一段时间抚平悲伤、重估环境、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

关于低落情绪的进化优势，一个被反复验证的理论是，低落情绪会让人更好地分析环境。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林恩·艾布拉姆森（Lyn Abramson）和劳伦·阿洛伊（Lauren Alloy）的实验发现，情绪低落（并呈现一定抑郁症症状）的人在评估对一个事件的控制权时更加精准，而情绪正常的人则倾向于高估自己对某个事件的控制度。澳大利亚心理学

家约瑟夫·福加斯 (Joseph Forgas) 则发现, 短暂的低落情绪会提高人的辩论能力。当实验对象被置于负面情绪时 (看十分钟关于一个人死于癌症的电影), 对一个题目 (比如提高学费、土著的土地产权归属) 能做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辩, 因为他们处理材料的时候更加谨慎、怀疑和小心。

那么, 低落情绪的代价呢?

最显然的就是行动上的弱点。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里, 行动力迟钝, 甚至瘫痪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有可能被捕猎者吃掉, 或者失去捕捉猎物的机会。情绪进一步低落, 压力荷尔蒙的过度释放不仅对身体造成损害, 还可能导致认知上的弱点。如重度抑郁症患者常常陷入扭曲的负面思维里: “我罪孽深重” “我不配活在世界上” 等, 而这些扭曲的思维会导向自毁性的行为。

作者认为仍然有必要在“浅抑郁”和“深抑郁”之间做出区分——浅抑郁是有适应价值的, 而深抑郁则是致残性的精神疾病。

情绪是一个连续的谱系, 而不是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两分法。证据就在于, 可能导致重度抑郁症的诸多风险因素, 如缺乏社会支持、高压环境、不良睡眠习惯、忧虑型个性, 与轻度抑郁症的风险因素是一样的。那么, 在 50 度灰的谱系中, 低落情绪到底是从什么时候从有益转向危害的? 对此, 科学暂时无法给出答案。但罗滕伯格花了很大的篇幅谈论抑郁症的种子最初是如何种下的。

抑郁症的种子是怎么种下的?

研究发现, 大部分的情绪波动都是短暂的, 外部压力对情绪的影响通常不会超过一天。情侣吵架会迅速和好, 朋友之间发火会很快道歉, 屋顶漏了很快就修好。这说明两件事情: 第一, 人是情绪的积极参与者, 我们不仅能意识到糟糕的情绪, 而且会主动修复, 散步、聊天、听歌、看电视剧, 都是有效缓解压力、平复情绪的方法。第二, 情绪系统自带抗压性, 它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做什么, 也善于放手。

但是, 有三个互相关联的触发因素可能导致负面情绪持续积压和沉溺: 事件、个性, 以及日常生活里的一些习惯。

第一, 事件。现代心理学理论认为, 如果能及时解释, 我们能更快地从一个坏事件中恢复过来。

困惑的想法、复杂的感觉, 是持续低落情绪的助力。事情发生的时机也很重要。很多研究发现, 早期的生命创伤 (身体、性虐待) 为抑郁症、焦虑症的缓慢蔓延提供了温床。

作者在书里提到一位叫简的中年女人, 长期患有轻度抑郁与焦虑, 从小父亲酗酒, 13 岁被邻居猥亵, 她不敢告诉任何人, 害怕母亲责怪, 父亲暴怒。“简的焦虑和悲伤, 是情绪系统的自然反应。在这个世界上, 当一个孩子的首要一连对象——父母——在情感上无可触及, 也不能提供帮助, 情绪系统就会一直预见 (forward looking), 坏事已经发生了, 它还会再次发生。最好做好更坏的事情发生的准备。焦虑的情绪会一直存在危险 (尤其在人际关系之中), 悲伤的情绪会分析失去了什么, 为什么会失去, 作为未来更大伤害的防线。”

第二, 个性。进化生物学家大卫·威尔森 (David Sloan Wilson) 说, 就个性而言, 进化并没有一个适合生存的最优解。但很多证据表明, 最倾向于抑郁的人格特质是神经质, 性急、敏感、对芝麻小事紧张兮兮、操心过度等,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伍迪·艾伦的样子。很多人都熟悉迪士尼动画片里蚂蚁和蟋蟀的故事: 秋天来了, 落叶飘零, 勤劳的蚂蚁都忙着为冬天储粮, 蟋蟀先生还无忧无虑地拉着小提琴, 当冬天到来的时候, 蟋蟀先生非常凄惨地饿着肚子, 最后在蚂蚁们的施舍下吃了一顿饱饭。高度神经质的人很像预言里的蚂蚁, 总是担心未来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对于威胁很敏感, 包括那些遥远的、隐藏的、微妙的威胁。

第三, 日常生活的习惯——即我们如何度过时间, 如何关心身体和心情——都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有一些习惯构建身体与精神资源, 改善情绪; 还有一些习惯则与进化的意志相悖, 会导致情绪系统的严重失调。

情绪系统是进化相当天才的设计。它对很多与生存繁殖有关的线索都很敏感, 比如日照, 白天的

大部分的情绪波动都是短暂的, 外部压力对情绪的影响通常不会超过一天。情侣吵架会迅速和好, 朋友之间发火会很快道歉, 屋顶漏了很快就修好。



20 世纪初期，英国一家医院的医务人员正在为抑郁症患者进行电击疗法治疗

时候动物会更警觉，更有活力，因为白天更容易找到猎物。同样的道理，人们在冬天更容易体验到低落情绪，北欧国家抑郁症高发就与冬季日照时间短有很大关系。健康状态也很重要，生病的时候，你的情绪会低落，这也是情绪系统在逼迫你慢下来，先等待身体康复。情绪系统对心理状态也很敏感。考试考砸了，失恋了，或者工作出了问题，情绪系统都会有所反应，因为你处在一个尴尬的处境，必须先搞清楚下一步怎么做。

很多研究证明，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与重重压力与身体的自然节奏、古老的情绪系统之间是相互冲突的。比如，我们得到的日照和睡眠越来越少，我们经常要为工作牺牲健康、牺牲休息时间，我们经常要远离亲人，在大都市里单打独斗，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工业化社会里不断升高的抑郁症患病率。

更为反讽的是，抑郁症在人类的严重程度远远高于动物，不是因为我们的缺陷，而恰恰是因为我们独特的能力。抑郁症从很多我们引以为豪的品质

吸取营养，比如思考和使用语言的能力、自我省察的能力、坚持野心勃勃的目标倾向，甚至我们追求幸福的冲动。

比如情绪，就像所有的适应一样，是在没有语言和文化的条件下进化出来的。它的一个关键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在意识之外运行的。情绪唯一需要的能力是清醒的感觉和有意识的知觉，包括对痛苦和愉悦的感知，而这在所有的动物中都是存在的。但当人类谈论情绪时，首先想到的是语言——我们很“生气”，我们很“悲伤”，我们很“高兴”。我们总是试图用语言去解释情绪，以及情绪出现的原因，但抑郁症患者会觉得“悲伤”“消沉”，其实很难真正描述他们内在的情感与体验。

尽管我们如此急切地想要解释情绪，但其实普通人很难看到情绪背后真正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外部环境（食物、同盟、潜在的伴侣）到内部环境（疲劳、荷尔蒙水平、免疫系统），都可能导致情绪系统的变化。而我们告诉自己的关于情绪的故事，往往

只是故事而已。比如我们假设自己感觉情绪低落，是因为我们工作进度落后了，但也许只是感冒刚好、身体无力；有时候我们无法为自己的情绪找到任何理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情绪不好），只好依靠心理咨询师帮我们找到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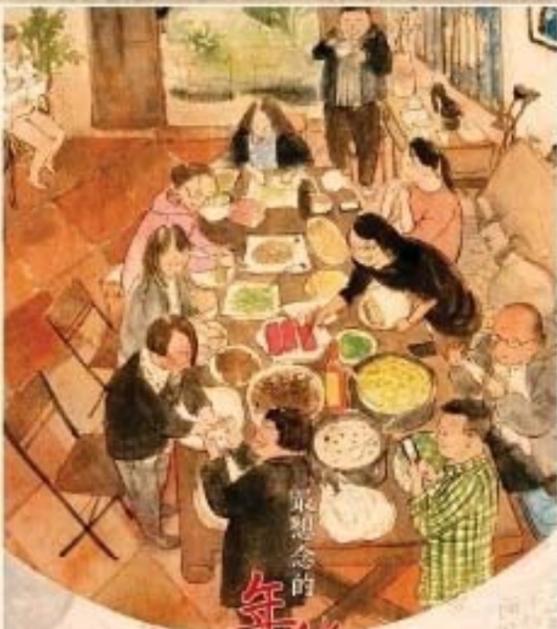
小狗失去了同伴，它能做的，就是望着窗外，寻找同伴归来的身影。我们却希望依靠思考来走出情绪的困境，但常常事与愿违——一个制造意义的机器运转过度，无时无刻不在对情绪低落这件事情进行解释，最终变成一种思维反刍，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的人生这么失败？我们强大的自我省察能力令这一切雪上加霜：为什么我不能放下，为什么我这么无能？我们时刻意识到我们在努力改变情绪上的失败。抑郁情绪每持续一天，我们对无力改变情绪这件事的挫折感就会增加一分。

再比如，人类很擅长设定目标，包括一些抽象的目标，比如幸福。越来越多的人将人生目标设定为“我要幸福”，但进化的目的从来与幸福无关，而是关于生存与繁殖。遇到喜欢的人，或者买了一辆新车，情绪系统当然会给予愉悦的奖励，但这种愉悦不会持久。没有人能够永远幸福，而那些以幸福为目标的人还在一直问，为什么我不能更幸福一点？尤其是当你看到朋友圈里那些更幸福的人，更完美

的假期，你开始深切地感到失败痛苦，对幸福的追逐最终变成幸福的阻碍，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则决定着你的抑郁程度。

但是，作者提醒我们，情绪系统是进化塑造的，要反抗它是很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情绪的奴隶。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情绪系统对如此多的内容敏感，意味着通往治愈有很多条路径——改变思维图景、改变事件、改变人际关系、改变与身体的关系（饮食、锻炼、冥想或者以药物改变大脑）。从这个角度来说，《深度：抑郁症的进化起源》这本书是很积极的。我们也许无法改变个性，但可以调节日常生活规律；也许我们无法改变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但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对它们的观点。我们可以试着改变人际关系，或者学习更加宽容地对待低落情绪。我们还可以重新评估和调整目标。很多时候，抑郁症患者无法逃离黑森林，是因为他/她不肯从一个已然失败的目标中抽身（无论是失败的婚姻，还是失败的事业）。

如作者所说，但凡是从抑郁症中走出来的，通常都对人生做出了重大的调整，这些变化使得他们对未来的威胁有了更大的抵抗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场疾病对他们的人生而言，是一场破坏性的重建。■



最想念的
年货

生活周刊

最想念的 年货

年货、年味就是乡愁，就是亲情，而亲情永远不过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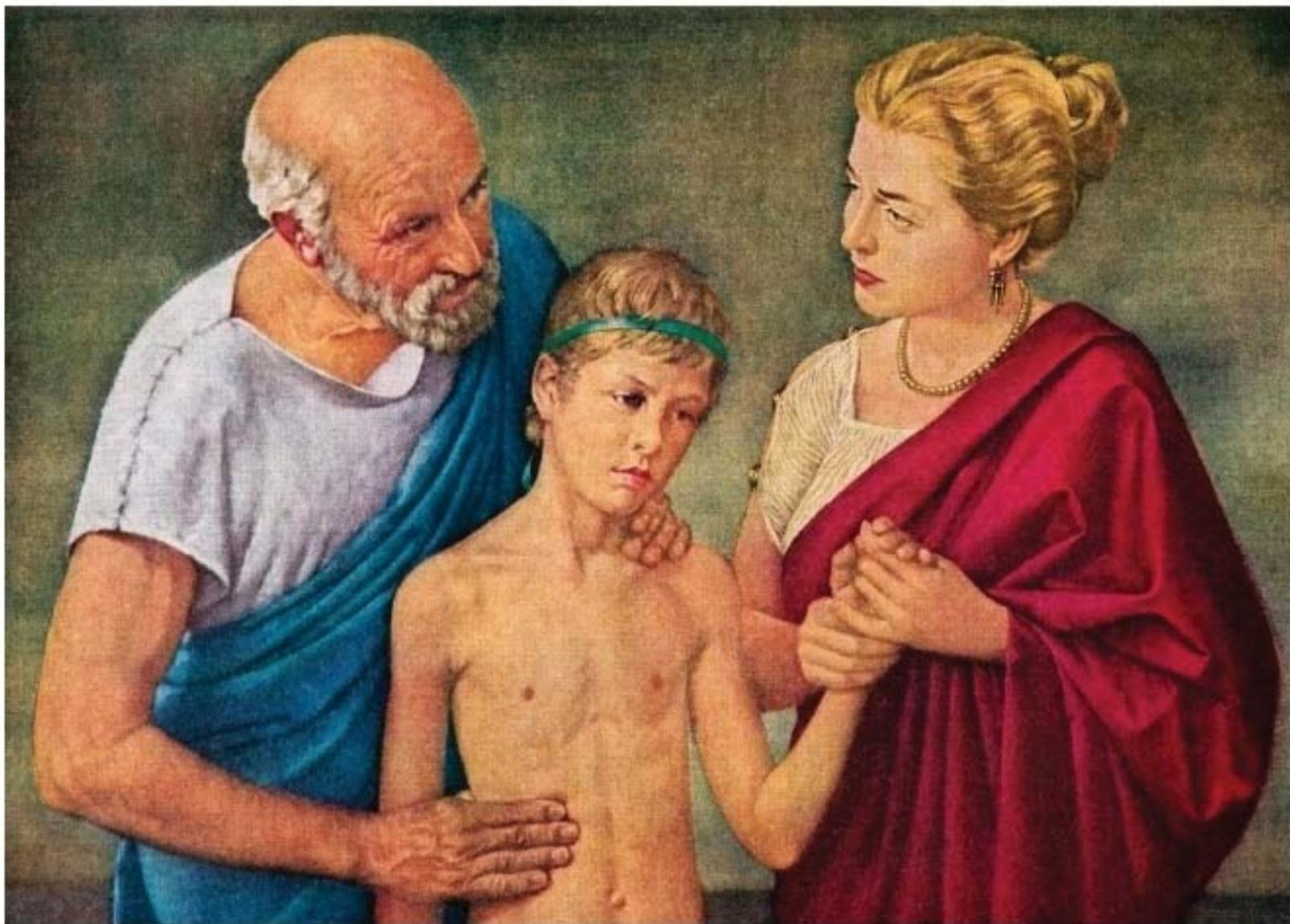
新的一年、新的一个春节即将来临的时候，《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一个充满乡情、亲情、充满年味的文化产品

——《最想念的年货》



抑郁症的历史

整理 / 傅婷婷



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和妻子为一名患病儿童做诊断



古代的抑郁症 医学和哲学

公元前5世纪末，“疾病”和“医生”的概念刚刚出现。古希腊人认为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心灵，那时的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就认为，抑郁症属于脑部疾病，应服药治疗。那时，人们有时会通过向神祈祷来治病，他对此提出了抨击，认为是“骗子和庸医”的治疗方法。他还说：“哲学家所有关于自然科学的文章，与其用于医疗，不如用在绘画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医生只能医治小病痛，精神障碍是哲学家该研究的事儿。

在理论意义上，希波克拉底是百忧解的祖师，而柏拉图则是精神动力治疗的祖师。从他们开始到现今的2500多年间，所有的理论都可归于这两派。

希波克拉底死后的70年里，亚里士多德学派提出了自成一派的理论，他们不赞成希波克拉底忽视灵魂的重要性，也反对柏拉图把医生贬低为匠人，而是认为：“身体失调会影响灵魂，灵魂的病症来自于身体，除非是天生的。强烈的情感可改变身体。”

生于公元2世纪的盖伦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奥勒利乌斯的御医，和其他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名医一样，他试图综合所有先人的神经学与心理学。然而，虽然盖伦一直被中世纪的人们奉为医学权威，他提出的精神药物治疗的观念却与基督教的教义冲突。基督教兴起对抑郁症患者极为不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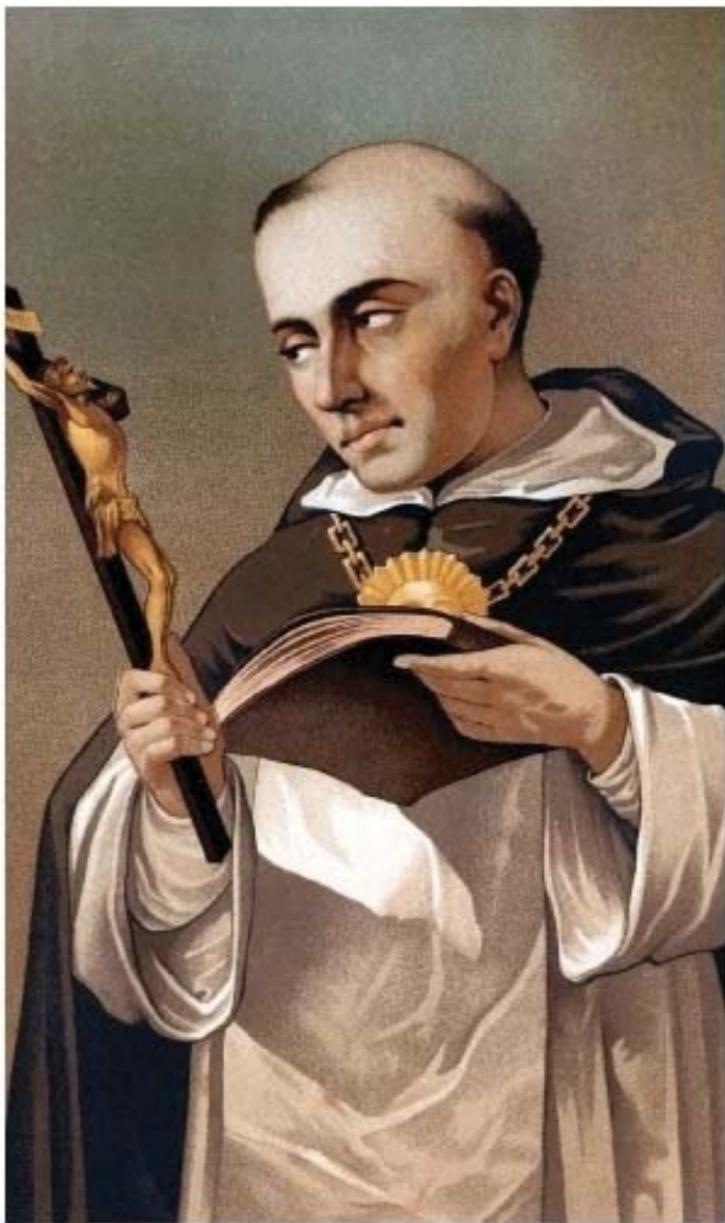
2

中世纪的抑郁症 一种罪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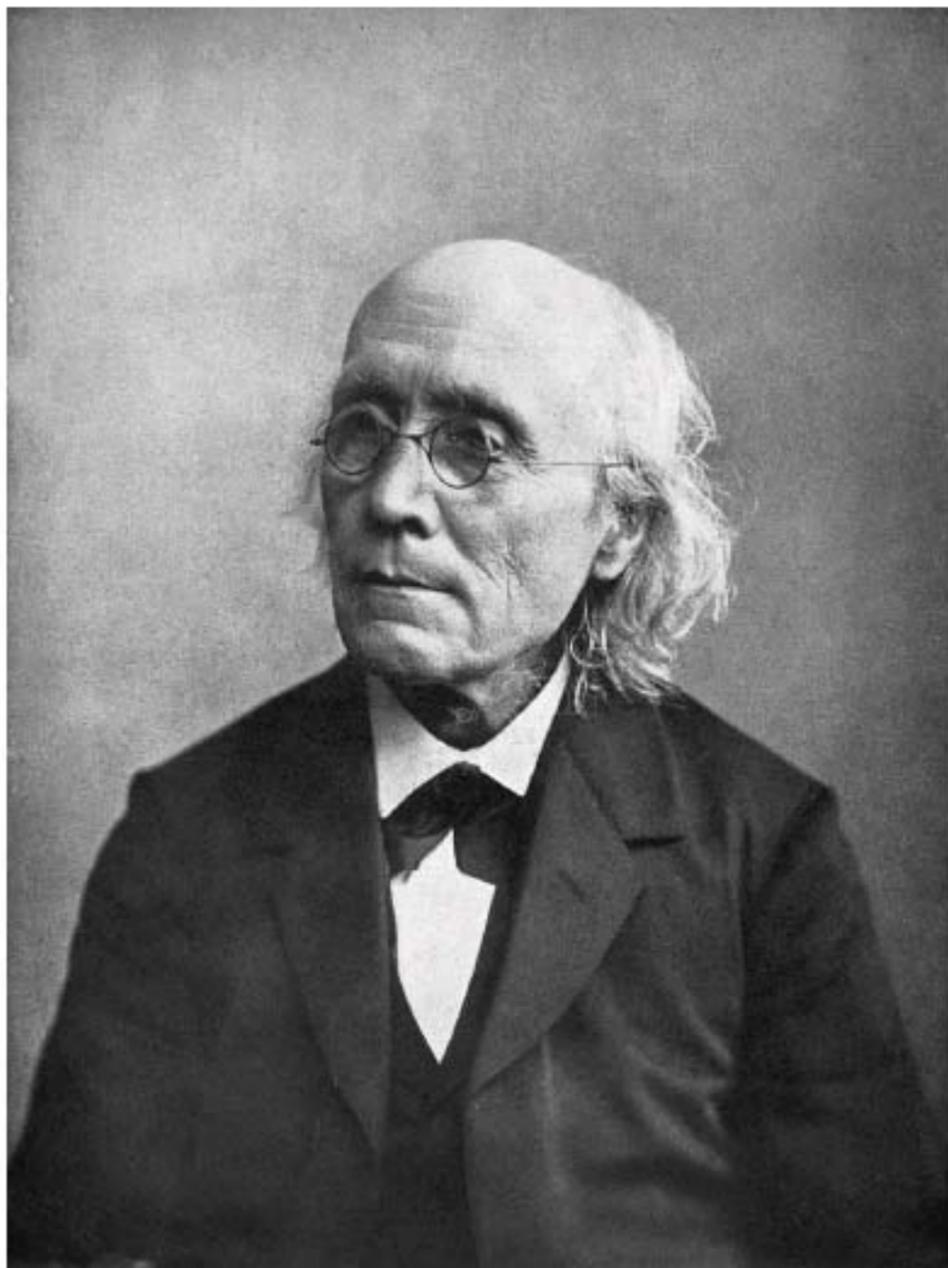
黑暗的中世纪，是一个敏感和社会秩序不稳定的时代。与古典时期不同，对中世纪基督徒来说，灵魂和身体没有关联。

根据托马斯·阿奎纳的说法，灵魂的位置在身体之上，灵魂不会臣服于身体疾病，因为灵魂是在神的管辖之下，只会受上帝或撒旦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失去理智被认为是没有足够的自制力遵守美德，社会秩序会因此荡然无存。抑郁症被道德化，患了抑郁症被认为是由于没有资格接受圣宠的福音，甚至罪有应得。抑郁症患者受到极大的诬蔑，甚至会被当成异教徒。



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托马斯·阿奎纳



德国哲学家费希纳

3

文艺复兴时期 一种浪漫

文艺复兴时期，抑郁症被浪漫化，脆弱的性格被看作为艺术天赋和深邃心灵付出的代价。关于这一时期，哲学家费希纳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忧郁是天才的表现，是产生灵感的必要条件，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比一般人更容易忧郁，他们的忧郁说明他们的心智已经超脱了世俗琐事。同时他也承认，忧郁是一种可怕的病症，可以通过运动、改变饮食和听音乐来治疗。

费希纳的这一观点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意大利，一些自认为是天才的人都说自己患了抑郁症，一些希望被认为有才华的人也假装很痛苦。在英国，上流阶层的叛逆者——满脸愁容、沉默寡言、



莎翁名剧《皆大欢喜》绘画

一头乱发、暴躁、倨傲、严肃——成了16世纪末的典型形象，当时的文章常嘲讽这种形象，如莎翁名剧《皆大欢喜》中“忧郁的杰奎斯”。

文艺复兴时代，“忧郁”这个词也意指深刻、感伤、复杂，甚至包括天赋。忧郁的状态被人同情，有时又令人有点羡慕，与黑暗阴沉的感觉相反，它一度被称为“白色忧郁”。



科学时代

生物学和社会学

在17世纪至19世纪，生物学和社会学成为控制精神障碍的重要方向。

17世纪，英国学者伯顿（Robert Burton）为抑郁症辩护，结合千年来的思想与观点，倾其一生完成了著作《忧郁的剖析》。在抑郁症领域，这是在弗洛伊德《哀悼与忧郁》之前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它博大精深却又充满矛盾，试图综合亚里士多德和费希纳的哲学、莎翁笔下人物的意志、希波克拉底等人的医学见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宗教观点、个人的疾病经验与自省。伯顿的成就跨越了哲学与医学，介于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

18世纪，科学对身体和精神的解释快速发展，虽然科学前进了一大步，但抑郁症患者的地位却倒退了一大步。有关抑郁症患者的印象虽然不再和恶魔有关，却也和放纵、拒绝养成健康的自律有关系。18世纪末期，浪漫主义重现，纯粹理性忧郁太乏味而渐渐破灭。忧郁则重新受到了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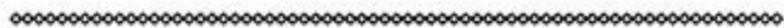


现代

精神分析和精神生物学

20世纪，精神分析和精神生物学两个方向对抑郁症的理解和治疗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所说的“潜意识”，取代了“灵魂”的观念，建立了抑郁症病因的一种新的观点；他的作品《哀悼与忧郁》颇具创见，对现代人对抑郁症的看法产生了深广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克拉培林提出的精神障碍分类法，使其成为精神生物学的代表人物。

最近的抑郁症科学研究回归了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观点，即抑郁症是脑部的疾病，可通过口服药物进行治疗。社会学在这方面的理论则与亚里士多德类似。同时二者也在各自的领域都更加成熟。而这两种思想孰是孰非，依然争论不休。也许，真理存在于二者之间。■



[根据美国作家安德鲁·所罗门的著作《忧郁》（*The Noonday Demon: An Atlas of Depression*）整理]

精神疾病防治与年龄阶段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对中国的精神障碍的疾病负担进行了评定,并与全球疾病负担进行比较,认为精神障碍同样是中国主要的疾病负担,并有逐渐升高的趋势。

1990年我国神经精神疾病占疾病总负担的14.2%,1998年为15.1%,比全球数字高得多。如果加上自杀/自伤比例达19.3%,预测到2020年神经精神疾病占疾病总负担的比例将升至15.5%,加上自杀/自伤比例将达20.2%。也就是说,中国人疾

病总负担的1/5是由精神障碍和自杀所引起,而抑郁症正是精神疾病中的一种。此外,与精神障碍相关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在中国乃至全球都是严重的卫生问题,如吸烟、酒精和毒品滥用、不洁性行为、酒后驾驶等,精神疾病和这些不健康、不安全的行为所导致的疾病负担几乎占中国总疾病负担的50%。

我们需要从社会和家庭层面开展精神障碍的病因预防。对于各个年龄组人群,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病因预防。



胎儿期

胎儿期是人类个体发育中的原始阶段,包括神经系统在内的各个组织和器官正在发生和形成。影响母体健康的有害因素都会影响胎儿的发育,甚至造成神经系统发育形成障碍。最常见者为各种感染,其次为许多中毒因素,如母体在妊娠期内接触的某些物质,如铅、汞、甲醇、锰、砷、一氧化碳和四氯化碳等,都可以影响到胎儿。近年发现有许多药物有致畸胎作用或影响胎儿的发育,应引起医务界的普遍注意。至于滥用安眠药、麻醉剂和成瘾药物对胎儿的有害影响已引起广泛注意,医护人员助产时也应尽量避免婴儿出生时的产伤。

婴幼儿期至学龄前期

这个时期孩子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发展特别迅速,但也较脆弱,因此在婴幼儿期要格外注意防病保健。也要重视婴幼儿的营养、睡眠,注意训练婴幼儿的言语、排泄机能。由于这一时期婴幼儿的兴奋过程较抑制过程占优势,活动富于情绪色彩,而克制能力则不健全,因此表现易激动、易疲劳、易受外界刺激等特征,对婴幼儿的正确养育很重要。

学龄前期至学龄期的儿童

学龄前期至学龄期的儿童,大脑的兴奋性和内抑制都有所增强,行为的自觉性也渐渐增多,能逐步控制并协调个人的行为,渐渐符合外界环境中的行为规范。研究结果提示,儿童行为问题与家庭背景、环境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有关,涉及父母文化水平、家庭气氛、父母对儿童的期待、教育所花精力、家庭类型、儿童学习成绩、性别、伙伴关系,以及儿童出生时的季节等因素。当儿童发育成长进入青春期阶段时,在较为复杂的生活条件下,大脑的机能继续有着明显的发展,第二性征方面出现了显著的改变,随之心理上也出现许多变化。

青年期

到青年期,一个人能够开始实行自我估价,也能评价他人的道德品质与行为作风,而且开始独立处理并支配自己的活动与行为。要在青年人中开展心理咨询,普及精神卫生知识,以预防和减少心理问题的发生十分重要。心理咨询的内容主要在于努力适应新的环境。

女性更年期

女性更年期的机体变化比较显著,内分泌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有着明显的失调,会影响大脑皮质的高级神经活动,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更年期症状群。少数人在某些精神创伤的促发下,发生了更年期忧郁状态或偏执状态。在青年期患有情感性精神病者,处于更年期时也易发病,临床多以焦虑抑郁状态为主要病象,因此要注意防止精神创伤和躯体疾病,对已存在了更年期症状群者,要及时采用内分泌治疗等。

老年期

当进入老年期时,人体会出现许多组织机构与功能的改变,精神功能自然趋于缓慢和欠灵活机敏;高血压、动脉硬化和心脏病等不少躯体疾病也增多,容易发生器质性或功能性精神异常者,在当今老龄化趋势的社会中有相对增多之势。因此,重视老年期的精神卫生,首先要防止老年期心因性疾病的发生,积极早期防止躯体疾病,注意改善脑功能状态,防止一些缺血性脑疾病导致的精神失常。

(资料来自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精神障碍的预防与控制》一文)



(插图: 薇薇)

爱的拯救：一个家庭的历程

口述 / 陈静（女，45岁，化名） 主笔 / 徐菁菁

“因为妈妈的抑郁症，我在44岁这一年终于和父母达成了和解。”

妈妈说：“活着太没有意思了。”

妈妈生病的时候，妹妹居住在国外。我在电话里说妈妈得了抑郁症，她根本无法相信。我告诉她：“你能想象吗？妈妈拉着我的手，我去厨房她就去厨房，我去厕所她也要跟着去，就怕我甩了她，她还害怕我被别人害死。”想起那种场景，我现在都会战栗。我要尽毕生的努力，不让妈妈再犯病。

妈妈开始出现异常是在2012年年底。那时候，爸爸患上了腿疾，行动不便。我发现妈妈的情绪开始变得消极。她总说：“你爸好不了了，我的日子也好

不了了，一天天挺没意思的。”前些年爸妈刚退休的时候，他们每年都会出去旅游。我妈是偏事业型的女性，不爱干家务活，退休以后，老两口儿在家也主要是我爸负责做饭，所以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妈这人真自私，光想着自己了。

一开始，我的对策是有事说事，有什么困难就解决什么困难。针对我爸的健康状况，我和我妈表态，保证我一定会照顾他们。可我发现，妈妈心里并不只是装着这一件事。她提到借给老乡一笔钱，怀疑再也不要回来了。那是一个正常的民间借贷，我去把钱给她要了回来。接着，又问出一个5万块钱的电信诈骗。我跟妈妈说：“5万块钱不是什么大事，咱们能承受得了。”我每天和她聊，她每天都能给出一些新的信息。到最后，她说：其实我没什么事，我就是觉得活着太没有意思了。

这段时间里，妈妈出现了失眠。连续失眠大概

一周以后，她开始出虚汗，说话的时候哆嗦，声音发颤。而且她开始记不住事，一件事我刚跟她磨完一遍，过了十分钟她又要重新来过一遍。到后来，妈妈甚至无法说出完整的句子。

那时候，我已经怀疑妈妈出现的并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我给一个得过抑郁症的朋友打电话，问她都有过什么症状。一听她的描述，我就感到妈妈的情况很相似。而且在我隐约的记忆当中，妈妈以前是得过病的。但直到我追问爸爸才知道，1988年，妈妈曾因为出版书籍问题生气，担心出版社的人骗了自己，出现注意力减退和自杀观念，被诊断为“反应性抑郁”，接受过住院药物治疗。1992年，妈妈和人做生意，在资金周转期间担心被骗破产，再次被诊断为躁郁症。妈妈那两次发病分别发生在我刚刚上大学和刚刚结婚的时候。父亲刻意向我们姐妹俩隐瞒妈妈的病情，以至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

患抑郁症的朋友告诉我，抑郁症患者感到恐惧的时候，就像是24小时不间断地看恐怖电影。妈妈当时就处于极度的恐惧中，她拉着我的手不能放，这就是她获得安全感的唯一方式。但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过送妈妈去住院。我想象中的精神病病房是恐怖的，担心她在医院里受罪，寄希望于靠着我们的照顾和支持，能把她从抑郁症的深坑里拉出来。

我搁置了工作，在家全天候陪着妈妈，但陪伴并没有解决问题。首先一个特别大的难处是我根本没办法让妈妈遵照医嘱服药。那会儿，我连哭带求什么招都用尽了，哄一个小时能塞一片药就算重大成果。大夫教我把药片弄碎拌在饭里，可是这个办法根本瞒不住我妈。

再一个，我发现我也没有办法依靠谈话来疏解妈妈的情绪。妈妈是特别聪明的一个人，她病得话都说不利索了，却还能看到电视新闻里播委内瑞拉政局，和我分析南美局势。我试着开导她，告诉她别老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人要积极。可每次我一张嘴，她反倒开始教育我佛法里怎么说，她看过哪些佛教书籍，她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她每天拉着我问：“世界真的会变好吗？”“这世界上出现这些不好的事情，你难道不觉得都有问题吗？”“活着有意义吗？”有好几次，我都差点被她带进去。

真正让我恐惧的是妈妈产生了幻觉。我爸住院治腿以后，有一天，妈妈突然对我说：“你以为你爸是去住院了，其实你爸是被专案组带走了。”听到这话我浑身一阵发凉。我想带着她上院里溜达，她不但敢出去，还要把家里窗帘全都拉上。那时候，妈妈

住在我家里，她总是问我，她和爸爸的房子是不是已经被没收了？爸爸出院以后，为了让她安心，我把她送回家去住几天。我千叮咛万嘱咐，叫我爸看住她，没想到她还是自己溜了出去。最后妈妈是被小区的保安押着回来的。她爬到了21层楼上，她说她就是不想活了。

“我找到的办法就是无微不至，有求必应”

即使到了这一步，应该怎么治疗妈妈的病，一家人还是难以达成共识。医生给出的建议是住院治疗，接受电休克疗法。一家人都怕妈妈受苦，爸爸不同意送妈妈去住院，妹妹不同意做电休克。她大半夜给我电话，一边掉眼泪一边反反复复问我：“一定得这样吗？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而妈妈呢，作为病人她是不相信医生的，她认为大夫给她下药，跟警察是一伙的。

妈妈生病以后，爸爸在压力之下一直处于特别回避的状态。他一开始就和我说：“家里以后就靠你遮风挡雨了。”这话让我觉得特别心酸——我深刻感到爸爸衰老了；这话也让我明确了一点：面对妈妈的病，我绝不能回避。妈妈去住院，接受电休克治疗，是我最终拍的板，我决定信任医生。

妈妈住院对于一家人来说都是心理上的考验。我爸那会儿去探视了两趟，每次都在医院门口哭。有时候，我们看完妈妈要走，她不愿意，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刚刚被家长送到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无助。我也心疼妈妈，但我想：要是妈妈生了其他重病，进了重症监护室呢？你觉得再残酷，再心疼她，能因为她在受苦就把她领走吗？作为家属你不能被病人牵着走，一定要跟大夫站在一起，必要的时候狠下心来，别无选择。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对的。两个月以后，妈妈出院了，情况比我们预料得还要好。

但出院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大夫说，妈妈是双向情感障碍，平常她的情绪会比一般的人要亢奋，一旦有什么事过不去，她又比一般人更容易滑向绝望。而药物特别难给她调到一个中间的正常值。和住院前一样，吃药依然是一个难题。药物在妈妈身上的副作用很明显：第一是嗜睡，她每天要花大量时间昏睡在床上；第二是嗜吃，她不停地寻找甜食，一个星期吃掉了一瓶蜂蜜，血糖都变得不正常了。妈妈一辈子都是特别积极活跃、风风火火的人，可她出院以后变成了一位慈祥的呆头呆脑的老太太，她的一举一动就像《疯狂动物城》里的树懒一样迟缓。我当时心里其实

有一个感觉——酸楚：这还是我妈吗？我特别明白，药物作用下毫无生机的生活绝对不是妈妈想要的生活质量。出院以后，妈妈又服用了半年的药物，等到情况越来越稳定，她性格慢慢恢复的时候，她对药物的反感也再次回潮。于是在征求了大夫的意见以后，我们给妈妈停了药。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更悉心地观察她、照顾她，避免她遭遇任何情绪上的大波动。

抑郁症患者的家属有一种无奈：有时候你很难分清病人的反应是她性格使然，是遇到了什么事，还是说又犯病了？我老开玩笑说：“我分不清海和天，也分不清好人和坏人。”我会主动咨询医生，医生也会告诉我应该特别注意什么情况，但是归根结底，生活在妈妈身边的是我，怎么能让妈妈保持心情愉快，一点一滴具体怎么做都得靠自己去摸索。

在妈妈身上，我找到的办法就是无微不至，有求必应。这些年来，我们几乎无条件地满足她的一切需求。她刚开始念叨：“我觉得人家家里那个饮水机挺好的。”我们在手机上已经下单了。妈妈喜欢旅游，我们就多带她出去走。冬天的时候，北京天气不好，我就送父母去三亚住，这样他们每天都能出门活动。生活的环境五彩缤纷，也有利于保持良好的心情。

从前去父母家看望，我基本是东西搁下就走，但是现在我会尽可能多地和妈妈聊天，我得知道她接触过什么人，心里想什么，有什么需求。没有共同话题，我就带她去看电影，回来讨论电影也能一起消磨两小时时光。我先生特别擅长给妈妈做心理按摩。我妈喜欢聊什么，他就聊什么。有时候妈妈叨叨台海关系，他不但耐心听完，还要夸奖老太太：“您思路太敏捷了！我觉得中央就该让您去做顾问，到底是搞外事工作出身的！”哄得妈妈特别高兴。

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最难的一点是你怎么去平衡自己内心的感受。妈妈有脾气的时候，做错事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做到呵护她、接纳她？绝大多数人，包括家里的亲戚都很难做到爱她。你对这个人有再多的好感，也都被她负面的东西消磨掉了。我总是告诉自己：妈妈是一个病人。你精心做了饭，病人胃口不好吃不下去的时候，你是能理解的，那么妈妈有精神疾病，她做错了事，你为什么不能宽容她？

今年1月份的时候，因为一个偶然事情，妹妹发现父母账户上的钱没了。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妈妈瞒着我们所有人将家里的一套房子卖了，连同存款，花400万元买了一家公司的理财产品。妈妈理直气壮，她说：“我已经研究透了，我把周围几个银行的理财顾问全都搞定了，他们知道的还不如我。”事实上，

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就能发现，这家公司的理财很可能是诈骗。可你再跟她强调她干了错事，她就开始急了。我当时立刻给了妈妈一个特别大的承诺，我说：“这钱要得回来你是我妈，要回不来你也是我妈，它绝不影响你任何生活。现在唯一的一条就是先不要告诉爸爸。”不告诉爸爸是因为他很可能冲妈妈发火，他会翻旧账。这些情绪既不会解决问题，也会刺激到妈妈。

有了我的这个承诺，妈妈的精神压力虽然大，但是并没有恶化。接下来的那几个月，我们一方面去外面追钱，一方面还要在家里努力地去安抚她，过得提心吊胆。这笔钱追讨了5个月。那时候我恰好摔伤了腿，我拄着拐，带着律师，上那家公司去要钱，其间我先生给了我特别大的支持。我记得他当时和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我的定心丸，他说：“其实很多事情想透了就好了。一句话：要钱还是要妈？要妈妈，咱们就得让她高兴，让她安心，别在她面前再提这钱了，就当这钱没有了。”

“我重新认识了她”

能够做到宽容和接纳妈妈，除了意识到她是一个病人，更重要的一点是我重新认识了她。

我爸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家在外人看来没什么可说的，是特别体面的一个家庭。我妈这个人，平常你若是见到她，你会觉得这阿姨特别好：非常聪明，知识广博，为人热情，看问题的眼光很远，价值观特别正确。几乎我所有的朋友，在不深入了解我妈的情况下都会很喜欢她。但我一直知道妈妈的性格是有缺陷的：她没有要好的朋友，在工作单位里，她的人际关系也常年处于一种不好状态。妈妈性格里有非常强势的一面，她会带给所有人特别大的压力。她强势到什么地步？当初她对我说：“你如果需要我帮你带孩子，你别来看，全归我。”妈妈内心里其实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她的好心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比方说，家里煮饺子，她总想着要给小区的保安送一些。家里的旧衣服她也想着要送给人家。可她不但不能理解人家未必乐意收下这些旧东西，还特别希望人家真心实意地感谢她。也是因为同样的处事方式，妈妈家族的亲戚们虽然受到她很大的帮助，但很少有人和她很亲。

事实上，妈妈生病以前，我和她的感情也不好。我出生不到一岁就被送回妈妈老家抚养，等我再回北京的时候已经有了妹妹。妹妹从小乖巧伶俐，学习成绩特别好，我一直生活在她的阴影之下。妈妈对我的

要求也苛刻：小时候，古诗背不下来，不给饭吃，也挨过打。在自己的家里，我好像没有感觉到多少爱。我从小逆反，希望自己越早独立越好。几十年来，我都是尽量躲着妈妈在生活。现在想起来，在40岁之前，我从来没有自觉认真地跟父母沟通，尝试理解他们是怎么活到这70多岁的。

妈妈生病以后，我花了大量时间想要弄清楚抑郁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为什么会发生在妈妈身上。我发现，妈妈的家族里面还有两位亲属也得过抑郁症，这说明，妈妈的抑郁可能有一定遗传因素的作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特别认可朱德庸说的：“人人都有病。”每个人都在承受压力，都可能有承受不住的那个瞬间。妈妈患病是不是还可能有一些社会和性格的因素？为了弄明白妈妈的抑郁症，我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找我爸和家里的亲戚谈话，回头去看妈妈的一生。

我妈妈出生在农村，是家里的长女。我姥爷是个中学老师，比较重男轻女，但是姥姥很开明，她自己是“睁眼瞎”，一心要把妈妈培养成才。妈妈小时候其实是被姥姥娇生惯养大的。妈妈早年特别顺遂。她跟我聊天的时候就特别得意，她说当时她在北京上大学，学习又好，人又漂亮，政治觉悟特别高，而且还是运动员，身体棒。外事单位到大学去选人，大家一溜站在操场上，一眼就看中了她。妈妈是学外语的，一工作就到了重要岗位，干的那活儿相当于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的口译。她年纪轻轻就结交了很多著名的外国人士。可是这个一帆风顺，在她工作不到一年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国际关系风云际会，妈妈一下子坐起了冷板凳。不但如此，这时候，姥爷被打成了“反革命”，老家还有人写信到北京来“揭发”，说有我妈这样一个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必须遣送。早在1966年，在这些因素的刺激下，妈妈第一次犯病。1968年，妈妈和爸爸相识结婚，1969年就生了我。生我的时候，我爸是“现行反革命”，妈妈目睹了家里被抄家，丈夫被人带走。我生下来一百天的时候，我妈就下了干校，干她从来没有干过的农活。

这些过往让我突然理解了很多事情。我明白了妈妈当初为什么能狠心把幼小的我送回老家，明白了妈妈犯抑郁症的时候，那些幻觉、那种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从何而来。

妈妈好几次掉到金融诈骗的坑里，我爸总是归结于妈妈“贪财”。我不这样想。我和妈妈说：“我知道您其实根本就不在乎钱，您只是想证明一下您的成功，但是您已经没必要去证明了，我就是您成功的例

子，您看您不是把我们都教育得挺好的吗？”我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妈妈的病慢慢好起来的时候，我和她沟通得比较多了，我发现妈妈一辈子个性争强好胜，但她的欲望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这种欲望，包括被认可、被爱、被尊重。妈妈这样一个外语专家，后来做的工作就是编写小学教材，再后来让她搞笔译，单位分配一年的工作量，她两个星期就能完成。妈妈自己也说，在她最好的年华，她应该是能为这个社会做更大贡献的。

以前我总觉得妈妈不爱我，但是后来我想她可能也没有获得特别多的爱。妈妈能够从爸爸那里获得的情感支持是有限的。妈妈容易上当受骗，爸爸就说她接触的都是坏人，否定她的社交欲望。妈妈和亲戚的关系不好，爸爸的总结是：“你们家的人就是想占便宜。”我还记得90年代初成功学兴盛起来的时候，他们夫妻俩经常在家里比较：你挣了56块钱，我挣了57块钱，反正我比你挣得多。以现在新型夫妻关系的眼光来看，这种相处模式是没法过下去的。我曾经和爸爸谈过一次，说他对妈妈的病也负有责任，他不愿意谈这些。我也明白，爸爸的心里也有创伤，也有巨大的不安全感。所以我常说，他们是“一代病人”。对爸爸来说，妈妈的病是一个巨大黑洞，他根本没有能力去拉她。这么多年来，他瞒着单位，瞒着同事，他害怕别人说自己的老婆是精神病。他身上的负担已经足够沉重。90年代，妈妈因为躁郁症住院，我还以为妈妈是得了心脏病。我还记得爸爸当时几乎放弃了生活，他把家里有多少财产都告诉了我。他说：“你妈妈要是不在了，这个家就散了，妹妹以后就由你来照顾。”那时候，他甚至已经决定去寺庙出家了。

我觉得，妈妈的抑郁症是时代的问题，婚姻中的问题，个性的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遗传问题叠加在一起的结果。妈妈已经70多岁了，她已经没有知识、能力和动力去对抗这些，只能做子女的主动回头，主动伸手去拉住她。

走到今天，照顾妈妈依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其他人谈论妈妈的病，让他们也能够像对待一个病人一样包容她。我要和妈妈去谈个什么事，真是先得打个草稿，深呼吸编排才行。但让我觉得满意的是，妈妈终于建立起了对我的基本信任。现在她固执听不进劝的时候，我会说：“妈，咱退一万步地讲，您认可不认可我是对您好的，全世界我应该排在其他人前面？”她认可。她跟爸爸已经建立起了特别牢固的一个信任感，他们相信晚年会很幸福，因为他们有我。☑

关欣：告别昨天

口述 / 关欣（女，63岁，化名） 主笔 / 徐菁菁

过去都已经翻篇，我只想过好我的今天。



（插图：图说）

2013年得病以后，我有两次自杀未遂。一次是在医院，六楼，窗户封死了，开不开，我就下来了。还有一次是晚上在家，我站上窗台，窗子已经推开了。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我去看心理科，大夫给我过一个电话号码，告诉我如果想要自杀，这个电话可以立刻给我疏解。我心想：是不是有人能帮我一下？我拨了这个电话，没想到没人接——只有白天才有人值班。尽管如此，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我不能死。

抑郁症是跟着一场疾病一块儿降临到我身上的。那会儿我已经快60岁了。退休以后，我每个礼拜都跟着一个俱乐部去爬山。一直以来我的身体都特别好，每次出去都是走在队伍前头。2013年8月，我突然觉得身体特别疲倦，爬一次山一个礼拜都歇不过来。刚意识到身体出了问题，我就开始焦虑：着急出汗，心慌。10月，我被确诊膜性肾病加肾病综合征。看到诊断书，我的世界好像一下子就垮了。

当时为了确诊，我跑了七家医院，在焦虑得稀里糊涂、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的情况下，还在凌晨4点坐出租车去挂号，我就是想证明，我没这病，是医院看错了。对于别人来说，肾病可能就是一场比赛，但对我来说非同小可。我的原生家庭并不幸福。我父亲特别严厉，他寡言少语，不善表达感情，宣泄情绪的方式就是打我。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性格中有非常极端的两面：一是一辈子都特别内向。我以前在出版社工作，用计算机编素材，也不需要和人有太多的交流。我在单位就是埋头干活，我和好多人十几年都没说过话。退休后，我也没什么朋友，爬山是我特别重要的生活方式。二是极度追求完美，生怕犯错，包括健康在内，我不允许自己出一点问题。而肾病这件事让我突然觉得，过去几十年里，我按部就班构建起来的生活再也无以为继了。

肾病确诊后我已经进入了特别抑郁的状态。现在想起来，我其实一开始就有自救的意识。因为崔永元，也因为我看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我知道抑郁症。当时我跑了北京的三家医院诊断，心里也是有一个小期望，希望我是焦虑症，那总比抑郁强，可所有医院的诊断都一样。我也找心理咨询师咨询，专门找最贵的，一个小时800块钱。可是我心里有预设，对咨询师怀有深刻的不信任感，我觉得咨询师的指导没有具体到我应该怎么做，我自己是什么样，我比他更清楚。

我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可我身边人不理解。我向我妹妹说起这件事，她说我就是瞎想。我姨是学医学的，我给她打电话，想问问她抑郁症药物会不会对肾不好。没想到，她在电话里连续数落了我

足足两个小时，结论是我自己太作。别说普通人不能理解，医生也不理解。有一回我去看胃病，大夫给我开了一堆药，和我说了一遍怎么吃。我告诉大夫，我有抑郁症，根本记不住，能不能再说一遍？大夫马上甩了脸色：那你先治抑郁症去，这都记不住！我当时就在诊室里哭了。

2013年11月到春节，我一天没出过家门。每天唯一能够靠意志力完成的事情就是给90多岁的老母亲做一顿早饭，因为她依靠我，我别无选择。其余的时候，我就躺着，整个人的头脑是懵。我想睡着，可是一次我最多只能睡两分钟，一睁眼浑身是汗。

我在家睁眼躺了3个月，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之中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我发现身体的侧面有一块块棕色的痕迹，特别害怕，以为自己又得了什么病。谁知道用手一抹，居然是污渍——那3个月里面我根本无法完成洗澡这件事，每次拿水冲一下，就要立刻逃回到床上去。这是一记当头棒喝：我从前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怎么能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

我真正下决心要从抑郁症里走出来，就是从这一个瞬间开始的。因为我意识到，再这样下去，我就完了。那会儿，正好俱乐部组织去南方徒步。我看到那条消息，内心里纠结了一个多星期。治疗肾病的大夫坚决不让我去，他说这是最危险的事，劳累一定会让我的病情恶化。但我最终还是决定去，因为我意识到，如果不给自己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就算肾病好起来，抑郁症也会把我拖垮。

回来以后，我的肾病确实恶化了，腿肿得像冬瓜一样粗，上床都得用手搬，但是我认为值，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能救自己了，我不至于躺在床上等死。在南方，我跟着俱乐部走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如果他们当天走折返路线，我一定跟着，大不了在半途等他们回来。有时候实在走不动，我就在驻地待着。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变化，我突然想和人说话了。我主动告诉所有人我得了抑郁症。其实他们并不理解抑郁症到底是什么，但他们都劝我想开点，至少没有一个批判我，我就觉得没那么难过了。

我觉得自己还有一点希望，这点希望来自于你发现自己还有能力去完成一些事情。从那以后，我强迫自己不在家里待着。我上网查，哪里有什么活动我都去参加，看表演、看展览，一个人去。其实那个时候，我的精神依然是木讷的，参加活动本身并没有丝毫乐趣。我以前喜欢舞蹈，可当时看芭蕾舞，台上的人在跳，我在下面看，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好像是在两个世界。但无论如何，我有了勇气，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慢慢出来，再也没有那种成天想死的感觉了。

2014年的时候，我在网上发现了抑郁症患者的互助聚餐活动。那是我第一次和其他抑郁症患者深入交流。这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原来我不是特例。我甚至还觉得自己特别幸运：有些人受到双相情感障碍的折磨，而我至少只是单纯的抑郁症；有些人吃过好多种药都没有效果，我虽然吃药副作用反应特别剧烈，但至少试第一种药就有效。后来负责组织聚餐的查尔斯（化名）夫妇两个人都有躁郁症和抑郁症，十几年来反反复复地住院治疗，可他们每次都乐呵呵的。那么艰难人都活得高兴，我干吗不好好活着？我看到有些患抑郁症十年、二十年的病人，他们依然在继续自己的生活，我就觉得没那么可怕了。

与他们相比，我的最大缺陷可能是在家庭里得不到支持，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最关键的。我也在抑郁症患者的微信群里头活动。有些人总是在抱怨，觉得家里人不支持，社会不支持，可我心想，得病的并不是人家，没有人真的能完全理解你，而抱怨也并不解决问题。有一次，我在群里说，你自己必须得起来，哪怕今天出门走一步，也比天天躺着强。结果被人怼了，他说：“你得的是抑郁症吗？我躺床都几天了，根本起不来。”

没有抑郁症患者走出来是容易的。我没办法描述在家躺了3个月以后，我去南方走的那一趟有多难。后来听说跑步对治疗抑郁症有帮助，我60岁了，也决定开始跑步。我治肾病吃了一年半激素。药物一停下来，有半年多的时间浑身疼痛，肌肉疼得都不敢碰，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可我就是要去锻炼。我上附近大学的体育场，刚开始的时候，400米的跑道走一圈下来都喘得不行，现在我能跑5公里，一个礼拜跑一两次。跑步的时候我天马行空地遐想，跑完了以后特放松。

我觉得我的整个生活都因为抑郁症翻盘了。我不想赞美疾病，那样太矫情，只能说，为了击败它，我改变了自己，我真心感到我现在的的生活比我得病之前还好。我有一种感觉，我过去的那种状态其实一直都在压抑着自己，我一直活在别人的评价里。

我现在变得特别乐意和人交流。我去扎针灸，一次一个小时，我觉得大夫对待我是真诚的，我就把心里话什么都说出来。结果我们成了朋友，大夫



患有抑郁症的斯特劳在工作室里看书。陪伴女儿和绘画是斯特劳调节情绪的一种方式

有了小孩以后，我还经常去他们家玩去。我们现在有一个英语小组，每两周活动一次。原来有一个爱尔兰老师教我们，后来老师走了，我们这几个人一直还坚持。谁出去玩了，回来用英语交流交流。每个周四，我还去参加一个戏剧班。一个老师带一帮业余的人学话剧学表演。这个班里头都是年轻人，30岁就算年纪大了。可我在里头，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他们都说：“阿姨你太棒了，我妈可不会像你这样有这么多爱好。”我也有自己的朋友。前几天，我刚跟朋友从波兰、德国自驾21天回来。

以前上学的时候，考试考99.5分，我心里能难过一个星期。后来上班，我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求自己会，我觉得我必须做到最好。说起来这是完美主义，其实是我接受不了自己，别人的评价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我连觉得一句话说错了，都会陷入极度的自责，我会不停地向人家道歉，结果越描越黑，把别人弄得很烦，而我自己回过头来又觉得自己简直是个罪人。

我一直都特别想学画画。可以前我没去，我心

想：我学得了吗？我画得好吗？我觉得我做不好的事情，我根本不敢尝试。我现在已经在学素描了。有时候老师说我画得挺好，心里特高兴，老师如果说哪儿不好呢，我也还是会觉得心里挺不舒服的。但是我会意识，这个不舒服其实没必要。这是我生病之后才慢慢能体会到的事儿。

我现在依然还在服药，我依然觉得我自己在性格上还是存在缺陷，可这都不重要了。有一次我参加抑郁症患者的聚餐，我记得在回来的路上，我问聚餐的组织者长风：“我挺焦虑的，以后要再犯病了怎么办？我性格有缺陷。”他说了一句话我特别受用。他说：“性格有缺陷你就接受好了，别去跟它较劲。就像皮球，你越用力拍打它，压制它，它可能弹得更高。”有一回我去扎针灸，也和要好的大夫说起这件事。他说：“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再犯了，你已经从原来的认知里头走出来了。”

现在的我不再埋怨谁了。我不再埋怨我家庭怎么对我，我的成长过程有何种不幸。那都翻篇了，我现在过好我自己的日子就行。我今年63岁，我活得更明白了。✍



绘画：阿槿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阅读之美

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 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患有双向情感障碍的苏西和女儿一起做烘焙。苏西是第三届奥运会选手，也是作家和律师，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通过互助分享调节方式康复

长风：“互助的本质是自助”

口述 / 长风 主笔 / 徐菁菁

34岁的长风今年在忙一件事，6月份他刚刚完成公益组织心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的注册手续。我见到他的时候，“心晴”的公益社交互动平台APP“心心相医”已经进入了上线审核的最后阶段。在抑郁症“郁友”的圈子里，长风是个传奇式的人物。

2003年，正在上大学的长风在网上搜索“自杀”，却被“阳光工程爱心行动”的互助论坛吸引了过去。“阳光工程”是2000年北京大学生李宁忠发起的国内第一个抗击抑郁症的公益组织。从那一天起，

长风发现，自己并不孤独。他扎进论坛里，先是为了抱团取暖，后来开始管理服务，设计论坛内容，召集全国各地的郁友组织线下聚会活动。从抑郁症患者到“康复者”，长风再也没有离开过抑郁症互助的圈子。回顾将近20年的抗抑郁历程，长风的感受是：所有的互助归根结底在于自助。

2014年，在完成了人生的两件大事结婚和买房以后，我把9年的外企工作辞掉了，专职投入抗抑郁症的公益事业。这个选择和高尚无关，是命中注定，如果不是参与抑郁症的互助，我不可能走出来。

抑郁症患者的痛苦很难被正常人理解。我6岁开始受焦虑的困扰。说不清从何而来，一种对死亡

的恐惧常常让我惊恐发作，全身抽搐，在濒死感中挣扎。初中二年级，我因为焦虑出冷汗，精神恍惚，出现了类似哮喘的症状。高考临考前的两个月，我严重失眠，免疫系统垮了，不停地生病。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2000年的大学新生军训。军训的时候夜里常常紧急集合，我住五楼，还是小班长，根本无法入睡。人形容失眠，说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那一点不夸张。

事实上，“痛苦”二字并不足以形容掉入抑郁症谷底的感觉。你觉得痛苦，意味着你还能感知，能比较，能判断。我觉得“失控”这个词更准确。上大学不久，我就因为抑郁症出现自杀念头休学了一年。在那一年里，我常常三四天不吃饭，一天不喝水，有时候，上厕所的生理需求也无法让我从床上爬起来，只能在床上解决。回到学校以后，我曾经完全无法以常人逻辑来判断人际关系，因为怀疑宿舍舍友背地里说我坏话，把所有东西都扔在了地上。我更加无法抑制自己头脑中的自杀念头。我试过攒安眠药，认真策划过跳火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身边建筑的结构都很了解，上楼顶不下100次，派出所的同志都认识我。

现在很多朋友会说我的状态比没有得抑郁症的人更积极。郁友们喜欢向我来讨教经验。最常见的问题是“该不该吃药”。我建议大家遵医嘱服药。可有的人会反问：“你不是吃药好的，为什么要让我吃药？”大家总希望我回答他们：“我该怎么办？”问题在于，抑郁症患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太大了，没有人能够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一个例子是，我从2013年开始长跑，每天风雨无阻跑步10公里。跑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调节方式。运动在治疗抑郁症中的作用也已经被医学研究证实。但是我能说跑步就一定能治疗你的抑郁症吗？首先，抑郁症的症状之一就是缺乏行动力，你的病情能够支持你开始行动吗？当你能够行动的时候，你有足够的意志力坚持下去吗？这里面还有一个性格和志趣的因素。我接触的抑郁症患者里面，有人发现写作有疗愈作用，还有人觉得做家务也有帮助。关键不在于采用哪一种具体的方式，而在于找到真正适合你的方式。

我在治疗抑郁症的过程中走过很多弯路，做过很多尝试。2000年那会儿，“抑郁症”还是个不太为人所知的名词。大学休学之前，我的焦虑症状一直被误认为是身体弱。休学期间，父母带我去医院

检查，去的不是精神科，查的项目是CT，吃的药物是维生素。因为查不出原因，有病乱投医，我还吃过朱砂，避邪。我确诊抑郁症是2001年。在那以后，除了开颅手术和电击，所有方法我都尝试过。

我先后吃过四五十种药，但我的身体对药物并不敏感。一个负责任的精神科医生会告诉你，药物发挥作用的概率是60%至70%（注：在我们的采访中，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指出药物有效率是30%到60%），所谓发挥作用，就是能让你的症状有所改善，并不意味着能治愈。刚毕业那会儿，我也投入了大量金钱和时间接受心理咨询，有有效的，也有没效果的。

2003年进入“阳光工程爱心行动”的互助论坛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公益意识，与其说是帮助别人，不如说是自己的需求。通过论坛上的交流，我意识到我不是一个人，我看到有些抑郁症患者能够从疾病中康复过来。2004年下半年开始，我在全国举办郁友们的聚会。最早发起的线下聚会目的也很单纯，大家希望能够见见面，随意分享一些东西。深陷抑郁症困扰中的人是很脆弱的，没有能力去伪装自己。在这些聚会中，我们交流过很多心里话，我也找到了很多知己。但是我们也不能夸大互助交流的作用，它可能可以给你提供一种支持。在和抑郁抗争的过程中，真正能救你的不是别人，关键在于是不是有强烈的自我意愿去改变、去自救。我这个人性格中积极与悲观并行，存在有毅力不服输的一面。而我的另一个动力来自我的父母。大学期间是我患抑郁症最严重的时期。我的父母一面要为我病担忧，一面要承担周围的流言蜚语。休学期间，我母亲每天在家照顾我，天天以泪洗面。复学之后，父亲为我停止了工作，陪着我把大学读完。我亲眼看到父亲“一夜白头”。这些爱让我一直很自责，也给了我自我拯救的动力。

在我看来，与抑郁症的斗争是一场“修行”，这场修行既是行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我一直拒

事实上，“痛苦”二字并不足以形容掉入抑郁症谷底的感觉。你觉得痛苦，意味着你还能感知，能比较，能判断。我觉得“失控”这个词更准确。

绝因为抑郁症而脱离正常的生活。大学是我最痛苦的几年，因为抑郁，大学四年我有三分之一的课程因不及格需要补考，但我坚持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2014年专职公益之前，我坚持了9年的外企工作。我常说，如果我没有从2003年开始从事抑郁症互助，我的病不会好起来。我把自己的大量精力倾注在了互助工作上，对我而言，这不仅仅是助人，而是给自己对抗抑郁寻找了一个重要的支点。这些行动尽管艰难，但它们让我没有与社会脱轨。我发现，即使是作为一名抑郁症患者，我依然可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这些年来，我在精神上也在不断重新认识自己，思考和处理我和抑郁的关系。2007年我做个大手术。6小时的手术后，我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身上的插管让我难受极了，我甚至动手拔掉了胃管。也就是这次手术，让我对死亡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新的体验：我意识到，有些痛苦是客观存在的，比如肉体的痛苦，而有些痛苦是主观的，如果它们只存在于我的脑海中，我是不是可以用意志去克服它们？我反思了这么多年反反复复的自杀尝试。2006年的一天夜晚，我曾经站在30层高的写字楼楼顶。在决定跳下去之前，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我叫爸爸照顾好妈妈，我说我实在熬不下去，对不起。挂电话后几分钟，在写字楼的两个同事突然跑上楼顶，是我爸打电话向他们求救的。一会儿，警察、领导，都来了。回过头去想想：给父亲的那个电话，到底是想诀别，还是潜意识里的求救？我意识到，即使在最后一秒钟，我也还有求生的希望或者说本能。想明白这些，2007年出院以后，我再也没有了自杀的念头。

再后来那些年里，我越来越能够直面抑郁，不再恐惧它。我以前经常组织郁友活动，每个人都说自己是最痛苦的。我开玩笑说，这个东西没有奥运会项目，没法比较。有些人还说：“抑郁症比癌症更痛苦。”不断谈论自己的痛苦是不是也很可能是一种

毫无疑问，抑郁症是敌人。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敌人，我们一定要杀死它吗？有些时候，你真的干不掉你的敌人，这就是事实，干不掉它的时候，你能不能和它相处？

逃避？7年前，我父亲患上了癌症。我亲眼见证了他和癌症的对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从来没有害怕过死亡，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从未发现他陷入过恐惧。现在，父亲的癌症已经复发三次，他依然按照多年来的老习惯，每天走10公里。从前，我曾经特别害怕父亲哪一天会不在了，但慢慢地，从他身上，我学会把这种恐惧也放下了：因为我发现生命的长度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当下的每一天都享受了生活。

很多郁友都有一种想法，他们说：“要是能够回到生病以前的状态就好了。”我就问：“你怎么知道生病以前的状态是最好的呢？如果不是因为以前的状态有问题，你会得抑郁症吗？”在我看来，“回到从前”是一个伪命题，克服抑郁要的是成长而不是回退。

我的生活彻底因为抑郁症而改变了。我找到了自己愿意从事一辈子的事业，我学会了用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去生活。但我并不会因此为抑郁症唱赞歌，苦难本身不值得赞美。毫无疑问，抑郁症是敌人。但是我们怎么去面对敌人，我们一定要杀死它吗？有些时候，你真的干不掉你的敌人，这就是事实，干不掉它的时候，你能不能和它相处？和它友好相处就是一种软弱吗？两千年前《孙子兵法》就说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肉体上消灭敌人并不是唯一且最好的方式。

2012年以后，我的抑郁症症状基本控制住了，但我很少用“康复”这个词。对于抑郁症患者而言，一个巨大的不幸是这种疾病的复发率很高，它可能会一辈子和你如影随形。直到今天，我依然会有惊恐发作的时候，我依然会焦虑。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时候，我跑着步，突然眼睛就看不见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我能驾驭这些感受，而不是被它所驾驭。我会反思和觉察自己的情绪，比如我语速比较快的时候，我会想想是不是因为焦虑了？如果真的是焦虑，我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对抗它的方式。

现在的我在生活中除了抑郁症还有许多东西。我爱长跑，一年可以跑很多个马拉松。我喜欢旅游，有一帮无话不谈的驴友朋友。我还有我的事业。2014年，我在北京幸运地找到我的灵魂伴侣。我的妻子、我的爱人懂得倾听与共情，她是我抗郁路上最重要的支点。结婚后，我的很多症状渐渐消失，我越来越懂得活在当下，享受幸福。爱，永远是最强大的生存力量。■

如何看待同伴支持？

主笔 / 徐菁菁

“同伴互助会是一种支持性手段，但绝对不能代替治疗。”

美国执业心理咨询师陈兑在加州湾区工作。在她所在的地区，推动同伴支持的主要组织是美国全国精神疾病联盟（NAMI）。NAMI 提供包括抑郁症知识课程、家属课程在内的一整套支持性服务。在 NAMI 的同伴支持小组，要成为活动组织者必须有推荐人，需要提交申请，接受专业的评估，在确认情况稳定的情况下，接受临床治疗师和其他互助活动组织者的培训。而所有的培训课程内容都要有医学研究做支持。特别明确的一点是：同伴互助会是一种支持性手段，但绝对不能代替治疗。

作为心理咨询师，陈兑会组织病人进行团体治疗。这种团体治疗和同伴互助会表面上看起来有相似之处，但后者才是真正的治疗手段。在美国，团体治疗通常以认知行为疗法为纲领，含有行为干预、认知改变、关系重建等干预技巧。

与同伴支持小组的随意性相比，咨询师带领的团体治疗，其成员构成、组织频率和时长都是固定的，咨询师会按照病人的“水平”（level）来组建团体，确保每个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相仿，都能够理解交流的内容。同时，咨询师会非常了解每一个病人的情况。每一次团体治疗，陈兑都会在开始之前强调几点内容：

第一，治疗过程中谈话内容有绝对的保密性，我们所谈的一切都要“留在房间里”（stay in this room）。第二，如果一位组员希望和另一个组员就一个话题进行会后的讨论，则必须征得后者的同意。这两点都是为了建立团队每一位成员的安全感，这对治疗的成败非常重要。第三，我会让大家讨论什么是尊重，一般大家都会通过发言形成这些共识：每个人都有权利持有不同的观点，不应当因观点不同遭到轻视，不要评判他人，他人发言时不要插话等等。这能够使一个小组形成组织黏性，让组员觉得这是一团体。第四，我会告诉大家，我是一个义务报告者，如果咨询师发现团队中的成员有自杀倾向，我有义务向相关机构报告。第五，如果有人希望能够和咨询师单独交流，那么可以在团队会后进

行，在会上，每一个人所能占用的时间是平均的。

作为心理咨询师，陈兑观察每一位患者的情况，还会为精神科医生的治疗提供信息。在美国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形成了分工合作的关系。精神科医生有处方权，但大多数情况不从事谈话治疗。一般来说精神科医生接诊一个病人的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而心理咨询师只通过谈话治疗、身心治疗等多种方式从事心理治疗，无权谈论患者是否应当服药、应该如何服药。作为心理咨询师，陈兑会在她认为需要的时候告诉患者：“我这里有一位精神科医生的联系方式，我建议你去他/她那里看看。”而大部分精神科医生也会向患者推荐心理咨询师。美国患者的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一般都处于一个健康保险网络中。在患者授权的情况下，两者之间经常交流。这种交流对于治疗非常重要。比如当患者的用药需要调整的时候，精神科医生会向心理咨询师了解患者的情况，以进行评估。同时，在谈话治疗的过程中，如果有患者谈到服药的情况，比如说他/她并没有遵照医嘱服药，心理咨询师也会向精神科医生及时反映这一情况。

2000 年北京大学生李宁忠发起的国内第一个抗击抑郁症的公益组织“阳光工程”，“阳光工程爱心行动”的网络论坛是国内最早出现的互助组织。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内相继出现了许多线下见面聚会形式的同伴支持小组，但这些组织的运转并不十分理想。从事多年互助工作的长风 and 抑郁症公益组织尚善公益基金会上海办事处负责人的林优都坦言，同伴支持小组能够帮助抑郁症患者减少病耻感，获得抱团取暖的支持，但并不总像看上去那么美好。长风注意到，组织一场良好的同伴支持小组活动对组织者的要求很高，他需要能够体察和照顾到每一位与会者的情绪。而组织不善的互助会很可能会产生负面效果：比如由于参加聚会的成员病情差别很大，一些患者可能会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情况比其他人更严重而加重心理负担；一些患者也可能因为无法与其他陌生病友顺利沟通而倍感疏远。

现在国内的抑郁症同伴支持小组大多借鉴了美国抑郁与双相情绪障碍支持联盟（DBSA）和美国全国精神疾病联盟（NAMI）的同伴支持小组规则，但无论是 DBSA 还是 NAMI 都有一整套严格规范的体系。中国的抑郁症互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不知抑郁是何物，到与之相处

口述 / 彭姗 记者 / 驳静



(通格可摄)

编剧、制片人彭姗

除了编剧和制片人，彭姗还有多重身份，既曾是因抑郁症自杀的演员尚于博最亲近的人之一，之后其又一度身陷抑郁；她处在影视行业核心，又密切关注着演艺界的抑郁症，志愿做预防推广，并应对求助者。听她来讲述所经历的危机。

即便你什么都有

2009年夏天，我在北京宋庄第一次见到了尚于博。在那不久前，我出了一场严重车祸，需要在轮椅上度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当时的我以为这是我的“人生最低谷”。但我不愿就此全面休息，仍

在宋庄的栗宪庭电影学校讲“电影制片管理”的相关课程，尚于博正是前去听课的学生。

很快，我就发现这位崭露头角的年轻演员跟他身上的“富二代”标签并不一致，他彬彬有礼、待人礼貌周全，甚至逐渐承担了我上下楼梯出入车的工作，每次去上课，都是他忙前忙后。他很低调，平常穿个棉布衬衫，骑个自行车上下学。因为没有经济压力，他并不急功近利追求出名和赚钱，所以那会儿我常挺骄傲地跟人说他“压力来自更高的精神追求”。

成为朋友后，他慢慢地把他抑郁症的情况透露给了我。看着一个特阳光的男孩儿说话，太难相信，而且我当时并不知道，把这样一个消息倒出去，有股微妙的难处，好比新科大夫头一回向病人家属宣布死讯，你不知道对方会是什么反应对不对？而且

“我得了抑郁症”这句由当事人一说出口，就失去了严肃性，甚至有种失衡的喜感。后来试图告诉我老公同样一句话时，酝酿多次，就是这种滋味。

但他还是勇敢地告诉了我，我也就不明不白地听了进去。

2009年秋天，我决定承担起尚于博经纪人的角色。最开始尝试帮他做一些宣传，后来发现这份工作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我本职是编剧和监制，有自己的电影梦，但我希望那么优秀的他能让更多的人看到。到那个时候，他会有更好的平台。

到了2011年夏天，我打算结婚并搬去香港，当时的尚于博处在一个特别好的上升期，他最后的那段时间，同时有4部很好的戏在找他，我作为经纪人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他签好了新的公司、新的经纪人。所以从专业的角度，我交付得很放心嘛。但从朋友的角度，的确很难割舍。

回香港前，我要回趟老家，四川自贡，然后跟一帮朋友去青海湖自驾游。最后一次离开北京，尚于博送我去机场，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他开了足足三个小时，不停地拐进死胡同、没有出路的田野里。

可我不了解抑郁会反复，我只觉得不对劲，却很难想象他真的处于那么艰难的阶段了。

在这趟车上，尚于博告诉我，数年前的一个派对他没来接我。实际上，他去了，但到了我家附近就“鬼使神差地拐去了另一个小区”，最后上了楼，电梯按了22层，是顶层。他走出电梯，在顶楼又徘徊一阵，他说他能听到楼下有人在说话，有人在生活中。突然间又好像清醒了过来，一发狠，离开了楼顶。

在这个节点听到这件事，我隐隐觉得不放心，可在那种时刻，内心忐忑的力量很少可以阻止人们去按计划进行，我也不例外。我最终还是上了飞机。我告诉他，他录完北京的节目，可以来青海湖跟我们汇合。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到了青海湖。旅途中，我们停下来在一处悬崖看风景。他突然说：“如果我跳下去了，你会怎么样？”我愣了一下，“如果你在我面前跳下去，那我该怎么活？”

他震惊了。好像并不知道一个人结束自己生命，会对亲人和朋友造成多大影响。耳边风呼呼而过，目光所及，是天涯海角和岁月静好。但我心里却非常不安，我抓住那个机会，告诉他，既然人生中有

这么好的朋友，就算为了亲友，也要好好活着。最重要的是，即便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也要记得对方是自己的支持者，任何时候，只要需要，要求助，绝不要认为自己会是对方的牵累。

这算是我们俩的一个约定。后来我想，我没有真正说明白的是，尽管来麻烦我，尽管给我打电话，尽管，尽管——他后来的确给我打了，当他最后一次徘徊在楼顶的时候。

仍然是在同一趟旅行里，有一天他在温泉里，突然跳起来，说“我好了，我好了”，他脸上那种欣喜和欢愉，真是叫人难忘。

剧情就这样反反复复，他的情绪忽好忽坏，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有明白抑郁症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像大多数人对抑郁症有的误解一样——要么，是他什么都有，有什么可抑郁的？要么就是，即便不开心，有再严重的情绪障碍，找过心理医生，就可以解决了呀。

心理医生真的不是万能的。

最后一个电话

我们一行人结束青海湖旅行，在成都告别，我见尚于博最后一面就在那儿。

他盘算着说：“反正你也不是马上去香港，我回北京录完节目，想再来成都找你们。”这样听下来，我就很放心。但到了北京，他每天给我打很多很多电话，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已经是最后几天的生死节点。我有时候看看其他演员，再看看尚于博，时常就想，他的事业起色非常大，这不就是一个演员的梦想吗，而他就在实现的路上，他到底在不开心什么呢？行走无人区，去徒步，去健身，写日记，后来想想，这些全是他跟这不开心做的搏斗。

他最后一次走上楼顶的前两天晚上，发短信问我：“你去找活佛了吗？我六神无主，感到心慌

他的情绪忽好忽坏，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是没有明白抑郁症究竟意味着什么。



(东方IC 供图)



左图：尚于博出演的电影《野草莓》剧照 右图：已故演员乔任梁

意乱。”这是一个不那么合理的要求，大家前几天寻找活佛未遂，尚于博觉得遗憾，就拜托我去帮他见活佛一面。虽然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活佛这事儿你还当真了”，第二天我还是努了努力，拄着拐杖，一早6点就坐上去藏区的长途车，还真的见到了活佛。

第三天上午，尚于博给我打来电话，这个电话先后持续了40多分钟，中间还断掉一次。我告诉他活佛都说了什么，他话锋一转，说：“你看，这次你又出门，应该花了不少钱，身上会不会不够用了？我去银行给你转一点吧！”我当然说不用，我还跟他开玩笑，一笔一笔给他算都花了多少，最后总结说，也没多少嘛，哪用特地转钱。

他不依不饶，继续说：“但既然活佛说要你再去看他一次，那买点礼物去吧，表示感谢。买礼物得花钱，我还是把钱给你。”

我终于成功说服了他不需特地去银行。

上午在藏区，我按掉好多电话，不同的朋友打来。我想，他们大概知道我在活佛这里，都想我帮他们算命呢。从藏区出来，我翻了翻长长的未接来

电，心想还是先给尚于博回一个，给他讲讲今天的情况。

打过去，是别人接的，电话那头响起哽咽的声音叫我一声“姗姗”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只觉得大事不好。但我捏紧电话，还是得往下问。

“怎么不是尚于博接电话？”

“他接不了了。”

“是现在接不了了，还是，永远接不了了？”

“是永远接不了了。”

要给 Ta 很多很多爱

后来我自己也陷入了与抑郁抵抗的漫长路途。

一个至亲好友因为抑郁症自杀，对周围人的打击是致命的。尤其是，我们会做无数假设，我自己做过的最可怕的假设就是：如果我当时听出来，他说的去银行给我打钱完全就是一个求救信号，他就不会死了。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假设摆在我面前，就像房间里的大象，没有任何办法不去看它。



(视觉中国供图)

我处理完后事就逃回了香港。几乎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不可理喻，因为那时经营尚于博，媒体给我们很多支持，宣传上能给多少资源大家都帮忙，可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却不理睬大家追求真相的好奇心。他们都说，“姗姗，你即便不接受采访，也给句话”。

尚于博和我自己的朋友也在等我给句话。这不是句随便的话，大家都想知道尚于博的死因。可死因已经明白给出了呀，但仿佛都无视了“因为抑郁症自杀”这几个字，好像这不是个正当的死因。

我开始大量学习抑郁症知识，看各种书，因为我想给大家“那句话”，我得能解释得了“为什么抑郁症会让人自杀”这个问题。尚于博的妈妈毛爱珍阿姨也试图搞明白抑郁症是什么，事发后，她就飞去哈佛大学找心理学教授。后来她做了“尚善基金会”，推广抑郁症预防。

可在这巨大的心理创伤下，我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进去，一度也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幸运的是最后我从这件事中“活”了回来。曾在网上搜索“自杀”，进到一个台湾网站，跳出来一个滚屏，

上面那段话我至今记得：首先我要让你知道，我是不愿意你死的，而且如果你现在就在我身边，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抱入怀里。

太温暖了对不对。知乎里输入“自杀”，也会跳出来一个温馨提示，告诉你24小时免费心理危机咨询热线，用我一个病友Bobbi的话说，就是“觉得冰冷的机器都在关心你”，这种感觉太温暖了。

有一次我和老公在商场。我就自己一个人绕着商场走，完全没办法分辨方向，痛不可言。我就跟毛阿姨打电话，她跟我说：“姗姗，你一定要跟你老公讲你的状况。”我想，天呐，我老公根本不可能理解的。最后我鼓起勇气跟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其实我现在身陷抑郁，痛不欲生。”听着很假对不对，我就说这话是很难出口的。当然他的第一反应是，好好儿的，怎么会这样呢，生活不是挺好的吗？但他因为我天天在那儿传播抑郁症相关知识，立刻告诉我：“不管是什么原因，我都爱你，陪着你。”然后就把我当个树袋熊一样拎在怀里带回家了。

后来我是知道，我这只是抑郁情绪，离真正的抑郁还有一段距离。每当我抑郁情绪上来了，周围所有人都会来疼我爱我，哭一天，无理取闹，都没关系。好比一瞬间，大家都用最大的宽容来对待你的情绪，搁平常，就会有人说你矫情了对不对。这就是最好的治愈，我才一天天从创伤里走出来。

我也担心自己会因此成为对方的负担。平常每个人都有面具要装坚强嘛，没想到当我暴露出我的脆弱，反而建立了信任，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嘛。当别人给我很多爱，我“好”起来了，又活蹦乱跳了，别人会看到什么？生命力啊。这对大家是种积极回应——多好啊，这种生命力，都是有希望的。

这种更深的联结，让暴露脆弱一点都不可怕。

我开始大量学习抑郁症知识，看各种书，因为我想给大家“那句话”，我得能解释得了“为什么抑郁症会让人自杀”这个问题。

武装自己，帮助别人

最近几年逐渐地，由于尚于博的事，也由于我在公共场合谈论抑郁症，做抑郁预防推广的志愿工作，我周围的演员、导演、编剧朋友们开始来向我求助。有时候甚至只是点头之交，也会把不能向外界透露的内心世界告诉我。我考取了二级心理咨询师，又曾是经纪人，大概是这样的原因吧，他们信任我会保守秘密。而且我也深知自己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只不过我现在可以评估一个人的状态。至少，我会告诉他：我理解你、支持你，也会陪伴你。其次就要判断他是抑郁情绪还是可能有抑郁症。

当一个人向我求助时，我不能再看不见。

我的微博和微信，有时候就是个救助平台。乔任梁去世后，关于他自杀原因的揣测谣言纷飞，关爱他的“粉丝”们也因此经历了一场不小的波动。我收到一条求助信息，说“粉丝会”里有一位姑娘有自杀倾向，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告诉他们一步步应当做些什么，最后大家接力，最终这个女孩儿平安回到家中，情绪也平稳了。

还有 Bobbi 这位“90后”电影编剧。就在《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驳静第一次来采访我的当天凌晨5点，她发信息给我说她又有自杀倾向，想跟我聊聊。我不想拖延这次见面，就让她跟驳静同一时间来，记者也听了 Bobbi 的故事。来了后，她跟我们聊了一整段她前一阵去太湖跳伞七次的心路历程。

“其中有一跳，我大脑一片空白。教练给我开伞手势，我以为他让我转弯，我就想说，你抓着我也转不了弯啊，就没搭理他。啪，他拍了我脑袋一下，我瞟了他一眼，心说，你为毛打我呀。后来是我自己看了眼高度表，发现比预定开伞高度已经低了1000多英尺。然后我慢慢悠悠地，给教练个手势，表示要开伞。这一跳我安全着陆。后来教练说，下回我再这样一次，他不会跟我跳了，因为他在上

面，必须我开完他才能开，如果我有问题，他也没命回来。

“后来另一个教练跟我说，有些人学不会跳伞，是因为动作不好。但我的动作特别好，因为在天上，恰恰放松，动作才会是好的。而我的问题就是太放松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几个不怕死的，但这种情况，是教练最害怕的。

“但每次跳完，爽了，我都想，OK，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这次我要为自己活。这招真的挺好使的，跳伞时，肾上腺素和多巴胺飙得特别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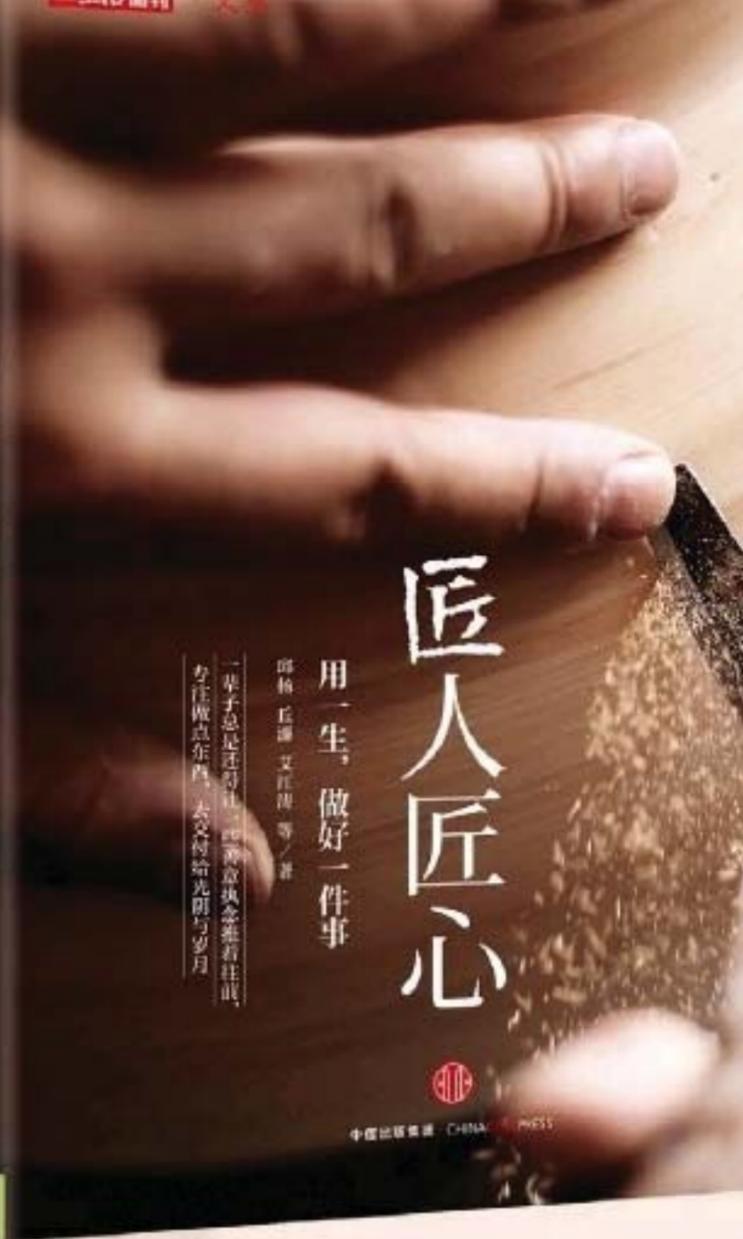
Bobbi 这算是给自己找到了一条抵抗和疏解的办法，而且她对自己的情绪有很敏感的觉察力，所以就好很多。还有一位男演员，前段时间因为一部戏非常红。他电话打来时，情绪低落，我一听，他都三个月没好好睡觉了。我就跟他讲，要马上告诉家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只是劝他看医生，电话挂了他什么都不做怎么办。所以一定要有家人陪着，看精神科、看心理医生，督促休息，少安排工作。后来过一阵他再打来，说“谢谢你彭姗姐，现在我好了”。这个时候，我又要告诉他，要小心，抑郁是会反复的。要记住上次是怎么闹出来的，又发了很多抑郁普及类知识给他家人。

剧组拍戏的问题就是太累，而演员又需要时刻亢奋贴近角色，调动“喜怒哀乐恐惊”这已经是超越常人的疲惫了。其次，名利场啊，得失很明显，昨天还跟你吃饭的人，今天因为一部戏火了。机遇多，不知道如何选择，就特容易患得患失，不知方向在哪里。一切未知，压力统统来对未知的恐惧。

还有一位知名媒体人和制片人，三十出头，长得很清秀。她失恋，失去动力，不想活，每天就躺在床上。后来她就真的去看了一个心理咨询师医生，还真说她是抑郁症。我就跟她说，你不用诊断，你不是抑郁症。而且心理咨询师没有诊断资格。你爱得那么轰轰烈烈，失恋了还能活蹦乱跳？才怪嘞，你就应该躺在家里哭嘛。后来她再去看精神科医生，只说是抑郁，不是抑郁症。从失恋的创伤里走出来了，情绪也好了，又有了动力。

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以为心理咨询师可以诊断。不是的，心理咨询师可以做评估，真正的抑郁症诊断，需要精神科医生去做。而且抑郁情绪和抑郁症，也要区分开来。“抑郁症”这个标签，有时还真会成为一种自我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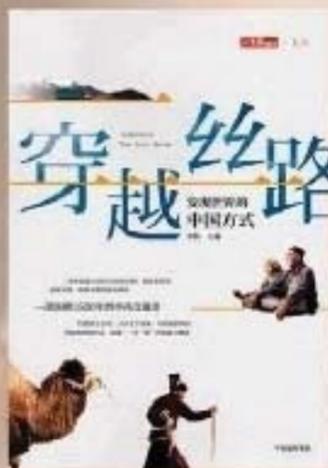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以为心理咨询师可以诊断。不是的，心理咨询师可以做评估，真正的抑郁症诊断，需要精神科医生去做。



三联生活周刊 专题集结

《穿越丝路： 发现世界的中国方式》

这是一部纵横 1500 年的中西交融史。《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历时一年，足迹踏遍丝绸之路沿线，从历史、经济、文明、器物、现场几个角度，深度挖掘“一带一路”对中国未来的巨大战略意义。



《大学的精神： 教育是让一个人成为 最好版本的自己》

全方位了解世界名校，以及精英学生是如何生活和学习的，从中为你困惑的教育问题寻找答案。



《关于人生，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来 自童书》

献给那些内心柔软、深沉爱着这个世界和孩子们的人，你的感受我们都懂得，只等你来读，其后的共鸣会让你感动到热泪盈眶。



《匠人匠心： 用一生，做好一件事》

修故宫的人李永革、沉香雕刻大师郑尧锦、龙泉四老、紫砂徐门……本书介绍了近 20 位中国传统手工艺人及其他他们承载的手工技艺，传达出传统手工艺人的纯粹的精神之美。



微信书店



天猫旗舰店

李子玉：与抑郁症的对抗和共存

文 / 傅婷婷



与抑郁症对抗了十余年，现已走出抑郁的李子玉

李子玉曾受到抑郁症的困扰达 10 年之久。在她看来，童年时期抑郁的种子就已经埋下，和第一任丈夫的分离是一个触发点，而此后的 10 年，则是她和抑郁症频繁抗争的时期。直到她有了一段新的婚姻后，在自己的努力、丈夫的陪伴、周围朋友的支持下，才渐渐走出了这段抑郁的日子。

痊愈后，她以自省的方式书写自己的故事，完成了作品《忧郁病，就是这样》，这是她一直以来的心愿，写出和病魔的抗争，让和她经受过类似痛苦的人看到她的故事。早在书出版之前的几年，她的朋友白先勇就曾跟她说：“你既然可以说出来，就可以写出来了，全数一倾而出，病就不会再犯了。”谈到过去的抑郁症经历，她也跟丈夫李欧梵聊道：“现在和过去最根本的不同，是我的观念彻底改变了，以前时时怕忧郁病复发，现在一点也不惊恐，而且知道如何对付。忧郁病是一种绝对可以治得好

的病，不是绝症。”

抑郁症的导火索

1988 年，李子玉结束了在芝加哥大学的伴读生涯，和丈夫回到阔别 13 年的香港，当时的她有一份比较自由的工作，不用朝九晚五地上班。没有想到，回到香港没多久，前夫提出了分手。那天晚上，她一个人住在沙田，窗外车来车往，她在房间里睡不着，没有胃口，落泪。身体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很不舒服，去了十几次洗手间，整个人都感觉到不行了。“好像突然跌倒了一个坑里。”她回忆当时的感觉时说道。

她以为自己的身体有了问题，于是第二天去见她的一位医生朋友。检查之后，医生说身体没什么事，需要看精神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告诉她，“你有抑郁症，你要吃药”。如果说在十几年的抑郁困扰下，李子玉还有什么是可以庆幸的，大概就是从她有了这些症状后，很快就在外科医生的建议下寻找了精神

科医生，发现了自己得的是抑郁症。李子玉很快就接受了这个结果，开始用药。“知道这是抑郁症的前后，心理其实没有变化。只是知道，要靠吃药来对付。”

在李子玉看来，分手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是她抑郁的一个近因。“事实上抑郁症不是突发的，而是一种连续的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体现出来。抑郁症一定有一个对你情绪影响很大的触发点，比如爸爸妈妈突然去世，或者家里突然有了大的变故，精神压力不能忍受，就触发了。这是一个近因，我和前夫在芝加哥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回到香港也生活了一两年。突然间，要我一个人生活，我觉得很孤立，无依无靠。”

回忆当时的感受时，李子玉说道：“我平常都喜欢打扮整齐漂亮再出门，但那段时间，我没有心情，就什么也不管随便穿一个衣服就出去。平时很喜欢的约朋友玩一玩、吃个饭也没兴趣了。好像什么都不对劲。最重要的是睡不着。偶尔睡不着没什么，但有忧郁病的人可能是连续一段时间都失眠，这样情绪哪里会好呢？很多问题就出来了，身体更不舒服，情绪更差，产生一种恶性循环。会觉得为什么我变成这样？慢慢地，人看起来无精打采、没有动力、完全对自己没有自信。”

讲述这段历程时，李子玉也会常常跳出来分析自己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人就应该去看医生了。有些人可以判断出自己可能是生病了，有些人则完全不知道这是自己生病的症状。后来我痊愈后，发现好多朋友不知道也不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只是觉得情绪低落而已。”如今，李子玉已经从抑郁症里解脱出来，她坦言，可能前夫和她都比较内向，缺乏沟通，才会最后分手。现在二人仍然是很好的朋友。

抑郁症的成因是多样的。李子玉认为，人的性格也会影响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一般得抑郁症的人都比较敏感，比较情绪化，有些别人没什么感觉的事情，敏感的人可能会从中感觉到忧郁。有这类性格的人，如果比较外向，会跟朋友家人表达出来，或者疯疯癫癫地出去玩，就不太容易得抑郁症。但我这种人比较内向，有什么事放在心里闷着，就容易患抑郁症。而我小时候的经历，可能为这种性格的形成埋下了种子。”

抑郁的种子

小时候，亲生父亲离开了李子玉，妈妈改嫁后

随继父去了英国，她和哥哥在香港的外祖母身边长大。外祖母是一个骨子里很传统的女人，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很多时候在语言和行为上会让李子玉产生很大的压抑感。有一次，婆婆打了她，她曾产生过一个想法：“等哪一天我死了，你会记得我的。”还有一次，婆婆出门去找哥哥，她十分担心，两个人回来后，她发现事情仿佛并没有想得那么严重，自己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产生了缺乏亲密感和被忽略的感觉。而对母爱的渴望，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发生了改变：“理性上，我知道应该孝顺母亲；情感上，我们却无法亲密，二人之间总是隔开了一道难以跨越的桥。”后来母亲试图弥补，事实上创伤已经造成，令李子玉产生了一种嫌弃感和因嫌弃而产生的负罪感。“妈妈没有做错任何事，只是我的心情不对而已。我对妈妈的愧疚感，如此来来回回持续了几十年。”

“如果你现在问我，我不觉得它是一种病，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低落的情绪。每个人患抑郁症的症状可能都不一样，有些人连翻身都没有动力，什么都做不成。而抑郁的情绪，每个人，或深或浅，或多或少都有过忧郁。我从小就离开父亲那边，不知道父亲那边人有没有类似的状况，但是据我所知，我妈妈没有这种所谓遗传的精神病。”

四次自杀

李子玉认为，抑郁症是一种长期的低落。普通的低落可能通过转移注意力排解掉，但是抑郁症则会一直伴随着低落。她回忆自己当时的情形：“我可以三天五天都躺在家里，有的时候看小说，有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就躺在那里。也不跟朋友沟通，也试过好几天都不讲话。日子不晓得怎么过了，度日如年，一分一秒都在熬，非常痛苦，一种无奈，一种悲哀，好像这个世界跟你已经断绝了。有的时候也会出门，会觉得那些人为什么会笑，这个世界有什么好笑的？你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你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

在书里，她回忆病情的转变：“能哭还好，病发的中期——麻木阶段，反而变得欲哭无泪，那就更苦不堪言。如果安眠药有效的话，会有至少四至五小时的睡眠，可是，睡眠的质量是很差的，通常都是噩梦连绵不断。”当时，她通常会服用三种药：抗抑郁药、镇静剂和安眠药。

渐渐地，她什么都不再想，只想去死，结束这

种感觉。“当时我已经被情绪控制住了，没办法想到死了会有什么后果，家人朋友会怎么样，自杀是唯一追求的东西，因为死了就一了百了可以解脱了，不用再承受这种痛苦的感觉。有勇气去死，没勇气去生存。活下去是痛苦，只有死一条路。”

第一次自杀的念头，产生于90年代初期，刚刚和前夫分手的时候。李子玉在沙田的新城市广场买了一卷胶纸和一把小刀片，用来干自己的“大事”。回到家里，开始写遗书，撕了写，写了撕。然后用胶纸封住门窗的缝隙，把被褥放在厨房的地板，打开了煤气。在10年时间里，自杀的行为共出现了4次。最后一次，她用酒服了橘子红色的结晶小颗粒，大概睡了二三十个钟头才醒来。

“4次的忧郁病发，横跨1992年至2001年，我和恶魔纠缠的日子，赔了志气、赔了柔情、赔了理想、赔了盼望，恶魔彻底战胜了，我彻底失败了。”所幸几次试图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都没有成功。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李子玉一直说自己很感恩，如果当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她现在的样子。

走出抑郁症

李子玉在1991年病发后，一直在与疾病抗争。“直至千禧年，也就是恶魔探访的最后一次，我不再单打独斗了，我多了一位与我并肩作战的丈夫欧梵。”从2001年至今，李子玉渐渐痊愈。这十几年来，她运动、写书、画画、交友，与自己的读者进行沟通，有了自己新的信仰。李子玉根据自身经历总结道：“克服忧郁除了按时服药之外，还需要彻底改变个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她还总结了走出抑郁的方法：交朋友、倾诉、运动、注意营养、服食营养补充剂、保持宁静、多看美好事物、以健康态度宣泄愤怒、享受闲暇食物和爱情。她写道：“想要做的事情，立刻付诸行动，停止终日胡思乱想，这一刻把自己从思想的死胡同里走出来，下一刻满天的云彩自会显现在你面前。”

认识李欧梵的时候，李子玉还在芝加哥大学陪伴读博士的前夫，李欧梵当时是芝大的教授。由于李子玉厨艺很好，就和当时的一些朋友搭伙吃饭。李欧梵也是食客之一。1991年，李子玉和前夫分手后，和抑郁症对抗了近10年。2000年，李欧梵从她的朋友变成了她的丈夫，开始陪伴她一起对抗抑郁症。

在生活中，李欧梵常常会与李子玉聊天。“我们这种人都没有安全感，需要人家跟我聊聊天，或者我要沟通，跟人家谈一谈。”在李子玉看来，李欧梵会感觉到她的不开心、压抑或者紧张，会让她有一种安全感。“安全感是一种很深入的东西。怎么算有安全感呢？有的人觉得我很有钱我就安全了，有些人觉得需要很多爱，有感情我就安全。每个人的安全感都不一样。”李子玉比较注重精神方面，感情、爱和沟通：“丈夫的存在给了我一种基本的安全感，感情的寄托。我常常说我这个人，什么都可以独立，但是感情不能独立。”

李子玉回忆走出抑郁症的这段时间，自己的身体和心理状态：“现在我学会爱自己多一点，多关注自己的需要，多注意身体对你说的话。如果你感觉压力很大，身体就会跟你说，我现在受到压力，你要好好关注我。去跑步，找朋友聊天，看电影，或者去做你认为能减压的事情，这是一种自爱的行为。在2008年我完成了这本书，到现在2017年，还是复发过几次，只是比较轻微，几天就走出来了。情绪病没有办法完全好，我每一次复发都有一些新的体悟，帮我提升我自己的一种免疫能力，对生命产生新的看法。我现在已经不吃药了，我吃了20多年的药，现在因为我自己锻炼身体，两年多前已经把药都停了。这个也需要感恩，因为很多人吃这么多的药很难停的，我做到了。通过锻炼身体，可以有一种信心，帮助我走出来。吃药不是唯一的方法，我的兴趣、我自己的努力、家人朋友的陪伴、与读者的互动，每一样对我都有一些帮助。”

几年前，李欧梵打算去台湾进行两年的学术研究。当时，李子玉觉得自己也很喜欢台湾，说可以一起过去。但是不久后，就抑郁症病发。“我当时大概是对自己估计错误了。抑郁病人其实是很害怕没有安全感的。我在香港土生土长这么久，突然去台湾两年，没什么朋友，潜意识里害怕孤独就产生了压力。”李欧梵为了妻子，取消了当时的这个计划。

现在，如果李欧梵发现李子玉有什么不对劲或者紧张的情绪，就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李子玉说：“他以前不爱运动，结婚这些年，我很关心他的健康，自己锻炼身体的同时，也什么都要他试着锻炼。”在李子玉看来，李欧梵其实未必喜欢花这么多时间做运动，但是李欧梵会让她感到平静：“你让我做运动我就做，这样你能够安心。我也希望我的健康情况好一点，这样能陪伴你更长的时间。”

易中天首部话剧

模范监狱

编剧的话：没想过会写戏，但是写了就得有戏。有戏才有意思，有意思比有意义重要。只要诸位觉得这《模范监狱》真有戏，我就心满意足了。

该来的会来，该走的会走，天地良心，不能没有

看易中天的话剧，欣赏易式独有风趣黑色幽默



这是一个关于人性和天良的故事

北京海淀剧院 2017年9月8日-24日 每晚19:30

票价：80、180、280、380、480、680、880元、VIP



大麦 damai.cn

全国统一购票电话 10103721

“大麦”官方公众号购票



鸣谢：本剧的创作得到史学博士陈勤教授、法学博士李超教授和作家野夫的帮助，特此鸣谢！
联合出品：北京保丰艺创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荣族盛世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与抑郁症抗争的名人

整理 / 盛煜涵



戴安娜王妃



安妮·海瑟薇



乔·汉姆



巴兹·奥尔德林



J.K. 罗琳

戴安娜王妃

1996年，威尔士王妃戴安娜与王子查尔斯婚姻不幸结束，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戴安娜公开谈论了她在离婚后感受到的抑郁症状。然而在1995年接受BBC采访时，她透露了自己令人震惊的产后抑郁症细节，以及暴食症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当没有人在听你的话，或者你觉得没有人在听你说话，所有的事情就由此发生了。”她如是说，“你内心有如此多的痛苦，你在外面试图伤害自己，因为你需要帮助，但你要求的是错误的帮助……我不喜欢自己，我感到羞愧，因为我无法应付压力。”戴安娜说她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治疗”来恢复自己的身心健康。事实上，在1997年，她在巴黎发生车祸之前，她已经是一名著名的人道主义者。

安妮·海瑟薇

2007年，安妮·海瑟薇告诉英国杂志《尚流》，她在“麻雀变公主”的日子里饱受抑郁和焦虑的折磨，那时她还是年轻的女孩。在那段时间里，海瑟薇拒绝了药物治疗，但成功地度过了她的痛苦期。“那天我跟妈妈说，你还记得那个女孩吗？她已经走了，去睡觉了。她说起了她的作品，她走了……她很抱歉她已经承受了那么久的痛苦。这些话语都是如此的自恋，如此自我陶醉。”但是自海瑟薇从早期的抑郁状态走出来后，她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乔·汉姆

随着《广告狂人》和《伴娘》的播出以及《周六现场夜》的频繁亮相，乔·汉姆在近几年名声大振，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是乔·汉姆在2010年9月向英国杂志《观察家》叙述了他因父亲的去世而陷入

深深的抑郁之中。他当年 20 岁，他的母亲也在 10 年前离他而去。“我当时在悲伤的情绪中无法自拔，我不断地在抑郁中挣扎，我的状态非常差，我知道我得回学校，回到正常的生活环境中……让生活继续。”著名精神疾病专家基塔·库里说：“在幼年时期失去自己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意外死亡已经被发现会提升抑郁症和自杀的可能性。”汉姆寻求了一些理论知识，并服用了一些抗抑郁药物，他把这一切归功于对自己状态的新的认知。他也说到了他在演艺圈里找到了安慰与友谊：“戏剧对我来说就像是那些不能融入别的地方的孤儿和所有人的庇护所。我会一直向它寻求帮助。”

J.K. 罗琳

她是拥有亿万资产的知名作家，她广受欢迎的“哈利·波特系列”书籍以及相关电影、主题公园仿佛给全世界都施了魔法。但是曾经当她离开第一任丈夫、成为一个单身母亲的时候，她独自一人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萌生了自杀的念头。但很快，通过行为认知疗法，她逐渐康复，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事实上，过去的一些情感纠葛为她塑造角色提供了灵感，她谈到摄魂怪（《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里的黑帽生物，发现受害者的恐惧，然后吸出他们的人性），就是这样塑造出来的。

田纳西·威廉姆斯

这位杰出的美国剧作家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因《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欲望号街车》等戏剧作品一举成名，但实际上他和抑郁症做了很长时间的斗争。他从哥伦比亚大学辍学后第一次陷入了严重的抑郁。在 60 年代，当他被工作压力吞噬时，加之他的长期合作伙伴死于癌症，威廉姆斯开始酗酒和吸毒。尽管他一辈子都在与酗酒和抑郁症做斗争，但在自传中他坦率地写下这些困难。他的自传《回忆录》于 1975 年出版，这位两届普利策奖获得者并没有真正被抑郁症打垮，仍然继续了他的写作生涯。

巴兹·奥尔德林

1969 年，当巴兹·奥尔德林与尼尔·阿姆斯特朗



田纳西·威廉姆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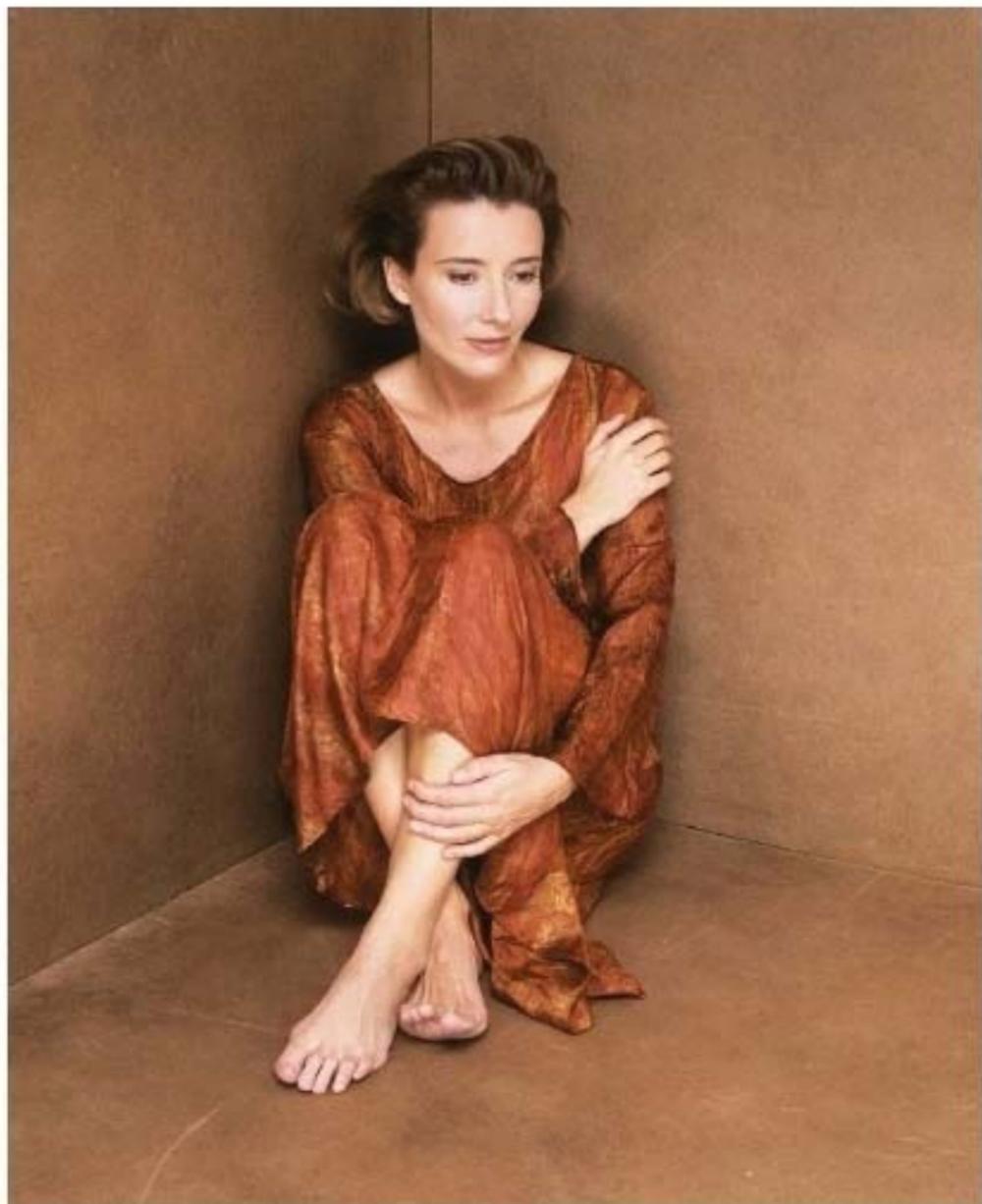
朗在月球完成了人类的第一次行走之后，他们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6 亿人观看了他们的电视影像）。奥尔德林收到了总统自由勋章，真正成为一个名人。但是这位美国英雄在竭力处理他暴涨的人气。“回到地球对我来说很有挑战性。”他在 2007 年承认了这一点，“我是一个‘崇高’的名人，我不得不承受这一切，就像演员和作家一样。而在就业方面，我的生活非常松散，因此，我逐渐开始酗酒和抑郁。”在喝酒和陷入深度抑郁 5 年之后，奥尔德林于 1975 年进入戒酒中心，他说这一决定帮助他戒了酒，并从心理恶魔中恢复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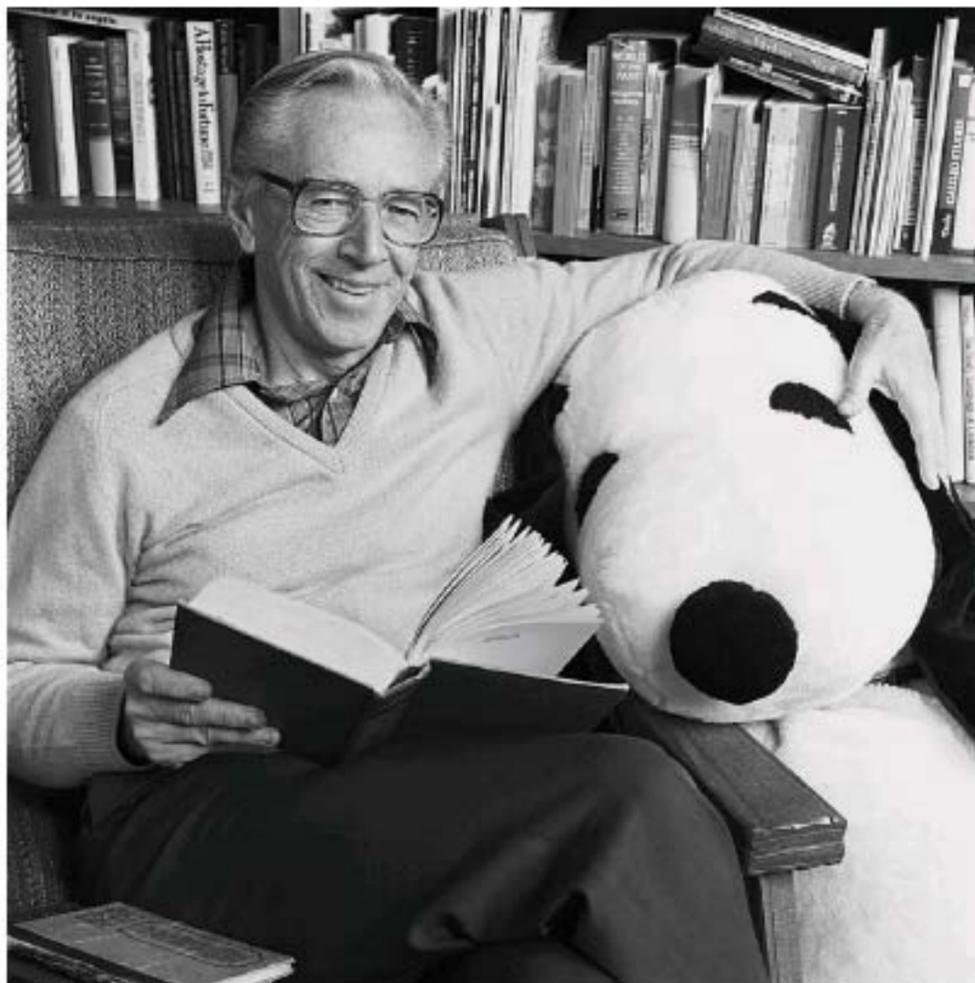
$$\sum F_i = \frac{d^2x}{dt^2} = 0$$

艾萨克·牛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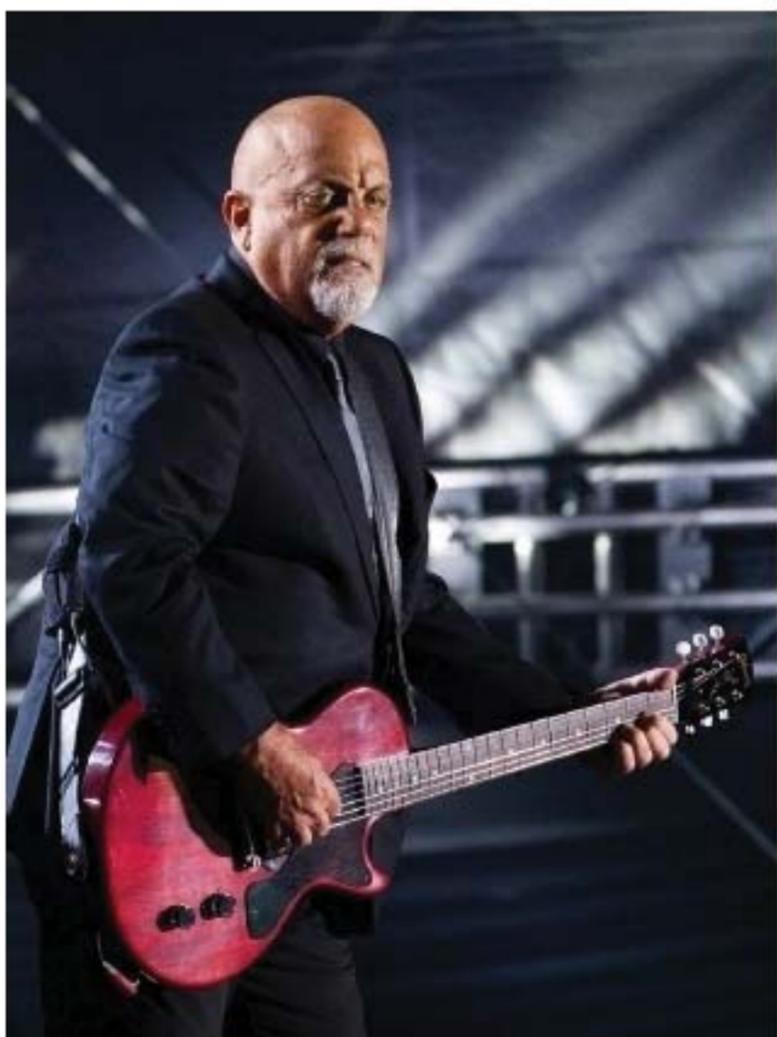
尽管艾萨克·牛顿是一位领先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但他对他的成就和与他人的关系感到非常不安。在他的一生中，他几乎都处于抑郁状态。牛顿还与他认为威胁到他的朋友和同事进行了暴力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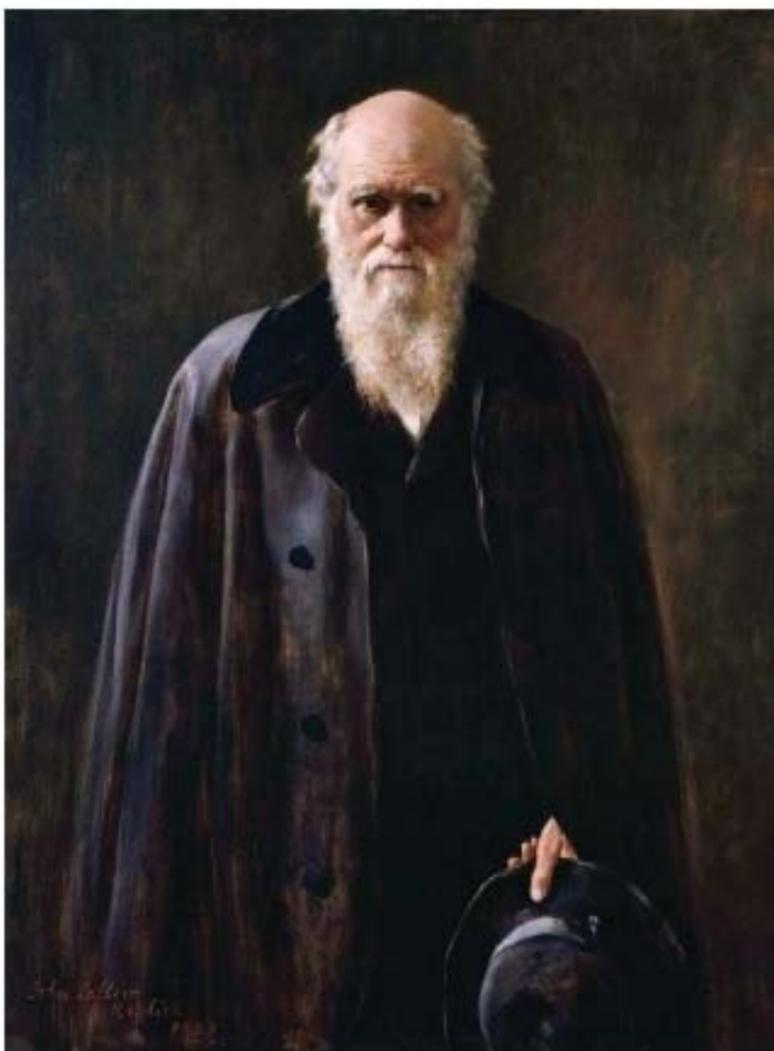
艾玛·汤普森



查尔斯·舒尔茨



比利·乔尔



达尔文



马克·吐温

“每个人都是一个月亮，有一个黑暗的一面，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展示过。”

有一次，当他确信两个朋友正在密谋对付他的时候，牛顿经历了严重的失眠，这直接导致了他1693年的精神崩溃。尽管经历了这些情绪上的挫折，牛顿依然创造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包括重力的发现和他的运动定律。

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是美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以其超凡的智慧和精巧的创作而闻名。然而，研究人员发现，抑郁症伴随了他生命的最后15年。1896年，他的女儿苏茜去世后，他第一次陷入抑郁，在1904年他的妻子死亡后他变得更为抑郁。马克·吐温的绝望在他的非虚构旅行作品《追随赤道》中有所表达：“每个人都是一个月亮，有一个黑暗的一面，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展示过。”

艾玛·汤普森

这位英国女演员、编剧和奥斯卡获奖者拥有一段黑暗的岁月。在BBC的播报中，汤普森谈论到在和演员肯尼思·布拉纳的婚姻结束后，她希望自己能去看心理医生。她说，在试图生第二个孩子时，她经历了三次不成功的试管婴儿尝试，这使她陷入第二次的抑郁和痛苦中。去年8月汤普森告诉《好莱坞记者》，她患有“轻微的抑郁”，但是知道自己并不是少数：“这是非常普遍的。”她说，“这是一个人们不谈论的非常隐蔽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应该讨论一下。”此后她继续进行着电影拍摄工作，她说她打算休假去面对挥之不去的抑郁症。

比利·乔尔

早在《Only The Good Die Young》和《Uptown Girl》登上音乐榜单时，比利·乔尔就在事业和情感上进行着痛苦的挣扎。1970年，当他发行了一张失败的专辑后，他患上了抑郁症。尝试用毒药自杀（乔尔说他走那条路是因为“它（毒药）比漂白剂更美味”）。他后来写了一封自杀遗言，这封遗言变成了《Tomorrow Is Today》的歌词。在该事件发生之后，乔尔进入了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几年后，乔尔发布了他的歌曲《Piano Man》，并因此获得了五项格莱美奖。

查尔斯·舒尔茨

很难想象创作了脍炙人口的《花生漫画》的漫画家舒尔茨与悲伤做过长时间斗争。据称在孩提时代，舒尔茨就感到焦虑、沮丧，陷入了自我怀疑。一位传记作家说他把他的抑郁情绪倾注在了漫画里，将漫画中的主人公查理·布朗塑造成一个普通人。2000年他去世后，《时代》杂志引用了他一位朋友的话：“我认为，给予他最大成就的内容之一就是他不愿意背弃痛苦。”舒尔茨在他的漫画里避难，希望这能让读者通过他的漫画也从他们自己的日常挣扎中逃脱。

“我为什么要思考他们呢？我还来不及担心自己。你和我一样清楚他们的遭遇。”



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

1936年，在一次著名的《纽约邮报》采访中，菲茨杰拉德透露了他的抑郁和自信的丧失。当他被问及关于“jazz-mad, grin-mad”这一代人的想法时，他说：“我为什么要思考他们呢？我还来不及担心自己。你和我一样清楚他们的遭遇。”记者还引用菲茨杰拉德的护工说的话：“绝望，绝望，绝望。绝望的日夜。尽量不要谈论他的工作或者他的未来。他确实在工作，但是每周只有三四个小时。”菲茨杰拉德的大部分伟大作品在此次采访之前就已经出版了，但是《末代大亨的情缘》在他死后5年才发表，受到了后世极高的赞誉。

达尔文

英国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达尔文是生物进化论的创始人，他伟大的发现却不幸地与家庭的悲剧交织在一起。1839年1月，达尔文同他舅舅的小女儿埃玛在梅庄教堂举行了婚礼，新娘是个贤淑美丽的姑娘。尽管达尔文与妻子之间互敬互爱，但表兄妹之间的结合却拉开了家庭悲剧的序幕。埃玛一共生了10个孩子，其中长女、次女和最小的儿子均幼年夭折，另外的7个孩子也都患有程度不同的各种疾病。达尔文的二儿子、三儿子、五儿子和终生未嫁的四女儿均患有程度不同的精神病。其他三个孩子虽然没有明显的精神病症状，但他们婚后却没有留下后



张国荣

(周耀辉摄/视觉中国供图)



查斯特·贝宁顿



丘吉尔



张纯如

(徐博元摄/中新社供图)

代。据后人考证，达尔文的家族长期患有一种神秘的疾病，这种疾病到达尔文这一代已经表现得很明显。达尔文从中年起就患上了“精神抑郁症”，这种疾病折磨了他的整个后半生。1882年4月19日，这位科学家因病逝世，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丘吉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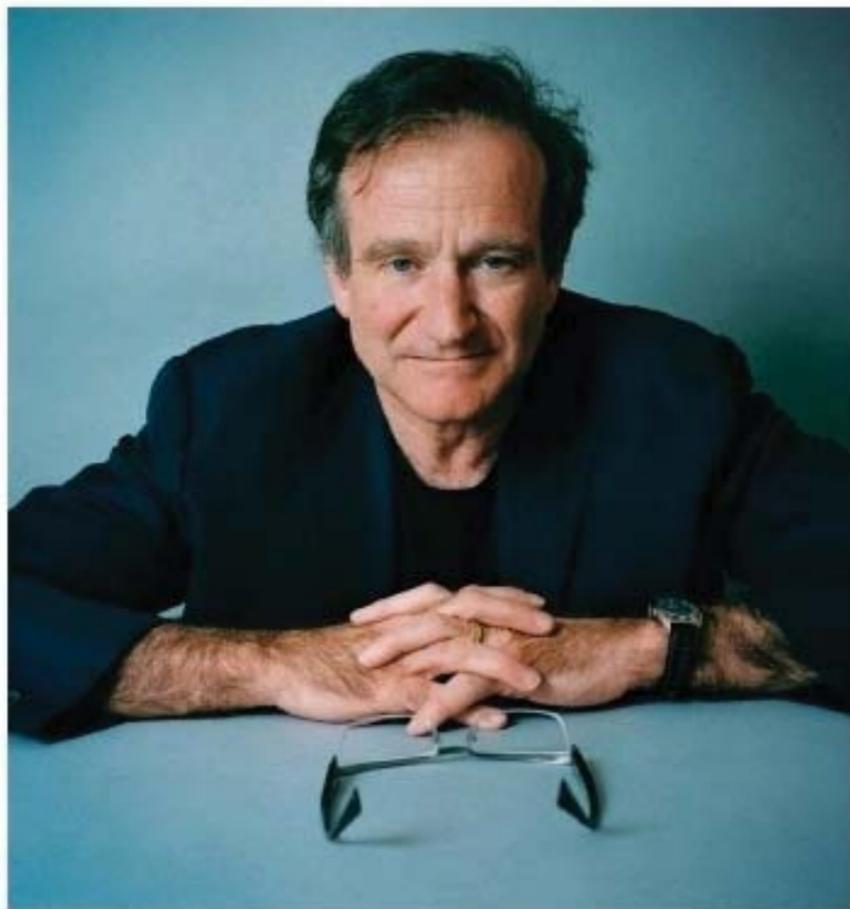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也曾患过抑郁症，他曾以亲身经历告诫人们：“要是‘黑狗’（他对抑郁症的称谓）开始咬你，千万不要置之不理，要是严重的征象已持续了数周，而且还有自杀念头的话，那就赶快去看医生。”

张国荣

2003年4月1日，张国荣从位于香港中环的一家酒店24楼纵身跃下，一代巨星就此陨落。他曾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想自己可能患上忧郁症，至于病源则是对自己不满，对别人不满，对世界更加不满。”张国荣的抑郁症病史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据传事业与感情是他患病的主要原因。

张纯如

以《南京大屠杀》一书闻名世界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在36岁这一年饮弹自杀。事实上研究（南



罗宾·威廉姆斯



三毛

京大屠杀)这样惨痛的历史最终让她患上了抑郁症。尽管她尽力抵抗在调查与写作南京大屠杀过程中给她的思想和精神造成的创伤,但最终未能扛住精神的折磨。张纯如生前曾因抑郁症而住院。

罗宾·威廉姆斯

2014年,罗宾·威廉姆斯在家中自杀身亡,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事实上,威廉姆斯饱受重度抑郁症的折磨。此外,他同时经受着酗酒、毒品和负债的困扰。曾经的《心灵捕手》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人们不禁讶然,一个每天沉浸在欢声笑语中的极具魅力的男人,内心竟是如此痛苦和抑郁。

“一个人感觉被强制地和另一人绑在一起,脚仿佛深陷泥沼,完全无助。”



凡·高

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凡·高在1888年割下自己的耳朵送给妓女时,他的抑郁症已经很严重了。在此后两年,他不断尝试自杀。1890年,心灵不堪重负的凡·高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曾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这样描述自己感受到抑郁带来的精神痛苦:“一个人感觉被强制地和另一人绑在一起,脚仿佛深陷泥沼,完全无助。”

三毛

三毛生前的挚友、台湾才子哇濂平所著《三毛的最后一封信》在台湾、大陆同时出版,书中不仅首度公开解读了三毛生前最后一封充满“密码”的遗信、从未披露过的三毛电话录音,还记叙了三毛一生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事实上,三毛在离世前几天,给哇濂平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她写出“我走了,这一回是真的”等话语,表明自己去意已决。谈及三毛的死因,众说纷纭,挚友哇濂平认为,还是因为抑郁症。实际上,青少年时期三毛便患有自闭症和抑郁症,但文字给了她一个表达自己的窗口。而后来由于生病、荷西离世等打击,她的抑郁症越发严重,最终选择了自杀。即便如此,读者眼中的三毛,依然是个潇洒的、坚强的、极具魅力的女性。

查斯特·贝宁顿

今年7月,林肯乐队主唱查斯特·贝宁顿的逝世令人震惊。生前,贝宁顿一直在与抑郁症做着斗争。贝宁顿过去在受访时表示,自己一直以来都饱受药物以及酒精成瘾的困扰,也一直在努力与这些问题抗争。但是他也表示,正是因为自身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才造就了他可以创作出一些引起大家共鸣的音乐。“我的生命一直都支离破碎,我虽然已经离婚好几年,但却一直很难走出来,其间我写了不少新歌,同时我也深深地沉溺在酒精以及药物当中,借着这些来撑过那段时间。”他表示自己在2000年写下的《Crawling》就是讲述自己无法控制自己,一直被酒精以及毒品牵制着。☑

联通混改的新高度

主笔 / 谢九

中国联通的混改方案，将央企的混改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在停牌4个月之后，中国联通的混改方案终于公之于众，混改的力度之强，大大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和过去几年的央企混改试点相比，联通此次混改的看点颇多。

首先是混改的层面很高，混改方案以中国联通的A股上市公司为平台，参与的是联通最核心的资产，可以说是目前混改力度最大的央企。从2014年以来，央企混改拉开序幕，出于谨慎的原则，很多参与混改的央企其实大多只是以二、三级子公司作为试点资产，并非以整个集团层面的全部核心资产参与改革。比如最早在2014年实施混改的中国石化，当时是以全资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与25家境内外投资者签署了增资协议，25家投资者以现金共计人民币1070.94亿元认购增资后销售公司29.99%的股权。去年年底中国电信实施混改，也是在子公司层面操作，通过A股上市公司号百控股（600640）收购资产，同时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相比之下，此次中国联通直接以最核心的资产参与混改，体现了公司改革的力度和勇气。

其次，联通混改让渡的股权比例也很高。按照联通公布的方案，交易全部完成后，联通集团合计持有公司约36.67%股份，战略投资者合计持有公司约35.19%股份。在以前央企的混改方案中，30%的股权比例一般是一条红线，很少有央企转让股份超过30%，比如2014年中国石化对旗下销售公司实施混改，战略投资者所占比重为29.99%。此次联通的混改授予战略投资者35.19%的股权比例，而大股权联通集团持股从62.74%大幅降至36.67%，比战略投资者持股比例仅仅高出1个百分点，可算是相当大胆的尝试。

不过，联通大比例出让股权，可能也会遭遇一些技术上的操作障碍。按照证监会的定增新规，上市公司在定增时发行股份数量不得超过总股本的20%，但是按照联通公布的混改方案来看，定增股份数量为公司总股本的42.6%，远远超过了20%的要求。或许是因为混改方案还存在一些技术细节上的问题，联通在公布了混改方案之后，很快又在上交所撤回了公告，表示是“因为技术原因，公司已申请继续停牌”。

联通混改的第三大看点是实施了力度颇大的员工

股权激励。按照方案，中国联通将向核心员工首期授予不超过约8.48亿股限制性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约32.13亿元。激励对象拟包括联通A股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对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影响的管理和技术骨干等。股权激励根据对经营业绩的贡献实现分配。激励价格仅为3.79元，中国联通A股停牌前的股价为7.47元，相当于以对折的价格授予激励对象。众所周知，我国的国企尤其是央企层面的员工股权激励一直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领域。中国联通此次实施的股权激励，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央企提供了一个参照系数。

联通混改的第四大看点是引入的战略投资者阵容强大，尤其是互联网领域的几大巨头全部到齐，腾讯、百度、京东和阿里分别持有公司5.18%、3.3%、2.36%和2.04%的股份。未来几大互联网巨头如何和中国联通在业务层面展开合作将是混改后期的最大看点，如果能够实现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携手双赢的局面，也将成为央企混改的一个标杆。

中国联通为何成为这一轮混改力度最大的央企，主要原因在于，联通最近几年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如果不实施较大力度的改革，未来可能会被竞争对手越甩越远。从中国联通最近两年的业绩来看，2015年和2016年的收入和净利润都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2016年，净利润更是大幅下降了96%。和竞争对手相比，中国联通的差距越来越大，以2016年的业绩来看，中国移动实现净利润1087亿元，中国电信的净利润为180亿元，而中国联通只有1.54亿元，即使不考虑公司去年业绩暴跌的特殊情况，公司历史上最好的业绩也只有30多亿元，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已经不在一个量级之上。

从联通的混改方案来看，最直接的效果是募集了大量资金，通过非公开发行引入战略投资者，预计募集资金617亿元左右，用于“4G能力提升项目”，“5G组网技术验证、相关业务使能及网络试商用建设项目”和“创新业务建设项目”。目前联通的4G用户不仅被中国移动远远甩开，更是落后于中国电信。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移动的4G用户已经接近6亿，中国电信大概1.5亿，而中国联通只有1.4亿。按照有关专业机构的测算，联通与移动在移动通信网络质量上的差距大约有34万个基站，对应资金缺口约500亿元，而混改带来的资金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一

缺口。在未来的5G时代，中国移动也已经开始抢先布局。今年6月份，中国移动在广州建成了国内第一个5G基站，在4G时代已经远远落后的中国联通，5G时代更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来弥补差距，这些都需要引入外部资金的支持。此次混改带来的巨额资金，将会为中国联通弥补4G差距，以及为提前布局5G提供支撑。

除了资金效应之外，联通混改更大的看点在于未来会如何和几大互联网巨头展开业务合作。过去几年，联通其实已经和这些互联网巨头开始展开合作，比如和腾讯联合推出的大王卡和腾讯系APP免流量受到了市场的认可，为联通带来不少新增用户，联通还和阿里联合推出了蚂蚁宝卡和阿里卡等等。今年5月份联通在年度业绩报告会透露，腾讯大、小王卡在半年时间就增加了2000万用户，和阿里的合作也带来了300万用户，为联通贡献了70%左右的新增份额。百度也公开表示，参与联通混改，不仅是看好联通长远的发展，更是看到未来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终端和设备接入网络，实现人与机器的自然对话和智能交互，自动驾驶汽车也将是新的数据平台，这些都将成为电信运营商的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预计在这几家互联网公司战略入股之外，双方的合作将会在更深的层面展开，老牌央企和新兴互联网巨头如何擦

出火花，将是联通混改的最大看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之后，央企混改成为过去几年的热点。但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央企的混改虽然动作颇多，其实力度不够，可以说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一次联通的方案可算是最有力度的一次混改，也正因为如此，联通混改方案出台之后，引发了市场对于央企混改加速的预期，尤其是A股市场，联通混改再度拉开了投资者对于混改的寻宝热情。

今年4月份，国资委新闻发言人严鹏程曾经披露混改的进展：“第一批9家混改试点的方案已基本批复，有望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和突破；第二批10家试点企业名单已经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审议确定，其中9家企业已正式报来试点方案，我们拟近期批复实施，预计年内将取得阶段性进展；第三批试点的遴选工作已经着手启动。”

严鹏程也透露了前两批19家试点央企的特征：“从行业领域看，涉及配售电、电力装备、高速铁路、铁路装备、航空物流、民航信息服务、基础电信、国防军工、重要商品、金融等重点领域，特别是国防军工领域较多，有7家企业。石油、天然气领域混改试点，拟待油气行业改革方案正式实施后，在第三批试点中统筹推进。”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 (传真)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7年第八期要目

封面话题

与新生代演奏家张昊辰、纱良·奥特、曾宇谦的三场对话

热点·观察 古典品味行：八月去听谁
斑斑说乐 为什么说“古典音乐”是一个拉丁现象
话题 赫尔姆格之上海贝多芬：从大乱到大治
扎克，何许人？
爱乐笔记 诗意与哲理的境界——李斯特访谈
两个“死之舞”——李斯特与圣-桑的问题材作品
早期音乐 珀塞尔家族中的音乐家（二）
20/21世纪音乐 走出“象牙塔”——看互动音乐的“天马行空”
乐史空间 布鲁诺·瓦尔特自传《主题与变奏》40
浮生碎乐 闲话德子阿姑
蕙蕙爱乐 自深深处——帕特、王尔德和蒙德里安
人物 波兰作曲家格莱茨基访谈（下）
作曲家与作品 法国“六人团”的音乐世界，包括对普朗克《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对话》、奥涅格《火刑堆上的贞德》、米约《屋顶上的公牛》和《世界之创造》的解读

资料库 舒伯特与施莱格尔兄弟：浪漫主义的黎明（七）
聆听收 英式巴洛克和古典主义音乐（上篇）
专题 真实的托斯卡尼尼——众多艺术家的回忆（六）
爱乐往事 我对北大“爱好者合唱团”的回忆

《爱乐》2017年订阅须知

2017年《爱乐》月刊，每期16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7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



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博

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0200012709201646336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夏洛茨维尔事件：种族主义的幽灵在美国游荡

记者 刘周岩

数千名三 K 党聚集在国父托马斯·杰斐逊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里执炬夜巡——这发生在 2017 年的美国。

火药桶上的炸弹

“因为一个历史人物百年前的某些作为不符合今天的价值观，就要砸掉他的雕塑，这和‘文革’破四旧有什么区别？”一位在美国生活多年的老华人对拆除罗伯特·李（Robert E. Lee）雕塑的决议表示了解。虽然拥护保留雕塑的人中不乏宣扬“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他仍认为保留雕塑才是对言论自由与

宽容精神的更好践行，也是当下愈发激进的美国左右两派和解的某种可能途径。

罗伯特·李，这位美国内战时期的南方将领，他的雕塑成为近两周来在美国发生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导火索。不仅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发生了造成 3 人死亡的右翼游行，美国政坛也因此持续动荡。《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麦克·戴森（Michael Eric Dyson）对此评论，现在形容美国的最佳词汇不再是 Democracy（民主），而是 Bigotocracy（不容异己）。

罗伯特·李将军是美国历史中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内战中代表拥护奴隶制的南方邦联出战，但最终主动投降，促进南北复合，加之其私德较受人尊敬，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双方的谅解。他曾拥有黑奴，又遵



左图：2017年8月12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右翼人士集会上，一名教徒在“奴隶解放公园”（原名罗伯特·李公园）内的罗伯特·李雕塑前祈祷

右图：2015年6月19日，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民众前往查尔斯顿学院TD竞技场参加守夜祈祷，悼念“查尔斯顿枪杀案”的遇难者

照岳父遗嘱将奴隶们释放。在书信中，他明确说过“奴隶制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是邪恶的”，却也说过“哪里有黑人，哪里就更糟，哪里有白人，哪里就在进步”。这些摇摆的言行和“反动派中的开明人物”的身份，给他的身后评价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各派政治势力纷纷出于不同目的加以利用，他的雕塑也就成为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

“这次发生冲突的弗吉尼亚州本身两派就比较对立，是火药桶一样的地方”，美国南方和种族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姬虹告诉本刊。

火药桶上的炸弹，最终被引爆了。

今年年初，夏洛茨维尔市议会决定，将市里的“罗伯特·李公园”更名为“奴隶解放公园”，将“杰克逊公园”更名为“正义公园”，并移走这两位南方邦联将领在公园中的铜像。保守组织极为不满，将市议会告上法庭，认为其无权擅自移走战争纪念碑。随着8月30日开庭日期的临近，右翼团体频频活动，串联游行，展示自己的力量。

8月12日的游行中，不同团体的极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蜂拥至弗吉尼亚大学所在的夏洛茨维尔市，公然使用三K党和纳粹符号，挥舞党卫军旗与邦联旗，

摆出纳粹手势，与反对他们游行的抗议者发生暴力冲突。其间右翼阵营的一名20岁白人男子开车故意冲向反对者队伍，造成一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一架警方直升机在协助地面维持秩序时坠毁，两名警员殉职。夏洛茨维尔事件引发全美轰动，各界强烈不安，担忧种族主义幽灵复活。

事实上，早在这次冲突事件之前，关于邦联符号（Confederate monuments）的存废就一直是南方政治的一个重要议题。1961年，时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弗里茨·霍灵斯以纪念内战爆发100周年为由，在州政府大楼楼顶升起象征南方的邦联旗，与美国国旗、南卡州州旗并置。评论普遍认为这一举动是在号召南方白人抵制当时势头正盛的民权运动，维护白人的统治地位。南方各州纷纷效仿南卡罗来纳，或在政府部门悬挂邦联旗帜，或直接更改州旗设计加入邦联徽章，甚至在议会厅前摆放邦联军政人物乃至三K党领袖雕像、设立邦联纪念日等。

毫无疑问，这些邦联符号会对身处南方各州的黑人造成心理上的伤害和隐形歧视，但保守派“护旗”人士则认为，南方邦联的历史早已融入南方各州人的血液，是一份不可抹杀的身份认同与文化遗产，保留

邦联符号不是为复活奴隶制，而是为纪念祖辈保卫家园的行动和决心，作为内战中战败的一方，南方人至少应该拥有缅怀历史、纪念先烈的资格，更重要的，这是保卫“州权”与本地生活方式的重要象征。

直到2015年6月17日，南卡罗来纳州发生了震惊全美的查尔斯顿枪杀案，白人凶手迪伦·茹夫（已被执行死刑）以种族仇恨的动机枪杀了教堂中正在祈祷的9名黑人。他手持邦联旗的照片刺激了无数人的心，要求拆除南方各州邦联符号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次夏洛茨维尔市李将军雕塑之争，是延续已久的邦联符号废存争论的又一个高潮。

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主张拆掉雕塑的声音占主流。翟淑珍(Susan Jakes)告诉本刊：“我认为罗伯特·李的雕塑和其他邦联符号应当从公共场所移除。把这视作‘文化大革命’的类比是严重有误的，是对美国历史的错误理解。”翟淑珍曾任《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目前是中美关系亚洲协会资深成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员，她在耶鲁大学接受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历史学教育。翟淑珍提醒人们注意夏洛茨维尔市两尊雕像建造的时间，分别是1921年（杰克逊雕像）和1924年（罗伯特·李雕像），即20世纪初的“第二波三K党运动”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才出现了强烈且刻意的美化内战的努力，这股潮流宣称罗伯特·李和其他人不是为奴隶制而战，而是为所谓‘州权’或独特的南方传统而战，所以他们是英雄”。

翟淑珍认为，这尊雕塑和其他邦联符号不是不可以保留，重要的是以何种形式进行保留，“它们应当属于历史博物馆或内战纪念馆，旁边放置对历史语境的说明，而不是竖立在荣耀的公共场合，赞颂它们”。她认为德国的“绊脚石”(Stolpersteine)项目是一个利用雕塑纪念历史的正面的例子，所谓“绊脚石”就是一块嵌入路面的黄铜板，上面刻有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的姓名，铺设在受害者生前的住处门口，整个欧洲铺设了5万多块“绊脚石”。“目前美国的邦联雕像和旗帜对于内战的纪念形式，就像是靖国神社之于日本军国主义，而非一个历史博物馆。”

今年5月，新奥尔良市移走了市内最后几处南方邦联纪念物。在拆除仪式上，民主党人市长兰德鲁(Mitch Landrieu)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他让人们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位非洲裔母亲带着上小学的女儿，经过罗伯特·李的雕塑，不得不向她解释城市里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尊雕塑，“你能看着小女孩的眼睛，让她相信李将军站在这里是给她以鼓舞和面对未来的勇气吗？”

对于这些符号之争，姬虹研究员则认为其中亦有“政治伪善”的成分：“民权运动过后，种族歧视确实成为过街老鼠，但从思想上根除却相当难。对种族主义言论零容忍的背后，往往有着政治利益和社会影响的考虑。拆除邦联旗帜和雕塑的这种行为更多是象征性的，对于黑人目前的实际状况没有太多改善。”

“三K党和他们的同路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

本周，欧美各大主流杂志纷纷选择以特朗普漫画作为封面。《经济学人》封面是特朗普拿着话筒喊话，话筒被画成三K党标志性的白色面罩形状。《纽约客》封面是特朗普驾驶一艘帆船，船帆是三K党的白色面罩。《明镜》封面则干脆是特朗普头上罩上了三K党面罩。

这些创意的“雷同”显示了欧美主流媒体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观点上的一致：特朗普要为发生在夏洛茨维尔的种族仇恨事件负责，而且，他本人就是这仇恨的化身。

事件发生当天，特朗普谴责了“来自多方”的“仇恨、偏执和暴力”。这种暧昧的、各打五十大板的表态，引起了美国国内舆论强烈的不满。与之对应的是，美国国内包括共和党人士在内的政要纷纷直截了当地批评“种族主义”和“极右翼势力”，黑白分明地将错误归在右翼一方，共和党人科里·加德纳(Cory Gardner)直称“他们是白人至上主义者，这是国内恐怖主义”。

两天后，迫于舆论压力，特朗普重新发表声明，直白地表示“种族主义是邪恶的”，点出三K党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并且悼念了事件中的遇难者希瑟·海耶尔(Heather Heyer)。这个迟到了两天的妥协让共和党内部暂时地松了一口气，《纽约时报》也只好暂时缩小火力，以《特朗普想弥补过失，可惜没诚意》为题发表评论文章，表示虽然这次总统难得地说出了符合舆论期待的言论，但因为“没诚意”，所以仍然是错。

就在这份更正后的说明眼看快要“过关”，事态将要平息之际，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在第二天又发表了反向的言论，指责左派在事件中也有责任。当天接受记者提问时，特朗普指责了媒体几天以来对自己的批评，然后讲述自己对整个事件的理解。他首先对拆除雕塑一事表达异议：“本周是罗伯特·李和斯通沃·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接下来会是乔治·华盛顿吗？你必须问问自己，要做到什么程度才会止步？”他暗示，华盛顿也是蓄奴者，怎么不把华盛顿的雕像

拆了呢？然后，他为保卫罗伯特·李雕塑的人群做了辩护：“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新纳粹，相信我。并不是所有这些人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继而点名批评了“极左”（alt-left）组织，形容其“非常、非常暴力”，指出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双方都有责任”。

如果抽离具体的情景和语境，特朗普这番颇有“辩证法”意味的言论从言辞与逻辑上似乎没什么问题。不过在夏洛茨维尔事件中，美国主流舆论从情感上完全无法接受总统这种看似中立实则“拉偏架”的态度。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对此评论：“三K党和他们的同路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指出在当代政治中属于绝对禁忌的三K党、新纳粹等种族主义势力，万万不会预料到美国总统在批评他们时竟然还犹豫了两天，并且随后“考虑周全”地连带批评了他们的对手，这简直已经是默许式的“通行证”了。

主流媒体和民主党火力全开的批判在预料之中，《纽约时报》谴责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放弃道德责任的总统。而特朗普在精英群体中仅有的两个同盟——部分共和党政要和商界领袖——也不得不和他划清界限，制造业顾问委员会和战略与政策论坛因此事解散，亲信班农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替罪羊退出了特朗普的幕僚团队。特朗普在这一周所经历的危机规模，可以和大选期间的更衣室密谈泄露相比。姬虹研究员认为：“夏洛茨维尔事件可以说是特朗普执政半年多以来在内政方面遇到的最棘手的一件事。”

特朗普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承担（又一次）众叛亲离的压力做如此表态，并非只是逞一时口舌之快。特朗普发布了第一个言辞模糊的表态之后，前三K党领袖大卫·杜克（David Duke）在推特上“敲打”特朗普：“我建议你好好看看镜子提醒一下自己，是美国白人们把你推上总统宝座的，不是激进左派。”这位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对特朗普的支持未必有利于特朗普，但他的话却点明了背后的道理：选民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无须提醒，特朗普始终没有忘记这一点，他的话是说给他们听的。

特朗普、支持特朗普的白人选民、种族主义者，这三者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共生关系。大多数支持特朗普的白人选民不是明确的种族主义者，也无法说特朗普本人是种族主义者（虽然自由派媒体一直在证明他至少有这方面倾向），但种族主义者却正是因为特朗普与其选民提供的“庇护”而获得了以前无法想象的生存发展空间。

“也许是出于政治回报的考量，也许是特朗普本身认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思想，更可能的是两者同时

成立，特朗普从竞选开始就在以或隐晦或直白的方式鼓励白人至上主义者了”，翟淑珍告诉本刊。早在两年前，2015年8月，特朗普正式宣布参选总统仅两个月时，《纽约客》作者欧逸文（Evan Osnos）就发布了长篇报道《恐惧与受挫》（*The Fearful and the Frustrated*），认为特朗普与白人民族主义者（White Nationalist）之间的同盟关系正在形成。当时一位特朗普的支持者这样告诉欧逸文：“我不认为特朗普是一个白人民族主义者，但他反映出许多白人心中或许无意识但深切担忧的一种恐惧：他们的孙辈可能在自己的国家中成为被憎恨的少数群体。”

正是这种恐惧，让特朗普可以无所顾忌地发言，“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也正是这种恐惧，让8月11日晚间弗吉尼亚大学的草坪上聚集了数千名手持火把、高喊“你们不会取代我们”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这种恐惧，也并非仅仅是所谓“底层白人”经济和阶层状况的产物，它同样直抵文化与意识的深处：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9·11”后出版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指出到20世纪中叶白人将不再是美国人口的多数（少于百分之五十），如果不能保持住建国时确立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作为主流文化，美国将不再是“美国”。

相比于自由派左翼的力量基本在“明处”：深蓝大城市居民、大学师生、传媒知识分子、LGBTQ与少数族裔……无数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潜在的种族主义者可能暗藏在美国国土的任何一个地方，他们的力量会逐渐地显露出来。8月19日，白人至上主义者继续在波士顿示威游行，名义为“言论自由集会”（Free Speech Rally），而这仅仅是极右翼组织在全美九个以上大城市组织的系列活动的首站。

当人们为眼下的境况担忧时，故人旧事往往凸显出它的好。夏洛茨维尔事件后，奥巴马的一条“没有人生来就因为肤色、背景或是宗教信仰而憎恨别人”的推特获得超过400万点赞，创下推特历史点赞数纪录。不过姬虹研究员提醒道：“奥巴马当选总统本身是美国种族和解的一大里程碑，但他执政的8年在种族问题上其实比较失败，很多黑人对他也很失望。”

特朗普或许对美国种族问题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种族问题并非因他的出现而开始，也绝不会随他离去而结束。正如特朗普自己所说：“这种情况（注：指种族仇恨）在我们国家出现很长时间了。不是唐纳德·特朗普时期特有的，也不是贝拉克·奥巴马时期特有的。它已经持续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



4岁女童被埋事件：家门口的伤害

记者 / 刘畅 插图 / 小牛

2017年8月11日，安徽蚌埠4岁半的女孩丁书瑶在家门口走失。42小时后，在距家门口仅20米的施工道路路基中被发现。安全意识缺失下的监管疏忽和不规范施工，将家门口变为了孩子的坟墓。

时隔一周，事发路面在阳光下泛着刺眼的白光，仍可随意进出。村中的孩子销声匿迹，有村民仍出现在路上乘凉。悲剧之后，村民的恐惧没有散去，安全隐患也没有散去。

家门口，孩子丢了

2017年8月11日，本是暑假里再普通不过的一天。下午4点左右，丁书瑶在周蔡村毛塘郢的家中看电视。她的爸爸去外地配货，妈妈在辅导上小学的哥哥做功课。她没有玩伴，便从后门跑到家后面的兴中路工地上玩。

家人都知道，那是她经常和隔壁的小孩儿一起玩耍的地方。丁书瑶家的后门距离那里只有几米远。丁书瑶的母亲彭洁告诉本刊记者，瑶瑶生性谨慎，虽然从小就住在村里，但她家在村子的边缘，孩子与村里面的小朋友不熟悉，只愿跟隔壁的两个孩子玩儿。那两个孩子不在，她就和他们玩儿，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会回家来。

丁书瑶也从不走远。兴中路平时施工，自卸车卸下成堆的建筑材料，散在工地各处。这些沙石堆，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小孩子们就喜欢玩儿沙子，”彭洁对本刊记者说，“平时孩子们在路边把沙子和石子堆着玩。”而她家房前恰有一个大沙堆，那是丁书瑶的最爱。丁书瑶的爷爷丁乃驹在房前指着沙堆，对记者说：“沙堆离后门连4米都没有，很让人放心。”所以，当时丁书瑶出门并没有引起彭洁的在意。

一小时后，哥哥写完作业，彭洁和他一起到兴中路上叫丁书瑶回家。丁书瑶没在路上，哥哥沿路跑了个遍，彭洁则挨家挨户询问邻居，都没发现孩子的踪迹。彭洁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回忆，起初，她担心孩子被人贩子拐走了。但转念一想，“这孩子很机灵，不会跟陌生人走；即使被强行带走，哭声也会引起注意，何况大白天施工现场人来人往，不可能不被发现”。遂继续和家人在村中寻找。

7点半时，她询问一直在兴中路上施工的三名挖掘机工人是否见到了自家的小女孩，他们都说没有看到。

找了4个多小时，天色已黑，路上没有，村子里也没有。8点左右，彭洁报了警，并发动家里亲戚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发布寻人消息。报警后，彭洁到派出所配合警方辨认村口监控录像，期望通过视频迅速找到女儿的下落，也没有结果。她告诉在淮北配货的丈夫，女儿失踪了，孩子的父亲连夜往家赶来。

与此同时，与丁家私交甚笃的周蔡村支书蔡书记，已经做好搜救的准备工作。他告诉本刊记者，6点多得知消息后，他便联系各方，准备组织搜救。因对当地地形熟，与乡政府和公安部门的人员也熟识，蔡书记获得了各方的信任，掌握了指挥权。

他与各方约好8点半在兴中路集合。“当时像部队分配任务一样。我把村里的党员、村民先分成了三组，把乡政府的人、公安的人、志愿者也各分成三组，分别编入我们的组中。”分好组后，每组都有本地熟悉地形的村干部带路，分别到村里的房屋、在建的兴中路上，以及周边的小区搜寻。

毛塘郢是拆迁区，被工地环绕，外来的工人租住在村里，可随意进出。而兴中路沿途坑洞、窖井众多，在当时都是开口的黑洞。鉴于此，人们普遍的担心有两个，要么是孩子被贩卖了，要么是孩子掉在了某处。

那时，毛塘郢漆黑一片。施工道路上没有路灯，村子里只有家中零星的光亮，村周围在建的高楼在

夜里形成黑色的剪影。搜救人员需要举着手电寻找。蔡书记回忆当时的情境，“村民们特别主动，有的抱着小孩儿也去找，有的70多岁了也帮忙。”村里的岳大爷一家就在其中，他家八口人出动了六口，都拿着一米长的木棍，在村里的草丛中搜索。

但他们面对窖井却无能为力，好在蓝天救援队带来了专业的设备。蚌埠蓝天救援队副队长王俊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称，他看到朋友发来的消息，经过核实后，带着13名队员赶到现场。救援队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24点15分来到现场，在丁书瑶家附近方圆1公里开展排查。到达时，消防队员已经在进行搜查。他们带着声呐探测仪及探感装置和携带生命探测仪的消防队员一起探测附近水域、拆迁工地、地下室，并排查了21个下水道。一名救援队员回忆当时情况时说：“虽然下水道的入口很浅，也没有水，但里面很深，要走很久，很费工夫。”直到凌晨3点多，蓝天救援队调集路口的监控，确认没有人将孩子带走。至此，第一天百余人的搜查队伍搜寻了方圆三四公里后，一无所获。

第二天早上6点下起大雨，持续了一上午。但没有人停歇，上午，警方出动警犬，蔡书记细分了任务，村内搜查的小组除了再次排查前一夜的踪迹，着重搜索村中的空置房和巷道，岳大爷告诉本刊记者，“能找的地方都找了，连家里的厕所里都用手电照过了”。下午，人员扩充为四个组，村民到对面的小区调集监控录像，但镜头朝向小区内部，内部没有踪迹，也没有照到路上的影像，搜救仍没有进展。直到第三天上午，仍有四个组进行分头搜索，搜救人数已经上千。蔡书记介绍，“周围在建的高楼没有电梯，乡政府组织的人一层一层爬上去，挨户搜索，生怕找漏了，一栋楼就需要好几个小时”。

就在搜救队员在楼里逐层搜索时，事情出现了转机。因为天气炎热，志愿者每天都会备几包矿泉水防暑。起初，矿泉水放在丁家门口的土坡上，方便往来进村的人拿。8月12日的大雨造成道路泥泞，村民把水都搬到混凝土的高地上。8月13日上午10点，有人送来几包矿泉水。有个志愿者发现踩到的一处水稳层是软的。“我们把矿泉水搬开，村民蔡加上把鼓起的水泥包块扒住，用力一搬，就看到孩子穿的黄色衣服。”蔡书记当时恰好坐在高地上休息，他告诉记者，“我坐的位置就在孩子旁边，还有人之前直接就坐在上面了。”

搜救的方向完全错了，身高1.1米的小女孩儿

有一半的身子被嵌入了地里。岳大爷目击到了当时的情况，孩子被找到的时候脸部朝下，身上压着一块不到10厘米厚的混凝土块，腿部、头部有伤，但身上及周围没有大片血迹。手脚只能扒出一半。据丁书瑶的叔叔讲，在法医和警察用电钻等专业工具深挖了3小时后，下午2点多，小女孩儿的遗体侧卧在路基下，后被送到了殡仪馆。

村民们很不解。“村里的孩子不都是这样的吗？”岳大爷向记者反问道，“在村里随便玩儿，谁会去管呢？”但事故过后，再没有村里的孩子被允许到兴中路上来玩。

死因疑点重重

丁书瑶的遗体被送走后，遇难处搭起了简易的红棚子灵堂。灵堂周围点起蜡烛，为孩子守灵，周围放有黄白相间的菊花。蔡书记与丁书瑶的爷爷年龄相仿，视瑶瑶如己出，每次路过灵堂，他都感到无比遗憾。“小姑娘的爸爸、爷爷都不矮，虽然只有4岁，但瑶瑶已经挺高的了，长得又很漂亮。”家人更是悲痛欲绝。在彭洁看来，瑶瑶特别会说话，很早便懂事了。她和丈夫经常出差配货，每次出门，瑶瑶小小年纪，都会叮嘱父母注意安全。而平日与爷爷奶奶朝夕相处，更是隔辈亲。爷爷有卖花的生意，中午骑三轮车回来，只要瑶瑶在家，都会跑出家门迎接。

如今，丁乃驷从家出来，就能看到孙女的灵堂。红棚子下的菊花已经枯萎，丁书瑶的死因，却仍是压在家属心头的巨石：遗体如何跑到了路基下，被成块的混凝土压着，为何却又没有大的变形？

8月18日，蚌埠市公安局禹会分局公布正式通报：“8月11日17时许，在蚌埠市兴中路毛郢段道路施工摊铺水稳层作业时，参与施工的自卸车驾驶员韩某某等违反安全操作规程，使在工地独自玩耍的女童丁某某被卸下的水稳材料掩埋，未能及时发现，致女童不幸身亡。”

但是，死者家属对此说法并不满意。丁乃驷告诉记者，在警方向遇难者家属通报情况时，说明了案发过程。自卸车的水稳材料把小女孩掩埋后，挖掘机又将沙石抹平，然后由压路机压实。虽然如此，可施工过程仍不清晰。

丁乃驷向记者质疑，“1米多高的孩子，自卸车司机为什么会看不到？”建筑工人邵佳和每日都要在兴中路旁的楼顶上施工，他将之前的修路过程看

得一览无余。邵师傅告诉本刊记者，施工时，首先需要堆料。自卸车倒着开，把斗支起来卸料，卸完后正着沿原路开走。这样操作必然增加视野中出现盲点的风险。但他向记者解释原因：“运料的入口在西边，如果车正着走，需要绕路。而且车前的路都没修，也不好开。倒着开走的都是修好的路。”

然而，彭洁向本刊记者反映，8月11日，她问过邻居家经常同女儿一起玩耍的小孩儿，邻居家的孩子当天还在丁书瑶遇难地点的水稳材料上面玩儿过。“孩子都在上面玩过，怎么可能还被自卸车卸下的水稳材料掩埋？”她质问道。

某业主单位工程项目经理赵轅凭借他的经验，告诉本刊记者，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为方便铺设路面，工地上施工水稳层，不会一次就把一车的材料都卸下，多数是分两三次下料。下一次料后，自卸车撤开，挖掘机平整路面后，自卸车再上。

丁乃驷对警方挖掘机的平整方式也感到不可思议。法制科的官员告诉他，挖掘机是用斗下的平面抹平路面的。赵轅介绍，挖掘机平整路面的正常工作流程是，先用齿来抓和摊铺，之后用平面的斗夯实，法制科官员的说法并不全面。本刊记者向他提供了在遇难地点旁，铺设的水稳层上疑似挖掘机齿痕的图片。土木工程系毕业，有着15年工程经验的赵轅，辨认出挖掘机所使用的两种操作方式。“齿痕短粗且间距相同的痕迹，像是挖掘机的齿在面层上抓和摊铺造成的。而挖掘机在多次扒平再敲击、夯平路面的过程中，因砂石大小不一，敲平以后，沉降不均匀，不同密度的砂石之间会有一道小沟，留下像接缝一样的爪痕。”

但是，挖掘机的这种使用方式确实存在不会破损小孩身体的可能。赵轅告诉记者，挖掘机正常为反铲式，而根据记者提供的现场的事故照片，挖掘机应是采用正铲式进行作业。“不是像用手在抓，而是像握紧拳头之后再松开，抖着爪子往前推，不会伤害小孩的身体。”

不过，赵轅对丁书瑶遇难的这截道路使用过压路机的事实存疑。虽然道路有一定的平整度，遗体身上有成块的混凝土，但这些挖掘机的履带也能办到。“因为压路机的滚轮有两米到两米五，压路机走过之后，两次碾压路线之间会留有一道整齐的压痕，这个路面上明显没有。”遗体的完整情况似乎也证明了他的猜测。“压路机一般都有震动功能，压缩砂石间的缝隙。如果压路机压过的话，小孩儿的遗体会和石头压在一起，会受损。”

综合记者提供的信息，根据多年的施工经验，赵轅认为，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丁书瑶在已有的水稳材料上玩儿。这堆材料不够，自卸车又卸下材料，将小女孩掩埋。自卸车撤出，挖掘机用正铲的方式摊铺路面，抖着爪子往前推，将平整的水稳层路面推进了几米。

但法医的尸检尚未得到结果，这些问题仍旧困扰着彭洁一家，他们对孩子的死始终充满疑惑：是活着时被掩埋了，还是死后才被掩埋？

工地隐患依旧

丁书瑶失踪后，施工就已经停止。施工道路通往黄山大道的入口被绿色的围挡遮住，坑洞、窖井上铺有木板，旁边偶尔竖有警示牌。

赵轅告诉记者，像兴中路这样，施工地点紧挨住宅，严格来讲，需要“硬隔离”，把施工区域和居住区域区分。据市政道路安全文明施工的管理规定，市区内新建、改建及扩建工程需搭设现场围挡，其材质应为砖基础，内外抹灰刷白，需有钢管立柱及压型钢板。在市区主要街道上，围挡需高2.5米，一般道路高1.8米。而兴中路两侧没有任何围挡。今年开始修建时，拓宽原址的旧路，把沿途旧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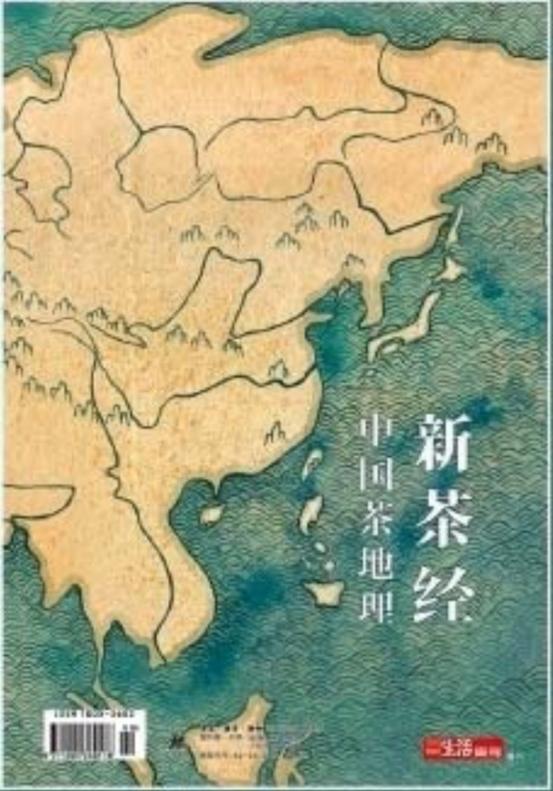
住房拆除，垫高路基，形成一米来高的土坡，土坡下就是村户。村中的孩子可以轻易地进入施工现场。

退一步讲，为方便村民出行，如果用在小区内修建通道设施的标准来施工，即使孩子在工地里，也会避免受害。赵轅介绍说，挖掘机工作时，周围需拉警戒线。倒沙石时，现场要有旁站人员，提醒旁边的人注意，同时用吹哨等方式提醒挖掘机工人视线内的盲点。

再开工时，这样的防护措施能否执行不得而知。纵然工地现已无人施工，但现场已经铺设的窖井、坑洞的遮挡物，仍然令人哑然。赵轅告诉本刊记者，即使现在，工地仍相当于一会儿防护都没有。他看到红棚子旁边的水泥涵管只是用木头盖住，上面压着石头，晚上如果有人走过，仍可能撞上，甚至掉进洞里。“没有封口的水泥涵管，首先必须用水泥盖板盖住，孔洞周围也必须有红白色的夜光遮拦。如果不配遮拦，也必须配红色或黄色的夜光灯，起到警示作用。”

施工方没有诚意，而在覆盖在另一个坑洞的木板上，村民已晾起了白薯干，像是在开一个潦草的玩笑。■

（文中丁书瑶、彭洁、丁乃骅、邵佳和、赵轅均为化名）



新茶经
中国茶地理

新茶经

中国茶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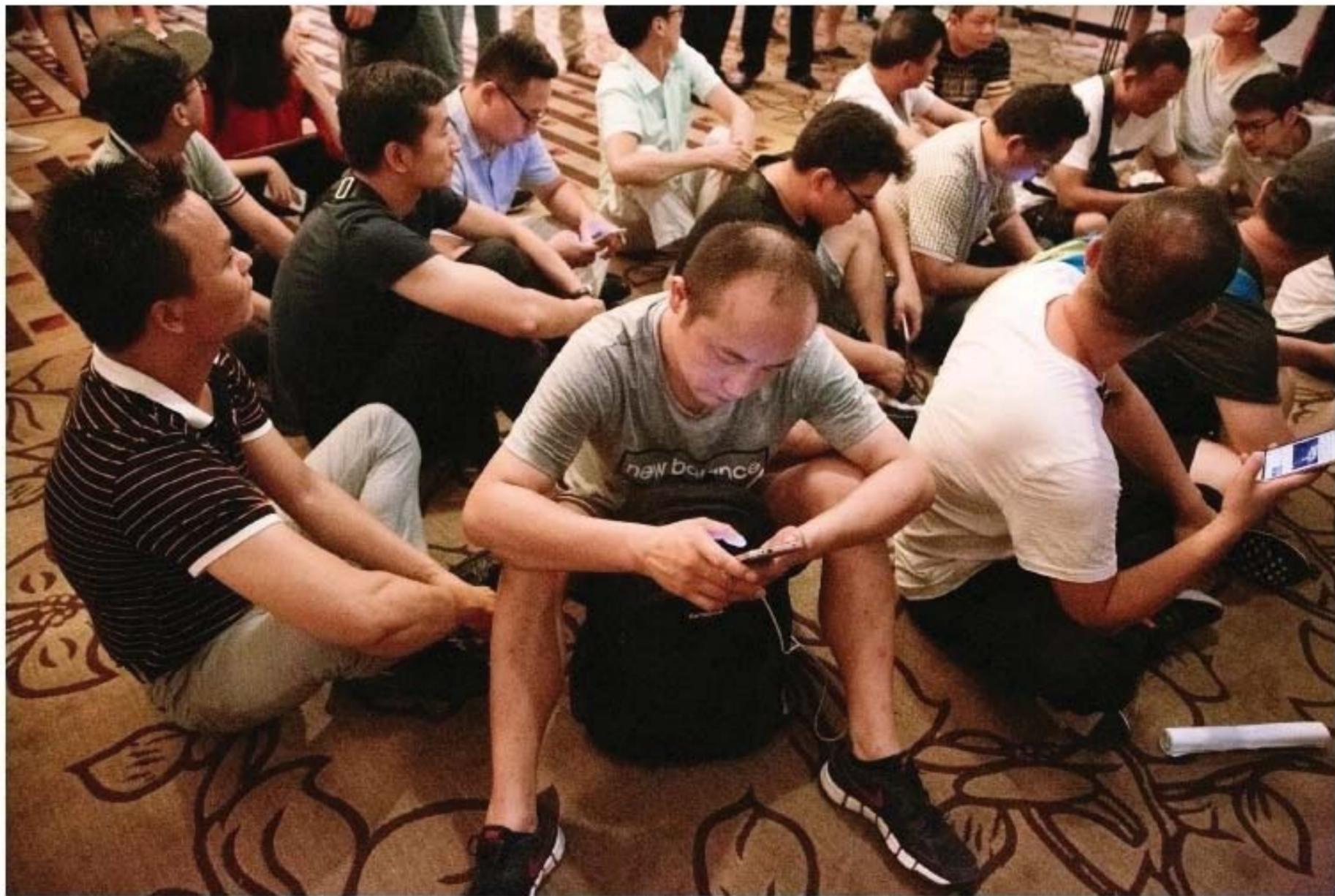
茶叶起源于中国，它原生于澜沧江畔的原始森林中，亿万年间一路向东迁徙，覆盖南中国的大部分省份。

一杯好茶，离不开地理、风土、气候、技艺的共同作用。《新茶经》以地理考察的方式讲述中国茶的故事。

历时七年，写作者十数人，足迹深入皖、浙、川、闽、滇、鄂、桂七省市，倾尽心力，无一篇不是亲自考察所得。



《三联生活周刊》天猫旗舰店



(李三强 摄/视觉中国 供图)

7月17日，乐视网在北京市朝阳区伯豪瑞廷酒店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现场有乐视移动区域供应商的人员讨债

乐视坍塌：“蒙眼狂奔”之后的乱局

记者 王珊

在采访中，乐视的不少员工纷纷表示，没有想到乐视大厦会倒塌得这么快。也许，贾跃亭更是没有料想过这种结局。他凭借着讲战略、描述未来故事为外界塑造了一个光鲜亮丽的乐视。这与公众如今看到的乐视形成巨大反差。这种反差一再打碎公众对乐视的信任，并最终导致人们对贾跃亭信心的丧失。乐视的现状证明，一味地靠“蒙眼狂奔”，却不顾及现代公司发展架构和实质性创新能力建设的公司，最终只能走向失败的结局。

8月20日，是李同在乐视大厦一层讨债的第55天。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20家广告公司。他们或坐或躺在瑜伽垫上，多数人低头摆弄着手机，脸上已经看不出情绪的变化。旁边是两个搭起来的双人大帐篷，疲乏的时候，可以进去休息一下。一旁的两个手持式小喇叭循环反复地呐喊着：“乐视还钱，贾跃亭还钱……”这是讨债商自己录的。“刚开始自己喊，后来嗓子哑了。就买了两个喇叭，好用。”

这些因为债务聚集在一起的人，迅速熟悉并团结在一起，并根据各自的特长进行了讨债任务的划分，有人负责订餐订饭，口才好、思维灵敏的则去谈判，负责应付媒体的讨债者则是因为其长相老实，

“有话直说”。“我们总结大家的共同点，第一次来北京要账，第一次睡到人家公司大堂里面，面对的还是同一个客户。”他们守在乐视一层，和员工一样早9点晚7点的下班，像是21个忠实的监工。他们怕哪一天醒来，员工不来上班了，“这意味着公司要倒了，到时候我们去找谁”。

55 天的对峙

李同是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2015年底，他与乐视签订协议，负责乐视在西南三区的手机实体店建设业务，包括手机柜台、体验台的建设，背景板、灯箱的设计和安装等。对于从线上转向线下的乐视手机来说，这是整个手机销售链条上最后的步骤。

包括李同在内的供应商见证了乐视手机实体店在全国从无到有的扩张，并贡献了个人所有的热情。李同记得，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月内给乐视做了150家店面，“一天就有三家”。李同言语中至今隐约透露出一股自豪感。“工程紧，乐视不会管你如何完成，他们只看结果，有时候会当天给单子，第二天就要做好，因为第三天就要开业。”21家供应商分布在全国大半的省份，他们埋头苦干的结果是：2016年乐视手机销量逼近2000万台，超过预期500万台。此前一年，仅靠线上渠道的乐视手机，销售量只有400万台。

李同对参与乐视的手机王国建设充满了期待：与上市公司合作不仅意味着稳定的业务量；对于公司日后的宣传以及新业务的投标入围也很有帮助。

李同对乐视的另一部分信心源于合作中的判断。在进行竞标的时候，李同对乐视表现出来的严谨有很深的印象。他和另外三家公司将样品拉到了乐视移动在省内的分公司进行，验收的团队里，有七八个人都是来自北京总部的。“他们会抠产品细节，每个产品的尺寸要严格按照这个施工图纸来做，比如说墙面的平整度以及点位的精确和收尾的流畅性都会很在意，装修的很多材料都是进口的。“上市公司不缺钱。”

他甚至为此拒绝与其他手机品牌续约，乐视的业务占据了李同公司总业务量的95%。“在讨债之前，我们一直认为乐视移动也是属于上市体系，也没有人对我们说不是。我们哪能想到这么大一家公司，说没钱就没有了呢？”李同燃起的热情随着乐视危机的不断爆出而逐渐熄灭。

“乐视总共欠我700万，还了一部分，还剩370万元。”李同公司和乐视的合作模式是“先自行垫付、每季度结算”，即在接到乐视的订单之后，他先垫付材料以及装修等方面的费用，待完工并检查合格后，乐视再进行付款。李同说，370万里面有200多万元是要付给材料商的结款。每个月的25日，他们都会给李同打电话催款。“电话我一定会接，这是一个起码的诚信问题，我会说给我点时间，一定会还。”保证很多情况下都起不到作用，李同被材料商堵了两次大门，“不允许进出，报警也没用。”

没事的时候，李同就会坐在瑜伽垫上发呆，回想跟乐视合作的整个过程，时间充分到可以让他想起几乎所有的细节。回头来看，早在2016年6月，事情便有了苗头。

2016年6月底是乐视支付他第二季度款项的日子。李同没有收到钱，他去找大区经理沟通，回复是“账面紧张，资金有些困难，要缓一下”。李同没当回事，这种事情也在其他项目里发生过，后来都结了钱。“当时要是能意识到问题，也不至于亏进去这么多。”在等着乐视结账的同时，李同继续按照合同搭建店面。

三个月后，乐视许诺的“十一”之后交款依然没有履行，李同又去询问，乐视给予的回复还是“资金紧张”。他托人打听了下，内部传来一个消息，即店面设计稿要重新调整，所以停了一段时间。李同想去北京看看，但考虑到这“是否会让双方撕破脸”，他还是没有去。

结清账过年是商人之间心照不宣的惯例。距离春节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李同坐上了成都飞往北京的飞机，“供货商催得太紧了”。到了乐视大厦的楼下，李同的心都凉了，他数了数，光拉横幅找乐视要钱的就有三波。也就在这时，李同才发现，几乎每家公司都在五六月份开始被乐视拖欠账款，给出的理由也是各式各样。比如说，一家来自华中地区的供货商在2016年5月被告知，“票款超过50万需要乐视控股批准，所以账款不能及时到账”。“现在想来，都是托词。”

李同慌了，他打电话给乐视与他对接的工作人员要求见面，对方说没时间，让他先回去。“我既然来了，必须要解决问题才会走。”直到他也跑到附近广告店里做了一面横幅“乐视还钱，还血汗钱”，在外面喊了两天，才有人出来见他。“那个时候我感觉乐视已经忙得要冒烟了，因为要应付各种债务问题。”

此时，李同才关注到网上乐视欠款、资金链断裂的新闻。乐视到底欠了多少钱呢？2016年12月，孙宏斌曾对乐视做了长达一个月的尽调，打算除了乐视汽车之外，“缺多少解决多少”。他当时预估填补乐视上市和非上市体系的资金窟窿总共需要约150亿元。然而在今年3月，孙宏斌才发现乐视的资金窟窿远不止这个数字，有媒体报道，3月底时清点完的乐视各业务债务总额约为343亿元，扣除保证金后仍高达263亿元，这其中还不包括供应商的欠款。

最终，李同和20余家供货商与乐视谈判签订协议：乐视每个月按照欠款20%的比例还钱，2017年5月份还清。然而，这个协议只履行了一半。“还有370万没给我，乐视又没有钱了，也没有音讯，电话也不给一个。”李同只好又到北京讨账，来回折腾了七八次，账款依然没有到位。最后一次是6月25日，他和其他供货商决定，如果乐视不还钱，他们就长住在乐视大厦，不走了。

50多天内，其他来要账的人零星地过来。李同跟几个人有过简短交流，发现除了欠他们3000多万元外，乐视还欠了130万元左右的盒饭钱、20余万元的桶装水费用以及80多万元的服装费；还有洗车的过来要4万元的洗车费。人来得多了，李同也就懒得聊了。他整日地躺在瑜伽垫或者帐篷里不说话，数着乐视大厦的保安从40多个慢慢变成个位数。“与乐视沟通的效率非常低。跟我们对接的中高层都换了三波，他们都辞职了。每次谈到有转机的时候，就换人了，新来的人又重新谈起。”

裁员潮来了

作为产品的售卖平台，乐视商城是受供货商直接影响的部门。早在数月前，乐视商城在供货上就已经出现问题。“比如说一些采取预售模式的商品，承诺一周或者两周内发货，到了预警期，我们却给不了货，因为没有货品补上来，有的消费者会因此向工商部门投诉。”乐视商城的一名员工告诉本刊记者，他在一次例会上获悉，乐视致新等供货部门将给材料供应商的钱拿去付了乐视体育欠的版权费用。

本应在3月同工资一同发放的2016年的全年绩效也被取消了。产品设计组的徐鹏记得很清楚，2月份，乐视商城HR（人力资源部门）还在给全体商城员工发放的邮件中提到，绩效工资将在3月上旬

随工资一起发放。然而，发薪日到了，这笔钱却没有发放。HR在微信中通知说，因为工作量不达标，绩效取消了。“我们觉得很气愤，你起码正式通知一下，另外不可能全部不达标吧，每个人总得有个完成度吧，什么都没说。”徐鹏告诉本刊记者。随即而来的是两次小规模辞退工作。通知只提前了一两天，每次都有接近10%的员工离开公司。

商城甚至还出现过一次变相裁员。“公司制度要求不能代替别人打卡，但制度一直没怎么执行。但去年底开始，公司开始抓这个事情，有一个小组因为一个人帮忙打卡，被全部裁员。”“无论如何，乐视没钱了。”徐鹏如此解释这些看似不合理的现象。

更大的波动随即而来。2017年5月底，乐视商城组织员工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商城员工被告知，又有一批人会被辞退。

会议结束后，徐鹏被HR叫去，签署了一份离职协议。按照协议规定，7月10日，徐鹏将拿到一个月的工资和4万多元的补偿款。即使乐视大厦的楼下，供货商已经闹了不少日子，乐视欠债的传闻已经坐实，先前也有不少征兆。然而，直到自己被辞退的那一刻，包括徐鹏在内的乐视员工才意识到，风浪真的到来了。“这次被辞退的比例高达50%。”徐鹏所在的产品设计小组包括运营、产品设计、软件开发三个小组，人数最多的时候有40多人，现在只剩下了五六个。

大规模的裁员工作不仅发生在乐视商城。乐视旗下的一个职能部门80多人只剩下不到30个，乐视体育下面的一个频道十六七个员工也只剩下了个位数，还有的部门所幸被取消。“商城有个员工休假，其间公司搬了家，没有人通知他，回去上班找不到地方，只好给HR打电话现找。”

8月11日上午8点半，徐鹏坐在朝阳区法院的大厅里，他刚刚填完强制执行的申请书——乐视并没有履行离职协议，在7月10日将工资和赔偿款发放给他们。8月10日又是发工资的日子，他依然没有收到，他只好寻求司法援助。徐鹏来自山东农村，工资是他在北京生活的唯一保障，他要租房子、支付基本的生活费用。“我都要吃糠咽菜了。”

2016年入职乐视商城的时候，徐鹏还满是憧憬。他之前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选择进乐视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积累互联网行业经验，二是贾跃亭描述的梦想前景打动了他。贾跃亭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颠覆苹果的垄断”，建立新的生态秩序。

徐鹏还记得，2015年，在乐1、乐1 Pro和乐Max的产品发布会上，乐视播放了一则超级手机的广告：象征着权威的绿苹果被一位追风少年咬成苹果核。随后，贾跃亭出现在舞台中央。“贾跃亭有可能成为贾布斯。”

按照原本的设想，徐鹏把乐视作为职业生涯的重要的一部分，积累产品设计和运营方面的经验。即使面试后，HR给出的工资并不理想，并且态度不太友好地说：“就这么些工资，你能来就来，不能来就拉倒。”徐鹏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进入乐视。现在，徐鹏什么都不想谈了。他只需要回欠款，告别乐视，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所幸的是，8月11日上午接近11点，这笔拖欠了接近两个月的款项终于到账。“乐视还是能学到东西的，像如何去仲裁、怎么申请强制执行，在别的公司，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走这个流程。”徐鹏手指着强制执行申请书，撇了撇嘴跟一起来的同事开玩笑。

留下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就在前一天，他们也刚刚拿到被拖欠的工资。乐视的一名员工甚至羡慕被辞退的人，“他们起码有补偿金拿。现在乐视也不开除人了，因为补偿金都发不起了”。

日常的工作已经难以为继。譬如乐视体育的一些频道，也不再像以往一样计较数量和点击量，“得过且过，大家都在混吧”。乐视体育的一名总监告诉本刊记者，组里的气氛一度很压抑，很多人觉得“公司就要完蛋了”，“特别是一些家里负担重的，又不好找工作的，压力更大”。

80亿去哪儿了呢？

钱去哪儿了呢？不止一个乐视的员工向本刊记者表示了自己的疑问。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乐视网在内的乐视体系近几年融资额（直接融资+间接融资）高达728.59亿元。从乐视网2010年上市以来计算，乐视平均每年的融资额为104.05亿元。

员工们最关注的是2016年4月公布的一笔融资，金额资金80亿元，公司估值也因此达到215亿元。日后乐视体育面临的危机让他们开始怀疑，钱究竟到账没有。“80亿肯定是到账了。”已经从乐视体育离职的管理人员许乐犹记得，3月的一天他们正在开会时，收到钱到账的消息。

根据公开报道，本来乐视体育想利用这笔钱再



乐视网创始人贾跃亭

次大展拳脚。比如说继续获取全球顶级赛事资源；研发智能化产品；获取产业链上游资源，包括赛事、场馆、俱乐部、明星等上游资源；涉足体育旅游、体育地产、体育培训、体育教育等泛体育项目等等。

然而，所有的规划都被打乱了：钱被集团划走了。“按道理说，这笔融资款是不能够被挪用的，但是老贾很强势。”许乐表示，钱被划走之前，乐视体育财务总监和投融资总监先后辞职，因为怕被牵连。事后，乐视控股派了新的人员到来，操作才得以完成。2016年4月21日，又有媒体报道称乐视控股首席财务官吴辉已离职，其所带来的团队亦有多人离职。

许乐曾经翻阅相关的文件后发现，乐视控股拿走了大部分融资款。“到现在，集团还欠乐视体育二三十亿元。”他很不理解乐视的这种做法，“乐视



(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1月5日，乐视公司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正式发布全新LeSEE Pro 电动概念车

右图：乐视公司位于北京电通创意园的汽车和体育产业办公场所

每部分融来的钱都是放在大乐视体系下一起花的，我都不敢相信，因为这样下来，投资者要承担很大的风险。”

另外一名乐视中层管理者则向本刊记者抱怨，有一次他去问财务为什么不将钱打给货品供应商，财务很委屈地告诉他，“没有控股的批准，他没有权利动用这笔钱”。“在乐视子公司财务体系上，控股还设置了财务管理，以对集团的钱进行把控。”一位内部的员工对本刊表示。“集团把控财务虽然有利于资金的集中管理，但乐视的这种专权的做法已经严重影响了子公司的正常运营。”一位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审计经理如此对本刊表示。

而对于乐视体育来说，缺钱导致的危机不断蔓延开来。

在乐视体育其中一个频道负责人王明的记忆中，危机最早起于乐视国际冠军杯赛事被取消。2016年7月25日下午，国际冠军杯官方突然发布通知，宣布原定于当日19点30分在“鸟巢”进行的曼联VS曼城的比赛由于天气和场地的原因被迫取

消。“大家觉得这个原因不具有说服力。”

对于业务部门来讲，最实际的影响是没有钱继续支付版权费用。王明负责的项目组视频版权到期，他们向上级部门打了报告，“他们告诉我们没有钱，我们组其实是很小的项目，花的钱并不多”。新的项目版权的购买变得更加困难，“你必须要有充足的理由说服领导，否则就是不可能”。

伴随而来的是ATP网球大师赛等大赛因款项不到位而面临信号被掐危机。“有几次甚至是在比赛前一天，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播放赛事，有几场都是最后一刻给了些钱，然后又开通了。”之后，乐视又丢失了亚足联赛事和中超版权。“这样反反复复，人心就很不定了。”

与之相对的是乐视一年前在版权领域的大手笔支出。曾有乐视体育员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签下版权的速度以天计算，“一年的时间，公司完成了250个项目以上的签约，管版权的副总余航基本每天都在签合同”。

有媒体曾获得一份乐视体育B轮融资文件显



图：乐视体育总部大楼

示：“（乐视）公司拥有全球种类最全、数量最多的体育赛事版权资源，涵盖了17类运动、191种项目、135个独家赛事版权。目前日均VV（访客访问次数）达到约1535万，日均UV（独立访客量）达到约626万……”“对于中国的体育产业来说，乐视是个开拓者，也引领了不少风尚。到现在为止，其他体育公司很多还是延续乐视的套路在走。”王明说。

“现在看来，乐视体育其实就是贾跃亭融钱讲故事的工具。”乐视体育前管理人员许乐对本刊表示，“从互联网产品的角度，乐视体育并没有拿出让市场服气的产品。版权是靠钱买来的，没有钱版权就没了。公司的价值是除了钱外，应该还有组织上的资产。”

公开资料显示，乐视体育“生态”的布局，包括版权内容、赛事运营、智能硬件、增值服务等业务。乐视试图通过这些，使乐视体育成为这个行业中的巨头。“乐视体育一直在努力打造智能生态圈。”乐视体育创始人兼CEO雷震剑在一次发布会上如此表示。“但在具体的打法上，乐视体育显得很很不专业。它就是在靠讲故事融钱。”许乐说。

2014年，物联网概念流行起来，智能硬件作为物联网的关键组成元素，也一并走红起来。投中集团统计显示，2014年国内已经有25家硬件厂商通过VC等方式实现融资，PreAngel天使投资人王利杰更是一口气投了20多家智能硬件公司。

作为追赶潮流的乐视体育来说，自然不能放过这个契机。雷震剑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提道：“它（体育产业）最大的特征是从产业的最底层到最前端全面被互联网包围，全面被智能包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为此2014年10月，乐视体育成立智能硬件团队，并设立了一个被称为“jene”（基因）的品牌。在智能硬件团队推出第一个产品超级自行车时，雷震剑曾对jene的含义进行了解释。他希望，产品能够涵盖运动、科技、互联网、创新、艺术五大基因，并介绍了未来的产品线包括自行车、运动相机、无人机、机器人、跑步机、运动可穿戴设备、智能箱包等产品。

智能自行车是乐视体育推出的第一代智能硬件产品。包括高、中、低档三款，售价分别是3.9999万元、5999元和3999元。在发布会上，乐视并没有讲清楚超级自行车所意味着的未来，而是将大量的时间花在自行车所承载的功能设计上，包括监测用户心率、骑行数据，及监测PM 2.5、紫外线、风速等，推送与踏频相匹配的音乐、智能防盗，以及进行APP社交等功能。乐视体育智能硬件副总裁李大龙将其称为“破坏式创新”。产品从推出后，就遭到了网友的吐槽和业界的批评，“叠加功能，不实用，没有核心设计”。而这不妨碍乐视体育的野心，希望“通过智能硬件能成为这个Key，打开乐视体育垂直生态链的开放性”。

乐视体育在智能硬件上的投入是大手笔的。许乐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智能硬件的HR来找乐视体育要招人指标，一开口就是三四百个。“我们问他要这么多人做什么，因为硬件好多活都是外包出去的，就连PPT都花几万块钱外包出去。他的回答是组织协调外包。”

结果却有点忧伤。许乐告诉本刊记者：“与乐视合作的飞鸽自行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产品一量产下线，订单就有40万，但实际销售量只有几百或者几千个。在内部团队汇报的时候，这一数据被扩展为几万台，而对外公布的时候则扩大为40万，这就是在造假。开监事会的时候，很多数据不能拿

出来，只有小会的时候才能拿出来。”

“互联网是讲究数据的，按说每周开会的重点应该是过数据。但是大家都是在讲未来，很少有人会去看数据。更多的时候会讨论发布会应该怎么开、请哪些名人或者不请谁。”许乐说，即使如此，凭借乐视网发展起来的乐视一直强调自己不是一个媒体工厂，而是一个产业工厂。

另外一名员工的说法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许乐的讲述。“乐视热衷于办活动，每次有什么事情，都要求全员转发，总监层面的人还被要求邀请好友转发，并将截图发给HR。很多人反感这种行为。”他告诉本刊记者，他的一个做销售的同事刚开始不是很理解这种做法，“他会跟我讨论是不是互联网公司都这么玩，因为每次转发后销售数字都有提升。不过他后来还是辞职了”。

蒙眼狂奔

入职时，每个乐视员工都会收到一本《乐视员工手册》。翻开第一页，就是贾跃亭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主宰自己，蒙眼狂奔，你就会成为最亮的那颗星》。

在信里，贾跃亭5次提到了“蒙眼狂奔”，并用热情洋溢的语言再次勾画了乐视的未来。“相信只要我们始终带着‘2’的精神蒙眼狂奔，不忘初心，执着向前，梦想就会实现。”贾跃亭说他的梦想是，将乐视打造成“独一无二的全球化、世界级的生态型企业”。

“蒙眼狂奔”给贾跃亭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好处。比如说，乐视在盗版横行的年代就已经开始布局版权，较早地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抢先布局了互联网、内容、大屏、手机、汽车、体育、互联网金融七大子生态，每一个生态内部都试图建立完整的系统。

“蒙眼狂奔”给贾跃亭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好处。比如乐视在盗版横行的年代就已经开始布局版权，较早地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抢先布局了互联网、汽车、体育等七大子生态。

贾跃亭自豪于这种生态，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平台、内容、硬件、软件和互联网应用这五个要素当中，每个要素对乐视生态都非常重要，乐视希望在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做到极致，这五大要素再产生化学反应，能够打造一个持续不断提供新价值的生态系统。”为了建设这些生态，有人统计后得出结论，贾跃亭烧掉了1500亿元。

在七大子生态的建立中，贾跃亭释放出了巨大的热情。一个中层管理者曾多次参加过总裁会，很多会议会从早上9点开到下午3点，贾跃亭会一直坚持到结束。“他能力很强，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比如说乐视七大生态业务，他不是全部懂，但是问问题都挺深层次的，每次别人发言后，他都会提取出一个关键信息，然后拍板做决策。”

另外一位商城的中层管理者李峰也见证了贾跃亭的严格和魄力。

2016年9月19日，是乐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9·19乐迷节”。乐视推出的活动主题是“买会员送硬件”，他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够将乐视的销售量和品牌知名度推向一个高潮。

活动当天早上，贾跃亭就坐到了指挥部。那是由会议室临时充当的。贾跃亭身体不好，不能久坐，他有时会站起来走一走。“他对细节抠得很细，比如说海报的设计、微博用词、卖点的梳理都会一一过问，大家压力很大。”李峰对本刊记者表示。

巨大的访问量很快让服务器瘫痪，客服的电话也被打爆了，“为什么我付不了款，为什么页面进不去……”从安抚用户的情绪出发，李峰等人决定送一些礼品。他们去找贾跃亭商量，“500个怎么样？老贾说送5000个”。一直到售卖结束，贾跃亭还留在指挥部跟工作人员开会，总结经验和出现的问题，“他越说越兴奋，舍不得离开。助理催了他起码5次。第二天战报出来，业绩非常好。以至于有个员工把小数点搞错了，老贾居然心情好到没有骂人”。

“414活动”只是一个缩影。事实上，每次发布会结束后，即便是身体严重不适，贾跃亭也会坚持与团队讨论到深夜，内容具体到发布会使用的图片、表格，表达时的用语以及手势等。在乐视内部，贾跃亭一直是公司的统领者，大到每一步的战略合作以及协议签署，小到项目细节、卖点梳理，都有他的影子。“他每次都希望自己可以更加完美地呈现出乐视的一切。”一名员工曾如此对媒体表示。

“贾跃亭有很高的战略敏锐度和机遇的把握能力，但是过于乐观。”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与贾跃亭相熟，对乐视的发展颇为了解，“乐视的危机是非常让人惋惜和痛惜的。”

“蒙眼狂奔”带来的最明显的表现是人员的扩增。许明是乐视体育一个频道的负责人。他犹记得，2015年他到乐视的时候，每天办理入职的人数高达一两百人，“阵仗很大”。这让从一个三四百人规模的公司过来的许明异常吃惊。乐视大厦挤得水泄不通，连个面试的办公室都没有，有不少人是在楼道里的电梯旁进行面试。

根据公开报道，2014到2016年，乐视员工人数从3000人迅速增长为1.5万人，仅2016年一年就新增5000名员工。

急剧的扩张，让乐视的一位管理人员觉得有些不安。他发现在他的团队内部，有些员工他都叫不出名字了。“人员快速增加，成本会大大提高，但是业务却没有快速成长，这就导致人浮于事的局面出现。这种氛围还会传染。”

这位管理人员担心的第二点，是公司的管理能力是否能够跟上扩招的速度。“作为管理者来讲，部门超过30人是一个坎。他要求管理能力成倍提升，需要耗费团队很大的精力。”他所在的部门原来只需要对接乐视一个业务部门，后来对接数量超过5个。

包括法务等在内的职能部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作为乐视的一个部门总监，李宏曾在一家外企工作，到了乐视后，他印象最深的两个字就是“对接”。“为什么需要对接呢？因为他缺乏完善的机制。”在他曾经所在的外企，业务支撑部门的工作非常明确，对方将处理的结果输出给他们，“每个人都像一个螺丝钉”。而在乐视，李宏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与其他部门的开会中，他需要通过参加会议来抓取对方的需求。“有时候，我在那儿坐三个小时，可能人家一句话都不会和你的业务相关。在这里什么事情都需要人来推动，效率极为低下。”

贾跃亭似乎有些理想主义。在2016年的乐视企业年会上，他首次提出了乐视的“狮狼文化”。“自然界中，狮子和狼是很难共存，融为一个团队的。”他说，乐视需要摒弃传统所谓“一山不容二虎”的弊病，进而打破现状，让每一个生态、子业务线都能同时拥有好几头狮子带领群狼突破传统。“每次遇

到困难，老贾就会说，你到哪里哪里挖个人过来不就行了。”

李宏说，在公司内部，很多人都不认同这个理念。“它的意思不就是这个业务你做不了，那你就找一个比你厉害的人就行了。谁会找个比自己厉害的人然后慢慢被人取代？除非公司是你的，你想找10个人都可以，赚的钱都是你的嘛。”

方兴东告诉本刊记者，早在危机发生前，孙宏斌就曾劝说贾跃亭对乐视的业务进行精简，放下包裹，尽早出手手机、易到、体育等，但是都没有起到效用。“老贾对于形势发展过度乐观，这方面的意见听不进去。成也过度乐观，败也过度乐观。他主要认为乐视每一个板块都是战略正确，业务实实在在，很有价值的。”方兴东对本刊表示，之前贾跃亭原本可以主动去分割上市体系和非上市体系，有主动权，现在只能被动分割，失去了基本的主动权。

2017年7月6日早上，贾跃亭通过微博以及微信公众号发表了公开信，宣布辞去上市公司CEO甚至更多其他重要职务，他提道：“我会承担全部责任，会对乐视的员工、用户、客户和投资者尽责到底……恳请大家给乐视一些时间，给乐视汽车一些时间，我们会把金融机构、供应商以及任何的欠款全部还上。”

这与2014年的情景有些类似，当时，他面临着竞争对手的攻击、各种负面的非议以及责难、内部的管理问题以及个人身体状况带来的病痛。2015年，在离开公众视线10个月后，他再次站在了舞台上，当被记者问到“这段时间感觉最艰难的是什么”时，他用手指着身体的右后侧说：“我打了四个洞，手术后身体还得继续放疗。”在谈话中，他多次用“命运多舛”一词来形容乐视和自己的命运。他还把自己比作“拿着一个长矛冲出去的堂吉诃德”。

如今，贾跃亭依然是乐观的，正像他在2016乐视生态全球年会上高唱《野子》时那样：“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幻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地在狂舞，我要握紧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而此时，在他曾经意气风发的乐视大厦一层，李同等人还在那里，旁边两个大喇叭依然高喊着：“贾跃亭还钱，乐视还钱。”

（文中李同、徐鹏、许乐、王明、李峰、李宏为化名）



天津“瓷房子”：一个收藏家的借贷罗生门

记者 / 王丹阳 摄影 / 蔡小川



天津赤峰道上的瓷房子比起周边老旧的洋楼，确实是个奇特的建筑

每年七八月，天津赤峰道上的瓷房子迎来最旺的旅游季，上万的日均客流在这条临近五大道的小马路上成了一种盛况。相比之下，仅3个门牌号之隔的张学良少帅府就门庭冷落，其实大多数人不知道瓷房子的原型是民国外交家黄荣良的故居，而被这幢绝无仅有的贴瓷建筑吸引。它的含义已超越了建筑，而成为一件离奇又璀璨华美的现代工艺品伫立在略显陈旧的洋楼群中。

今年7月，阿里巴巴网络拍卖平台上，俨然出现了这幢作价1.4亿元的瓷房子，相比同页面上几百上千万的房产，它的出现颇为稀奇，更蹊跷的是它被撤回了两次，终在8月8日等待落槌前被法院中止了拍卖。瓷房子在短短十几天里逃过三劫，背后却是一桩匪夷所思的民间借贷纠纷，民间收藏家兼市政协委员张连志的私人博物馆之路在此刻露出荒诞的一面。

“瓷房子”奇观

月初的天津骄阳似火，听说瓷房子要拍卖了，附近的居民都聚集在外面指指点点，津津乐道着1.4亿元的起拍价。他们都知道张连志这个人，是一个拥有奇特口味的收藏富豪，15年前，他开始在房子上捌飧瓷片，7亿多古瓷片、1.3万瓷瓶瓷碗、500多个瓷猫枕把整幢5层高的法式洋楼贴得严严实实。出于猎奇，这大概是五大道上最招揽游客的景点，树大招风之下老天津人各表意见，有的说好看，有的说古怪，也有历史风貌保护界的民间人士说它丑陋，似疮疤。

一道波浪状的“平安墙”将房子和外界隔开，墙是600个青红花瓷瓶子垒成，里面灌注了白石灰，这是瓷房子的第一道风景。馆员一律穿严密的黑色特勤作训服，入口大厅前的岗亭保安也不例外，如同警卫般戒备而肃穆，对络绎不绝的游客不知疲惫地敬礼。这就是瓷房子的噱头之一，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它已经被移交公家。不管墙外多少目光和传闻，

墙内是一波波挥汗如雨的旅游团，讲解员两耳不闻墙外事，一遍遍解说着馆长的创举。

房顶上有一条彩带般的骨瓷龙透迤成“China”的字样，有中国和瓷器的双重含义，龙首顶着一个纯红色釉五角星，据说来自馆长收藏了30年的明代宣德年间祭红瓷瓷瓶，为表达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心，摔碎后而贴上的。“盛世才烧祭红瓷”，这种瓷釉不惜以玛瑙、黄金、珊瑚粉烧制，进炉100件，能烧出一件都不容易。

在讲解中，主人阔绰豪奢，不惜一掷千金的地方俯仰皆是，宛如置身于宝库中。300多尊北魏、北齐的石雕像，300多件汉白玉石狮子、20多吨天然水晶玛瑙；还有很多是隐匿的孤品，平安墙上8400万元拍得的“御制珐琅彩庭园人物图题诗灯笼尊”，门前的清初三彩琉璃狮是段祺瑞府流落出的旧物，进门处的铜鹿是慈禧宫里的，门把手上是个清代粉彩牡丹纹饰官帽筒……楼内墙上贴满一幅幅碎瓷拼就的名画，“镇馆之宝”可谓是赵孟頫的《调良图》和张大千的《荷花八屏图》，不过，它奇特在用瓷片临摹，它的价值连城体现在都是钧窑、汝窑和祭红瓷碎片。那些细节处的马鬃人须，让贴瓷过程中找瓷都要耗上半天。

也有人觉得他的东西不入流，在五大道古玩市场沈阳道上，一位研究瓷器30年的老先生嘘道：“张连志啊，我们太熟悉了，80年代时没人要的瓷瓶他一车车几百块地往回拉。”一拉都是同样花色的瓶子，严格来说是并不值钱的嫁妆瓶，“我们行家叫‘疙瘩碗儿’（指劣等器物）”。这位老先生跟多数质疑者一样问我，“真正值钱的东西有谁是往墙上贴的？”

张连志不在乎这些，如果不是债务纠纷，他会出现在人声鼎沸的小楼中，倾情地为游客解释他的设计和想法。他多次声称“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

瓷一片”，但他不惜碎之贴在画里，为的就是那“哇”的一声，给人以冲击力。为此他不知摔碎了多少瓷瓶瓷碗，用不同形态的瓷将整个有棱角的建筑包裹得精工细雕，“美吗？很美！”他无意识地重复着这句发自内心的话，瓷房子的钧瓷共计上亿片，张连志称“你只要发现一片新的给你10万”。

从小楼正中间的回马廊直瞥楼顶天花板，是一幅令人发怵的似藤蔓似龙爪的立体石像，像一团邪魔的烟气盘亘在头上，又被斑驳的瓷片所固定。讲解员告诉你，这是女娲伏羲造像，馆长熟读《山海经》后的创意。这座占地仅千把平方米，集儒释道和民间信仰于一身，又兼存了封建意喻和社会主义象征的瓷房子耗费了张连志15年的脑细胞，2010年入选《赫芬顿邮报》的“全球十五大独特设计博物馆”，翌年被市旅游局评为三A级景点。

著名民间收藏家

但是，这座房子应该说一开始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也就是最近，人们才知，它价值连城的背后是一桩暗中操作的民间借贷，光鲜亮丽的反面是同样的意味深长的资金窟窿。许多记者都来找张连志，出来的报道都无法为他证明“清白”，或者挽回命悬一线的拍卖，所以他经常躲在瓷房子的后楼里，对那几个员工感叹人心不古，也大叹现实世界中的交易跟古玩圈的差别。

虽然张连志很少曝光过自己的身世，但外界流传他生于仅几百米之外的意大利风情街，祖上是做盐业生意的买办阶级，舅老爷是吉林督军孟恩远，从小家里有不少古物。这些古物在“文革”时被毁，原本住独栋洋楼的张家后人也是飞鸟各投林，“老七”张连志从此与兄弟分家，成为72家房客之一，七八十年代时他并不与众不同。邻居记得他亲切而懂事，最早在感光片厂卷胶卷，80年代成了这座北方城埠难得的下海商人。

那时，他在街上支棚子卖布头，都是从广东、上海倒腾来的，当地人称“倒爷”，让他赚了第一桶金，1992年，他开了天津第一家活鲜餐馆“粤唯鲜”，那是借鉴了广东的生猛海鲜饭店而做的，在当时的天津可谓开风气之先。那时，餐馆门口放着个笼子，装着猴子、鹿等奇珍异兽，路人无不惊叹，而吃饭

这座房子一开始就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最近人们才知，它价值连城的背后是一桩暗中操作的民间借贷，光鲜亮丽的反面是同样的意味深长的资金窟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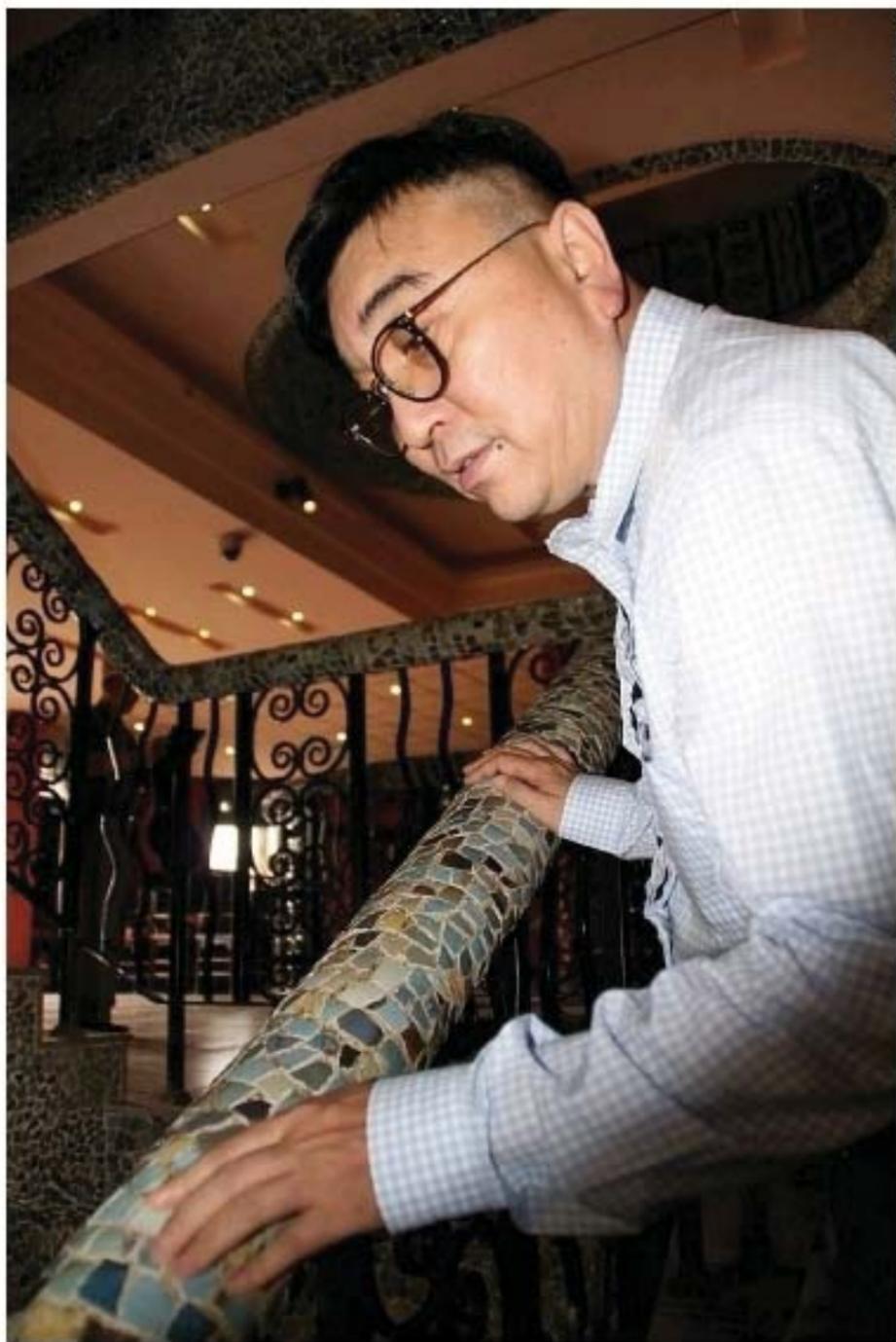
更是要排队等号，最兴旺时订位需早3个月。这家餐馆成了张连志的财富发动机，很快天津人发现，他在加拿大定居又有了房产，复又出现在天津已是一身毛衣夹克、洋毡帽的华侨做派。

张连志骨子里仍然是老派的天津闲散人，操着一口顺滑的津腔，有人说他是天津“老炮”，但这种对传统的痴迷是裹藏在动辄上万元的名牌西装里的。张连志曾对媒体表示，他六七岁时就跟着爷爷奶奶收藏古董，被蒙上眼睛摸瓷器的里胎外肉，猜对朝代就被赏点心吃，没有猜对就是“不开门”（指不入行）。他的侄子张帆从小耳濡目染，“文物鉴别的道道有些是祖传而不可奉告的，叫‘一眼白’，看一眼就知道值不值钱，价格合适了就成交”。那年头海河三岔口河底淤泥常提上来碎瓷，是历代随运河北运而来的贡品，停船检查时凡不合格的就不得进京，就地打碎沉河，张连志的父亲喜欢收集这些。

90年代末，天津召开财长会议，粤唯鲜成了市政府指定的接待餐厅，为了制造点噱头，张连志将古瓷片贴了整整一面墙，从而引来外国太太们“china, china”的惊叹。张连志由此被启发，想要做一个与瓷有关的博物馆，瓷房子的前身就在2000年被相中了。那时的张连志长期定居加拿大，也曾看中一个古堡，房产价值仅三四十万元，但修葺协议上的强制性修复成本高达千万，这使张连志却步了，想着还不如回国搞。当时天津五大道上的洋楼虽是公产却均无文物身份，张连志找到这座砖木结构危楼时它是工商局的“三产”，闲置了十几年。

“说真的，当时拆掉也就拆掉了，从一楼踩一脚，天花板上会掉灰。”张连志这么说。这栋5层楼、通体黯淡的法式洋楼被重新加裹浇筑，张连志天马行空般的“创作”开始了，无底洞般的烧钱也发生了。没有图纸，时常是灵光一现，今天画这些，明天画那些，张为了讨好工人，给他们唱歌跳舞以激发积极性，但很多细节上他至今都觉做得死气不灵动。

2002年，房子正式过户，作价3000万元，几年后天津开始实施房产证和土地证二证合一，瓷房子面临千万的土地出让金缺口以及千万元的工程款。房子的人工成本之巨让他的粤唯鲜文化创意公司几乎失血，不办理二证合一就无法从银行抵押贷款，



天津瓷房子主人兼设计师张连志抚摸古董瓷片贴成的楼梯扶手

于是张连志开始和小额贷款发生了交集。

神秘的“救星”

2012年，张连志已经在小贷圈里滚了3700万元债务，急着还钱。据张连志的助手黄晓燕回忆，那年他们认识了一个自称是农业银行后台的人，名叫单辉，时年30岁。同为天津人的单辉长得精悍乖巧，张口闭口叫着“张伯”，很有礼。他称自己的父亲是建委的人，经常光顾粤唯鲜，和张连志有浅交。只是，当张每一次问他父亲是谁时，他都推脱说“以后再说，这不重要”。

单辉摆出的另一个身份是“天津鑫泽小贷公司



1

的副总”，这家公司同年成立，是天津富士达自行车公司的老板辛建生主投的。但张连志不过问这些背景，从他和黄晓燕的多次讲述中可以听出，在小贷圈中，英雄不问出处，有钱就能私人间借贷，背后的公司有时只是应付监管的幌子。张连志的公司除了30来个馆员，只剩下三四个日常运营，他为了瓷房子而关了餐厅，从此遣散人员，公司架构不再完整。那天，他带着一个2009年刚毕业的财务林更，和小助手黄晓燕去见了单辉。

对张连志来说，古董圈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一笔头生意，比如看中一个什么了，让对方留着，然后凑钱来提。按照他的说法，长久以来浸润在这种交易方式里，这行不流行合同、协议、白条什么的，所以理所应当觉得借钱也是朋友间私下里口头约定，

之后就凭个人信用了，反正老一辈人都不會赖账。据黄晓燕回忆，当时单辉一再对他这位知名收藏家兼市政协委员表示敬意，把一侧的她也感动了，“虽然我们找人家借钱，但人家不是颐指气使”。

没有合同，但他们顺利地约定了5000万元，只是在几天后去房管局做他项权抵押时，补签了合同。黄晓燕说：“单辉的意思始终是问银行贷款才是最正规的资金渠道，一直是在提醒我们。”相比之下鑫泽小贷的月息是两个点，年息就在24%，不是长久之计，而银行贷款的先决条件是二证合一。此时，已经停业并筹备做另一个博物馆的粤唯鲜也未办理二证合一，并负债累累，欠有银行1000多万，张连志的想法是，把土地连同房产一起盘活了就可再滚抵押贷款，借新补旧。单辉轻易说服他们再借5000



2



3



4

万元。

这5000万元从此埋下荒诞的种子。黄晓燕记得，她去过鑫泽小贷的办公室，给一个叫崔洪生的总经理交了营业执照、信用担保和银行流水等各种证件，对方在单辉的描述里是个东北的富二代，也是鑫泽的金主，“非常有钱，你们不要张扬”。这次，听起来对银行业务了如指掌的单辉对张手下的林更提了个要求，去办一张某银行的大额卡。“他对我们说，把个人流水做得好看些，这样以后就容易贷了。”黄晓燕说。他建议，就用这张林更名下的个人卡来走账，不必走公司账户，否则银行手续更麻烦。

事实上，鑫泽的注册资金是5000万元，按照天津对小贷业的借款限额，对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这也是为何不能走公司账

户的原因，而这种通过自然人转账，再出具委托划转证明的做法在小贷双方看来都是通行做法。进贵宾室前，单辉指导了林更这个毕业不久的新人一套开大额卡的说辞，其中包括“帮银行增加存款”，等卡开完后，被他连同硬卡、密码和U盾都拿了走。单的意思是，这张卡就交给他来保管，由他来“把流水做得漂亮”。

借和贷的罗生门

按张连志一方的说法，他再也没有过问这张卡，让手下给单辉提供了7个供应商、施工方的账户，让对方直接把工程欠款打给他们，共计1500万元左右，对方收款后，发来确认函，就算结束了。瓷房

1. 瓷房子里有不少家具是清朝的，或源自张连志祖上

2. 房子中间的回走廊

3. 楼梯墙上到处是瓷片临摹的中国名画

4. 用瓷片贴出的窗棂，为了适应建筑风格，瓷片的选择花费不少时间

子的后楼办公处就像个小型作坊，交给几个姑娘和他的侄子打理，张连志自己说，他是那种满脑子古董，而在现代公司制运营上缺根筋的人，当时任用黄晓燕和林更也是看这两个孩子挺老实。

黄晓燕说，馆长至今对财务流水不上心，具体借多少欠多少都没概念，所以还不如她和林更对事情的脉络清楚。她认为，把卡让单辉来保管是他们最大的疏忽，其间张连志也从未问起卡的去处，林更更是认为单辉亲如家人，百分之百地相信他。等到翌年7月，一个叫辛建生的富士达公司的老板把他们叫进厂里，张才恍悟这卡里的手脚。辛建生是鑫泽真正的法人，彼时他开篇就问：“这欠下的一亿准备什么时候还？”罗生门就此开始。

按黄晓燕的说法，张当时懵了，怎么是一个亿？等对方拿出所有的流水单和打款凭证，才“第一次看见这张被单辉拿走的卡在2012年10月打进了5000万”，汇款人是鑫泽的会计，而辛又拿出了同年同时和这会计签订的“委托划款确认书”。鑫泽一方证据确凿，辛建生咬定说打到了林更的卡上就相当于给了你们公司，别的他不管了。

这张银行流水单至今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上面除了9笔工程款是张连志认账的，其余他皆称无关。焦点在于，其中有近10笔款项近1500万元是转到了单辉和他妻子名下，以至于该卡的结余只剩5000块。“当时两人不觉得是敌我矛盾，都认为是单辉胆太大了，辛总建议以馆长的名义去告他诈骗，因为当时鑫泽已经进去了两个人，再掺和就乱了。但是抓人要有事实依据，所以要张总确认是借了1亿元，被骗走4000多万。”黄晓燕说。

按照张连志一方的说法，因觉得“双方立场一致”，张对此提议没有多做他想，就将此事交给辛建生安排，再由自己出面来告。张连志一方的回忆是：没过几天，辛建生带着一位东丽区法院的执行庭副庭长陈树清（化名）把他约到一个叫璞御的海鲜餐

“当时两人不觉得是敌我矛盾，都认为是单辉胆太大了，辛总建议以馆长的名义去告他诈骗，因为当时鑫泽已经进去了两个人，再掺和就乱了。”

厅，在这位陈庭长的说法里，建议张把这1亿拆成20笔500万签20份借款合同，一方面作为报案凭证，一方面是区法院只有权管辖500万以下标的的案子。张连志说，这位庭长当即拿出20份借款合同，他都签了。

张连志认为有一个细节能确认单辉是在“诈骗”：一次他带着一堆公章和姓名章去和单辉喝酒，酒过之后还唱了KTV，翌早发现章不见了，“电话中他说别提了，在我这儿呢，你以后小心别多喝酒啊……”他现在认为，这章是被偷用了，虽然辛拿出的一大堆收款确认函上都有他的章，但按照这行的规矩，好多都是空白件上盖章，他不知道。

可是，辛建生几乎全盘否定了张连志的说法，他认为这就是一个老赖，心里对所借账款一清二楚，忽悠外界说自己不懂现代财务制度。他记得第一次见张时，张一身奇装异服，梳着油光锃亮的阴阳头，满嘴跑火车，讲话不着边际，关键是他认这1亿的账的。辛建生自称不认识单辉，那只是小贷间普遍存在的一个中间人，作为投资人，他是不过问这些外头人的，当时要求见张连志，只是一年期到了，那2%的月息没有收到一分钱。

“他当时还求我给他时间去银行贷款，建议把瓷房子过到我的富士达名下，让我把房子作为担保抵押来贷款，当然我不同意，我要这房子干吗！”辛建生这样告诉本刊，他斩钉截铁地表示当时张丝毫没有提及自己是被骗的，他对张的第一印象就不好，作为有头有脸的政协委员，“一把年纪了干吗穿成那样？”辛名下的富士达是天津主要的ofo小黄车供应商，单车和摩托车订单延伸到北美和欧洲，常年不在国内，对于小贷部分一开始是撒手的。

至于后来有否介绍陈庭长给张认识，他更是否认。“从来没有在璞御餐厅跟张连志吃过饭，更没有介绍东丽区法官给他。他是2个月后找我说，自己被单辉骗了，我当时建议，你去和平区或东丽区告都可以，要是来东丽区我介绍人给你。”

拘留42天

辛建生咬定张连志是个睁眼说瞎话的人，包括后来一连串对上庭的描述也是无中生有，从2012年8月民事立案至今5年，其间经过三次调解协议，仍未弄清真实款项，大名鼎鼎的天津地标瓷房子背

后的罗生门还在往更离奇的方向发展。今年7月末，张的代理方北京京师律所开了个召集众法律学者和记者的“瓷房子拍卖门法律研讨会”，会上有学者问张连志，作为一个多年古董买卖的生意人，既然没有借1亿，怎么就会在那20份500万的合同上草率签字，张连志被问得哑口无言，但与会者倾向于认为这次他是被讹诈的，“等于说进了一个局”。

在京师律所的抗诉申请书上写明，2013年8月12日，张接到辛建生电话去东丽区法院办理控告单辉的手续，但张连志却被直接带到了审判庭上，被要求签一堆材料。“出于对法律的敬畏，毫不犹豫签了字，从进入法庭到签字离开，不超过10分钟。”张连志说他根本就没看那是什么材料，事后，黄晓燕向所有前来采访的媒体称，其中有民事裁定书及调解协议，等于说用法律的形式做实了张连志是欠了一个亿。

辛建生告诉本刊记者，那又是对方的臆造，实际上他7月就电话知会了张连志，“我要开始民事诉讼了，他是知道我要告他了”。张连志不知所签为何物的说法也引来记者会上诸多质疑，但他表示自己本来就不懂法律程序，对方叫签就都签了，以为签了就能告单辉。直到翌年1月，张连志向市公安局经侦科报案，2年后，警方以查不到犯罪事实将此案撤销。对辛建生来说，“先刑后民”是一个折磨耐心的过程，他自称也是受害者，“为什么公安查了两年查不到犯罪事实？单辉和张连志间也有私人协议啊，可能在中介费上发生了矛盾”。他这么说。

去年夏天，经侦无果的情况下，张连志以“拒不执行法律生效文书”“拒报财产”等理由被连续拘留了42天，他是在丽思卡尔顿的房间里被带走的，已经住了7天，爱豪奢和摆阔也使他在外面到处留话柄。至被拘留前，他们没有还对方一分钱，一瞬间，“老赖欠账一亿不还”的新闻在坊间扩散。张连志认为，这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在他说来，没有搞清到底欠债多少的情况下就不该还钱。“如果我真借了1亿，那么我把瓷房子送给你。”他逢人就这么说。

京师律所的律师庞理鹏告诉本刊，张连志好面子，一直以来都认为凡是能靠个人信用背书的，就不要麻烦第三方，所以在请律师上也犹豫不决。正如他之前一直认为宁愿向不认识的民间高利贷借款，都不要向熟人开口，出了问题还尽量自己藏掖着。

直到今年7月中旬，瓷房子将被法院执行拍卖，他才驱车赶到北京求助于大所的律师。

代理人之一的庞理鹏指出东丽区法院在此案中的种种越权和漏洞，似乎能隐约指向辛建生与该法院间可能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勾连。“事实上，在有房产查封的情况下是不该进行拘留的，张名下的瓷房子和疙瘩楼（粤唯鲜酒楼原址）在2013年8月就都被查封了，法院尽可以执行而不是抓人，这就涉及以拘代执。”庞理鹏告诉本刊。在案卷中，有一份签于去年7月21日的拘留决定书，理由是“拒绝申报财产”，而8月3日，拘留所中的张连志收到了一份“报告财产令”，限其收到此令1日内报告近一年的财产情况。

拘留所中的张连志切实感受到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和耻辱，比起借贷纠纷，他更愿意向媒体痛陈那次经历：拘留期间心脏病发被送到一所中医院却不得住院观察，靠吃速效救心丸和阿司匹林缓解，好不容易被送到有底档的胸科医院，却被所长强行带回，“这是东丽区的重刑犯，法院安排下来的”。张连志问：“如果我死了呢？”“死了我负责！”这位市政协委员那一刻感到命如蝼蚁。

骚动的地下拆借

罗生门产生的实质是两名天津“老炮”的暗中角力，谁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但张连志单方认为单辉是这起连通诈骗中的腾挪者，而辛建生却不承认与之有关系。单辉几乎成了案中屡次被提的隐形人，已经被撤了案，没人再去找他，事实上他也已经发迹并成为角力的第三方力量。很多人都纳闷，只要证明流水单上单辉的确向自己名下转了钱就犯罪事实成立了，但是经侦并没有抓他。这桩淹没在口水战中的案子的导线是民间金融中不可小觑的监管漏洞。

“要抓单辉是抓不到的，他现在倒卖商品房起码已经赚了一个亿”，同样和他有过节的戴忠才出现在法律研讨会上，他形容自己也是“被骗者”之一。应该说，老戴是看着单辉成长起来的，当单辉在张连志面前自称是鑫泽的副总时，他的真实身份是滨海区一家投资公司的总经理，而老戴是董事长，两人合伙关系。老戴在80年代时在山东某纪委工作，来天津下海做商业地产开发，“这小子经常在外称我



对多数游客来说，跟瓷器合影是来瓷房子必做的事之一

是他干爹，把我是纪委的说成是天津建委的”。

在滨海新区临港的一套商住两用二室一厅里，老戴跟本刊记者回忆起他和单辉几乎一事无成的2012年。屋内四壁萧然，一个仅有的自动茶桌显示着主人并不起眼的生意。单给他最初的印象是机灵又聪明，2011年时，老戴在滨海卖商业地产，单辉和老婆开着一辆七八万元的宝来车，以一个民间卖楼中介人的身份出现，他们约定合作卖楼，一个月后单辉得到一笔25万元的劳务费。两人开始合作公司，去外地拿地，跑了一年没成效，老戴开始问老朋友辛建生借钱。

也就是以私人银行卡收了辛建生2500万元借款

后，他将此卡交给当时在公司任财务的单辉的妻子顾静，约半年后发现此款并没有汇入公司账户，而是打到了单辉的个人卡上。“他就开始不出现了，说我的钱还没有回来，就用一用，我觉得他发赖了。”老戴觉得他比张连志幸运的是，这2500万元是直接被单辉整个划走了，自己没有用到一分钱，所以在法庭上能撇得干净。至今单辉没有还这笔钱，而老辛也没有催债，老戴就懒得去申诉了。“他是我公司的人，顶多以挪用公款去告他，没法告他诈骗啊！”老戴稀里糊涂地过了5年，在他的口吻里，这个圈子热钱满天飞，动辄千万数额如同过家家般草率随意。

“20年前，4000万元民间借贷就一张纸，两边

盖个章就完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是不会发赖的，哪里像现在一写五六页照样出事。”他说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小贷公司只是个门面，背后的实质就是个人间的高利贷，“像单辉这种中间人表面上跟你谈3个点利息的，肯定自己抽掉1个点”。老戴开的是房地产投资公司，但私下里他也放贷，“这个圈就是这么个圈，小贷公司无权放的个人可以无限放，惯例上要多几个点”。

他不能确定单辉是否与老辛有过勾兑，但他知道，后来去了老辛那儿当总经理的崔洪生，一开始是滨海某个易初莲花的拓展部职员，曾找他租过楼。单辉就是通过崔洪生介绍来的。“他俩是一对，没错”，他这样分析，他认为这一对到处招摇撞骗的“混混”是事件的始作俑者。一年后，当他找到单辉，对方已经在河北香河县的一处房地产公司卖楼。“他卖楼就赚了1亿，在梅江买了套1700万元的别墅，所以那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跟我说，你们要抓他很难啊！”

把崔洪生聘为总经理的辛建生告诉本刊，这是公司筹备之初疏于管理的后果，他是“经熟人介绍，以为崔洪生有财务管理经验”，但对他的底细一无所知，更不知有个单辉里应外合。“这就是小贷普遍存在的情况，中间人一手拖两家。”鑫泽的现任总经理是辛建生的女婿王嘉臣，他这么说。

荒诞的尾声

王嘉臣称鑫泽小贷是为解决富士达上下游资金短缺而成立的，很少放如此巨款给生意圈外的个人，就因为崔洪生在位时制造了多笔呆账，所以他在2013年被炒了。目前，鑫泽的办公点在天津第一高楼环球金融中心内，接待处只挂富士达的名字，仅四人运作的小贷是并不对外宣传的副业。“你别看这楼里都是投资公司、咨询公司，其实都是放贷的，所以有时进出能看见一些画龙画虎的黑帮，都是帮着讨债的。”王不讳言。

根据银监会2008年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第四条，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贷公司资本净额5%。三年后，天津市金融办亦发布对小贷公司审批监管的《暂行细则》，公司对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此案中，鑫泽的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倘若1亿借款属实，那么远超这10%。所以，通过自然人走账这种“体外循环”的玩法就大行其道了。

“体外循环对小贷来讲很正常，比如自然人间往往有多张个人卡，都是走账用的，收回来的款立即汇出作为下一笔的贷，所以跟公司账户很容易脱节，造成坏账。”庞理鹏说。天津瀛略律所的主任胡明春这样告诉本刊，如果违反以上10%的原则，小贷公司只可能会受到来自金融局的处罚，法律上来说借款合同仍然生效。“哪怕是自然人走账，只要委托划转书是存在的，那就有法律效力。”

王嘉臣将两笔5000万元的所有委托划转书摊在面前，以上均有张连志的公司章或姓名章，无论如何他认为这是赖不掉的。“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一个案外人（指单辉），可那么多手续上都没有他，我们讨论的是黑与白，但张连志讨论的是红，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把钱打给单辉又后悔了呢？所以说为什么是老赖呢……”王很不满，彼时他正迫切地等待着8月8日的拍卖，好补上这笔5年的账。

6日，法院宣布，瓷房子拍卖中止，其中的原因不仅是律师提出的种种漏洞，更不可忽视的是该房子目前可能是文物，到底是剥离掉瓷片，房子单独拍卖还是连同装饰物一起拍卖成了另一个坊间的热议。张连志当然不同意前者，因为这是凝聚他15年心血的完整的作品，他也就是在拍卖前才知道这房子可能涉嫌篡改历史文物。这是对他另外一个打击，也为这出罗生门再添荒诞元素。

2003年，也就是黄荣良故居被张连志买下的第二年，天津市文物局开始陆续发文要加强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之后区文管所公布了辖区内“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就包括了黄氏故居。幽默的是张连志当时已经在房子上大张旗鼓地“创作”了，之后顺利地升格为3A级景区，多年来高官云集、接待参访无数，“50多个国家的大使来这儿拍过照呢！”他认为，这房子就算当年拆掉也没人来管，“拆掉也就拆掉了”。

法院中止拍卖的理由是，要核实并等待“相关主管行政部门明确态度”。张连志眼看又逃过一劫，但因多一条头绪而前途未卜，他要开展的是更长远的申诉，黄晓燕向本刊总结道：“做私人博物馆真的很不容易。”辛建生的焦灼更胜一筹，法院撤回拍卖相当于眼看要回笼的钱又飞走了。“张连志根本就没钱，但我们又不能逼法院。”王嘉臣说。最近，张连志开始以拍卖展品的方式来筹资还款，从8月26日开始，每个月拍一次，直到还上他所认可的借款数。■

（感谢《新京报》记者王静祎对此文的帮助）

叮叮超级车：出行领域的“消费升级”新尝试

记者 王梓辉



叮叮约车总经理龚立

去年7月28日，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联合出台了被称为“网约车新政”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此后一年内，各地关于网约车的监管细则相继出炉。

上月底，《暂行办法》出台满一年，但相关的统计数字却让用户对网约车行业没办法满意。根据交通运输部披露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有19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在相关城市获得了经营许可，但目前全国各地发放的网约车驾驶员证只有10万本，车辆运营证约5万本。面对多达2亿人次的用户规模，“10万”这个数字无疑只是“杯水车薪”，要知道在《暂行办法》实施之前，滴滴就曾透露，仅在北京地区其平台上的注册司机数就多达110万。

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人都能亲身体会到“打车难，打车贵”现象。根据目前全国最主要的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数据显示，今年6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早晚高峰打车难度同比分别增长了12.4%、17.7%、13.2%、22.5%。

就在这种市场环境下，主流的网约车平台要么试图招罗更多符合要求的车主和车辆加入，比如滴

滴出行，要么通过一定的资金投入更多的自营车辆，比如首汽约车。而叮叮约车却准备走一条与别人都不太相同的“另类路线”。作为从事汽车经销等相关服务的全国500强企业庞大集团的子公司，叮叮约车虽然在网约车领域还是一个“晚辈”，但他们却想用一种新思路打开局面。采用市价在270万元左右的巴博斯50S-SL车型，单次出行1200元的费用，“VIP出行管理师”的噱头……这个由叮叮约车即将推出的“叮叮超级车”项目选择在竞争激烈的网约车领域“不走寻常路”。

选择叮叮超级车项目，“更多的是出于布局高端市场，走差异化经营路线的一种考虑”，叮叮约车总经理龚立对本刊说道。在龚立看来，这种差异化出行的需求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已经体现出来。“我们拿纽约来举例，它的用车服务有两种，一种是Limo（即limousines，豪华轿车，在纽约是较为常见的电召车服务，车型多为林肯加长型、克莱斯勒等高级品牌），Limo就是它的豪华车服务；另一种就是普通的出租车服务。”龚立觉得，目前国内还没有可以填补Limo这部分市场的服务，“所以我们超级车正好可以填补”。

现阶段，国内的专车、快车与出租车市场的价格差异并不明显。仅以记者在北京的实际体验来看，在滴滴出行、神州专车、易到等主流网约车平台上，即使你选择最昂贵的奥迪A6或宝马5系等“豪华轿车”类别，从市中心的王府井到首都国际机场的价格也不会超过300元，而普通快车的价格也需要100元左右。显然，叮叮超级车1200元的单次定价相当不菲。

但龚立认为，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至少有两类用户需要这样的高端出行服务。

第一，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商业中心，每天都有大量的接待活动、商务活动、外事活动，但这种商务上的需求还没有公司能够提供统一的解决办法。

第二，在这些一线城市中有大量的高收入人群，他们也许都有自己的私家车，但偶尔在出行或游玩时使用叮叮超级车服务，“换一种角度去体验一下，

这完全有可能”。

从这两类潜在用户群体出发，叮叮超级车将服务分为C端普通个人用户与B端企业用户两部分。普通个人用户自不必说，龚立认为对企业市场的挖掘才是他们更核心的目标。“其实满足企业的商务用车还没有得到大家特别的关注，包括我们的同行们，虽然有跟企业去签合同，但还是属于正常的用车范畴，并没有去深度挖掘。”在他们看来，像航空公司、银行、酒店、高尔夫会馆等类型的企业都有相对高端的用车需求。“他们可能需要那种大一点的、好一点的商务车，可以在里面办公的那种，但是我们现在的同行们还没有，而我们都会一步步推出。”目前，他们正在和一些有这方面需求的公司进行沟通。

此外，更特别的地方发生在与一些特定城市的合作上。舟山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看上去和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大城市没有太多共同点的海岛小城也成为叮叮超级车的一个潜在合作伙伴。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舟山是一个旅游城市，它的人流量非常大；第二，它又是一个工业城市，它有大量的油料企业以及波音737的完工和交付中心，所以有大量的商务需求。而拥有这种特点的二、三线城市将会是叮叮超级车项目在北上广深之外的下沉目标。

作为庞大集团的子公司，因为本身就从事汽车销售等相关业务，所以背靠这棵大树的叮叮约车在出行服务方面有先天的优势，比如他们所有的用车都来自内部，可以将成本控制到最低。但即使如此，这个“超级车”服务的前期投入也足够惊人。

根据龚立对本刊透露的数据，他们初步计划在北上广深这四座城市各投放100辆“高级品牌”的车型，除了中国区目前仅有的24辆巴博斯50S-SL之外，还将会投放劳斯莱斯和宾利等品牌的车型。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龚立表示至少都是“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车型”。而初期这400辆车的投资就已经达到了3亿元人民币。如此高的投入不禁让人对其能否收回成本表示怀疑。

“投入产出比我们算过，它还是符合商业逻辑

的。当然我们会补贴一些，但是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龚立如此说道。相比依靠这项服务获得营收上的增长，这种高端服务的更大意义在于对品牌价值的提升。“我们与其花几千万或几亿去打广告，不如把这个成本直接给我们的客户，而这也是一个活的在路上跑的广告。”

熊猫资本合伙人毛圣博曾经对新形势下的“消费升级”做了自己的解读和定义：消费升级表面上是在买更好的东西，而深层次的是满足人的心理问题。龚立对这个观点特别赞同，他觉得具体到出行领域，消费升级带来的机遇主要体现在“人们对自己时间的把控和服务体验的优化”上。“同样是从A点到B点，以前用户想得更多的是抵达目的地，用户现在想的是同样的时间里能不能做更多事、体验更多美好。”龚立说。

四五十元的矿泉水、几千元的高级雨伞、专门定制的纸巾盒……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豪华配置是否符合你对“消费升级”的定义，但它至少在硬件服务上打上了“高端”的标签；对专门招聘来的40~50岁的长驾龄司机进行专业的礼仪与心理培训，并打上“VIP高级出行师”的名号，也许与普通专车司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或许能在口碑和服务品质上得到用户不一样的评价。

根据龚立的说法，叮叮超级车的服务将会于9月率先在北京地区开始试运行，第一期将会投入10辆巴博斯50S-SL型轿车，初期的路线也仅限于北京市区往返首都机场的接送机服务。如果你对这样的豪华出行服务有兴趣，届时可以尝试看看是否符合你对“出行领域消费升级”的想象。■

“我们与其花几千万或几亿去打广告，不如把这个成本直接给我们的客户，而这也是一个活的在路上跑的广告。”

宝马提速本土化

主笔 / 李三



华晨宝马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魏岚德

今年上半年华晨宝马已经在业界搞了好几件大事情，包括新大东工厂正式开业，全新一代BMW 5上市，以及华晨宝马新研发中心正式运营等。这一系列快马加鞭的动作，显示出宝马在中国推进本土化进程正在加速深化。

自去年10月接任华晨宝马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短短几个月，魏岚德深刻感受到了“中国速度”，并为之振奋，他说：“中国速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快，我们要接受变革，并在变革中寻找机遇。”

三联生活周刊：豪华车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奔驰的势头非常强劲，奥迪现在也有回升势头，你认为今年年底时三大品牌竞争格局会是怎样的？宝马如何确保在豪华车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魏岚德：我没那么在意年底时销量的排名，对我们来说那个排名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看得更远，追求长期可持续的成功。可以预见的是，豪华车市场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而我们会将竞争变成更大动力，争取比对手做得更好。这才是一种良性竞争。

就上半年的情况看，我们的5系正处于换代阶段。上一代5系4月份已经停产，新一代5系才刚上市，这难免对短期销量有影响。我们对全新5系Li充满信心，会竭尽所能去推动它发展。相比销量而言，我们更注重的是可持续性的发展与长期稳定的增长。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在2017年和2018年保持可观的增长。

三联生活周刊：宝马在过去几个月里大动作频出，其在市场竞争中的深意有哪些？

魏岚德：我们认为，如果想在中国社会长期发展，就必须让品牌和中国一些重大的议题联系起来，比如现在中国对环保空前重视，我们就要用产品和

生产来回应社会发展和需求。此外，我们也要参与到中国汽车工业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当中，参与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当中，从我们的产品特性、品牌价值以及当地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来找到共通点，作为我们制定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

华晨宝马从来不采取“Me too”的做法。比如，有人会说我们的车“也”很运动、“也”很舒适、“也”很有驾驶乐趣，但我们不会这样。我们都是独创的，有自己的创新精神和自己的坚持，如果是人云亦云地跟随策略，将不可能获得长久的、持续的成功。

我们一直在不断激励自己挑战极限，要求工程师解决看似矛盾的一些议题。举两个例子：一个是BMW高效动力战略，在过去高动力性和低油耗是不可兼得的两个目标，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车越来越动感，油耗越来越低；另外一个例子是全新一代BMW 5系是智能轻量化设计的典范，在过去轻量化就意味着车身坚固程度和刚性会降低，现在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车型最大减重可以达到130公斤，但刚性同样得到了提高，为此它运用了很多创新的方法，比如采用大量的热成型钢、高强度钢、热成型铝、铝合金等，多种材料智能混合应用。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在新能源和智能化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魏岚德：我们很少过早去谈未来的概念车、未来的安排。如果我们要谈一个新产品，比如说全新BMW 5系插电式混合动力，那么这款车就已经开始

排产，很快就会上市了；我们在沈阳的高压动力电池生产线今年就会投入使用，而别人可能还需要两年的准备时间。

不只生产新能源车型，我们在整个新能源汽车生产体系、产业链体系的布局和建设方面也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包括从电池的生产到回收等。不只是新能源，在自动驾驶、互联科技等方面，我们也付诸行动，很多技术全新 BMW 5 系 Li 已经能够实现，增强型驾驶辅助系统，包括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主动车道跟踪系统等都是自动驾驶相关的技术，只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宣传会比较谨慎。汽车行业的技术日新月异，越晚上市的车型所配备的 IT 技术就可能越先进一些，相信我们的 7 系中期改款时会配备更先进的技术。

三联生活周刊：华晨宝马研发中心二期已经正式运营，新研发中心可以将华晨宝马在中国的研发水平提升到什么样的水平？

魏岚德：对于我们来讲，与竞品的较大区别在于，我们除了进行国产产品的开发性工作，还会进行很多研究性的工作，而且我们从开始就有一个清晰的研发聚焦点，那就是新能源汽车，比如华晨宝马新的研发中心有很多实验室和测试设备，可以对高压电池驱动系统和整个动力驱动系统进行完整测试。

得益于研发中心一期，华晨宝马之诺品牌的大部分工程开发工作都是在国内进行的。随着研发中心二期的落成，我们将进行更多除了技术开发之外的研究性工作。现在，新研发中心各种测试台和实验室设备非常齐全，有一个非常大的研发中心车间，这里就可以生产原型车。我们将来也会不断去提升和扩大宝马在中国研发中心的能力和范围，理念就是研发一定要贴近市场需求，让华晨宝马研发中心和德国的研发中心形成一个互通的研发体系，把更多的研发工作从德国转移到中国来进行，促进我们在中国研发能力的整体提升。

我们知道，工程设计和研发是中国汽车工业急需迎头赶上的重要领域。值得借鉴的是，现代汽车工业的研发并不需要任何事情都由汽车厂商自己来做，比如说，底盘、制动系统、悬挂、车身都可以

交由不同的技术公司去做。厂家的研发主要体现于集成创新的能力，怎么样把现有好的设计和技术集成在一起，让它成为最优秀的汽车是每个厂家需要思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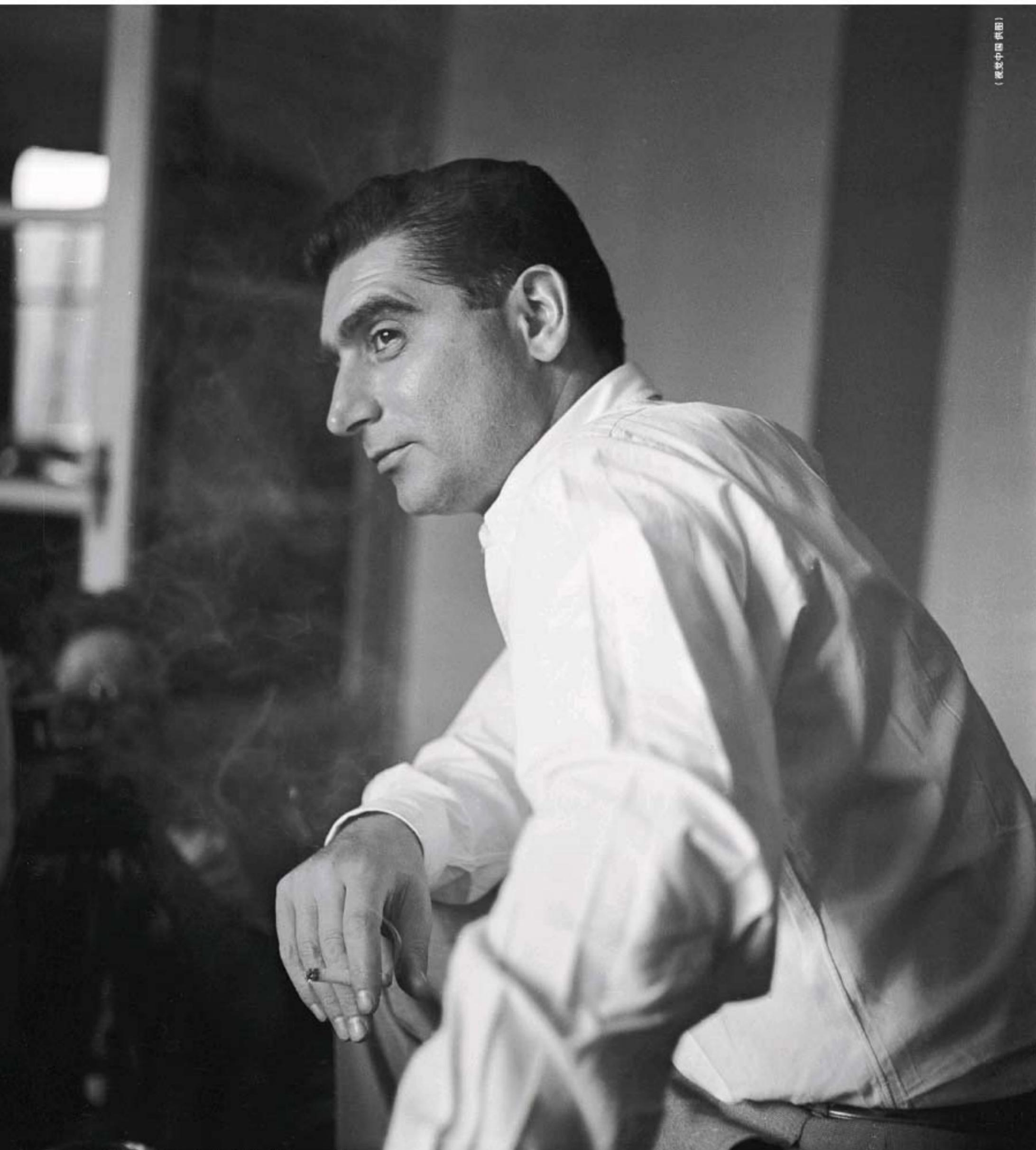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数字化是现在行业里的一个热词，你如何解读？

魏岚德：很多公司都在谈数字化，有的认为车里装载一些车联网的技术就是数字化，有些在谈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可以说几乎所有主流汽车厂商都在讨论这类话题。对宝马而言，我们对数字化的理解不止于此，我们认为数字化进程中一个重大的议题是生产领域，在生产过程以及在整个供应商体系中推进数字化，都是数字化的一部分，会对所有事情和流程都产生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奔驰刚刚宣布在北奔生产电池，以现有奔驰公布的情况来看，宝马和奔驰的做法有什么不同？

魏岚德：大众集团、戴姆勒集团和宝马集团早就对电芯的基本规格达成了协议，行业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行业标准，否则每个厂家有自己的标准，将来消费者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但在这个基础上，每个厂家对于电池设计的要求还是有所不同的，比如说对充电次数的要求、充电性能的要求等，因为电池组是由多块电池组成一个模块，整个电池组的设计尺寸大小、管理系统、冷却系统、整个形状都要适合不同车型，这个也存在差异。总体来讲，没有哪个汽车厂家会自己生产电芯，都要和供应商合作。

我们不仅引进新产品、建立新工厂，也在不断推进新能源生态体系的发展。一个产业的发展需要把创新科技转移到整个供应链体系中，才能把产业链建立起来。我们一直很自豪能够在最初的时候帮助宁德时代成为当今汽车高压动力电池首屈一指的供应商。在与宁德时代合作的同时，我们还和电池回收企业邦普集团建立了合作关系，在最初就考虑到将来电池回收方面的问题。我们相信中国的电动出行事业需要从全局来考虑，这是我们对中国电动出行产业发展的一种理解。■



(视觉中国 供图)

匈牙利裔美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 (1947年摄于巴黎)



(美方IC供图)

1944年6月6日，卡帕跟随第一批美军登陆诺曼底奥马哈海滩，并拍下了这张照片。
18岁的士兵爱德华·雷根趴在沙滩上

罗伯特·卡帕 定义战地纪实摄影

记者 / 张星云

玛格南图片社成立70周年之际，深圳大学美术馆近日举办了“聚焦与失焦——罗伯特·卡帕影像回顾展”。那些历史瞬间与卡帕的关系永远是双向的。正是因为卡帕的勇气和决心，战地摄影成为一项令人尊敬的艺术形式。

罗伯特·卡帕 (Robert Capa)，这位“世界最伟大战地摄影师”和玛格南图片社 (Magnum Photos) 的创始人之一，终于迎来了在中国的首次回顾作品展，弥补了所有摄影迷们的缺憾。

展览中，近百幅经典作品按时间段划分，包括他职业生涯第一张发表作品《演讲中的托洛茨基》、西班牙内战中《倒下的士兵》、失焦的《诺曼底登陆》，以及拍摄中国抗战的《少年士兵》等所有经典原作尽皆展出，此外还有纪录片、采访音频和《生活》杂志原本。

从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

战北非和西欧战场，到第一次阿以战争和越南反对法国殖民的印度支那战争，卡帕作为战地摄影师所经历的五大战场全都展现给观众。深圳大乾艺术机构联合玛格南图片社，将这些原版照片带到了中国。他所拍摄的士兵、难民，抑或尸体、废墟，均是黑白影像，庄严肃穆，尽显苦难与哀伤。展览中展示了他迄今依旧无人超越的战争摄影作品，也展示了他生命最后一刻拍下的影像。

1954年，卡帕再次接受美国《生活》杂志的提议，代替一位中途休假的摄影师前往拍摄越南抗法战争。在越南，一次与纵队的日常推进过程中，由于没有

拍到想要的照片，卡帕决定离开几位同伴摄影记者，跳下吉普车，跟随一个小队进入稻田。他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一众士兵在稻田中行军的场景。几分钟后，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吉普车上的同伴骂道：“他妈的，又让这小子拍到好照片了！”结果是卡帕踩到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因此丧命。

这名历史上最有名的战地摄影师形象，永远被定格在了他40岁的模样。

那时的他，曾通过《生活》杂志和美国战时“图片共享联合体”，成为“二战”最有名的摄影师。“二战”结束后，他拒绝了拍摄朝鲜战争的邀请，在纽约与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等人一同创办马格南图片社，并担任总编。尽管卡帕与其他创始人的纪实摄影风格不尽相同，但却从此为马格南定调。

从诞生至今，马格南图片社已经70年了。卡帕被视为战地纪实摄影的经典，而马格南则在不断定义着纪实摄影的风向。1954年去世的卡帕，没有经历纪实摄影的弱势和艺术摄影的崛起，也不知道他赖以生存的《生活》杂志会在20世纪70年代停刊。

如今，激烈的世界大战早已远我们而去。马格南赖以生存战争和地区冲突，在现而今不断消逝。环绕在卡帕回顾展的经典作品中，不禁让人思考：如果卡帕活到了80岁，面对这些年世界和摄影的变化和转向，他会对马格南的风格和发展、对纪实摄影历史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玛格南全球展览总监安德里亚·侯泽尔（Andrea Holzherr）如今负责很多马格南摄影师作品的编辑工作，他对本刊表示：“卡帕如果晚几十年去世，除了摄影作品数量以外，他留给马格南的精神也许是一样的。因为卡帕是个思想开放的人，他曾经邀请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摄影师加入马格南，比如布列松、沃纳·比肖夫（Werner Bischof）和赫伯特·李斯特（Herbert List），这些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地新闻摄影师，这些人也同样共同孕育了马格南如今的精神。”马格南前任主席斯图尔特·富兰克林（Stuart Franklin）则对本刊称，如果卡帕没有那么早去世，他很可能会选择走其他道路。“他会去拍纪录片或者虚构电影，我觉得他不会折磨自己，使自己适应摄影产业。他可能会像雷蒙·德帕东（Raymond Depardon）拍摄《法国日记》（*Journal de France*）那样转型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

围绕纪实摄影中失焦与聚焦，真实与模拟探讨

的辩证关系，卡帕留给摄影艺术一笔财富。

勇气、颤抖与失焦

卡帕的成功，源于他的运气和勇气。他那句名言成了他身后所有战地摄影师的警句：“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离炮火不够近。”

他一生中最著名的作品，便是诺曼底登陆时拍下的影像。1944年6月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当天，他是唯一一名与第一批军人一同登上奥马哈海滩，并活着回来的摄影师。

如今回望，很多人对诺曼底登陆的视觉记忆，或者日后电影重新模拟诺曼底登陆时的一切视觉根据，源头也许都是卡帕的那组照片。那组照片不仅成为历史依据，也让卡帕成为珍贵的历史见证者。

尽管此前卡帕已经通过拍摄西班牙内战开始成名，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他先后参加了盟军在北非和意大利南部的战役。在结束意大利的战役之后，卡帕返回伦敦，与其他记者和士兵一同等待着“下一场重大战役”的到来。在数百名盟军战地记者中，只有几十名被选中随首批进攻部队上前线，其中只有4名摄影记者，卡帕便是其中之一。

漫长的等待之后，5月28日凌晨，盟军公关处的士兵把他从酒店中唤醒，被要求不得与任何人交谈，带上简单的行李上路。他去了英国韦茅斯港，登上了美国军舰“蔡斯号”，除了卡帕以外，还有总共300万盟军士兵一同前往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6月6日凌晨，在离海滩几英里的地方，他与士兵们一同登上登陆艇。待登陆艇进入德军火炮射程后，士兵们开始呕吐，卡帕在一片呕吐物和海水中蹲下身子，从防水油布里摸出一台德国康太时相机。此时天边已经有足够的光线让他拍照了，登陆艇触地，艇前挡板被放下，卡帕看到露出水面的钢铁障碍物和德国人机枪的扫射，以及盟军士兵们在及腰的海水中吃力前进。他举起相机，拍下了历史上这场进攻第一张真正的照片。

在后来的自传中，卡帕清晰地记载了登陆之初几个小时的紧张。海水很凉，奥马哈海滩依然在100多码之外，子弹打得卡帕周围的海水开花。他急忙向最近的一处钢铁障碍物行进，并与一名士兵共同分享了一会儿它的掩护。卡帕的镜头中，灰蒙蒙的水面和灰蒙蒙的天空中间，小小的盟军士兵们躲在障碍物下。



(视觉中国供图)

1940年，卡帕（右）与作家海明威（右三）在美国爱达荷州的一家酒吧里交谈。两人在西班牙内战时相识，后来又相遇于“二战”欧洲战场，卡帕认海明威为“老爸”，据说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里有卡帕的影子

等他拍完了照片，海水已在他裤腿里冰凉。每次他想从障碍物旁走开，德军的子弹便会把他赶回来。他从浮尸之间又到了一辆半烧毁的水陆两栖坦克旁，停下来又拍了几张照片，最后鼓足勇气，一跃到岸上。

海滩的斜坡给了卡帕一些保护，他和士兵们都平趴着躲避机枪和来复枪子弹，但潮水把他们推向子弹飞来的方向。卡帕拿出第二台相机，头也不抬地开始拍照。他的照片前景全是靴子和发青的脸，在靴子和脸的上方，画面全是榴霰弹的烟，烧毁的坦克和下沉的登陆艇构成了照片的背景。

德军的迫击炮随即到来，落点极近，卡帕不敢将目光从他的相机取景器上移开，发疯似地拍摄，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半分钟后，他的相机卡住了，胶卷用完了，他从包里取了一卷新胶卷，但他湿漉漉颤抖的双手马上将它弄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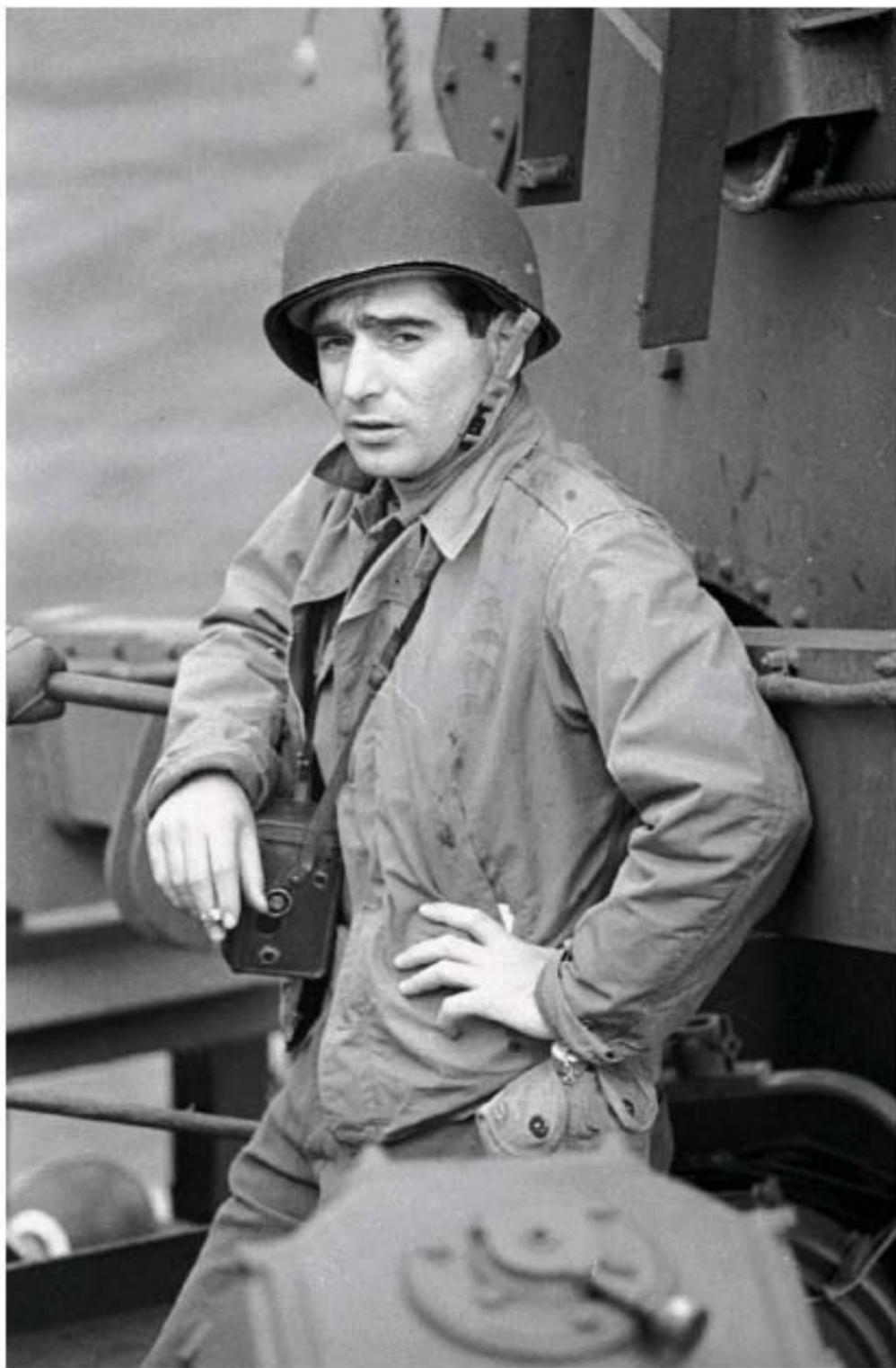
空空的相机在他的手中颤抖着，一种新的恐惧使他从头到脚浑身哆嗦。他周围的人都一动不动地躺着，只有死者在水线上随浪翻滚。一艘登陆艇在

他身后靠近，他什么都没想，只是站起来，向登陆艇奔跑，直到海水淹到了他的脖子。他将相机举过头顶，突然意识到，他这是在逃跑，他试着回去，但他无法面对海滩，他对自己说：“我只是想到艇上去弄干我的手。”

他爬上艇，烘干双手，给两台相机换上新胶片，此时小艇开始倾斜，缓缓驶离海滩。他在甲板上给硝烟笼罩的海滩拍了最后一张照片，又给甲板上的伤员拍了几张。登陆艇将他带回了6小时前他离开的那艘“蔡斯号”美国军舰，他因劳累而倒下。

再醒来时，军舰返回了英国韦茅斯港。卡帕从等在码头上的记者们那里知道，另一位被派往奥马哈海滩的战地摄影师两小时前就回来了，根本没有下船，更没有碰过海滩。卡帕成了唯一一名与第一批军人一同登上奥马哈海滩的摄影记者。他随即被邀请坐飞机前往伦敦，在新闻广播中讲述自己的经历。但卡帕谢绝了，他把拍摄的底片寄出，换了身衣服，乘坐第一艘船重回诺曼底，继续拍摄。

7天后，卡帕获悉，信使千里迢迢把他的底片



(新华社中国供图)

左图：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当天的卡帕，军装、头盔，右挎相机，左挎行军酒壶，这是他的标准装备

右图：诺曼底登陆后，天主教神父在奥马哈海滩上为盟军士兵做弥撒



送到伦敦，暗房的技工急着追赶截稿时间，忙乱中使出昏着，调高了烘干箱的温度，导致胶卷上的感光乳液溶化了，总共106张照片，只有8张抢救了下来，画面因为受热而变得模糊。

6月19日，卡帕的照片出现在《生活》杂志，总共7版，配上标题《诺曼底滩头，海陆空联合打响欧洲命运之战》，并注有文字：“题图和以下6版的图片是《生活》杂志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拍摄的。

他跟随第一批盟军登陆。尽管他的相片内容跟第一批登陆报道有些出入，但是他的图片展现了当时战斗的激烈程度，以及德军顽固的防守。”

在那张最著名的照片下面，怕担责任的杂志编辑配上的文字说明是：“水中匍匐行进，一位美国士兵缓慢移动到岸边。沉浸在兴奋和激动之中，摄影师卡帕移动着他的相机，颤抖的双手模糊了他的照片。”

卡帕用一组照片定格了自己职业生涯最高光的



时刻，而置身战场中的卡帕当时并不知道这组照片更深远的意义：照片上的人，第116步兵师K连18岁的士兵的爱德华·雷根，与照片一同永远地成为奥马哈登陆最初几分钟里的史实。

对雷根来说，那张照片标志着“重要的成年仪式……是从少年走向成人的过渡”。在美国，雷根的母亲从《生活》杂志剪下他的照片，一脸泪水。1945年雷根回到弗吉尼亚，她拿出那张剪下来的照

片。“你看，这是你吧？”她问。“是啊，是我，”他回答说，“我为此自豪。”

看得出，卡帕很得意这张照片，也原谅了《生活》杂志员工暗房冲洗时的失误，后来甚至将其充作自传的封面，书名索性就叫《失焦》。

正是卡帕和那个时期的一众摄影师，让战地摄影成为“高贵的战地摄影艺术”。

1944年8月，随盟军解放巴黎后，卡帕就曾发

出感慨：“永远不会再有一张照片像北非沙漠或者意大利群山中步兵的照片那样，永远不会再有一次攻势超越诺曼底海滩之战，永远不会再有一次解放能与巴黎的解放相提并论……从现在起，我拍的照片不会再有新花样了。每一个匍匐的士兵、每一辆滚动向前的坦克、每一处狂热地挥动着手的人群，都将只是我以前在某处拍过的某张照片的弟弟。”

捕获英雄式的死亡

如果说卡帕最著名的照片是诺曼底登陆系列，那他西班牙内战中的拍摄的照片《倒下的士兵》，可以说自此定义了战地摄影师这一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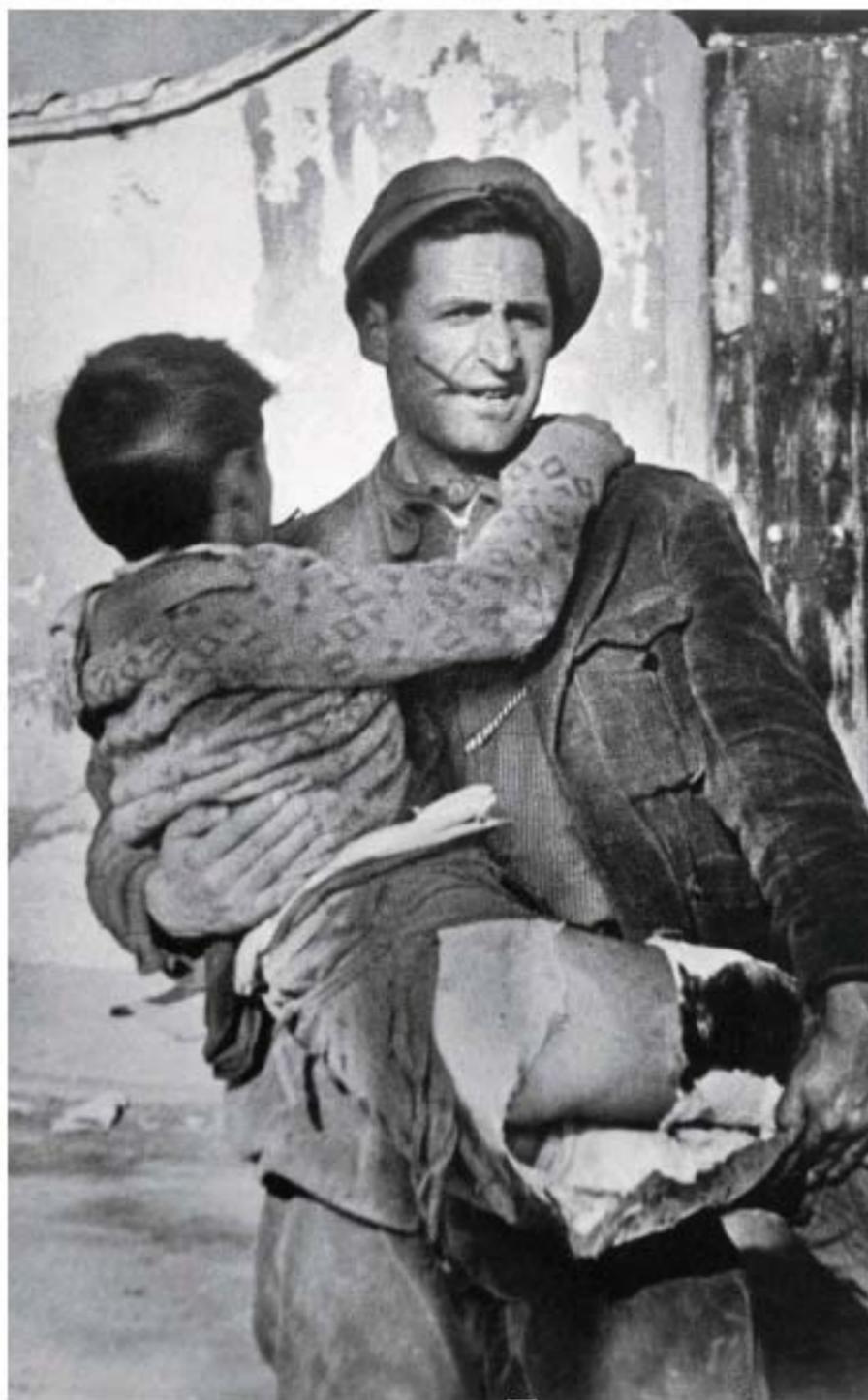
1936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初期，在安达卢西亚，西班牙第二共和国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率领的民族主义军队正在战斗。广袤的天际之下，一名西班牙共和军民兵双腿紧绷，胸口对着狂风，步枪拿在手上，顺着山坡往下跑。突然之间，士兵的飞奔中断了，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图像定格，战士身体倾倒，原本紧攥在手的步枪已然松开，他似乎要跌破画面，瞬间丧命的身体在下一秒就会与草地上浓黑的影子会合。1937年7月的《生活》杂志第19页刊登了这幅照片，照片下方一行粗黑标题：《死亡在西班牙：这场内战在一年之内带走了五十万条生命》。

在历史上，战争的残酷头一次通过摄影被极致地展现出来。照片的意图相当明显，它毫不迟疑地捕捉到了惨剧发生的瞬间。它是如此震撼人心、残酷无情，迅速成为战争的标志之一。

“在西班牙拍照不必要花招。你不用摆布你的相机，摆布被摄者。照片就在那儿，你拍就是了。真相就是最好的照片，最好的宣传材料。”1937年9月2日，卡帕接受《纽约世界电讯》采访时这样说道。

作品发表即引起轰动，成为战争摄影的不朽之作。但也有不同声音，有人批评拍摄品质相当差，有人质疑照片真伪，说这名战士根本没有死，而是战场后方演习的摆拍，也有人说拍摄者不是他，而是他德籍摄影师女友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

虽然后来争议不断，但至少在当时，这张照片被视作事实的雄辩展现。它独特诠释了人类、人性与战争。20世纪人像摄影和时尚摄影之父爱德华·史泰钦（Edward Steichen）将卡帕的摄影比作戈雅的绘画《战争的灾难》，宣泄出人类的感情，记录战



1



3

(东方IC供图)



(东方IC供图)

2

(国际摄影中心/玛格南图片社授权 大苑艺术供图)



(视觉中国 供图)

- 1. 1937年12月，西班牙内战期间，卡帕随西班牙共和军艰难攻入特鲁埃尔后，发现很多受伤的平民
- 2. 1936年11月，在马德里周边休整的西班牙共和军士兵
- 3. 1936年9月，西班牙科尔多瓦前线，一名共和军战士中弹瞬间
- 4. 1936年，在巴黎咖啡馆的卡帕和女友塔罗

4

争的恐怖。而中国摄影评论家顾铮认为，相比绘画，卡帕给出的视觉与意识的刺激，是基于“人们对于摄影的真实描绘能力的基本接受”，因此“也许更经久地潜伏于意识深层，更易于在某些场合被迅速翻检出来和某些历史场面与事件加以对比，召唤某种历史意识”。英国学者卡洛琳·布拉斯特则表示：“这张照片的名声指明了一种集体想象，它所展现的是，战争中的死亡是有英雄气质的，是悲剧性的，在这其中个人是很重要的，他的死亡是值得人们关注的。”

面对真实性受到的质疑，卡帕本人生前唯一一次公开评论《倒下的士兵》拍摄过程则是在1947年接受WNBC电台节目采访时，那时他正在为自己的回忆录《失焦》宣传，并在节目中主动讲述了1936年在西班牙的那次经历。

他把这张照片的成名，归功于杂志编辑和大众传播。“这张获奖照片，诞生于编辑们的想象力和看到这些出版物的公众心中。”卡帕回忆说，在安达卢西亚，他与20名新招募来的共和军士兵在同一个战壕里，在朝外的一个山坡上，叛军的机关枪就架在远处。每5分钟，共和军士兵们便爬出战壕向外冲锋。机关枪响起，剩下的人爬回战壕，再朝着机关枪的方向一通乱射。然后他们再次冲锋，“他们像割草一样割倒一批”。这样重复了三四次，卡帕在共和军第四次冲锋的时候将相机举过头顶，甚至没有朝外看，便按下了快门。拍摄完那张照片，卡帕在西班牙又待了三个月，再回到法国时他发现，“因为我举过头顶的相机正好捕捉到了士兵中弹的那一刻，所以我已经成为一位著名摄影师”。

西班牙内战是22岁的卡帕经历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而这场战争也让卡帕从此成为职业战地摄影师。

佛朗哥暴动刚刚开始，卡帕便与在巴黎相识的女友塔罗决定前往西班牙，他们联系了各家杂志社的编辑，最终获得了战地摄影师的工作。他们在安达卢西亚海岸拍摄难民迁徙时遇到了白求恩，在马德里拍摄共和军抵抗时认识了海明威。与卡帕一同出没于硝烟弥漫战场的女友塔罗此时已经成长为一名摄影师，不再只是辅助卡帕拍摄，她拒绝了卡帕的求婚，开始在枪林弹雨中独立拍摄。1937年7月25日，就在塔罗计划回巴黎的前一天，她在前线被共和军一方的坦克剐蹭，身受重伤，在送往医院后身亡。

这位卡帕的伴侣，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被众人忽视，直至2007年“墨西哥旅行箱”的发现，塔罗在



战地摄影方面的艺术成就才再次浮出水面。三个纸箱中的大量胶片，分别是卡帕、塔罗和他们的朋友大卫·西蒙（David Seymour）的摄影作品。这三箱胶片是卡帕1939年离开巴黎赴纽约时匆忙交给匈牙利犹太摄影家伊姆雷·威兹保管的，此人后来在马赛被捕，胶片又落入墨西哥外交官手中，并随外交官辗转回到墨西哥。2007年，卡帕的弟弟康奈尔·卡帕发现了这批胶片，并因此设立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

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中，战地摄影能在当时开始盛行，也有赖于上世纪3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特殊时期。当时的欧洲刚刚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回归和平的人们开始寻找精神出口，他们渴望物质享受，同时对文化艺术层面的追求同样高涨，也正是在那一时期产生了众多艺术大师和杰出作品。而摄影技术的进步和大众传播的形成则让新闻现场图片在那一时期成为市民所爱，新闻从此开始了由“读”到“看”的转化，20世纪视觉文化随之到来。

在一切背景铺垫之后，西班牙内战被视为现代



(国际摄影中心 / 玛格南图片社授权 大乾艺术供图)



(国际摄影中心 / 玛格南图片社授权 大乾艺术供图)

左图：1938年3月，卡帕在中国汉口拍摄的玩雪的孩子

右图：1938年3月，汉口的国民党少年士兵

史上第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而卡帕之所以能在一众战地摄影师中名垂青史，则因为他们不仅仅将镜头对准战火、武器和死亡，更关注战场中幸存下来的人和战争中的人性。

死亡之外的战争

塔罗去世后，卡帕失去了战场上和精神上的伴侣，他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喝很多酒，吃得很少。在布列松眼里，塔罗的死使蒙在卡帕额头上的帘子掀开了，曾经躲藏在帘子后面的那个人世俗、充满机会主义，还有厌世情绪。卡帕后来的一生一直在酗酒。

也正是此时，尽管西班牙内战还在继续，但地球另一面的另一场战争，使卡帕努力走出低谷。中国抗日战争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已然拉开。为了让好友卡帕分心，不再陷入持续不断的悲伤，1938年1月，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斯（Joris Ivens）邀请卡帕做助理摄影师，与摄制组一同去中国拍纪录片，卡帕负责拍摄同期静止画面。

卡帕曾与塔罗说好一起去中国采访。而此时机缘已到，他带上塔罗的照片，与伊文斯、奥登和伊修伍德同船前往中国，更是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2月底他们到达汉口，武汉那时刚刚成为全国战时军事中心，这部名为《四万万人民》（*The 400 Million*）的纪录片由此展开，记录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真实画面。本次展览中，《四万万人民》的纪录片视频便被摆在了卡帕的摄影作品旁，观众也可以直观对比纪录片视频和定格的摄影作品两种当时最流行的影像形式。

当时的伊文斯认为，共产党与蒋介石的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最终会打败日本侵略者。但摄制组到达汉口几天后，便受到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的严格干预，她将摄制组限制在汉口范围内，并派去了间谍全程跟踪。伊文斯在回忆录《我与摄像机》中回忆称，他希望拍摄到毛泽东武装力量的情况，但“蒋夫人”不允许。

这段严格的新闻审查经历，在卡帕的作品中同样展现出来。在那一时期的《生活》周刊中，卡帕

拍摄的蒋介石照片，被配上了更露骨的文字。“中国这位年届五十的总司令有着不可思议的职业生涯，他是世界上受人攻击最多的人之一，而他迷人的妻子则是中国抵抗日本的主心骨。”卡帕见过很多次宋美龄，他后来对一位朋友说，有一次，为了保持清醒，他不得不将她递过来的鸡尾酒偷偷倒进盆景里。

卡帕和伊文斯被国民党军队处处设限，他们被要求不能离战场太近，也不准拍摄火炮等武器，卡帕很快学会了他的第一句中国话：“Bu yao kan”——不要看。

他们到达了苏州，但在台儿庄大捷当晚却不能进入战场进行拍摄，第二天下午才被允许进入台儿庄城，只留下一片荒凉废墟。他们前往河南拍摄花园口决堤，卡帕的照片中，满身污泥的中国农民正拼命朝陆地爬行，而背景里他们的家园却被浑浊的泥浆围住了。

苦恼的卡帕对宋美龄的限制和大批监视间谍产生了深深的怨恨心理，他成了汉口“破酒吧”的常客，也与在这里同饮杜松子酒和廉价威士忌的其他西方记者成了朋友，包括美国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我们原来的看法似乎都消失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一切不再抱任何希望。”史沫特莱回忆道。

远离正面战场，卡帕无法拍摄到他最想寻找的死亡。但他继续工作，并在中国留下了500多张底片。《少年士兵》是卡帕以仰视的角度拍摄那名十几岁便全身戎装的男孩：他戴着钢盔，神情刚毅，眉头微蹙，目光炯炯。这几乎是一张面部特写，只露出了士兵的上半部胸膛，凸显了军装衣领紧扣着的风纪扣。领章上的两颗星显示，这是个一等兵。那一期《生活》杂志中国战场专题就以这个一等兵的肖像作为封面，遂成经典。

虽然卡帕最著名的，是他以极近距离拍摄的战地作品，但他在战地报道中的另外一面则是记录无辜平民的苦难，特别是战争中的儿童。在马德里、汉口和伦敦，当轰炸机的炸弹从天空落在居民区时，卡帕就在现场，但他却极少拍摄死亡或重伤的悲惨画面。相反，他把镜头聚焦于战争的幸存者如何继续生活下去，即便惨痛的损失和打击让他们麻木。那年冬天，武汉下起了雪，卡帕同样用镜头拍摄下雪中嬉戏的孩子们，那是他少有的轻松一刻。

残酷战争对平民的残害和国民党政府严格的审查扑灭了卡帕中国之行的最后一丝热情。卡帕似乎

对此前的人生经历产生了一些怀疑。他自问，就这样继续当一名自由投稿摄影师，以此度过余生吗？在致友人的信中，他谈了未来的打算，应该组成一个由年轻摄影师构成的通讯社——这就是玛格南图片社最初的雏形。

创立马格南

1947年，4月中旬，一个中午，美国纽约现代艺术馆二层的餐厅，34岁的卡帕召集了一个饭局。参加饭局的有《生活》杂志摄影师威廉·范迪维特（William Vandivert）和妻子里塔，还有大卫·西蒙。卡帕认为应该防止像《生活》这样的杂志不断剥削独立摄影师，这些杂志不仅毁坏他的重要报道，还掩盖责任，把一切推到了摄影师本人头上。摄影师应该在报道内容上尽可能获得控制权，摄影师为照片匹配的说明文字不得让编辑修改。最后，最重要的是，摄影师一定要拿到照片的版权，因为这些照片在日后可能有很大价值，比如他拍摄到的盟军诺曼底登陆的照片。

卡帕在会上宣布，为争取调整与杂志的权利平衡，由摄影师本身开办的图片通讯社就此成立，它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独立摄影合作机构马格南图片社。创始人还包括乔治·罗杰（George Rodger）和布列松。大卫·西蒙负责欧洲报道，布列松负责印度和远东，罗杰负责非洲和中东，范迪维特负责美国，而卡帕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布列松曾说：“玛格南是思想的团体，是人类本质的共享，是对世界的好奇心，是对未来的崇拜，是转换成视觉的美好愿望。”

对卡帕来说，战地摄影师并不是一份光荣的职业，他愿意自己是一个“失业”的战地摄影师，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没有战争。但随着“二战”的结束，卡帕真的开始“失业”。远离战火带来的肾上腺素，卡帕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一度纵欲、赌博成性。作为马格南总编，他招募了大量优秀的摄影师，但却不善管理图片社的财政，他还因此与布列松吵过架。在去世前一年，卡帕将马格南总编的职位移交给了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正是后者当年作为《生活》图片编辑发布了卡帕诺曼底登陆的那组照片。

卡帕有着非常超前的远见。1953年9月，在卡帕参加的最后一次马格南股东会议上，他高谈未来的活动影像如何会取代静止画面，并表示，马格南的成员应该开始使用拍摄电影画面的摄影机了。法

国人马克·吕布 (Marc Riboud) 1953 年被卡帕招聘而来, 他记得当年秋天去过卡帕在伦敦酒店的房间。“卡帕要我去伦敦学英语, 并认识那里的姑娘。我去了, 但没有见到任何姑娘, 我太不好意思了。他告诉我, 摄影已经没戏了, 电视会取代一切。”

卡帕的预言很准确。如今, 战地摄影几乎成为“古董”, 尽管地区冲突仍然存在, 依然有战地摄影师葬身炮火, 但曾经大规模的世界大战不复存在, 媒体机构对战地摄影师的资金支持也不如当年那样雄厚。战地摄影师的地位早已大不如前, 就连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摄影方法论也被无数新摄影风格所挑战。人们心中最优秀的战地摄影作品, 几乎全都涵盖在了深圳大学美术馆卡帕回顾展的展厅内了。

现任玛格南执行董事大卫·科根 (David Kogan) 很清楚这样的处境, 在玛格南今年 70 周年时他表示:“布列松拍摄的甘地葬礼、卡帕拍摄的‘二战’吸引我, 是因为他们在照片中呈现的历史。当我们看到这些来自玛格南创始人的早期作品, 我们很难忽略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经历的那段黑暗时光以及他们镜头中所呈现出的那段岁月。”他表示玛格南这 70 年经历了金融危机和无数战争, 才有了这些杰出作品。

玛格南的摄影师们也在面对现实进而转型。

马格南前主席斯图尔特·富兰克林便从战地纪实摄影转向写意的艺术摄影, 还有克里斯多夫·安德森 (Christopher Anderson) 的“体验式纪实”、安托万·达加塔 (Antoine d'Agata) 的新“私摄影”、艾克·索斯 (Alec Soth) 的美国边缘文化影像、马特·斯图尔特 (Matt Stuart) 的浮世绘式伦敦街头摄影等等。另一位前主席马丁·帕尔 (Martin Parr) 则瞄准了向消费社会的转变, 将镜头指向了新模式中的荒诞与虚无, 开创了马格南新时代纪实摄影的一种新可能。

托马斯·德沃扎克 (Thomas Dworzak) 今年初当选为玛格南新一任主席。作为一位报道摄影师, 尽管他 20 岁出头就开始报道高加索地区的冲突, 拍摄局部的战役以及冲突背后难民和士兵的生存状态, 但如今的他早已远离传统纪实摄影风格, 以收藏他人相片的艺术手法处理他的个人项目。这些都与卡帕、布列松、约瑟夫·寇德卡 (Josef Koudelka) 等老一辈大师的马格南相距甚远。

卡帕, 随同他所代表的战地纪实摄影成为经典, 留在了上世纪, 而他开创的马格南, 却在不断寻找着自己新的目标和表达方式。■

(参考资料:《焦点不太准》, 罗伯特·卡帕著;《卡帕传》, 阿列克斯·凯尔肖著)

《读书》2017 年第九期目录

蒋原伦 虚构的空间
张振涛 追寻民间抄本无双谱
汪毅霖 创新的经济逻辑
郝延伟 “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

短长书

孙悟空形象中的大历史 (陈晓明)·斩头相谢与披沙拣金 (梁培恕)·《教育敎语》死灰复燃的历史地层 (周晓霞)

杨凤岗 多元时代的宗教和世俗主义
邢承吉 他们是发不出声音的人
张伟劫 拉丁美洲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孙红卫 不关风月: 爱尔兰人韩尔礼与中国花草
王炎 文明比较, 还是文化偏见?
李丹婕 后上官婉儿时代与冯道的历史世界

谢一峰 南宋史学的三重阴影
何江穗 方慧容 萧公权《中国乡村》台议

品书录

大自然的忧伤侦探 (刘文飞)·未完成的“断裂” (黄发有)·讲好书法故事 (司新丽)

孔元 重新发现博丹
高臻 你不可能是个例外
李庆西 汉温迷津 老谈三国
郑国庆 猫与人: 朱天心的动物书写与动物伦理学
孙歌 吃货与乡情

读书短札

定武木兰亭 北窗读记 (刘涛)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 100125 国内代号: 2-275



“互联网正在成为社群与文化的破壁者”

——专访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

记者 苗千

2017年8月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和世界人文大会基金会共同在比利时列日举办了首届世界人文大会,会议的主题为“全球转型过程中的挑战与责任”。



8月6日,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在比利时召开的首届“世界人文大会”上,面向来自全球的1800多名学者及政治、艺术界等人士发表了开场致辞,谈论技术如何与人文共享连接的力量

本刊在世界人文大会现场采访了在开幕式上致辞的腾讯集团副总裁程武,还有列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古埃及学家让·维纳德(Jean Winand)。这次会议本身似乎正是全球人文学科研究陷入低谷,人文精神逐渐被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所疏远的一个标志。在网络时代,人们看待人文学科的价值,对待人文精神的态度,乃至理解 and 分享文化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急剧的改变。这场改变最终将把人类引向何方?至今仍没有答案。

三联生活周刊:互联网正成为一种全新的世界语言,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如何在适应全世界互联网发展潮流的同时保持其自身的中国文化特色?

程武:我想主要需要把握两点:一是顺应时代潮流,耐心地打造产品;二是坚持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五年前移动互联网刚刚出现,我们发现人们对娱乐的需求因为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可以非常便利地融合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发现关键在于IP(Intellectual Properties)。

我们把握了这种趋势,提出泛娱乐战略,现在这种多领域共生,以打造明星IP的模式已成为整个“互联网+文创产业”的一个基础。过去传统的做法,在不同的板块之间用户的体验是割裂的,因为都体现在了不同的介质里,它也是单向的,用户只能被动接受。现在我们提出的泛娱乐概念基于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包括智能设备,在手机里内容与内容的转换非常容易,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也在加快,因为用户的兴趣转换得很快。

IP的产生有两大源头,一个是文学,一个是动漫。在这两大源头里,IP的生命力只能在用户那里得到验证。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发言中也提到,用户同时也是内容的重要创造者,互联网公司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平台的角色,那么如何让内容的创造者能够享受到经济收益?

程武:腾讯几年前就提出了开放战略,现在马化腾讲我们要做互联网时代的基础设施提供商,给

大家供应零部件。以前创作是一小部分人和精英团队的事情，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作品为大众所接受的门槛也是相当高的，而且是单向的。但是在互联网的创意时代和众创时代，随着工具的进步和平台的出现，每个人都可以创作。而平台帮助这些创意者直接与消费者对接，直接与专业的生产机构对接，而且相互之间可以及时地不断沟通反馈。

这是一个众创时代，我们要确保内容的创造者能够获得足够的回报。过去在传统的出版业作者只能拿到6%到15%的版税，而且书籍到底发行了多少，信息完全由出版社控制。现在网络文学作家在互联网平台上跟我们签约，所获得的版税一般都在50%以上，这还不包括我们帮他变成影视、游戏的版税。仅以网络文学为例，我们的平台去年一年里产生了100个年薪超过百万元的作家，这在传统情况下是没法想象的。网络文学量比较多，创作时间也比较短，有的地方当然会比较粗糙，但也有各种有想象力的优秀作品产生。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除了互联网之外，在现代社会，还有其他哪些渠道可以作为人文和科技的连接者？互联网自身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程武：人是一切的核心。科技和人文，一个向外关注未来的发展，一个向内关注每个人的内心。所以我们提出了以互联网为基础，从科技和文化两个维度努力去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连接，以及与连接相伴随的信息的传递。1999年，万维网创始人蒂姆·伯纳斯·李爵士曾经这样描述他想象中的互联网：“这将是一个全球化的信息空间，万事万物互联……所有信息都将到达我和其他人。”

互联网带来了自由和创新，它对人类社会发生的影响还在不断深入。

三联生活周刊：科技的发展，包括互联网的发展，主要是以技术为主导，不受国界和地域的限制，而文化则有很强的地域性，受到各地传统和经济发展的限制，互联网公司要作为科技和人文的连接者，如何应对这其中的差别？

程武：作为连接者要做的是通过产品来破壁，实现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族群，以及不同的文化之间更好地连接。比如我们在五年前启动Next Idea(下一个创新)。我们从一开始就相信，改变世界的伟大变革，往往就隐藏在Next Idea里。很多年轻人在这里崭露头角。比如我们启动了与故宫的合作，将故宫的元素与表情包结合起来，美好的事物都可以经由这样的现代表达被年轻人接受和喜爱。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超越国界的力量，在互联网时代，游戏和动漫就是无国界的通行语言。美国的漫威英雄可以征服世界，花木兰经由迪士尼的打磨重焕光彩，中国五千年文明所沉淀下来的文化，在互联网时代里都可以成为我们创意的源泉。

汤因比认为人类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同文明之间需要互相了解，达成融合，否则人类将走向自我毁灭。互联网，以及在互联网基础上生成的数字内容产业，都应该致力于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与了解，这就是我们要推动互联网与人文融合的根本原因。

三联生活周刊：你把互联网对于人类社会的改变与活字印刷术的重要性相提并论，那么能否预测一下互联网对于全世界和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50年后的世界与现在会有怎样的不同？

程武：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技术还将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互联网对于社会发生的影响还在不断深化，它带来了新的思考方式、新的组织方式，也许还将带来文化上的新秩序。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在未来都会不断拓展自己的应用场景，从而进一步打破我们对于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认知，甚至也将突破我们对于自身的认识。

互联网的创意时代和众创时代，随着工具的进步和平台的出现，每个人都可以创作。而平台帮助这些创意者直接与消费者对接，直接与专业的生产机构对接。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新的连接，对于一个社会尤其是青年文化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和影响？

程武：新的连接带来了新的内容，比如现在的年轻人更愿意用表情包来表达各种复杂的情绪和感受。在一些“00后”的对话里，甚至没有文字，只有各式各样的表情包。网络游戏也成为了一种跨语言、跨国界的文化表达和交流方式。

最突出的改变在于这种连接让表达变得更为开放和多元，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分野不再一成不变。人们经由社群而建立的充分的认同感促使过去原本属于小众的文化在互联网时代强势发声，反而淹没了传统意义上的主流文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腐文化”的流行，甚至《人民的名义》这样的主旋律电视剧，也借势“腐文化”的流行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

另外，比如说在泛娱乐平台上流行起来的一种以道教哲学为基础的仙侠和玄幻类作品，原本是小众题材，在互联网时代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不仅在中国流行起来，在美国还出现了专门翻译中国网络作品的网站，有很多英语读者付费追文。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与时代紧密相连，是所有文化形态的特征。现在，网络文学、动漫、游戏和电竞，这些原生于互联网的文化形态才是这个时代的文化。

三联生活周刊：从QQ到微信，腾讯公司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极大影响了全中国乃至世界的青年文化，你是否担心青年人过度沉迷于网络世界而忽略了生活的其他方面？

程武：这是一个从来都有人担心但又并不需要担心的问题。上一代永远都会对下一代的爱好指手画脚，而实际上年轻人才是未来世界的主宰。谁也不能代替年轻人去决定未来。对于很多网络原生代来说，网络是他的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在网上交朋友、恋爱、结婚。网络世界对他而言并非虚拟世界，而是真实存在。随着他们的成长，社会的形态也将发生改变。■

如果一个人完全抛弃人文学科会怎么样？

——专访列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古埃及学家让·维纳德

记者 苗千

我们需要“慢科学”

三联生活周刊：我听了你在大会开幕式上的发言——《如果一个人完全抛弃人文学科会怎么样》(What If One Completely Gets Rid of the Humanities)，确实很有挑战性的意味，那么能否阐述一下，你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

维纳德：我主要关注的是现在的大学越来越被经济因素所主宰，而人文学科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这非常遗憾。我们可以这么说，现在的大学有两种不同的趋势：培养技术精英和培养知识精英，这两类并非完全相同。第一种人试图解决问题，尤其是技术问题，在我看来这很好，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才，比如我们需要新的机器、新的疫苗、新的治疗方式等等。但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技术精英就无法回答了，需要人文学科的力量。

人文学科试着寻找世界的意义，寻找各种符号，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化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有其符号化的意义。比如每个房间的装饰，在比利时，在中国，在日本，在非洲，都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所承载的意义不同，这关系到我们怎么生活，我们怎么感知这个世界。对人文学科的忽略对于我们的民主也是一种威胁，因为社会需要批评者，很多议题需要哲学式的讨论。在过去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独裁国家都倾向于压制人文学科的发展。所以在我看来，一所好大学，必须是一个平衡的大学。我们需要技术，也需要人文。人类当然需要新的技术，但是我們也需要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人文学科普遍关注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人类的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人们获取知识，乃至人文学科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维纳德：互联网是一种“双面”的技术，一方面，它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具。你需要任何知识和数据，都可以马上从互联网上得到。但是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正确地使用它。如果你没有受到适当的教育，有关



列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古埃及学家让·维纳德

于它的知识，你就只会被数据所淹没。你在网络上问一个问题，不会只得到一个答案，而是会得到几千个答案。那么这些答案是怎么组织排列的？实际上它们都是根据某些技术、某些软件排列的，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用来控制信息。一般来说，你搜索某个信息，你不会翻到搜索的第二页，可能连第一页都看不完。页面上的第一个答案就是最重要的，这非常容易被操纵。所以我的观点在于，需要教会人们如何才能在网络上找到适当的信息，而不是被操纵的信息。也许你可以交叉搜索，也许你可以在不同的网站上搜索，用不同的语言搜索，这也就意味着你需要一些技巧，而且这需要时间。

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都马上需要答案的世界里，我们不想为任何事情花费时间。但是我们需要“慢科学”，就像我们有“快餐”和“慢餐”一样，我们有“快科学”，但是我們也需要“慢科学”。目前在欧洲有一种所谓的“博洛尼亚体系”（欧洲诸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相互衔接的一个项目）。简短介绍，就是说博士项目必须在三年的时间里完成，这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需要时间让想法成熟，如果你读生物学或者化学的博士学位，你甚至不需要有你自己的想法，你的导师只是把一个大项目中的很小一部分分配给你，但是在人文领域，这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看到全景，我们同样需要时间去重新调整

一切，这和科学研究完全不同。我是说，如果科学研究需要以这种形式进行，这完全没问题，但是这种模式不能推广到人文学科，我们需要弹性，而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奢侈，现在在整个欧洲都需要标准化，为什么会这样？我实在是不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科学和技术主宰了这个世界，这个情况同样影响了大学。大学里科学的院系能够拿到很多资金，而人文学科院系的资金被大幅削减。现在对于人文学科来说算不算是一段艰难的时间？这是不是举办这次大会的原因之一？

维纳德：我想这可能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段艰难的时间。如果你想做一些基础研究的话，这对于科学研究者来说同样不容易，他们同样没有足够的研究资金。而我在发言中也说过，为了得到研究资金，在某种程度上，你需要“模拟”成一种科学研究。你必须把研究项目装饰得像是个科学研究。如果你说我只需要纸和笔进行研究，那么你什么资助也得不到，你必须说你各种高科技的设备。这也是我所谴责的所谓“跨学科”研究。你要是想被重视，就必须“跨学科”，有些时候这没问题，但是有些时候这只不过是为了得到资助的手段而已，因为你的研究项目和跨学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只是不得不这么做。首先，这是一种学术上的不诚实，同时这也是对金钱的浪费，而且你为了让自己的研

究项目显得“科学”，你还必须要有些统计数据，有些“大数据”之类，实际上这些都是为了资金，这些真的是非常荒谬。因此，科学学科把它们的研究方式生硬地加到人文学科的头上，我们必须反抗，因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人文学科的研究很少有绝对的是和非，在很多情况下是在中间地带，因为人就是这样生活的。

我们拿语言学做一个例子，有人认为语言学是最接近科学的一个人文学科，因为它可以通过科学手段来研究。甚至有人认为，语言学研究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脑软件来完成，但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在语言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两种文化”的概念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很多学生来到大学里，只是想拿到一个漂亮的学位，然后就可以在社会中找到一个好工作赚钱。那么你怎么样才能让你的学生相信，在大学里还有更多值得追求的东西？

维纳德：我认为想要实现大学理想，你就必须教育年轻人更灵活（flexible）。如果你只是想教授给学生某些技术，那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十年之内，甚至更短的时间里，他们必须重新适应自己，因为技术会落后。大学必须教育学生具备适应性，让他们有能力提出问题。我们必须传递给学生知识，让他们有能力建造一些东西，只有在这点上，所谓的大学才完全不同于技术学校。我们传授给他们信息，同时也要传授他们重新思考的能力，我们也教授他们这样做的意义。即使是对于大的商业公司来说，他们也明白，他们不光需要技术人才，不光需要只会写报告的人才，他们也需要人文学科的人才。

三联生活周刊：查尔斯·珀西·斯诺（C.P.Snow）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一次讲座中第一次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概念，他也提到了在这两种文化中所潜藏的分别和冲突。你会期待在未来，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融合，科学成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人们都接受所谓的“博雅教育”吗？

维纳德：这两种文化当然应该融合，否则就是人类的末日了。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学里，比如哈佛、剑桥等等，他们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可以承担得起。你知道，几年前在日本，政府曾经想要大幅削减大学里的人文学科，因为他们认为大学教育出

更多的技术人才更符合社会需要，但是有意思的是，日本的很多大公司都反对这个计划，因为他们需要富有创造性的人才，他们需要学习人文学科的人才。科学和人文，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少了任何一面，人类都会迷失。在17、18世纪人类就是进行这样的教育的，人文学科和科学学科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大思想家也都是大科学家。比如笛卡儿和莱布尼兹等等，这可能就是我们所丢失的东西。但是我们需要这样的传统，我们需要更广阔视野。

三联生活周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同时起源于古希腊，它们是西方文明的两个非常宝贵的传统。现在这两个传统是否发生了改变，或者说发生了变异？以至于让人们担心科学技术的发展超出了人们的控制和需要？

维纳德：对我来讲，我只是希望更加规范化，因为你不可能停止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现在有很多私人公司有大量的研发经费，你不可能阻止他们进行科学研究，但是需要更严谨的规范。政府，我们的民主政体，不能对科学研究完全失控，因为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如果它被用来奴役人类，那么就走向了反面。商业公司进行研发是为自己的股东负责，他们有可能跨越“红线”，这时候就需要政府出面，否则就成了一种丛林社会。

三联生活周刊：在一些“反乌托邦”类的科幻小说里，例如《1984》，乔治·奥威尔预言科学让独裁统治变得更加容易了，而在一些“赛博朋克”类的科幻小说里，未来世界被几家巨头跨国公司所控制。你会担心这样想象中的场景成为现实吗？人文学科的存在是否是阻止这样的场景成为现实的关键？

维纳德：这很难说。根据现在的情形来说，小说中的场景不大可能成为现实，但是从技术上来说是可能的。我不知道我们一天留下多少“痕迹”，在商店买东西，被摄像头拍摄之类，每天都会留下大量的数据。用软件来监控每一个人，这当然是可能的。但是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像《星际迷航》这样的电影，里面的人大都生活在一个宇宙飞船里，他们从不听音乐，不看书，不欣赏艺术，每天的生活就是非常忙碌地维持飞船运转。这就是未来吗？真的很悲哀。他们就像是机器人，他们已经不是人类了。这是潜在的危险。只有通过人文学科，人们才能意识到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人类工作，但是我们不能让它们奴役我们。如何看待科学，这是人文学科的责任。■



陈兑

加州注册心理师
《通往真爱之路》



盖子

娓娓道来，从科学角度解读真爱，很有启发和作用。



人比黄花胖

谢谢朵拉，这些话说到我心里去了。你的课给了我信心！



Yvon

振聋发聩的小课。谢谢老师，回看自己的生活，感觉很多事情都得到了解释，这就是哲学的力量吧！



a^tman

谢谢老师。人生，正是不断地选择，冲突，挣扎，最终找到自我，谢谢。



田Candy

可是这三个“着陆技术”，只是暂时地消除了焦虑情绪，如果多次使用这样的方法抑制，身体也会免疫吧



清流

临床咨询经验超过6000小时的心理咨询师
《打败紧张、焦虑、愤怒，三大情绪敌人》



李剑

牛津学者、社科院专家
《难以选择时如何更好的做选择？》



马良坤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教授
《备孕二胎你必须准备的十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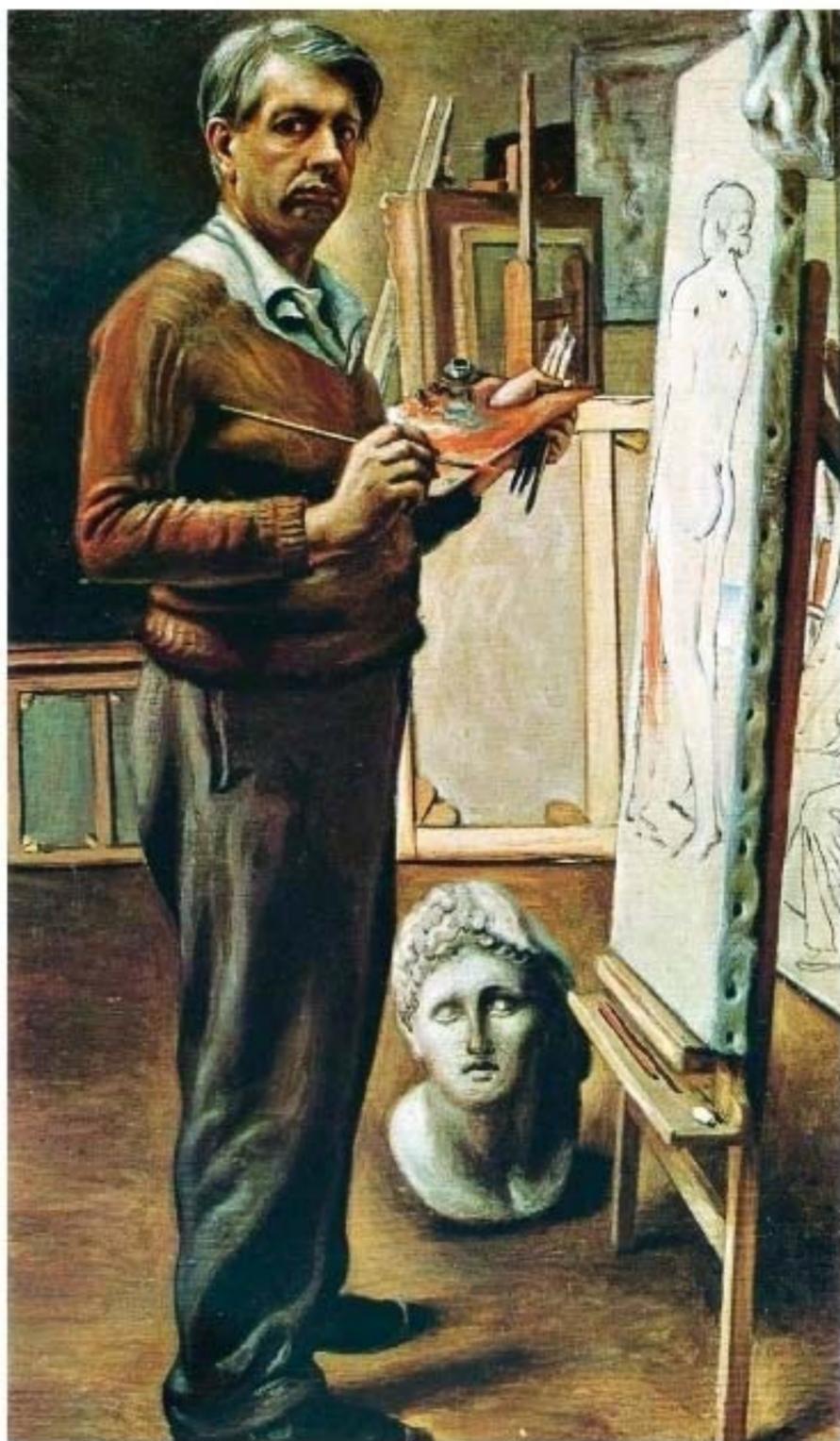


扫描二维码
下载「中读」客户端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放下你的焦虑 「中读小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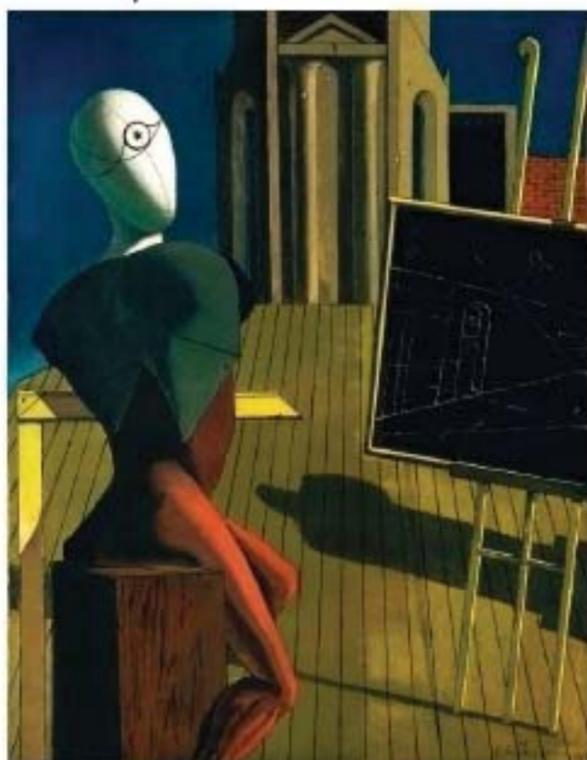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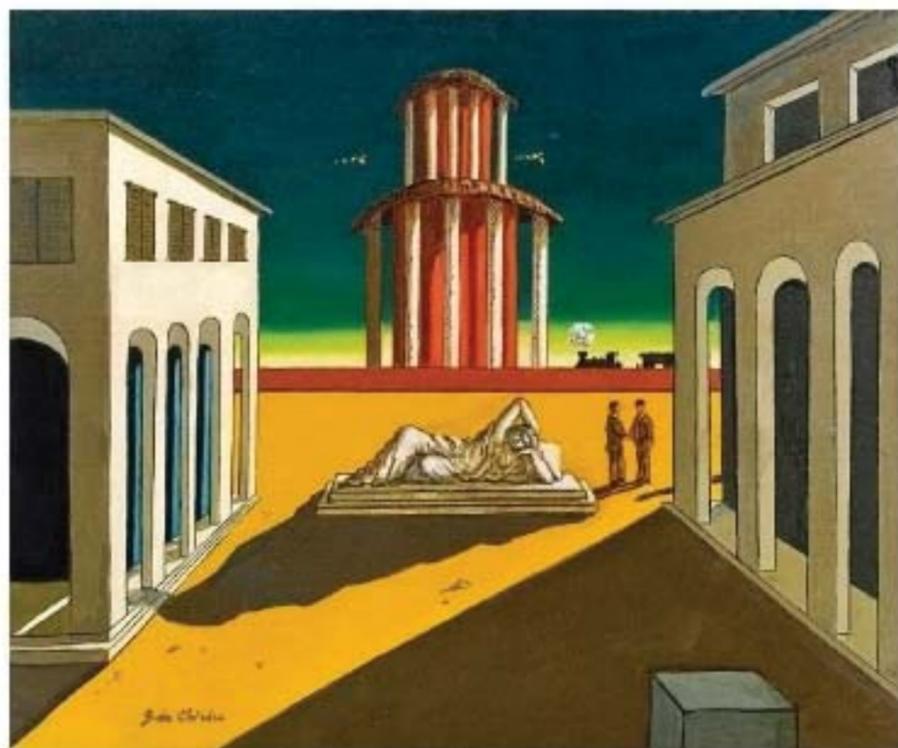
1

意大利画家基里科作品：

1. 《工作室中的基里科自画像》，1935年
2. 《意大利广场》，1964年
3. 《先知》，1915年
4. 《一条街道的神秘与忧郁：推铁环的小女孩》，20世纪60年代



3



2



4

乔治·德·基里科
《一条街道的神秘与忧郁：推铁环的小女孩》，1960年代
布面油画，74 x 58 cm
罗马卡洛·比洛蒂博物馆

Giorgio de Chirico
MISTERO E MALINCONIA DI UNA STRADA. FANCIULLA CON CERCHIO, 1960's
Oil on canvas, cm 74 x 58
Museo Carlo Biondi - Aranciera di Villa Borghese, Rome

意大利广场的神秘与忧郁

文 / 钟和晏 部分图片提供 / 基里科基金会

“都灵和佛罗伦萨是构建基里科的空间想象力的基础城市，他画笔下的广场早已脱离了建筑实体本身，成为符号、仪式感以及死亡神圣感的表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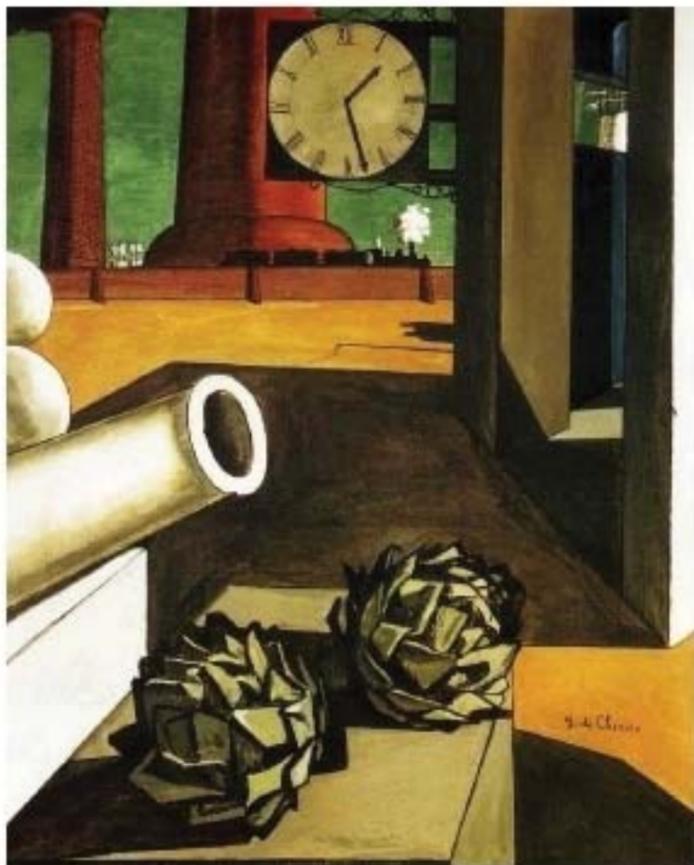
意大利画家乔治·德·基里科的画布上是一个神秘而难以捉摸的世界，它们可以以不同的构成元素反复组合：空旷的城市街道、寂静的广场，那里有拱形柱廊、古典雕像、喷泉、挂钟、塔楼、工厂烟囱和远处驶过的蒸汽火车，阳光在地面投下大块被拉长的黑色阴影，唯独人类活动的热闹和喧嚣从那里消失了。

这是一个地中海城市在午后阳光下的静默，空无一人的空间中渗透着令人不安的成分。这样的画面像梦境般似曾相识，引诱着我们进入场景之中，又似乎我们隐约记得已经到过那个地方，孤独地站在拱廊里停滞的时钟下面。

“意大利广场”成为基里科画笔下独具魅力的主题，始于他在佛罗伦萨广场的亲身经历。如他1945年的《回忆录》中所记录的，1909年10月在佛罗伦萨旅行的时候，他遭遇了一系列最初的启示，其中周围的广场、建筑物等似乎仅仅是一个更深刻世界及其隐含意义的物理表现。

在一个晴朗秋天的下午，我坐在佛罗伦萨圣十字广场中央的长凳上，这当然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广场。我刚刚经历了一场漫长而痛苦的肠道疾病，旧疾未愈，大自然的一切似乎让我恢复了元气。在广场中间，头带桂冠、身披长披风的但丁雕像捧着自己的著作，充满思想的头低垂着。雕像是白色大理石的，但时间已经给它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秋天的阳光温暖而无情地照亮了雕像和神庙的正面。

然后，我产生了仿佛第一次看到所有这些东西的奇怪印象，我看到的景象组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一刻对我来说是一个谜，因为它无从解释，由此



《哲学家的征服》，1914年

而来的作品也是如此。

正在上海艺仓美术馆举办的“基里科 & 莫兰迪——意大利现代艺术的光芒”展览中，基里科的经典名作《一条街道的神秘与忧郁》就是这样一幅充满谜团的作品，一个以简单的几何形式呈现的城市公共空间。画作显示了黄昏暮色中的广场，文艺复兴建筑的拱形门廊，一座看不见的雕像在地面投下它的黑色阴影，远处矗立着一面旗帜。

这个静止的场景中，唯一的运动是明亮赭黄色街道的左下角，一个正推着铁环奔跑的小女孩，她的左脚向后踢起，头发和裙裾向后飘扬着。这个女孩正朝向来自右侧建筑物后面的明亮光源奔去，她的左侧是被照亮的拱廊建筑，赭黄色街道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分隔了明暗两个区域。

如果仔细观察这两座明暗对比鲜明的建筑物，你会注意到光线不是它们唯一的区别。基里科有意使用了两个相互矛盾的消失点，从而破坏场景与现



1974年，基里科在他的罗马画室中作画

实的相似性。左侧明亮建筑物的所有线条都略微高于地平线，光源和视角的并置使画面中出现了一个不可能世界，在那里两个空间永远不会融合，女孩也永远不会与雕像相遇。

展览的策展人之一、乔治·德·基里科基金会艺术中心委员乔凡娜·罗萨里奥（Giovanna Rasario）这样评论说：“对于基里科来说，都灵和佛罗伦萨是他空间想象力构建的基础城市，他画笔下的广场早已脱离了建筑实体本身，成为符号、仪式感以及死亡神圣感的表征。”

早在1917年基里科与意大利画家卡罗·卡拉（Carlo Carrà）一起创立“形而上画派”之前，巴黎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就已经在1913年的一篇文章中把基里科的画作描述为“形而上学”。Metaphysical这个来自古希腊的哲学词语并不是指某一特定的哲学流派，而是由思维属性分离出来的、超越直观形态的思考方法。

按照艺术家自己的话来说：“我画的是我闭上眼睛看到的東西，使看不見的東西變得显而易见，由此捕捉到永恒的现在。要想成为真正的永恒，艺术作品必须摆脱人的局限性，逻辑和常识只会干扰。但一旦打破这些障碍，就能进入童年和梦想的境界。”

基里科的弟弟、同属形而上画派的阿尔贝托·萨维尼奥（Alberto Savinio，原名安德烈·德·基里科）也说过：“形而上绘画更多是一种观察方法，而非一个形式的流派。”

在《一条街道的神秘与忧郁》《预言家的报酬》等“形而上学城市广场”系列绘画中，基里科将建筑、广场与人物以几何图形的方式抽象为一系列符号表征，再以一种可辨识的方式重新拼贴。拱廊、塔楼、火车、烟囱等这些元素是梦想世界中经常使用的道具，它们被用来安排创造“孤独和空虚的图像”，共同唤起与意大利北部城市相关的忧郁，同时也表达了“权力与自由”的情感。

对于基里科来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典主题在现代世界仍然有效，他的城市风景中有着明显的古典世界的回声，这也许和他的出生地有关。他于1888年7月10日出生在希腊塞萨利省首府沃洛斯，父母是意大利人。他曾在雅典和慕尼黑学习，深受尼采哲学和阿诺德·勃克林的象征主义艺术影响。

1911年他搬到巴黎，开始描绘他的形而上城市风景，并结识了毕加索、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等人。不过，当时他并不属于巴黎丰富绚烂艺术生活的一部分，很少有亲密的朋友，后来在意大利的岁月里，他也是一个孤独者。

基里科的父亲生前是一名铁路工程师，火车作为他作品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充当了生命与青春期望的象征。1914年的作品《哲学家的征服》中，画面最远处是帆船和冒着白烟的火车，与庞大的红色工厂烟囱对比之下显得微小，两个看不见的人在天上投下他们的阴影。一管大炮从画面左侧的边缘突伸出来，炮弹笨拙而挑衅地堆叠在炮筒上。最前景处是两颗巨大的洋葱，它们的尺寸和尖刺阻止了观众的接近。

1915年的《回归的快乐》中，火车已经驶入了城市，一个明亮的蒸汽圆球直接盘旋在烟囱上方。也许它来自火车，也许它只是地平线上的云彩，被没有渗透到建筑物中的太阳照亮。蒸汽圆球改变了远近关系，迷惑了人们的空间感，早期的基里科作品中经常充满了这样的效果。

除了都灵和佛罗伦萨，基里科还把意大利北部城市费拉拉称为最具“形而上美学”的城市。当他1915年6月抵达费拉拉时，发现自己“受到灵感和启示的强烈刺激”。他给巴黎画商保罗·纪尧姆(Paul Guillaume)的信中说，他相信是命运把他带到这个迷人的文艺复兴时期城市，让他意识到自己的艺术使命。

基里科出现在费拉拉出于偶然。“一战”爆发后他从法国回意大利服兵役，因为异常敏感的身体状况，军队体检把他划为不适合上前线，分配他一份军队的文书工作。这样，他在空闲时间里又回到了绘画。

在费拉拉，艺术家缩小了他的焦点，使用日常用品创造接近错视画的静物画，其中包括典型的费拉拉面包卷和在商店橱窗中看到的当地糖果。后来，这些画作发展成为一系列奇怪而幽闭的房间，被盔甲、地图、图表、画架、几何仪器、古董胸像和无



《令人不安的缪斯》

The Disquieting Muse, 1916年

缪斯是基里科绘画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他相信她们启发了艺术家超越表象进入形而上学——记忆、神话和真理——的领域。这幅画是基里科居住在费拉拉的时候画的，铁锈红色的文艺复兴时期城堡与工艺建筑并列在一起。基里科再次不顾建筑的真实规模，把城堡表现得像是微型模型。画面前景中分别是古典装扮的缪斯，一个站立，另一个坐着，暗指悲剧女神墨尔波墨和喜剧女神塔利娅，她们身后基座上的雕像是太阳神阿波罗。



脸假人等不寻常物品所占据。为了实现现实的错位，基里科不协调地并置着这些无生命的物体，赋予它们精细的尺寸和细节。这些元素后来在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中，作为强烈的暗示成分重新出现。

这些无序的符号被评论家称为基里科的“梦境书写”，但它们与超现实主义者的语汇有着明显的差别。如果说超现实主义者的绘画是借自精神分析学的词汇，基里科的语汇则是有限的、非常个人化的。他的神秘城市风景中萦绕着对古典世界的优美与逻辑的记忆，其中并没有解释什么。相比之下，达利的“梦境图像”更像是试图用相机捕获梦的内容。

基里科强烈地影响了超现实主义运动，这已经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承认基里科影响力的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包括马克思·恩斯特、萨尔瓦多·达利和雷内·马格里特等人。20世纪20年代初，超现实主义作家安德烈·布列东在纪尧姆的巴黎画廊里第一次发现了一幅基里科的形而上学绘画，并为之深深着迷。

《预言家的报酬》

The Soothsayer's Recompense, 1913年

《预言家的报酬》属于忧郁的城市风景系列，带拱廊的建筑包围着冷清的广场，一个古典雕像带着深深的阴影矗立在那里。雕像和它背后的蒸汽火车被并置，形成古代和现代世界碰撞以及时间地点的混乱模糊。图案的前景是静止不动的，低矮墙壁以外的地区则表现为运动，冒着浓烟的火车沿着地平线向前运行。

在这里，画家用精确的绘画风格和线性视角创造出令人不安的、梦境般的气氛，卧着的雕像是阿里亚德涅——希腊神话中帮助她的情人忒修斯逃离迷宫之后，被遗弃在纳克索斯岛上的希腊公主，雕像被拉长的影子强化了画面的忧郁感。



《出发的忧郁》

The Melancholy of Departure, 1914年

《出发的忧郁》又名《蒙帕纳斯火车站》，它曾被美国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称为“建筑的杰作”。建筑的存在是它的核心，但是基里科用创新方式来处理建筑，它不是表现一个特定的地点或环境，而是像戏剧布景一样成为虚幻事件的非真实背景。在当时的作品中，基里科经常使用多个消失点和深色的黄昏阴影。画面上的钟塔和出发的火车可能暗示了他即将离开巴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入意大利军队。

另一位法国超现实主义画家伊夫·唐吉（Yves Tanguy）也有过相似的经历。1922年的一天，他在画商橱窗里看到了基里科的画作之后如此受到震动，当场决定成为一名画家，虽然当时他还从来没有拿过画刷。

1924年，基里科访问巴黎时加入了超现实主义集团，然而，早在1919年秋天，他发表过一篇题为《回归工艺》的文章，主张回归传统的图像和技法。他的艺术取向由此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转向新古典主义和类似于学院派的传统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者公开蔑视和贬低他的新作品，在1928年将他谴责为“死亡画家”，他们很快分道扬镳。

美国著名艺术评论家、基里科作品的权威詹姆斯·萨尔·索比（James Thrall Soby）这样赞美基里科早期的形而上绘画：“只有少数艺术家能够创造出如此奇特、如此新颖的世界：沉默的建筑、冷漠的光线和神秘的机器人。”

对于后期的作品，索比的谴责同样严厉而不留情面：“基里科回到了他曾经蔑视的巴洛克风格的传统，投入大量精力对20世纪的视觉革命进行暴力攻击，竭尽所能地抹杀了自己辉煌的青春。幸运的是对艺术史来说，他失败了，他的早期绘画幸存下来，获得了历史的重要性。”

直到现在，一种普遍的观点是，20世纪初意大利艺术中有两个伟大的动力，一个是未来主义，另一个是基里科和他的形而上学绘画。从1909年至1919年之间的形而上时期被视为基里科绘画生涯的高峰，而他的后期绘画从未得到过同样的称颂。

他对此感到不平，以为自己后来的作品更好、更成熟。不过，最后几十年他仍然重新绘制了大量形而上时期的名作。就像“基里科 & 莫兰迪——意大利现代艺术的光芒”展出的《一条街道的神秘与忧郁》作于20世纪60年代，《加富尔雕像矗立于意大利广场》作于1974年，1959年的《石膏像与橡胶手套》是对1914年《爱之歌》的重新绘制。这种“自我伪造”既可以从他早期的成功中获利，也是对艺术批评家偏袒他早期作品的一种报复行为。

从1944年到1978年11月去世之前，基里科一直住在罗马西班牙广场31号的一栋小楼里，他是艺术世界中的被遗忘者。1955年，他对一位曾经访问他画室的评论家说过一段自我辩护的话：“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塑料颓废的时代。一个艺术家的方法应该是纯粹的，而不是智力上的恃才傲物，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就是如此。绘画就应该是绘画，好的画法、好的形式来表达一个人的内心，没有花招！”



1



- 1. Miu Miu 大片中的猫
- 2. 纪梵希大片中的猫
- 3. 龙骧大片中的狗
- 4. 宝格丽大片中的朱丽安·摩尔与小狮子



2



3

为什么 时尚大片里有那么多 动物？

记者 / 杨聃

翻翻时尚杂志就会发现，
时尚成为继马戏团和动物园之外的
另一个动物乐园。



4

“网红”动物

很遗憾，火烈鸟都火了一年了，还没有过气的意思。从米兰的秀场到宜家的卖场，无数火烈鸟单品——纪梵希礼服，巨大个的网红必备游泳圈，印着火烈鸟图案的拖鞋、抱枕、浴帘、壁画……感觉把整个夏天搬进了南美洲。没记错的话，火烈鸟明明很“低俗”的啊。

1957年，设计师唐纳德·费瑟斯通为“Union Products”公司设计了塑料火烈鸟，作为园艺装饰之用，西尔斯百货售价2.76美元一对，郊区的家家

户户都买了好多来装点门前的草坪。后来，Union Products也曾试图销售鸭子、天鹅、鸵鸟等装饰物，但销售情况都跟火烈鸟差远了，也许是因为它跟佛罗里达州风情更契合吧。难怪当费瑟斯通去世的时候，《纽约时报》称他为“改变了美国上世纪中期地貌的人”。

然而，泛滥的火烈鸟逐渐成了低级品位的代名词。1972年，美国导演约翰·沃特斯一部名为《粉红色火烈鸟》的限制级电影成为70年代赢利最多的地下电影，奠定了沃特斯的反叛偶像地位，同时也把火烈鸟的庸俗化意象推向了高潮。当他被问到为



1

1. MAC 大片中的火烈鸟

3. 蔻驰大片中的狗

2. 范思哲大片中的马

4. 迈宝瑞大片中模特卡拉·迪瓦伊与猫头鹰

什么给电影取了这么个相关性不高的名字时，沃特斯回答道：“因为电影已经很重口味了，我需要给它一个既轻描淡写而又有暗示性的名字。”自此，火烈鸟演化成了同性、异装癖等文化中的象征物。

直到2014年，设计师马克·雅各布把这个“臭名昭著”的动物形象拉进了时尚圈，他在其2015年春夏系列的飞行员夹克上装饰了火烈鸟，同年普拉达也推出了一款火烈鸟主题香水。在新创意总监亚历山德罗·米歇尔（Alessandro Michele）的带领下，古驰走上了刻奇、华丽而迷幻的路线，先是在柏林中央火车站让模特踩着滑板抱着孔雀，隔年也跟上了这股火烈鸟热潮。在2016早秋系列大片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那些文艺十足的包袋，而是镜头正中几只高傲的粉红色大鸟。

想来火烈鸟的风靡也非偶然，它占据了三个当下流行的元素：热带（仙人掌和菠萝也是主流印花）、

鸟类和粉红潮。粉色在2016年曾大行其道，从T恤、软装饰到时髦人最爱的Acne Studios购物袋，粉色无处不在。同时这种印象中代表柔弱的颜色还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第四波女权主义的象征。火烈鸟身上的颜色刚好和这种饱和度低、略为寡淡的“千禧粉”（Millennial Pink）相似，被定义为一种俗气而真诚、摩登又怀旧的颜色。

回想一下，上个世纪中期，塑料火烈鸟普及的时候，也恰好是粉色当道。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的杰奎琳·肯尼迪以标志性的粉色套装，成为风格偶像。相比之下，杰奎琳粉和塑料火烈鸟的颜色都是饱和度比较高的。

乘着“粉红”东风大热的火烈鸟，只是越来越多占据时尚大片的动物形象之一，很多“喵星人”和“汪星人”甚至是Instagram上的“红人”。翻翻时尚杂志就会发现时尚成为继马戏团和动物园之外



2



3



4

的另一个动物乐园。迈宝瑞2014年的春夏广告片里，模特卡拉·迪瓦伊的左手上站立着一只毛色灰白的猫头鹰，镜头定格住了它展开双翅的瞬间，少了它这种梦幻的感觉很难实现。在为宝格丽拍摄的大片中，朱丽安·摩尔仅用珠宝、手袋和两只小狮子遮挡住了她近乎裸露的身体。

《时尚和动物》一书指出，动物从19世纪就开始进入时尚圈了。这本书的作者约书亚·卡切尔曾表示：“人类仅会对很少的东西一直保持兴趣，其中包括性、死亡、超自然现象和动物。”这也是为什么在广告行业一直有个视觉要素定律“ABB”，A代表Animal（动物）、两个B分别代表Baby（婴儿）和Beauty（美女）。

正是如此，创意人用不同的动物可以展现不同的特质。“金钱豹这样的珍稀动物会让人自然联想到高级、奢华、夺目的感觉。”美国俄勒冈大学的

新闻和传播系教授黛布拉·莫斯根表示。怪不得卡地亚一直以豹为品牌的形象在广告片里频繁出现。“正如汽车喜欢用马来拍广告，来影射‘马力’，而沃尔沃在广告里用狼象征威胁，动物所代表的象征意义是亘古不变的。”不过如果带着某种预判去欣赏时尚广告或大片的话，有时会更加摸不着头脑，比如斑马或者大象镇定而突兀地出现在模特身边，除了画面上的和谐，似乎找不到任何“逻辑”上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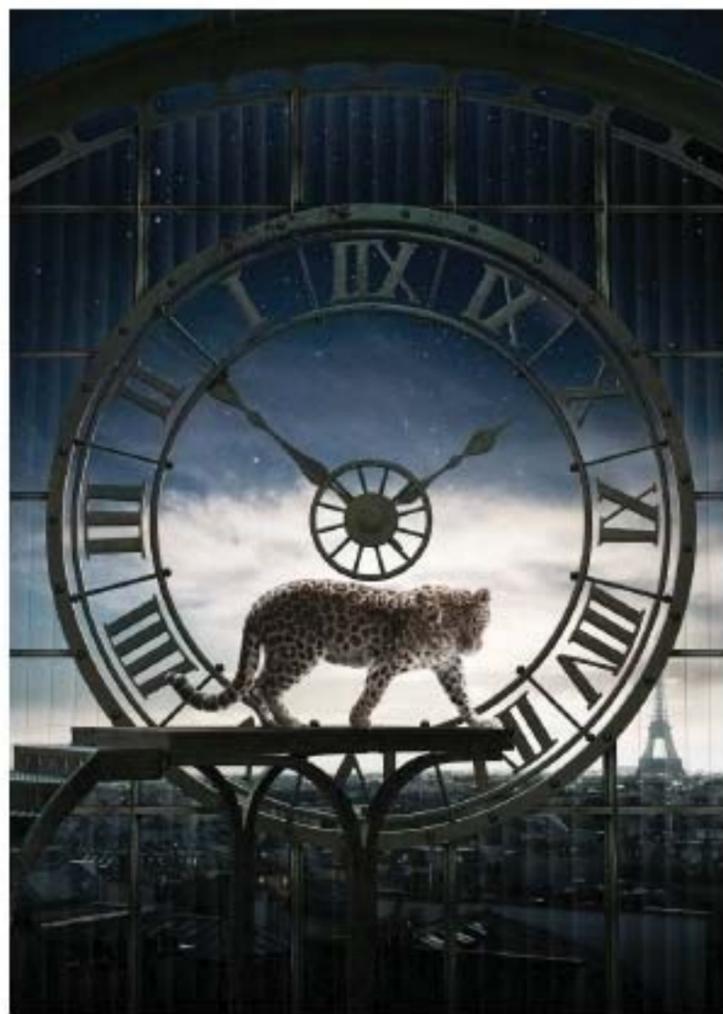
事实上，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视觉艺术家们已经发现了小动物的装饰作用。当宗教事件被置于画布之上，特别是进餐场景被纳入故事的刻画之后，猫便出现在了这类作品当中。意大利画家丁托列托（1518～1594）绘有至少六个版本的《最后的晚餐》，其中三幅画上了猫，其中一幅将大胆而壮硕的猫放在了画面的中心位置，而耶稣和使徒们坐在桌子后



1



2



3

- 1. 古驰大片中的恐龙
- 2. Kate Spade 大片中的骆驼
- 3. 卡地亚以猎豹为品牌形象

面。女仆正从篮子里拿取食物，猫的后腿站立扒在篮子边上好奇地向里面窥探，另一只隐约可见的狗则趴在桌子下面充满渴望地旁观着。将这些动物加入到画作中的目的大概是想让它们更通俗，让宗教事件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如今广告的意义不也是如此么。

猫狗大战

The Dog Agency 的创始人洛尼·爱德华兹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律系，如今她成了一位“汪红经纪人”，负责替那些对合同一知半解的狗主人和找上门的广告主谈判，找寻客户和制定长期的“犬”品牌战略。她自己的斗牛犬克洛伊在 Instagram 上就有超过 15 万粉丝。

公司的客户之一“Dogist”是一个只关注汪星人的账号，其摄影师费尔曼喜欢漫游在城市里寻找各类狗摆拍。除此以外，The Dog Agency 的客户还包括法国斗牛犬姐妹 Piggy and Polly、混迹于布鲁克林的金毛贵宾混种 Samson。像女鞋 Jimmy Choo、丽思卡尔顿酒店、谷歌、皮克斯、百威啤酒、戴森等品牌都和他们有合作。

因为能给人带来温暖的感觉，不同品种的狗都分别出现在了龙骧、路易威登和博柏利等品牌的广告里。继 Lady GaGa 带着自己的法国斗牛犬入镜寇驰的“COACH PUPS”广告大片后，这一系列又新增了两位明星和其爱宠——歌手爱莉安娜·格兰德和超模米兰达·可儿。爱德华兹表示，因为有了一只可爱的狗，广告可以变得老少通吃。

像电影《猫狗大战》那样，时尚圈的另一股动物明星势力来自“喵星人”，毕竟，早在 1890 年 5 月的《哈泼斯》(Harper's) 月刊封面，猫就被描绘为美好生活的优雅装饰了。

虽然在 17 世纪末，把猫视为伙伴的想法还是法国贵族圈的新时尚，如今，猫胜于狗已经成了人们的首选宠物。在英国，1980 年人们养狗的数量还是猫的两倍多，到了 1995 年，猫的数量已经比狗多出 40 多万只了。事实上，猫的确比狗更适合生活在一所整日无人的公寓中。

然而，猫作为宠物的争议一直比狗高。第一本通篇描写猫的书是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奥古斯丁·帕拉迪斯·德蒙克里夫的《猫的历史》(1727)，书中一半是严肃的研究和赞美，一半是机警的妙语和警

句。尽管他的著作很受欢迎，为猫发声还是严重损害了德蒙克里夫作为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相比之下，法国作家尚弗勒里 (Champfleury) 虽然严肃但内容空洞的《猫》(1868) 却赢得了并不相称的荣誉，毕竟，时代不同了。如今，书名里随便带个猫字就能起到促销的作用。

安德鲁·劳埃德·韦伯改编谱曲的音乐剧《猫》(1981) 成为历史上最卖座的音乐剧之一；吉姆·戴维斯笔记下胖墩墩的加菲猫形成了数百万美元的产业。比尔·克林顿的索克斯并不是白宫里的第一只猫，却是白宫里第一只成为公众人物的猫。它经常出现在政治漫画中，就像在 1994 年 12 月 8 日《华盛顿邮报》的一幅漫画中，讽刺了深受危机困扰的克林顿遭受了另一个沉重打击——被它的猫索克斯所抛弃。

19 世纪 20 年代，当一只灰色的流浪猫爬过破旧的楼板出现在麦克·森尼特的喜剧片场时，这位导演立刻意识到将猫加入剧情的好处。女演员在往咖啡里加奶的时候故意撒出一些，猫小心地闻了闻，用小爪子蘸了一些。自此，猫相继出现在了电影之中，为人物和剧情增加魅力。

在《教父》中，马龙·白兰度对猫长时间的抚摸烘托了人物不张扬的力量和冷酷的优越感。因在《蒂芙尼的早餐》中的表演，胖乎乎的赤黄色公猫奥林奇 (Orangey) 获得过两次年度影视动物巨星奖，这可是冬雨节的奥斯卡，可它需要做的仅是被人抱起，搂在怀里，跳上跳下，抑或是卧在高高的台子上警觉地凝视着移动的目标。

虽然“汪星人”也有像《101 真狗》和《一条狗的使命》这样的代表作来博得好感，但一跟女性消费沾边，汪星人就暴露了弱势。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热衷于淡化猫天生的野性，把它们塑造成整洁有序的主妇。而法国人则不然，戈蒂埃和波德莱尔等作家赞美猫是属于黑夜的动物，它们在城市的屋顶上嚎叫，无视人间法律。

漫画家格朗维尔也认为猫反映了蔑视社会习俗的波西米亚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优雅端庄的猫看起来比憨憨的狗更加安静有序，它们对人类的统治毫不在意，因此享受着人和狗都无法得到的自由。如英国诗人迈克尔·汉伯格在描述其宠物时所说的：“它把配满家具的公寓想象成了交织的丛林。”

这不和“粉红潮”有着相似的内核吗？更不用说甩出汪星人好几条街的性感了。☑

绝境重生，每个人都可以的

文 / 张斌



(摄影:中国新闻网)

8月11日，蒂安娜·巴托莱塔在2017年伦敦田径世锦赛跳远比赛中获得铜牌

田径场忙不迭上演人间悲喜剧，这一遭的主角名叫蒂安娜·巴托莱塔。8月12日，31岁的蒂安娜在自己的Instagram上写了不短的一段：“卫冕不易，铜牌当是人生意义最为非凡的奖牌。三个月前，我从家中跑出来，要决定所有属于我的东西中，什么最重要。我要告别爱犬，身上仅有很少的钱。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家庭地址了，但我要给自己机会，生活中本不该有打斗、威胁和虐待。”

也许不少人看到了蒂安娜站在领奖台上泪流满面，但未曾读到她的及时抒怀，未必能想象到她跌宕起伏的心境。蒂安娜·巴托莱塔的名字很容易被忽略的，尽管她拥有三块奥运金牌、两块世锦赛金牌，近几年来世界女子跳远的第一人。直到北京田径世锦赛，在鸟巢亲眼看见其夺冠，人们才从她的简历中读到一丝传奇，她居然还曾尝试过雪橇项目，起点不低，世界杯分站赛拿过铜牌。在里约，蒂安娜大热，获得跳远和4×100米接力两块金牌，而立之年，人生一幅圆满景象。

人生总有背面，常人难见。蒂安娜婚姻崩溃，生命中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个存续五年的夫姓——巴托莱塔，身心遭虐则让她险些走到生命终点，前夫则将人生的重大变故描写为“和平分手”。伦敦世锦赛后，

蒂安娜选择了BBC讲出自己的悲情日子，这在她看来是疗伤的唯一手段。结束糟糕的婚姻是要冒巨大的风险，大赛之年更是要将自己的田径生涯一道逼上绝境，但如今回头看去，一切还算值得。

最挣扎的时刻似乎就在不久前，欧洲某个火车月台上，眼见着火车呼啸而至，蒂安娜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跳下去，这是逃离痛苦的最好办法。每天，蒂安娜都在怀疑自己，难以面对变化了的自己，“成为自己的陌生人”。苦海中，谁都需要一双有力的手搭救，亲人本应是最好的依靠，但蒂安娜与母亲自小关系紧张，无法求得温暖和力量。最糟糕的是，苦痛之时，蒂安娜的成绩并没有大的起伏，旁人眼中她是力量的化身，根本不信她活在炼狱之中。久而久之，蒂安娜只能煎熬自己，无处倾诉。

孤独中，蒂安娜时常会凝视着镜子中的自己，自言自语：“你不是孤独的。”在社交媒体上，蒂安娜写出了自己的人生故事，把伤口毫无遮拦地展示出来。最初，会有强烈的不适感，但蒂安娜发现，给她留言的人大多和善，还有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允许彼此走进自己的人生中来。久而久之，一种信念充盈心间，笃信自己一定可以从绝望中走出来，不再恐惧。

既然决定人生重新开始，蒂安娜又全心回到了训练之中，她在荷兰的训练地租住房子，虽然没有了名义上的家，世锦赛后被称为“三个月无家可归者夺得跳远铜牌”，但内心重新找回了安宁。蒂安娜心中很清楚，任何一位伟大的运动员都有一种超强的能力，那就是无论遇到何种苦痛，都能将其装进一个盒子中，暂且封存，日后再去解决，不会让苦痛来侵蚀自己。还是训练场最熟悉，还是训练中的感觉最安全，这吸引着蒂安娜坚定地回到自己的运动之中。

不幸的是，对于一届世锦赛而言，蒂安娜重新回到训练中有些迟了，若想蝉联跳远金牌，她需要更长时间的专注。但从以死解脱的心境到再上领奖台，蒂安娜自认为她平稳地冲过了这一道终点线，她成功地逃脱了死亡、恐惧和怯懦。成功的运动员都有可能深陷焦虑甚至抑郁之中，不要让过往的成功阻碍你重获新生的可能，你不孤独，你能从绝望中走出来。蒂安娜如此，每个人都应该可以的。■

两场不同的涉核“口水战”

文 / 宋晓军

8月15日，在持续了几天的美、朝涉核“口水战”稍有缓和迹象之时，伊朗总统鲁哈尼在议会发表讲话时称：若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威胁和制裁，伊朗将有能力在一定时间内退出“伊核协议”。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莉（Nikki Haley）当天就发表声明回应说：绝不能允许伊朗以退出“伊核协议”来要挟世界。如果把鲁哈尼与黑莉的“互怼”与之前特朗普威胁要在9月对“伊核协议”再审查联系起来看，无疑预示着一场在美、伊之间的涉核“口水战”又开启了。那么这两场始于8月的涉核“口水战”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2002年，小布什政府不仅在“国情咨文”中将伊朗和朝鲜列为利用“先发制人打击”进行“政权更迭”的目标，而且在同年发布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亦将伊朗和朝鲜列为核打击的潜在对象。2003年，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努力下就有了解决朝核问题及伊核问题的两个“六方谈判”解决方案。之后，尽管面临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困境及随后的金融危机，但在小布什政府都没调整“先发制人打击”战略，致使两个“核问题”不仅没有实质性进展，而且朝、伊两国的核、导能力却都有了长足发展。奥巴马政府上任后，以现实主义的态度确立了优先解决伊核问题而后解决朝核问题的排序。这种排序

的成果就是2015年7月达成的“伊核协议”，而其代价就是朝鲜随后进行的两次核试验和多次弹道导弹试验。当特朗普政府上任后，也许是出于竞选承诺和党派之争，就迅速表示了要强势、快速解决朝鲜和伊朗这两个“核问题”。而这正是两场涉核“口水战”先后爆发的背景。

说到这儿，再分析一下这两场涉核“口水战”背后的一些微妙变化。如果仔细分析美、朝“口水战”中的信息，就会发现美国务卿蒂勒森在“口水战”中多次强调的对朝“四不”政策（不寻求朝鲜政权更迭、不寻求搞垮朝政权、不寻求加速南北统一、不寻求为跨过“三八线”找借口），实际上是释放了在未来对朝政策中要放弃“先发制人打击”战略的信息。而这一实质性变化，则与美、伊的“口水战”中特朗普政府执意要在伊朗执行“伊核协议”上“挑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说，特朗普政府试图将奥巴马政府解决两个“核问题”的排序颠倒过来玩。有关这一点，不仅能从特朗普上任后废除了TPP、“重返亚太战略”和首次出访选在沙特上看出一些端倪，而且也能从伊朗支持的武装力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上的“抢眼”表现中得到佐证。事实上，据8月15日纽约的犹太人媒体《通报》在一篇报道中引述的两位美前高官的观点，也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变化提供了依据。报道中美海军前第七舰队司令伯德（John Bird）和前助理国务卿兰德梅克（Stephen Rademaker）均表示不相信“伊核协议”的可靠性。他们甚至认为，即便按“协议”规定的15年期限后，也不能保证伊朗不会像现今的朝鲜一样用发展核武器来“勒索”和威胁美国，而届时伊朗在经济上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球体系。

最后我想说的是，特朗普政府在两场涉核的“口水战”中表现出来的政策取向变化，实际上反映了其政策班底对朝鲜“制造地区麻烦”能力和伊朗“重塑地区格局”能力的评估结果。如果特朗普的政策班底把这种评估方法用在制定对俄及对华政策的制定上，就不能排除他们会认为：俄罗斯更像是只具备“制造地区麻烦”能力的朝鲜，而中国则更像是具备了“重塑地区格局”能力的伊朗。■



8月15日，伊朗总统鲁哈尼称，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加新制裁，伊朗可以在“几小时内”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

哈佛的中国哲学课

文 / 刘梁剑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迈克尔·普鸣开了一门中国哲学公选课，从人生智慧的角度把中国传统思想稀释成了简单易行的人生指南。



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历史教授迈克尔·普鸣与他的著作《哈佛中国哲学课》



让中国哲学说英语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与西方的思想交流存在明显的“逆差”，甚至呈现为中国单向度地从西方输入“先进”思想的态势。哲学亦是如此。我们学习西方哲学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流派，同时拿西方哲学做样子，从中国传统中整理出“中国哲学”。不过，最近十几年以来，中国哲学越来越不甘心于“学徒”状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胡晓明教授语），谋求创建具有中国气象、有别于西方的哲学形态。大江南北，一些哲学工作者开始转变为哲学家，代表性人物包括北京首都师范大学陈嘉映、中国社科院赵

汀阳、广州中山大学陈少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杨国荣与贡华南等。另一个趋势则是让中国哲学说英语，走出国门、走出汉语圈，进而谋求影响英语世界的主流哲学。越来越多的当代中国哲学著作英译本在国外知名出版社出版，越来越多的高校面向留学生开设中国哲学全英文项目。

在此背景之下，听到下面的消息无疑令人振奋：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开了一门中国哲学公选课，人气极高，成为仅次于《经济学原理》和《计算机科学入门》的热门课程，上课地点就在桑德尔等“大牛”开过课的桑德斯剧场。对于年轻的美国学生来说，来自异域的古老的中国哲学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魅力？2016年4月，普鸣与克里斯蒂娜·格罗斯-洛合作，在中国哲学授课讲义的基础上出了一本篇幅不大的书《道》（*The Path*）。该书一经问世，便不可思议地释放出作者在“致谢”中所预言的“巨大潜力”，25个国家购买了它的版权，中文版被定名为《哈佛中国哲学课》。

误读与“偏”读

这样的书，自然要找来一读。翻阅中译本及英文本之后，却未免感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哈佛中国哲学课》从人生“智慧”的角度把中国传统思想稀释为简单易行的心灵鸡汤，对中国古典文献的妙读有时基于误读或“偏”读，还偶尔带点知识上的硬伤。中译者改易书名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章、节、目的标题也是随心更换。虽是11万字的小书，漏译、增译、省译、改译、误译的地方为数不少。

兹举几例。在全书最末一段，作者写道：“从日常生活中最细微之事开始，我们改变万事万物。如果我们由此开始，万事万物就取决于我们。”这两句话大概呼应了整本书的副题“思考万事万物的新思路”。中译本则省译、改译为“从日常生活中最细微之事开始，重塑你的人生吧”。倒是更有励志的口吻了。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始者近情，终者近义”，出自《性自命出》，上世纪90年代新出土的郭店楚

筒材料。这句话本是说，礼最初因人情而作，最终又能够让人性达于中正。但作者的阐释则是：我们最初处于“凭借情感随意应对事物的状态”（情），但通过礼仪，我们最终达到“更好的回应方式”。作者的阐释也许不无妙处，却是基于对文献的误读。

作者还说：“关于孟子学说的文集《孟子》由他的弟子在他死后编辑而成。”据《史记·孟荀列传》记载，孟子晚年“退而与万章之徒……作《孟子》七篇”，这是说孟子生前就和弟子万章等人一起编撰《孟子》一书。再如作者写道，“孔子的弟子经常向他请教‘善’的定义，孔子则根据场合的不同给每个人一个不同的答案”。这里的“善”，英文本作“goodness”，恐怕是“仁”之误。作者把“仁”译为“a sensitivity of goodness”，于是“仁”与“善”在普鸣那里便形近而讹了。《论语》记载了子贡、仲弓、司马牛等弟子向孔子“问仁”。如颜渊问仁，孔子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樊迟问仁，孔子回答说，“爱人”。

第四章，中译本标题为“孟子与仁义之道”。如照英文本直译，则为“论决定：孟子和变化无常的世界”。中译者如此变易标题，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一种揣测：译者认为，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义，而从“决定”的角度解读孟子未免有点“偏”。实际上，当作者说，“孟子认为，我们在规划生活时认为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恰恰会限制我们”，我们实在要怀疑，这完全是作者把自己的观点安到孟子头上了。

从好生活到美好生活

然而，这样一本不无瑕疵的书，这样一门不无瑕疵的课程，能够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应该有它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钱穆先生曾说，读一本书，不是要挑它的刺，而是要学习它的好（参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我们理应思考：普鸣所展示的中国哲学，为什么对于年轻的美国学生来说富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它对于我们发展中国哲学，有何种启发？

西蒙·舒斯特版的副题交待了《哈佛中国哲学课》的主旨：中国哲学关于好生活的教诲。普鸣试图告诉他的学生及读者：中国古代哲人也像现代西方人一样关心什么是好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提供了革命性的全新视角。现代西方人对好生活的理解基于以下基本认知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当代中国人亦然）：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确定的世界中的确定的自我；我们应当向内找到真实的自我，进而依靠

我们理性的头脑，精确规划人生，努力实现计划，成为幸福的人。在这里，理性个体、确定的自我和确定的世界是三个最基本的预设。普鸣试图通过中国哲学颠覆它们：世界是变化无常的，由一系列无尽的、破碎的、凌乱的偶然组成（《性自命出》《孟子》）；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情感的支配（《性自命出》）；自我是可塑的，而不是通过自省可以发现的一个单一且固定的东西（《论语》）。因此，我们需要激发与周遭世界以“气”相感的神性（《管子·内业》），培养理性与情感合一的“心”，让“心”帮助我们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境（《孟子》），遵循“无为”的原则温和而巧妙地把周围的人与事关联起来（《老子》），打破思维与行动的固有模式，以真正的自发性投入无限的流动与变化之中（《庄子》），变革世界，创造幸福（《荀子》）。

普鸣从中国古代哲学感悟到的精神，一言以蔽之，乃是《易经》所讲的“变”——尽管他没有提到《易经》，尽管《易经》讲“变”的同时还讲“不变”。改变自己，变革世界——这样的感悟视角似乎也回响着奥巴马时代的美国精神，“我们可以相信变革”，“我们需要变革”。虽然普鸣的诠释有时显得牵强，但通过与听众读者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与时代精神相应和，中国古代哲学的智慧变得鲜活可亲了。这大概是普鸣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

在英语中，“good”含义很宽，包括道德伦理意义的“善”（good）。普鸣讲“good life”，关心怎么才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道德伦理意义的“善”显得可有可无。比如他讲孟子，关心的是如何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做决定，而不是中译者改易标题所突显的“仁义”。又如，“老子”一章的关键词是“影响力”和“高效率”，颇像成功学；“荀子”一章不讨论人性善恶，而是讨论无物自然、一切皆人为。因此，普鸣所讲的“good life”是“好生活”，而非“美好生活”。比起好生活，中国哲学或许更重视美好生活。何为美好生活？哲学家陈嘉映以此为题写过一本品质极佳的书《何为美好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其一，美好生活首先从品性、识见、有所作为着眼来看待生活，而有所作为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其二，美好生活不是个人内心强大就可以的。美好生活要求某些政治环境，“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正因此，如亚里士多德所明见，对美好生活的思考不得不引向政治哲学。■

复数的平野启一郎

记者 / 孙若茜

早在1999年，平野启一郎就凭借小说《日蚀》获得第120届芥川奖。时隔近20年，他的写作风格不断转变，一再成为日本文坛的话题人物，也揽获了其他诸多奖项。但因为此前缺少译介，今年夏天，当这位日本作家出现在上海书展时，对于更多的中国读者来说，他依然是一位新人。



日本作家平野启一郎与他的成名作《日蚀》



认识平野启一郎，还要从他的成名作《日蚀》说起。一则，它在作家的作品中依然尤为独特；二来，它也是作家在此后的写作中不断探讨的有关“个人主义”这个核心问题的酝酿和发端；再者，它是平野目前仅被翻译成中文的两部作品之一。

《日蚀》的故事背景设定在15世纪的法国，作者以一个在巴黎学习托马斯神学的学生作为叙述者，

用一种长篇日记体回忆了他神奇的经历：为了寻求费奇诺的《赫密斯派文献》，他前往佛罗伦萨，在距离里昂不远的的一个村子里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堕落世俗的僧侣、狡猾的畸形男人、纯洁的聋哑少年以及古怪的炼金术士等等。接下来，他跟着炼金术士的步伐，眼见了双性人被冠以女巫之名施以火刑……作者以此描绘中世纪末期神权与世俗社会对立、融合的景象。

写作时，平野启一郎只有23岁，正在念京都大学。初到大学第一年他就经历了阪神大地震。那年春假往返九州时，从姬路到东京的新干线停运，只能坐飞机，回程就刚好在大阪机场看到了“奥姆真理教事件”的新闻。这让他产生了一种末世感。他希望能用一种非日常的书写排解日常中的忧郁，或者说，是去对抗时代的闭锁性。

于是，他选择去写炼金术，去写中世纪的法国。因为那个由一神教、战争、黑死病填充的时代，在他眼中同样有一种末日将近的氛围，和90年代中期，泡沫破裂，经济低迷，旧的价值观解体，新价值观还未建立的日本非常相似。他说，在那样的形态下，宗教要通过惩罚别人来确立自我、体现自我，比如经过磋磨、虐待巫女的身体来寻求一种价值观。而中世纪宗教性的炼金术，同样体现了当时时代的思想趋势。整部小说的主题和思考以及内心描写都不同于其他当代日本作家的风格，因此，有评论甚至认为：“与其说这是日本作家的作品，不如说这更像欧洲作家的小说。”

平野接下来发表的小说《一月物语》同样是反时代的，小说的主人公以自杀的日本明治诗人北村透谷作为原型：透谷一方面追求东方古典式的自然神秘一体化状态，另一方面则是信奉西欧的恋爱至上主义，并期待着现实中恋爱的能动性。“明治维新之后的近代化过程中，日本吸收了西欧的很多思想，但实际只是吸收了表面，没有真正地进入日本文化中。《一月物语》的主人公就处在这样新旧交替的时代，很难消化接受新思潮。”与《日蚀》里西洋古典的背景不同，在这一次的叙述中，平野融入了中国古典元素，从蝴蝶与梦的关联，到对唐代李贺诗句

的引用等等。

“通常来说，一个小说家在其第二部、第三部作品时，其守备范围就已经明了了。按照从前的说法就是，创作风格显现出来了。然后使其创作风格稳步发展，主题与方法的坐标轴逐渐稳定下来，读者们便开始安心地关注其走向。赞叹也好，沮丧也罢，都是在其风格限度内。”三浦雅士曾在撰文评论平野启一郎的写作时，提到过以上这种在东西方世界或多或少已成为文学习惯，甚至是文学制度的存在。他的言下之意是，平野的写作，并不在这一范围之内。对他而言：“平野启一郎还是个谜一样的作家。”

他所不能理解之谜，是平野继而发表的小说，2002年的《葬送》，2008年的《决口》，前者2500页，取材于肖邦与德拉克罗瓦，是一部近似标准的艺术家小说，后者1500页，是以21世纪的网络社会作为背景写作的犯罪小说。还有其间出版的那些充满实验性质的短篇集：《高濂川》《滴落时钟群的波纹》，同样“扩散与充实”。“一方面，正当你认为他采用了坚实的自然主义风格的手法时，另一方面则展开了令人不得不起现代诗破天荒的语言实验。这位作家就是思想犯。”他以为，这些作品的出版，“就像是平野启一郎在嘲笑我们的困惑”。

三浦雅士的困惑一定不是他所独有的，这或许也是平野常在作品发表之后成为日本文坛话题人物的原因所在。但作家本人也同样认为写作中呈现出悬殊的手法和表达，使他的作品无法归纳，甚至毫无关联吗？

并非如此。他告诉我们，如果《日蚀》中以太阳作为象征，那么《一月物语》的象征就是月亮。它们之间的默契在于时间，《日蚀》中谈到资本主义，时间如直线，指向利己主义；《一月物语》的时间则是环线，主人公被卷进日升月落的循环，一系列的故事才得以发生。《日蚀》讲的是人和神的关系如何产生，又如何变化；《一月物语》是从日本的角度重新看待人与神。再到后来的《葬送》，是公民社会建立起来、人和神的关系不再重要以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变得怎样，以及个人的身份认同。

在这当中，平野始终想要追索的问题是：对于

个体的人而言，“自己”究竟是什么？这是从《日蚀》就开始了的一种抽象式的思考。直到后来的小说《最后的变身》，这种思考才在写作中变得具体。他开始就“真正的自己”与“暂时的自己”，去考虑自我同一性的问题。《没有脸的裸体们》，探讨了“网络上的自己”与“真正的自己”“社会中的自己”之间的一种变化关系。到了写作《决口》时，他感到“个人”的概念已经走到了极限。如果继续使用这个概念写作，将不会再有新的发展。于是在后面的《曙光号》中，就提出了“分人主义”的概念。

平野启一郎认为，人有“复数的自己”。对于亲人、恋人、上司等等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自己”都是真正的自己。这是人与具体的社会接触中变成的样子，而非简单的不同面孔，不同于过去“个人是不可分的”认知。因为现代社会职业的要求，在日本，人们曾长期以来都是一辈子只做一个职业，但是现在，复数的自己可以在社会的变化中更好地生存，通过“复数”来做不同的事情，这样即使一个做不成，另一个做成，也还是可以实现自己。他所希望在小说中探寻的，就是人在现今的社会中应该怎么活。

而作品的形式，无非是同一思想的变体。就像他解释自己写作短篇，是因当时的时代，对于要创作一部构架宏大的长篇来讲，有一些过于纷乱。虽然其中存在实验性质，从方法论的角度去探究文学以外的，现代艺术的思路在小说中有多少可行性，但核心依然延伸至“分人主义”。再后来，平野开始刻意在作品中回避掉“分人”这个词，不再用它解释分人主义，以达到一种模糊的效果。比如2016年出版的小说《剧演的终章》，里面就根本没有提到“分人”，但这个概念却依然作为小说的背景存在。

平野启一郎曾经说，“分人主义”对他的影响极其深刻，甚至决定了他基本的人生观。或者，这已经不再是他力图表达的观念而已。就像三浦雅士谈到其作品主题、方法的扩散与充实时说：“除了用异常一词来形容外别无他法。这是一个作家不可为之事。不，如果结合社会规范，更为正确地来说的话，这又是一个作家必做之事。因为作为小说家的同一性尚未确立，必然存在复数的平野启一郎。”

面对复数的自己

——专访平野启一郎

记者 孙若茜

“过去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创作观在我看来需要一些改变，我想要创造一个偏‘分人主义’的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从《日蚀》开始，你一直在书写不同风格的作品，其中也包括很多实验性的尝试，在这当中，什么是你一以贯之，甚至可能会在未来的作品中持续讨论的问题？

平野启一郎：对我来说，“我是谁”这个问题很重要。每一个现代人都面对这样的问题：成为一个怎样的自己，怎样才能做真正的自己？所以我引入了“分人主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我从欧洲近代的一个哲学概念中阐发出来的，是对一个人的生存价值，以及一个人如何才能做自己的一种现代性的阐释。它基本上就是我创作的中心。

三联生活周刊：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平野启一郎：“个人是不可分的”这个理念，是近代社会的基础。但是现代社会人们为了跟不同的人产生交际关系，就会产生很多个“自己”存在，一般人认为这是一个人的不同的表面，是分裂出的不同面孔，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人们有“复数的自己”，对于亲人、恋人、上司等等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自己”都是真正的自己。复数的自己可以在社会的变化中更好地生存。人们经常是通过复数的自己来做不同的事情，这样即使一个做不成，另一个可以做成，还是可以实现自己。

过去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创作观在我看来需要一些改变，我想要创造一个偏“分人主义”的世界。人最早从猿，四只脚，变为人，两只脚，这种历史过程固然是不能改变的，但当我们面对接下来的社会时，却可以使用“分人”这个概念。因此，在30岁左右的时候，我以此为中心写了一些小说。直到最近的作品《剧演的终章》，里面虽然没有直接用“分人”这个词，但这个概念依然始终作为背景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在早期阶段的作品《日蚀》《一月物语》里面，想要表达的也是“分人主义”吗？似乎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概念。

平野启一郎：与其说我是想要以小说形式来表现它，不如说是通过小说一直在进行思考。早期的作品虽然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个概念，但那时已经开始思考“我是谁”，对个体而言，“自己”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是已经在酝酿这个想法了。

《日蚀》的背景设定在欧洲文艺复兴前夕，里面谈到人与神、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化，以及怎样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月物语》是将个人投入神秘主义的背景之中，从日本的角度重新看待人与神的关系。欧洲的个人观念源自一神教，人们需要以统一的自己去面对仅有一位的神灵，到了近现代社会，有关个人的思潮开始萌芽，神消失了，统一的自我分裂产生出复数的“自己”。“分人主义”实际上就建立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它对应的就是我所设定的小说的时代背景。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最初的几部作品都将背景设置在法国，是有什么特殊的情结么？

平野启一郎：我十几岁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三岛由纪夫，而他创作的主要灵感来源就是德国、法国和俄国的文学。为了更深入地读他的作品，我慢慢地接触了欧洲的文学作品，其中特别喜欢19世纪的法国文学。相比读一些身边的文学作品，读法国文学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真正的自己，也比较向往那种文学风格。虽然物理上，我的身体是在日本九州长大的，但精神上，我其实是受到以法国为代表的外国文学的影响。所以在写《日蚀》的时候，就以法国为背景了。另外，日本近代以来受到欧洲的影响非常深刻，欧洲作品在日本的出版也比较强盛，可以经常读到，因此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三联生活周刊：有评论说《日蚀》不像日本作家的作品，更像是欧洲人写的。这不光是因为背景、人物的设定，还因为你文体的选择。

平野启一郎：用日常的普通文体，好像不太符合我想要反映的风格，我觉得应该以一种稍微有点艰涩，或者说特别一点的文体和语汇来描绘我的作

品。虽然日常的文风和写法，有时也会让人有一些深刻和丰富的体验，但我希望还能超越这样的体验。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很多作家用日常的文风写作，读过之后我觉得刺激不够，好像不太能得到满足。而那个时期，我更侧重于“自己想如何写”，所以就用了不太一样的风格，至于读者能不能接受，当时都没有考虑。

三联生活周刊：在小说中插入空白页又是想表达什么呢？

平野启一郎：小说的背景定位在中世纪末期，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当时在人和神之间，神比较重要。人会接受到像“神谕”这样一种绝对存在的概念。神秘主义会营造出各种各样的体验，从某种意义上，我其实是为了那两页空白，才写这篇小说的。我经常想要在作品里实现一种用语言不可能完成的语言，当一些内容不能通过语言很好地表达出来的时候，就用一些别的方式来实现传达，这也是我创作的一个非常大的动机。

三联生活周刊：虽然你的很多作品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但是你所作的大量实验性的写作，我们也有所耳闻。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不会只是一种对独特性的追求吧？

平野启一郎：其实还是为了尝试去更好地处理现代的人和社会的关系。社会不停地发展，且越来越快，90年代以后互联网兴起，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近。19、20世纪作家传统的写作方式不会去考虑这些当时尚未出现的问题和情况，而现在，作家和读者都需要一种崭新的书写和思考方式。当然，也有些作家不太愿意去认识新的变化，还是觉得19世纪的文体很好，这当然也可以。但继续写下去，他们很有可能会发现越来越不顺畅，因为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文学虽然有一个非常深厚的传统，可以去追溯之前的历史，也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它很快又成为历史，这是一个越来越完善的过程，但与其不停地去追溯历史，还不如更注重现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现在的文学应该怎么写。实际上，光是我自己去写，还不能完成实验，只有作品发表之后，

将读者的反馈回收形成最终的结果，才是一个完整的实验。

三联生活周刊：但如今，你的作品已经逐渐脱离实验性，走向通俗易懂。这又是为什么？是考虑到读者的反馈了吗？听说读者的群体真的比以前规模更大了。

平野启一郎：最近写的长篇小说变得比较通俗，其实也是多亏了之前做的那些实验，这也是一部分实验成果。经过那些实验，我觉得“有趣”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什么是有趣的，什么不是有趣的，这一个很深奥的哲学问题，我现在在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所以写的时候会偏向通俗易懂，为了让人读到之后觉得有趣。读者比以前规模大，可能也和我还在玩儿音乐，开过很多现场的摇滚音乐会有关。

三联生活周刊：对你来说，在这个让写作走向通俗的过程里，需要警惕自己的作品从“纯文学”走向“大众文学”吗？

平野启一郎：“有趣”很重要，但不能单纯为了有趣。我个人理解的有趣，可能偏向于认知科学方面的理论，也要将它放在一个哲学范畴、分人主义的范畴里面去解决。我在考虑“分人主义”的时候，关键还是希望能探索和解决人在这个社会上应该怎么活的问题，我希望读者在读过我的作品之后，能够获得一些想法，比如我应该这样活，或应该那样活。我觉得读者多了并不意味着倾向于通俗文学。■



余华：温暖与百感交集的旅程（8）

文 / 朱伟



作家余华

（图：张中毅/视觉中国）

2006年写完《兄弟》，2012年写《第七天》，中间隔了六年。《兄弟》篇幅最长，《第七天》篇幅最短，余华自称是写一个“历史地标故事集”，社会历史地标。他巧妙地用了一个七天的构思。《圣经》里，上帝在第七日造齐了万物，第七日是安息日，上帝赐福于安息。在我们的传统理念中，七是生命的数字，七日来复，故星期日也称“来复日”，“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余华的“来复”是什么呢？这个长篇的结尾，伍超晚来一天，错过了“鼠妹”。“鼠妹”已经安息了，她却不会再有墓地。没有墓地就没有归宿，但小说中的“我”对她说，走过去吧，那里的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那里没有贫贱富贵，没有悲伤疼痛，那里人人死而平等。

她问：“那是什么地方？”

我答：“死无葬身之地。”

这部小说就如法国作曲家弗雷的《安魂曲》，有意抹杀了经文中本应有的末日审判、对死亡的恐惧。没有上帝的权力意志，死也就抹杀了生的阶级关系，抹杀了善恶。不再有天堂地狱、因果等级，也就无

须尔虞我诈，有墓地者均可安息，无墓地的游魂也可在青草遍地、流水潺潺、树上结满硕果、到处盘旋着夜莺般歌声的彼此亲爱中永生。这样美好的永生，无非是肉体腐烂，都变成身材不一的骨骼而已。余华是有意将死后的“这边”与《创世记》第七日之圣联系起来——死无葬身之地，也就无忧无虑，重新回归了自然怀抱的“伊甸园”。“这边”与“那边”，自身、人为的罪带来的苦痛，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然，这部小说中展示的现实是夸张的，充分戏剧化的，这夸张与戏剧化就为了表达“罪”——社会机器造就的种种生之卑微，及因卑微造就的，到了“这边”才看清是荒谬的悲剧。这部小说，余华采用极简的表现主义方法，因此导致有些读者因其中使用了一些类似恶意拆迁、刑讯逼供、隐瞒死亡人数的社会新闻元素，便以为是“串烧”了社会热点，用小说创作参与了表达社会宣泄。其实，表现主义是将现实提炼为表现的结构，现实之种种是在冥河的“那边”，用余华自己的说法，只不过是投射在“这边”的倒影而已。

余华说，他是因获得了那个火葬场来的电话“你迟到了，还想不想烧”的奇思妙想，才找到了通向这部小说的桥梁。这个第一天写得太精彩了，一个作家的财富，莫过于其想象力。想象一个走向火葬场的死人，身体飘忽着失去了重心，视觉呢？余华写因爆炸，五官错位，眼睛移到了颧骨的位置，“鼻子旁边就是鼻子，下巴下面就是下巴”。他以虚无缥缈，古小说中仙人的轻盈飘忽写温暖的阴间，阳间反而是阳光照着的冷酷了。反其道而锋利，余华捕捉细节的能力太强了，他通过雪花写死人的阴寒，雪花纷纷扬扬，“恍若光芒”，“飘落在脸上，脸庞就有点温暖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的顶峰作品，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写“我”走进一个故人生活的村庄，就没有这样的环境营造，只有赤裸裸隔世的真实。

在《兄弟》中，余华用50万字，写一个结结实实的人物——李光头的权力实现。这权力具体体现在对林红的性征服上，富裕权力崛起于贫困被奴役的辛酸之上。《第七天》，他用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

反身再来关怀这个贫困群体。余华大约是因不愿再重复许三观那样，对沉重的卑微的凝注，才改用这样一种凌波微步般诗意的手段，写他们因难以承受生命之重，才急切地从“那边”走向“这边”。彼岸成了“那边”，本来的阳光明媚变成凄风苦雨；“这边”本来被死神操控于伸手不见五指的暗黑的恐惧，反而变成了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桃花源。这当然是余华在追求锋利中，创作途径之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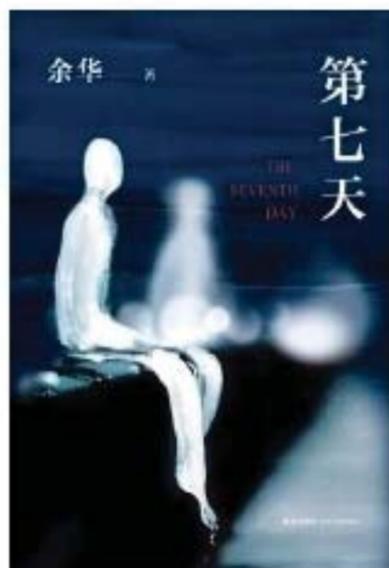
我想，余华是因不愿再写卑微者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里的残酷了，才找到这样一种反其道行之的方法。这小说中的“我”是在冠名“谭家菜”的廉价饭馆里，吃一碗廉价的面条而被炸死的。谭老板制造爆炸，是因不堪负债，负债是因各种社会权力的盘剥，生意惨不忍睹。谭老板一家到了“这边”再开张，就不再有欺压敲诈，在到处欢声笑语中，不用愁容满面了。“我”在饭馆，之所以没有逃跑，是因看到了前妻自杀的消息。“我”的美好生活是因前妻出轨始，前妻出轨是因向往富裕，富裕生活向她招手后又很快将她抛弃，将她推向出卖尊严维持生计的绝路。尊严卖光了，就只能自杀，在“这边”与“我”重逢，重温了往昔的温馨。“我”呢？一个从列车卫生间厕所降生到铁轨上的苦孩子，幸得一位铁路工人收养，在养父的艰辛中好不容易大学毕业，找到了体面的工作与体面的妻子。无奈所有美丽女人都难逃诱惑的罗网，屋漏偏逢连夜雨，妻子出走，养父患癌，只能买房辞职尽孝道。养父不愿拖累儿子而出走，儿子就开始了茫茫人海中的寻找，最后他们也只能在殡仪馆相认。这部小说里，这些人物都只呈示各自的类型，余华不愿再累赘现实世界中他们的脆弱无助，于是反过来，就写他们在“这边”获得的尊严。

小说中写得特别感人的，就是第六天送“鼠妹”去墓地的仪式。“鼠妹”之死，卑微到只因贫困的未婚夫伍超欺骗了她，送了她一个假 iPhone4S 后她自杀了。伍超守候病父时获知“鼠妹”的死讯，卖肾给她买了墓地。“鼠妹”下葬墓地前要先净身，余华描写她躺在青草与野花上，青草与野花低头凝视着她，“它们的凝视遮蔽了她的身体，青草就在她身上

生长，野花就在她身上开放”。然后，骨骼们每人双手合十，捧着树叶之碗里掬起的河水，排起长长的队列，“青草与野花接过河水，抖动着浇灌了鼠妹”。再然后，制衣厂烧死的几十个女工给她缝出一条曳地的长裙，27个死婴以带笑的歌声伴唱，这些死婴像花环，环绕着发现他们的李月珍，李月珍成了他们的母亲。这真是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里那个走向婚礼的唯美主义场景啊。读到这里，我真的落泪了。这些卑微地生活社会底层、任意被人践踏伤害的小人物，也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出光彩与尊严吧？

可惜的是，很多读者看不到作家在叙述角度选择上的无奈。这部小说出版后，遭遇的非议大约是最多的。余华因此而写了一篇文章，他说，他正是因为现实世界的冷酷，才想赋予温暖。在“这边”，那个被枪毙的“鞞丸”才有可能每天与被他杀死的民警下着悔棋，等待他得到烈士的称号，“仇恨被挡在了那个离去的世界里”。在“这边”，那个商场大火里被烧死的小女孩说：“我以前只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现在有很多爸爸很多妈妈。”余华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他是在现实世界令人绝望之后，“写下了一个美好的死者世界”。

现在，余华还在写那部新作，写写停停。“一部写了近20年的小说，清末民初时的故事。”他说。清末民初，他如何形成自己独到的叙述呢？我好奇，我期待着。✎（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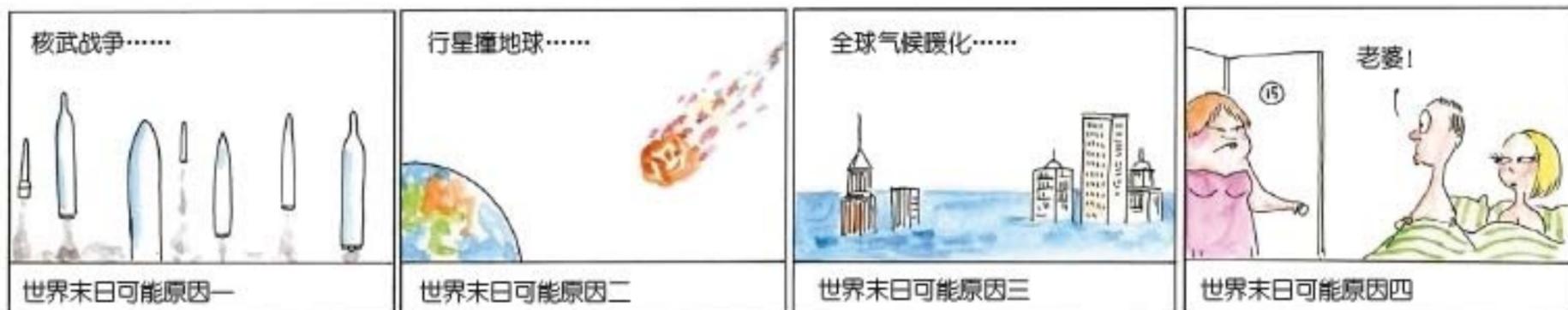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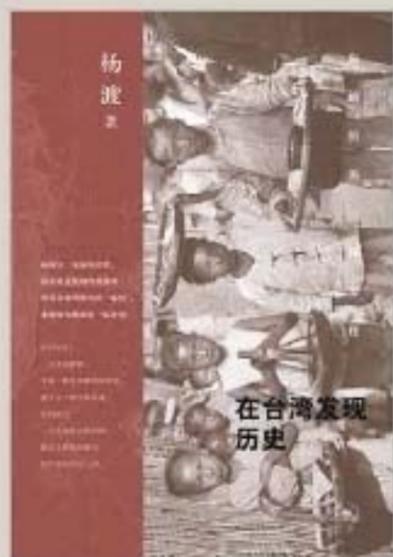
新星出版社2013年
首版《第七天》封面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在台湾发现历史：岛屿的另一种凝视

杨渡 著 定价：35.00元

“另一种凝视”，不同于“本土意识”的自说自话，而是将现在的台湾放在历史的大脉络下考量，将不被关注的另一种抗争引入视线。消失的凯达格兰族、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巨变下的一九四五年、“二二八”中沉默的母亲、迷雾中的将军……这是一部“有温度感的台湾史”，讲述被遗落的台湾故事。

圣诗撷英

冯象 著 定价：48.00元

本书从希伯来圣经和新约中撷取五十首有代表性的诗章，逐一讲解、注释和评论。译文着重体现原文的音韵、格律之讲究，也力求准确传达经文的旨趣和要义。每篇各具导读和尾注，阐发作者近年授课答疑及写作中的一些所思所得，也有助于读者理解和欣赏。



西南联大的背影

余斌 著 定价：48.00元

作者历时多年考证，以昆明大西门、文林街、青云街、翠湖等西南联大遗迹为线，以梅贻琦、陈寅恪、沈从文、顾颉刚、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等名人旧居为点，重返西南联大那段历史岁月，并对与西南联大互为背景的昆明进行浮世绘式的描写，生动呈现了一个血肉丰满的战时昆明。

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

[英]麦克法兰 等著 定价：48.00元

本书收录了英文《文汇报》自19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表的部分文章。包括对当时政府、工厂企业、文化设施等公共机构及其运作的介绍，对黄包车夫、苦力、眼斑等社会群体的描述以及对上海县城、租界的描写，是了解当时开埠近五十年的上海社会以及西方人中国观的珍贵资料。



社会变迁中的英国中世纪城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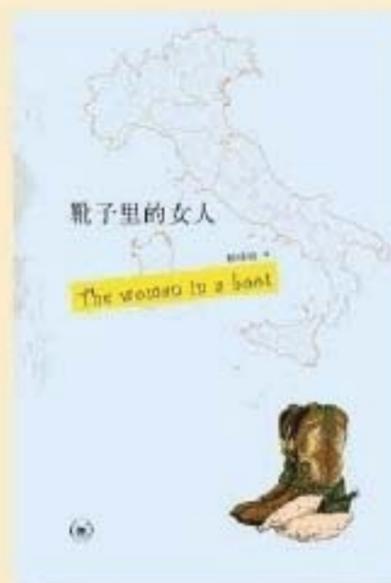
赵阳 著 定价：49.00元

城堡是西欧中世纪文明的重要载体，中世纪中晚期几乎遍布西欧各地。本书以英国中世纪城堡为例，从历史、政治、军事、文化、建筑等多学科的不同视角，探讨西欧中世纪社会大环境与城堡的兴衰。

靴子里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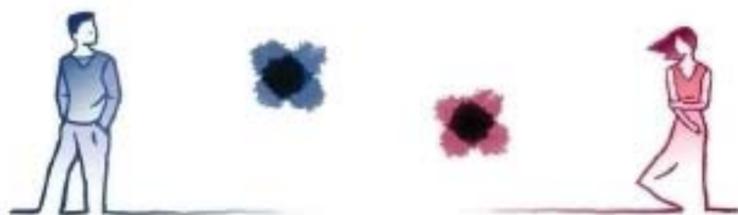
邱琪钧 著 定价：29.00元

一本轻松快乐的意大利小镇生活随笔：零零散散的小店，随风起舞的麦田，野生动物密居的森林，质朴的小镇生活，性格热情幽默的镇民，以及诙谐的意大利说话方式等等。闻名遐迩的意大利奢侈品在这里杳无踪影，人们熟知的意大利与作者笔下的意大利，是全然不同的两道风景。



离婚第十年

文 / 朵马 图 / 陈曦



在父母离婚的第十年，我第一次同时见到了他们两个人。

这是一对在结婚快二十年时离婚的夫妻，婚姻的长度几乎占了他们当时生命的一半。这么多年的同床共枕，对彼此的影响必然是刻骨的。但在他们离婚以后，我偶尔试图回忆他们之间亲切的交流、激烈的争吵，记忆却模糊到近乎虚无。

不论离婚前后，我父母的关系都不算好。相处时会因一点小事发动“冷战”，分开时彼此像对伏地魔的名字般讳莫如深。我们一家三口别说结伴出门旅行，从我记事起似乎连一同外卖都不曾有。唯一一次接近成行是在他们离婚一年后，约定在我学校旁边的餐厅为我庆生，可由于我母亲又一次迟到缺席，我只好和父亲匆忙吃了几口就回学校上自习。于是这世界上关系最密切的三个人，竟然快30年都没有一起在外面吃过一顿饭。

离婚后他们仍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在一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分手后大可以安心做一对陌生人。直到今年外公病危，我和母亲恰巧都在外地，接到消息连夜赶回家，父亲来机场接我们去医院。在他们离婚后的第十年，我们才终于有机会坐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向前行驶，那些最熟悉不过的街道在车窗外不断后退。

目的地是一个那样沉重的地方，他们的交谈却轻松畅快，仿佛多年未见的中学同学，平淡到我忘记了他们曾经是怎样地记恨对方。他们谈到共同好友的长辈过世，谈到他们这一代人如何赡养父母，谈到各地的养老院和医保政策。他们言语间对死亡的坦然，稍稍安抚了我对将要面对的事情的恐惧。

车程很远，父亲让我放首歌来提神，我把车载光盘的歌曲列表翻了十页，最后选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这张碟里我唯一想听的歌。这样的夜里我担心他们难免会因歌词而感伤，却没想到母亲一直在翻找她的手机充电器，父亲则悠然地跟唱起来。那情景

好像和两个分手多年的好友坐在KTV，感慨的似乎只有我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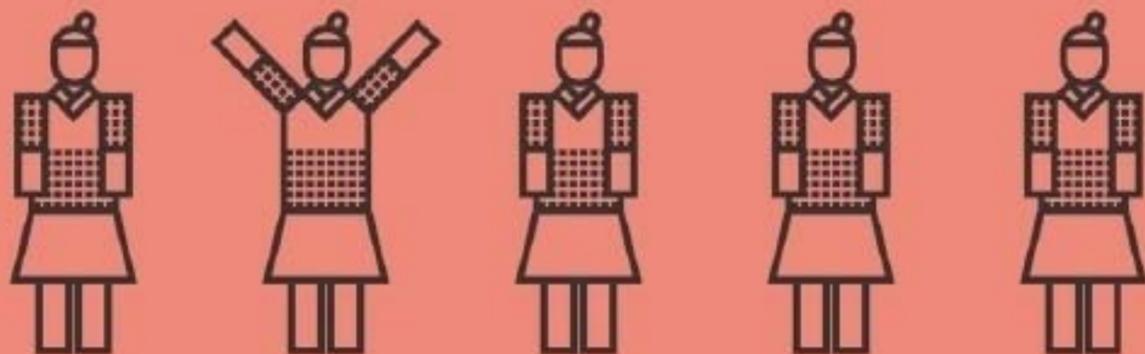
到了医院，我和母亲上楼，父亲在车里点了一根烟等待。见到外公时他已陷入深度昏迷，对亲人的呼唤都无法做出反应。我们在床边陪伴了一段时间，舅舅让母亲先回家放行李，明天再来换班。下楼时已凌晨两点，父亲把住在反方向的母亲先送回了家。

随后的几天，都由父亲送我到医院看望外公。第三天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外公情况不好。我们连忙赶往医院，慌乱中车门被划了一道几十厘米长的口子。到医院楼下父亲不太想上去。“我到那里，帮也不是，不帮也不是。”他说。我知道父亲与外公的关系并不融洽，便说你不愿上去就不去吧。

外公终究还是走了，因为年事已高且病情危重，儿女们都早有心理准备。但我仍能感到母亲的惊慌和难过，即使我印象中的外公与母亲几乎没有什么话说。的确，我只在逢年过节见过那个不善言辞的嗜烟嗜酒的老人，不曾参与过他风华正茂的前半生，更不了解母亲在我的年纪是如何与她的父亲相处的。同样，我只感受过父母之间的冷漠和不信任，见证了这段关系如何崩塌，而对他们相遇相知的过往知之甚少。

有次我忍不住问父亲，为什么你们如此不适当当初却要结婚。父亲想了想，说：“我第一次见你妈妈，她穿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慌慌张张地赶过来，我当时觉得这个姑娘还不错。”而有天我和母亲路过王府井大街，她突然提起上世纪80年代父亲到北京出差，给她买了一条很贵的牛仔裤。这是他们极少数向我提起往事的瞬间。

人与人之间，多的是其他人不知道的事。即使我是他们在这世上最亲近的人之一，也只能窥见一部分而已。父母离婚的第十年，我们还是未能一起在外吃一顿饭，会有机会的，我相信。☑



秦始皇陵考古

新发现

8月20日
14:30-16:30

北京光华路9号
SOHO 3Q·剧场(南二门)

张卫星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考古工作部主任

考古学博士，长期从事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的考古工作。2009年以来主持秦始皇陵园的考古工作，参加发掘的秦俑二号坑第一阶段发掘成果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一等奖”，目前正在进行秦始皇陵大遗址50平方公里的勘探调查与重点发掘工作。



扫码报名

阅读汇

爱阅读的人在一起



清平福来
齐白石
艺术人生

8月27日
14:30-16:30

北京光华路9号
SOHO 3Q·报告厅
(南一门入负一层)

吴洪亮

北京画院副院长

199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任北京画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齐白石纪念馆馆长等职，2003年参与策划北京国际双年展齐白石特展，2007年至2017年，策划齐白石陈列展及“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40余次，2015年参与策划“天然之趣——齐白石特展”赴匈牙利展出，等等。



扫码报名

HASSELBLAD

CREATE TO INSPIRE



这是你的自由
这是我们的热情
这是X1D



石利洛

www.shiro.com.hk

总代理：

石利洛(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852 2524 5031

北京：+010 8580 1927

上海：+021 6418 9688

广州：+020 3868 2959

✉：marketing@shiro.com.hk